

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ISSN 1001-5973

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〇二〇年第五期 (总第一九二期)



2020 **5**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 (双月刊)

2020年第5期 (总第292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商志晓

副 主 任：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 (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 宏 王 玮 王 卓

王志民 毛 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 建

主 编：李宗刚

副 主 编：时晓红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期“写实”的限度

——以作家叶圣陶小说创作为例 杨洪承(1)

中国现代文体学视野中的“型类的混杂” 周海波(14)

《野草》的主体性和矛盾性

——1940 至 1950 年代有关鲁迅思想理解的分歧之一 袁盛勇(25)

现代文学红色经典的知识社会学考释 王寰鹏(36)

□ 文艺学研究

强制阐释、公共阐释与中国阐释学的创造性建构 傅永军(48)

20 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三次转向与意义生成 付昌玲(65)

□ 语言产业研究

学术主持人 孙书文

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趋向 李 艳(76)

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 李宇明(87)

我国非通用语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董希骁(99)

经济学研究

电子银行、金融便捷及家庭消费

——基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 臧旭恒 董婧璇(107)

历史学研究

卫道、救时与应时：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特色与价值研究 张晨怡(125)

教育学研究

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逻辑向度 冯永刚(135)

影视学研究

国防电影：困境中的艰难突围

——以电影《壮志凌云》为例 张新英(145)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5(Serial No.292)

MAIN CONTENTS

Limit of “Real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aking Ye Shengtao’s Novel Creation as an Example Yang Hongcheng(1)

“Mixture of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 Stylistics Zhou Haibo(14)

Subjectiv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Weed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u Xun’s Thought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50s Yuan Shengyong(25)

Study on Red Classic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ang Huanpeng(36)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Fu Yongjun(48)

Three Turns and Meaning Generation of Western Text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Fu Changling(65)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Li Yan(76)

Data Age and Language Industry Li Yuming(87)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Industry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Dong Xixiao(99)

E-banking, Financial Convenienc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Zang Xuheng, Dong Jingxuan(107)

Defending the Tao, Saving the Nation and Dealing with the Jime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Huxiang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Chenyi(125)

Logical Dimension of System Culture Education of Schools Feng Yonggang(135)

Difficult Breakthrough of Defense Films in the Dilemma
 ——A Discussion about the Banned Film *Soaring Aspiration* Zhang Xinying(145)

英文校译:李玉麟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期“写实”的限度

——以作家叶圣陶小说创作为例^{*①}

杨洪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 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考察,五四作家的创作实践应该不限于已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和定位,叶圣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天然的接续,另一方面从开始就表现出改造现实主义的某些特质的诉求。叶圣陶小说创作不是致力于普遍事实的主题思想、宏大叙事的传达,而是体味把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细节、最了解的人物心理,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还原历史变迁与人物命运的纠缠,表现普通人的观察与时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可以触摸到有体温的人生感知。叶圣陶做人的“真诚”与小说创作信奉的“冷静”“客观”的写实,既为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又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的实践提供了完整而丰满的来去路径。

关键词: 现代革命文学;叶圣陶小说;平民立场;写实限度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01-13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1

叶圣陶这位现代著名作家,过往的文学史对其所作的“为人生”五四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定位,对于他不一样的革命人生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新探索,尤其是对他提供的现代“革命文学”发生期本体形态特殊性意义的学术价值有所遮蔽。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叶圣陶同样经历了五四前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巨大动荡,他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五四作家身上更为浓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乃至职业革命家的多重身份角色;即便与郁达夫、王统照、冰心等同属于五四新文学中有影响的小说作家相比,也不只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的简单差异。比如,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创作意义远不是浪漫主义可以涵盖的。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看,郁达夫最早将外部社会政治、现实人生、意识形态的元素和思想资源内化为作品情感的潜流,或暗示于个体精神的呈现,同时还用虚构的文学叙述现实的故事,或以社会人生、政治丰富文学的想象,并且注意与其个人的言行、政治立场交织于一身,创造了现代作家独树一帜的“富丽悲壮的史诗”^②的革命传奇人生。叶圣陶同“五四”时代一大批作家一样,也不是唯一性解读的,他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家庭状况、人生履历。清光绪年间出生于平民之家的叶圣陶,因家境贫寒,中学毕业便进入一所小学担任教员。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的那一年,年仅17岁的叶绍钧找到学校先生说,皇帝已经被打倒,我不能再做“臣”了,并请先生改名“圣陶”^③。从此,现代文坛不断可以见到署名叶圣陶的文学作品问世。当然,这不只是因为一

* 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杨洪承(1954—),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14AZD080)的阶段性成果。

②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香港思园书屋,1946年,第34页。

③刘增人:《叶圣陶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位作家的名字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五四现代作家许多读过大学,普遍有着留学东洋、西洋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叶圣陶都没有。他一做就是十年的小学教员工作阅历。从1921年到1930年,他先后在5个中学、3个大学教国文。然而,教书也只是他的“兼务”,1923年叶圣陶就应邀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31年起转入开明书店,从编辑做到新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作家叶圣陶在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五四文学之前就有文言小说刊于《小说丛报》《礼拜六》等报刊上;1919年在北京大学《新潮》有白话短篇小说发表;1921年成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大学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之一;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1928年有长篇小说《倪焕之》在杂志上连载、第5部短篇小说集《未厌集》出版。叶圣陶自述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缘起,总是谦称自己怎样没有学问,“当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而小说创作都是“偶然的机缘”,因在北京的朋友办杂志索稿,就“作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①。50岁时叶圣陶对自己的文字和为人写过的短文,用“平庸”^②两字概括,有着对自己的不满意。但是李健吾却说,“喜爱他的平庸”,正是融入作家文字和血肉的“平庸”,“成为我们的经验,好像一个亲人,不用烦(繁)文褥礼,就把温暖亲切的感觉给了我们”^③。自然,在五四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中,叶圣陶最吸引我们的不是他自我的言说,或朋友的唱和,而是他始终坚持脚踏实地、面向生活和自我、严谨又多产的创作。这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考察他的创作发生发展,探寻到作家最为本真的思想与精神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叶圣陶独特的个性和创作追求,在五四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演进中,非激进思想的先觉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政治革命,也非极端情绪的文学想象和夸张的自我反叛,甚至也不是对生活和社会的成熟、深刻解剖和批判。他面对自己的家庭和人格世界,相对熟悉的教育界生活经历和体验,以对生活和社会人生独有的细致观察、描摹和实录,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中革命文学的发生,是如何在最平凡的社会人生中,在作家感知和认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在个人无法抗拒的历史与时代涌动向前的潮流中,悄然而至,自觉不自觉地源于最普通人生活之必然。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里,立足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考察,应该不限于已有现代中国文学史分类。创造社作家由独立个体的自我张扬,将革命的叛逆和反抗,在时代、环境影响下流淌着新青年极度变动的情绪和心理意识;文学研究会作家面向现实人生的社会,将革命的意识 and 行为,体现于封建奴役的非人的打破,人生互相同情理解的爱和美之生活追求,客观地谛视、书写真实的生活细节,自觉地担当文学者的责任和使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标签。比如,现实主义作家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中写实大于情感,就表现出一种文学史的特例。就其写实性的内容与表现方式而言,他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放大与缩小,也与五四新学生成的革命文学核心理念现实的社会性、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演变有着关联。

—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天然的接续,另一方面表现出自觉改造现实主义某些特质的诉求。例如,叶圣陶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学生成的创作实践过程的关联,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作家融入社会人生,在最平凡的平民市井中所体味、感受和理解的生活。尤其

①圣陶(叶圣陶):《过去随谈》,《中学生》1930年第11期。

②叶圣陶:《答复朋友们》,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③刘西渭(李健吾):《〈四川集〉》,《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3期。

是在知识者与一般平民之间平静中的冷暖、哀苦、痛楚之爱恨与同情,或本能反应的激越、抗争与紧张冲突之革命意向,将五四以来域外译介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等思潮和写作方式一并予以接受与发展。

五四前后叶圣陶最初的创作实践,与侧重主观表现的创造社作家创作有明显不同,与同为主张文学反映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同仁也是有所区别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由冷静、严肃、执著于人生的写实,徐徐拉开了封建伦理的沉重铁幕和由人与人关系透视的社会改革的大门,从中表现出叶圣陶文学书写的独立姿态。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冰心、庐隐等现代作家,虽然创作伊始都关注社会现实,但是他们在思想和社会价值层面的思考更多于人生的实录考察。冰心以“问题小说”为内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最后的安息》等小说,是以现实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为引子,激发人们对理想人生、爱的世界的憧憬;王统照的《沉思》《雪后》《微笑》等小说也有人生问题的反映,同样也是重于“爱与美”人道教化对现实的超越。庐隐的创作世界有对生活真切苦痛的描述,读她的《海滨故人》这样的早期小说,与其说是在直面不同女性的人生,倒不如说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中所言,更多是在宣泄“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无一惬意”之情绪。这些作家大多早早冲出了自己封建的大家庭,在现代高等教育影响下率先接受了新思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迷茫的发问和美好的理想大于实际的行动,成为一代青年人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更倾向于文学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之寻找。“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批评。那么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所以我说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哲学。文学所表现所批评的便是某种人生观与世界观。”^①现代作家正是以文学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传达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遥相呼应。叶圣陶与同期作家一样经历着时代的转折。所不同的是,他远离京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城市一隅的边缘乡镇里读私塾,入中小学,因出自平民之家而未能接受现代大学教育,为生计早早做了小学教员。为此,在五四一代先觉的知识分子中,叶圣陶没有像陈独秀等作家那样成为激进的政治思想家,也没有像王统照等作家那样成为直接经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青年学生,而是以自己城镇生活的真切体验和自幼偏爱的文学兴趣,由普通的平民之子无法回避地经历着历史变革和时代动荡。他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形成了平和、踏实和稳健的文化人格,及其严谨而冷静的写作风,尤其务实地关注自己熟悉的市民生活,并且真诚地表现它们。

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学之前,叶圣陶用文言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刊于《小说丛报》《新闻报》《礼拜六》《妇女杂志》等报刊上。最初写作,他有拿文艺来敷衍生计的动机,自言投稿“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皆寄之”。但是,叶圣陶一开始所抱创作“宗旨:不做言情体,不打诳语……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重在“写实,不在虚构。”^②像《穷愁》《贫女泪》《博徒之儿》《春燕琐谭》等小说,就作品标题即可见“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③。丝厂失业的贫穷工人阿松(《穷愁》);受尽婆婆百般凌辱的贫女云娘(《贫女》);嗜赌成癖、时常对儿子王根生大打出手的父亲(《博徒之儿》)。这些文言小说并不一味迎合市民的趣味,而是真实地描摹民国初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世相。五四前夕,叶圣陶经朋友介绍入北京大学“新潮社”开始了白话文的新文学创作。1919年2月,他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刊于同年3月《新潮》第1卷第3期。小说写一个没有名字的农家女子,“伊”15岁出嫁

①瞿世英:《创作与哲学》,《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7号。

②顾颉刚:《〈隔膜〉序》,《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③叶圣陶:《过去随谈》,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

受尽婆婆虐待,丈夫病逝后,婆婆认为“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意义”。伊的悲惨命运不仅是没有人的尊严和地位,而且最终还如同牲口一样被随便买卖。这里所呈现的正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卑微女子非人的生活。作家在冷静的故事叙述中,将全部意蕴传达在小说结尾的这段话中。这既完成了故事的结局,又杂糅了作家怜悯与苦痛讥讽的复杂情感。这篇小说后来作为首篇被收入叶圣陶第一部短篇集《隔膜》,并改名为《一生》。短篇集里作为作家1922年之前早期创作的20余篇作品,大都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人与事之冷静叙述,富有含蓄而不夸张的人道关怀和讽喻意味。如在小说《伊和他》《欢迎》《母》《萌芽》《潜隐的爱》等篇目里,借用小说中的话,作家侧重描摹和渲染着“世界的精魂,是爱,生趣、愉快”(《阿凤》)的一种理想美满的平民生活状态。作品所写的学生、低能的儿童、婆婆、媳妇这些普通人,他们的心底有着极深挚的慈爱 and 情趣。同时,小说中又有真诚目光注视着平民社会底层的人们,叶圣陶寥寥几笔叙述人事情境,或一个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介绍,更多是写与“爱和美”的生活相互映衬的不协调,不经意带出了生活中的血与泪,各色各样的人们心中不同的悲哀。如《阿菊》里家中做零工仆役的父亲、搓草绳的母亲;《恐怖的夜》里受到兵荒马乱战事困扰,在车站等待着外出多年的弟弟归来的哥哥;《阿凤》里佣妇杨家娘与12岁渔家孩子童养媳的阿凤;《寒晓的琴歌》里10余岁就拉琴卖唱的小女孩;《苦菜》里只有一个“还租”念头的种田、买菜的农人福堂;《绿衣》里总是“一种沉重而紧急的脚步”,“瘦削的两颧在灯光里显出苍白的颜色”的送信邮差;等等。叶圣陶最初的这些创作实践,他自己很清楚“文艺的本质是思想情绪”^①，“不应当把小说看得太容易太浅薄,专事探取人间庶事,辄为记录”^②。他的一篇小说和第一个小说集取名《隔膜》,与上述的大部分小说篇目名字、其中内容似乎有些突兀,恰恰体现了作家思想追求。1921年5月30日,叶圣陶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坦言:“我有一种空想,人与人是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我没有理由,只是有一种信念罢了。这一层膜,是有所为而遮盖着的;待到不必须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我没有别的能力,单想从小说里略微将此义与人以暗示。”为此,叶圣陶早期小说看似叙事与情感分离、内容与标题相悖,恰如顾颉刚所言:“他所以表现这种微妙的爱,并不是求在象征主义中占一席之地,只是要把残酷的社会徐徐的转变。”^③

可见,叶圣陶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及其思想情绪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旨意并不在于发现了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隔膜”现象之思想的文化批评,甚至也不是五四初期一度流行的“问题小说”“哲理小诗”,许多作家探索人生的发问与哲学的思考,要急切地开出解决人生诸问题的“药方”。他将“隔膜”这一社会现象化为冷静平实的人与事的叙述,温和而有节制的感情表现,这与同期革命作家用政论杂感方式解析此社会病态有着相近似的认识。在清晰与不清晰之间的模糊姿态,倒是代表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作家思想的真实。可将上述叶圣陶在通信中的表述、小说《隔膜》的叙事,与李钊同期《精神解放》短文作一对读。“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的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

①叶圣陶:《文艺谈·二》,《晨报》(副刊)1921年3月6日。

②叶圣陶:《文艺谈·三》,《晨报》(副刊)1921年3月10日。

③顾颉刚:《〈隔膜〉序》,《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

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①在《隔膜》中,叶圣陶描写茶馆里的茶客“每天聚集在这里”,“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藏着”,“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是这里的空气的性质”。小说创作者与政论革命家不约而同地解剖“隔膜”的社会怪象,李大钊“精神解放”的根源分析不无片面简单,叶圣陶认识社会的“信念”也有模糊茫然,这恰恰反映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和其限度。叶圣陶从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动中,触摸到五四时代跳动的“革命”脉搏,这样的面向人生的文学写实,较之冰心、王统照等作家只是发问人生究竟是为为什么,人生有没有意义,或沉浸于哲学思索,要更为务实而客观地正视生活。叶圣陶新文学创作伊始就写他熟悉的普通人,唤起人的本性,同时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是他的简单也是他的成熟。为此,现代中国文学最初“革命”的书写,正是通过叶圣陶笔下温和、稳重的普通人思想的涌动,百态世象的人与人关系预示着社会变革的点滴先兆。这不同于陈独秀等思想社会活动家大张旗鼓的政论启蒙“革命”的呐喊,也区别于郁达夫等作家笔下宣泄情绪的叛逆夸张式的“革命”文学表现。

二

1922年以后,叶圣陶的个人生活、工作有了较大变动。“在民间”的“抗争”中,他从市井生活的身份认同到阶级冲突的零星片断场景,真诚的记录,或平实的叙事,勾勒了社会革命和个人变动互为交织的人生线路,最早将现代意识形态某些革命因素逐渐转化为文学想象。

这个时期,现代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迅速急变的时代。此时,叶圣陶在自己家乡城镇做了近10年小学教员的工作,自1921年秋季起,应朋友之邀请先后去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中学、杭州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期间,叶圣陶在“杭州一师”结识了后来的革命作家赵平福(即“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潘漠华、冯雪峰等,与他们组织成立浙江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晨光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成为该社团的文学创作最勤勉的中坚作家。在上海又与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等作家创办出版了第一个专门发表新诗、研究新诗理论的刊物《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创作丛书,其中包括他在内的8位诗人合集《雪朝》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等。个人的生活总是与时代社会的大潮起落相生相伴的。当叶圣陶离开故土苏州城一隅的乡镇,走向更为开阔的社会人生之时,现代中国社会既是普通人经历着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又是悄然发生在每一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爱国运动在从高潮到落潮的过程中,1921年,孕育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发生“二七”惨案;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5年上海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遭杀害,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民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初,在上海的后期创造社与中共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发起倡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叶圣陶由家乡做了近10年小学教员的职业,转向去中学大学教书和接手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并没有多少坎坷,而正在迅捷发生着的大时代社会的动荡突变之情势,

^①孤松(李大钊):《精神解放》,《新生活》1920年2月8日第25期。

对于每个生活的普通个体人生来说,这似乎有关又无关的影响着我们的作家。五四之后,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持续,普通市民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困扰,正得益于相对平稳安静的教书编辑生活。后来他说:“大概还要写小说,当职业的工作清闲一点,而材料在我心头形成一个凝合体的时候。”^①截止到1928年底,在大约五六年间,叶圣陶创作出版了《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四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部童话集,与俞平伯合集的一部散文集。这些正是作家所说的“清闲”状态下的创作收获。它们浓缩了作家这段实际生活的素材,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鳞一爪的镜像。叶圣陶这样自述:“现在回头想一下,我似乎没有写什么自己不怎么清楚的事情。……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②作家如此严肃地面对生活,为我们探求五四之后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另一路向,尤其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边缘,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实例。叶圣陶避免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致力于普遍事实的主题思想、宏大叙事的传达,在娓娓道来的叙述和生活细节、人物心理的还原中,表现普通人的观察和触摸有体温的生活,寻踪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完整而丰满的来去路径。叶圣陶关于“现实”与“真实”的创作理念和其独立的践行,很值得重读和再思考。

1930年代,钱杏邨针对作家创作的取材,指出叶圣陶“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③。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评价:“以客观的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叶绍钧。”^④1980年代,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叶圣陶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名手,是一个典型的人生派作家”^⑤。显然,过往文学史家笔下的叶圣陶小说创作的评判,更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思想内容之主题考量,特别看重外部世界与作家的关联,这应该不无是一种最迅捷提炼作家作品价值的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寻觅叶圣陶小说创作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最容易理清的线路。但是,“现实主义小说永远的痛楚地挣扎,通过疏远主题说教,以摆脱语言教条式或推论式的运用”^⑥。重新解读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本体结构组织,也就可以发现对他“教育小说”“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为人生”的作家作品定位,远没有深入小说文本人与事的“真实”世界与作家生活的“现实”环境之多元互动的考察。当钱杏邨给予叶圣陶小说创作“黑暗暴露的多”“表现的人物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人物”^⑦等批评时,实际上,已经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写实主义创作,乃至他们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和某些思想需要的过滤。

叶圣陶小说创作的实际应该远比文学史家批评家概括的思想主题或形象类型丰富而复杂得多。叶圣陶《火灾》以后的小说集,作家一方面继续保持他严肃认真的写实姿态,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民间”生活里的多重元素叠加,委婉而间接地表达关怀与孤独之情愫;另一方面在并不刻意回

①叶圣陶:《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41页。

②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

③钱杏邨:《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80页。

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

⑥[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⑦钱杏邨:《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77页。

避实际情形的真相下,由生活断片客观描摹出某些社会的裂隙,无意识地传导了大时代急剧变动的信息。从这些作品中大体可以看出作家静动交叉视角切入现实的平民生活:一是动态的人生行进中实实在在世界的观察与描摹。“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我晓行于乡间田头,有了乡村实感的描写与农人面对面的交谈:“前年的灾情真厉害。去年好些吧?”“好些,他冷笑真说”(《晓行》)。“一艘‘常熟快’由小汽船拖着”,“循环通行于乡镇间”,写下了船舱的各色乘客、旅程中好事人的说事,经过村集船上人的眺望与嘈杂,更有我听到“农村破裂的先兆”的沉思(《悲哀的重载》)。长途航船正是一个老妇叙述的“珠儿家的故事”,打破了船上的“沉寂”和乘客的“无聊”,也“引起了我的感情”(《旅路的伴侣》)。舅父带着外甥去贡院参加科举科考试,一路想着随身提篮里“可爱的翠绿的”马铃瓜,应试中一进贡院就吃马铃瓜,赶考结束还想着“回家去要求父亲再给我买两个马铃瓜”(《马铃瓜》)。逃难使得“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思,就现出异样的神色”,潘先生的一家人终于“从兵祸凶险的地方”逃出来,他“乐哉乐哉”的(《潘先生在难中》)。两年未见的藻如与忆云,一天在途中不期而遇,曾有的情愫和现实境况碰撞出彼此心灵的“微波”,却最终静止于“种种窒碍之处”(《微波》)。这些篇目足可见行进中的人生世相和一个个不安的心灵,又与生活中一些意识的弥漫关联。二是静态的生活环境工作场所中人与事的实录。自然,叶圣陶写得最多的场景还是他熟悉的城郊乡镇的中小学校,及其学校里的教员。比如《饭》《义儿》《乐园》《前途》《搭班子》《校长》《抗争》等小说,都集中于学校生活环境的描写和教师诸相各色人物的生动刻画。这些作品中《游泳》一篇为两者融合最佳。喜欢说大话的体育教师司徒先生言与行,串联起“星期日的上午,几位教师聚在休息室里闲聊”,及“一群人奔向”学校后面河边围观司徒先生游泳的场景。作家叙述司徒先生游泳前后的全过程,抓取极富现实感的情景,其场景热闹与冷酷并存。这表现的不仅是学校教育界一角,而且是“一种时代现象,社会生活”^①。除此之外,叶圣陶小说也有非常态的性爱人生的描写(《被忘却的》《归宿》);最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生活的关注(《醉后》);还有儿童世界的纪实(《小蚬的回家》《小铜匠》),等等。这些人生片断不只是作家熟悉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作家认为“合于事理的真实,切乎生活的实况”,我“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②。叶圣陶小说静动交叉增强了取材和描写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静动互动介入了人与事的叙述,实写的故事与作家主观立场获得了自然的契合。所以准确地说,在小说世界里,作家更多是对他熟悉的个体和群体内外生活的真诚的体验和细致的观察,从而将这段从五四到大革命时代社会里,一些少被人关注的普通人生活在其笔下还原和复活。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在叶圣陶的眼里,“五四”的一切价值重估,“五四”过后思想的裂痕,困境的突破,生活大变动前的点滴先兆,并不完全都是轰轰烈烈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呈现。相反,将一切放眼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实际人生的本真事相,芸芸众生的情感起伏中的种种“革命”信息。他们可能会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标识,如《孤独》里在家庭亲情、世人面前的老先生,摆脱不了被冷落甚至奚落的孤独之感,只有幼年的深刻记忆,循环不已的思念。这里虽然不是鲁迅小说《孤独者》时代落伍者魏连受的孤独,也没有郁达夫笔下“零余者”贫困而自怨自艾的孤独,但是家庭与社会的“孤独”何尝不是一体的呢!同样在《平常的故事》中,叶圣陶通过主人公仁地的小家庭理想与现实的抵牾,传导的是一个交替时代常见的惆怅和烦闷之情绪。因为作家本着现实人生的取材,所观察到变化和“革命”气息,更多源于普通人的某一愿望或某一言论

①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第20期。

②叶圣陶:《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小说月报》1924年1月10日第15卷第1号。

和行为;或普通人最实在的本能生存所需、所逼迫的反应。如《校长》《搭班子》两篇短篇小说,叙述故事旨意不在一个光明的结局,而是着重刻画两位小学校长叔雅与泽如的犹豫不决、动摇于习惯势力压迫,最终耽于理想和美好计划。还有在《潘先生在难中》《一个青年》《饭》《去病》《前途》等小说里普通市民的教员、编辑等人生经历和生活片断,都在为不丢掉饭碗,保持一份职业,而忍气吞声地活着。他们不乏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可是都经不住贫困、饥饿的威胁。这一发生于市井阶层的生活面影,难道还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作家主观的意愿吗?当然,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政治革命的迅速推进,再怎样含蓄和节制的生活写实,作家笔下也不免留痕时代的激越气息和呐喊。1924年以后,叶圣陶小说中的现实社会政治内容明显加大。1925年的《线下》小说集的最后三篇小说《金耳环》《潘先生在难中》《外国旗》,都涉猎军阀战乱和士兵生活的社会背景。而1926年的《城中》短篇集里的《演讲》《城中》《到民间》等篇目,学潮、赤化、工人罢工等社会政治术语和事件已经穿插在叙事之中,出现了受新思潮洗礼,有勇气、热情的而并不都是灰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到1928年的短篇小说集《未厌集》,《一包东西》《抗争》《夜》《某城纪事》等小说,黑暗社会,政治斗争、阶级冲突,甚至屠杀、白色恐怖等革命与反革命的镜像,以及投机革命者和反抗斗争者,也都成为了作家写作取材的内容。

从五四到大革命的人生社会的纪录,叶圣陶并非简单地追随社会的进化或激变,而是淡淡地素描,舒缓地叙述,冷静地审视,发掘普通民众身上、生活细节中的变动和革命元素的滋生。这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与表现,提供了又一种有生命体温的书写路径。

三

1928年《教育杂志》第20卷第1号“教育文艺”栏内开始连载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第20卷第12号刊登结束;小说从本年1月份开始到11月15日写完。“严正的态度如实的写”:从个体到集体、家庭到组织,倪焕之的奋斗和精神史透视了社会政治革命的肌理纹路,从而成就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创作的一部典范性“史诗”文本。小说写作和连载的时间正是文坛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大张旗鼓地倡导革命文学,并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期。但是,无论是作为倡导者还是论争者,小说作者叶圣陶均不在其中。在创作自述中,他说写作这部小说“无所谓对谁最抱同感”,“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①。显然,小说并不是为迎合革命文学倡导而作的,比如作者直接投稿的教育杂志社就是非激进的。作家仍然坚守着一以贯之的原则:“如实”“真诚”的创作态度,所写内容也保持了作家之前得心应手的教育题材,学校生活,教师学生为主的人物系列。而他对别人冠以“写实派”作家的判定并不以为然。更有意思的是,同时期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的双方都关注到叶圣陶的这部小说,并且都对《倪焕之》小说做了意见相反的文学批评。钱杏邨认为这“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反封建势力的教育小说”。其小说人物虽然与茅盾笔下人物相近,但是“可以给予相当的宽容”,而茅盾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人物,都是表示着幻灭动摇”;“要给予严厉的指摘和批判的”^②。茅盾也借《倪焕之》立即回应了钱杏邨等的批评,他认为叶圣陶的这部小说是“扛鼎”之作,具有“时代性”,其人物“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③。这里,他们

①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37页。

②钱杏邨:《文艺批评集》,《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1、373页。

③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5月8卷20期。

的不同立场和角度导致文本解读的差异,实际并不重要,关键是针对叶圣陶《倪焕之》小说创作的文本案例,出现的关于革命文学共同话题的批评与反批评之现象。就作品本身而言,小说叙述的倪焕之个人奋斗史,作品所包孕的主人公人生的三大领域——教育、感情和政治^①,密切联系着个人与时代的一系列典型而丰富的社会信息。就文学史而言,五四以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小说人物浓重的自传色彩,客观展示了五四以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彷徨于自我独立与社会解放的艰难抉择。小说真诚披露人物一路前行丰富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中革命文学生成可能的多元路向和不同视角的阐释空间。我们如果跳出当年钱杏邨与茅盾等关于应对时代历史之变,而倡导革命文学的论辩思维,回到作家生活的实际和小说客观叙事的创作原点,就会看到,叶圣陶的人生经历和《倪焕之》小说的故事,很大程度并非是刻意为了革命文学量身定做的,作家也不旨在革命文学的写作。诚如小说发表不久作家夏丏尊指出的:“评价一篇小说,不该因了题材来定区别。因《倪焕之》中写着教育的事,说它是教育小说,原不妥当。因《倪焕之》中写着革命的事,就说它是革命小说,也同样地不妥当。……作家所描写的是事实,责任但在表现的确否。”^②相反,作家自己与其小说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还原本色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朴实平淡的文学镜像与镜像文学的书写之中,呈现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与流变的过程,给予了市井贫民生活的某些本真细节的留存。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究竟是如何还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事实”呢?作家整体创作文学世界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走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说伊始,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倪焕之就这样描述“武昌光复”的辛亥革命,“武昌新军起事,占领火药局,直攻督署”。“中学堂里,当然也包藏着被激动的心。学生们这样想,现在革命了,还上什么课呢!”再过了几年,“‘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1925年5月31日倪焕之纪实“东方大都市上海,前一天正演过暴露人类兽性,剥除了文明面具的活剧”。随之“‘五卅’惨案”的发生,主人公也参加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市民罢市的社会政治运动。小说最后,倪焕之献身革命的旧同学王乐山,是“被装在盛米的麻布袋里,始而用乱刀周围刺戳,直到热血差不多流完了的时候,才被投在什么河里”^③。以曾经给他“好些慰藉”的革命党人惨遭杀害,暗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情景。这部“多少带着些自传意味”^④的长篇小说1928年完成以后,不论是激进革命立场的钱杏邨评价小说人物“对革命的阶级没有明了认识”之批评,还是茅盾认为小说是“扛鼎”的工作,夏丏尊说给文坛“划一时代”之肯定,客观讲,他们褒贬之言都与当时社会政治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情势密切关联,乃是假小说评判之名,传导他们的“革命”理解和期待。自然,通读小说也不难看出叶圣陶想要表达的革命观,与当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论争者理解的“革命”并非完全一致。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释革》里指出:“革命”是指“人群中一切有行无行之事物,无不有其”变革。叶圣陶创作的实际与小说本身内容与此所言的“革命”更为贴近。小说中主人公倪焕之的人生奋斗和成长经历,作家只是“严正的态度如实的写”而已,正是以其个人视角对平凡生活的纪实和还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革命,除了社会政治的变动、朝代的更替外,更多的是普通人生活之中带温度的无奈和超常,所反映出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之悄然变化。这突出表现在长篇小说用了三分之二多的篇

①[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②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70页。

③《叶圣陶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0、318、318、332、397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56页。

幅写倪焕之的个人成长史。他最初厌恶小学教员的工作,不断更换大同小异的学校,使得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倪焕之憔悴、孤寂,而在遇到留学归来的小学校长、开明乡绅蒋冰如之后,焕发了青春,变成了理想主义的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教育事业。这里有叶圣陶长期教育和中小学教员生活的体验与感情的集成,也有他熟悉的朋友人生经历和事情的记载。小说花了比较多的笔墨描绘倪焕之与蒋冰如一起从事教育改良,提倡学校儿童本位,感化关爱式教育并且积极实践学校兴办工场农场,半工半读,学校应该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缩影。显然,即便思想解放的五四过后,在经济相对富庶的江浙的城镇,倪焕之的改良教育的计划实施过程中也都受到重重阻力,很快夭折。这一过程被作家在具体故事情节里、在人物矛盾冲突中写得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较之短篇小说的片段更有了人世间生活的全景展示。短篇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吴先生《饭》、惠之《前途》、丁雨生《城中》,等等),一件件事情(《游泳》教员们的无聊围观游泳、《潘先生在难中》军阀割据的战乱、《校长》里的治理校风校纪的新方针,及教员中流言蜚语,等等),都进入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由主人公倪焕之串联起来了。我更认为小说的“革命”意识首先应该来自倪焕之个人成长过程全景式的“自我革命”。作家坦诚地客观写实,“不敢存在玩弄的心思”,完整呈现了倪焕之这类普通知识分子寻路、追求、而又迷路、孤寂的人生经历。小说中倪焕之自我思想革命的高昂与衰落之全过程,表面看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演变的基本线路,而实际上,小说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言行在作家笔下是有自己取舍的。比如引导倪焕之思想走向的小说中两个关键人物,即前述小学校长蒋冰如和小说过半出现的过往同学、革命者王乐山。前者对倪焕之一系列有志教育救国的构想和教育改良的实践活动,均给予积极的支持,提供他的学校平台;后者以其红色鼓动、革命激情及其为革命的悲壮献身对倪焕之的思想的每一次波动和最后的彻底幻灭,都有着极大影响。作家的处理还不在于前者写得生动而细致,后者叙述的简单匆忙的粗线条点到为止。小说现实主义的真实是将自己生活经历的人与事化为切身体验和感受的文学世界。在叶圣陶的文学叙事中,前者非虚构的成分较重,而后者多有虚构的印象中的内容。且不说王乐山这个革命者形象对作家的陌生,作品几乎很少对他有着生活化的描写;就是倪焕之一生如此巧合浓缩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大革命失败等近现代中国交替时期所有重大历史的政治事件,这些也都不无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这部小说成功恰恰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家有限制地讲述了倪焕之的个人成长故事。他直接叙述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由一个市民视野、普通知识者的生活所及,尤其是在非政治文化中心地的革命边缘城郊乡镇所见所闻。作家有意与无意的本真写作还原了革命如此悄然发生于生活之中,成就了并不着意于宏大叙事的最接地气的革命文学的另一文本样态。应该说,这些多源于小说家叶圣陶坚持自己独立的写实主义创作立场,努力向外获取自己认知的社会“革命”资源及其叙述策略。

四

《倪焕之》作为五四新文学初始阶段有代表性的革命文学文本,还不只是人物与故事中将社会政治事件的变动要素和主人公理想的教育救国、教育改良的活动有机结合,而更用心于以严谨的态度还原日常生活的青年男女的两性关系、情感世界,将五四以后无法回避的爱情与革命话题最早作出了自己的诠释。

小说中关于倪焕之与金佩璋的恋爱、蜜月生活及其家庭婚姻之过程描写,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中个性解放的爱情、反封建的婚姻之高调,而是揭示了向着生活本真的男女关系,以及由爱情与革命两个话语范畴的抵牾、融合所表现的社会革命之内在张力。小说以“和谐爱情”“美满

婚姻”“妻子与同志”的书写，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伦理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的话题，及其爱情与革命予以了一种极其温和而超常的文学表现。

倪焕之一生理想的爱情婚姻与理想的教育改革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人生最终的悲剧结局，从表面上理解是其现实面前双重“理想”的破灭。可是，叶圣陶在这个人物身上，对五四以来共识的爱情观采取了另一种表达，将男女彼此爱情的缠绵、家庭的和谐、夫妻的温情之细致描写，与历史的政治事件、社会发生的革命活动等多重内容交叉融合，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伊始大量婚姻爱情与革命的书写。小说平实叙述市井平民男女的结合，还原了五四文学表现爱情、描写婚姻、书写革命最为丰富性的一面，提供了传统的回归与现代的追求并不矛盾的生活案例。

小说将倪焕之与金佩璋的相识相爱、同道相知、结婚成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在此之前，五四时期大量爱情题材的作品尚不多见这样的书写。比如胡适的《婚姻大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郁达夫的《沉沦》、杨振声的《贞女》、张资平的《爱的焦点》、汪静之的《蕙的风》、冯沅君（淦女士）的《卷施·隔绝》、鲁迅的《伤逝》等作品，集中地表现了来自个体和家庭在恋爱婚姻上的悲剧或痛苦情愫，彰显出自我的个性解放和人对于自由独立的期盼。新文学在一时间如此广泛而突出的婚姻爱情的内容，诚如鲁迅所言：“爱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而无爱情婚姻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①现代中国作家最先以生命主体的切身体验和真切感受，大都将自己的婚姻爱情的不幸经历作为了原始的创作素材，甚至直接把虚构的文学等同于真实的生活。情爱与性爱的话题，以及延伸的婚姻和家庭、妇女的问题，本质上是率先觉醒的现代作家们对长期压抑下的精神情感世界的一种宣泄，一种本性的释放，一种追求身与心完整自由的象征。《倪焕之》的主人公倪焕之到学校任教的第二天，结识了女子师范里同学的妹妹金佩璋，大有一见钟情；后来他们又在灯会上不期而遇，一段倾心交谈，彼此并有了互相的爱慕；接下来开始书信交流，金小姐去倪焕之教育改良实验的农场参观，共同的志趣和教师职业，双方感情的发展又进了一层；后来倪焕之写信求婚，爱情之花的绽放，也如同水到渠成。他们开始商量如何说媒、要不要举办浓重婚礼，规划幸福的未来生活，等等。甚至，婚后两个月，金佩璋便有了做母亲的资格，也是那么自然天成。这一切在小说的10个章节里完成，占了全部小说文字三分之一的篇幅。小说爱恋婚姻过程描摹得极有生活的情趣，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彼此感情、心理的发展也写得细腻而生动。其中传统媒妁之言、礼仪孝道，与现代自由恋爱、志同道合，交替时代新旧婚姻爱情观并不矛盾地呈现于这对青年男女身上。叶圣陶以日常生活的市井平民视角，通过倪焕之与金佩璋的爱情婚姻还原生活中普通人之间的温情和谐、美好的人生。小说重心在爱情、婚姻过程的细节描写和两情相悦的情感表达，而不是五四文学作品重在强调爱情本身的革命（包括性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妇女革命等），或者将“爱情”仅仅作为时代的个性解放的象征。

叶圣陶如此写作，在小说中多少有个人的人生投影，作家本人婚姻经历与其故事情节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开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来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②小说虚构的故事与作家生平的自述构成了两个可以对读的文

①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2页。

②叶圣陶：《过去随谈》，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本。它们的一致在于男女的两性关系,本质上是个人身体经验和性别认同。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即便没有高扬爱情,婚姻彼此也是满意的,并不存在一方的压迫或另一方的反抗。故事和人物的变化出现于小说最后10章,倪焕之被五四运动唤醒,在同学革命党人王乐山的鼓动下,投身于革命的他如同换了一个人。他从“教育救国”转向革命,来到了上海,热衷参与各种集会结社、演讲等社会政治活动。当革命失败后得知王乐山惨遭杀害,理想旋即幻灭。同样,和谐的婚姻也有了变化,妻子金佩璋安心呆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他不满地感叹“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打击,使倪焕之开始迷茫、消沉,极度的悲哀至身体重病而死。叶圣陶小说中的革命只是粗线条呈现,写得较为简单,王乐山被害后小说匆忙结束。但是,倪焕之悲剧结局不是回应大革命的失败,相反激活了爱情。倪焕之病逝后,妻子金佩璋哀伤,“但并不昏沉”,而是觉悟了先前被家务所困,受旧思想的束缚。“心头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我要出去做点事儿;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重新追随当初夫妻共同的志向,她决定“要向外面飞翔”。^① 这便“真实地记录了献身民国教育的倪焕之、金佩璋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和情感裂变的种种艰难,其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②。

1925年之后,当五四作家普遍面临着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困扰,叶圣陶本着忠实于现实的理解和生活的体验,并没有像同期或后来的许多作家落入“革命和恋爱的冲突”的陷阱,如蒋光慈的《冲破云围的月亮》、丁玲的《韦护》、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等作品流行主题、人物“定型的观念”^③的模式。叶圣陶笔下金佩璋女性、妻子、学生、教师、同志多重身份角色的处理,比起革命者王乐山的塑造要有骨感。男女两性关系、生活和情感的书写,较多于普遍性的活动和本真性的意识的细致展示,金佩璋前后思想的差异与转变基于常态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基础。她殷实的家庭背景和接受的女子师范新学教育,包容了新旧时代诸多复杂而丰富的内容集于一身。对这一人物,作家没有过度的拔高或贬低。小说通过贴近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人生过程赋予了人物的筋骨和温度。为此,她对倪焕之的人生之路,短暂的革命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异性、妻子、伴侣、同志的衬托,更重要的是她既走进了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又参与了倪焕之真实的精神心理的建构。小说最后,金佩璋作出到广阔的社会里的决定,与其说是她的又一次的人生选择,倒不如说是对倪焕之未尽革命事业的自觉认同。金佩璋将走的是不是“一条新的道路”呢?她,包括作家本人也并不清楚,但是“唯有”必须走出去。小说以此结束,有着与人物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就在于爱情与革命、文学与革命、个体与群体的关联,这些对许多人来说,虽然还很模糊但是已经无法回避了。这样一种必须思考、必须行动的决绝过程,也正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真正产生的过程。这是叶圣陶《倪焕之》小说的历史价值意义所在。

叶圣陶此后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参与当时1928年前后热闹时髦的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甚至也没有参加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团体组织。叶圣陶依然本分地做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或教书,或业余时间写作。但是,无论倾听他文学创作字里行间传达的个人心声,还是感受他的创作纳入文学史同辈作家行列的时代共鸣,都能发现作家以自己独有的平民立场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并非是一味闭门读书的知识者。如果以叶圣陶1928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创作时间为界,那么,从1923—

①《叶圣陶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10页。

②李宗刚:《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1933年间,他的创作道路恰恰为最初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勾勒了一条生成发展的线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非主流革命文学的另一面的样本。前述叶圣陶本着忠于现实生活,为人生的创作起步,1925年之前,一鳞一爪地写他熟悉的小市民的各色各样的生活。小说《潘先生在难中》、长诗《浏河战场》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但是他不是鲁迅“呐喊”“彷徨”式的冷峻的现实批判,而是冷静的观察,忠实的记录,偶有“一讽”而已。1925年以后,他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同胞”的枪弹》等散文创作,与此时的小说《夜》《一包东西》《某城纪事的》等短篇小说,表明作家注意反映“在民间”的“抗争”。至此,1928年的《倪焕之》长篇小说水到渠成,可谓集作家教书生活经历和感怀世事艰难之大成。它是在革命作家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之后,在政治历史和个人生活相交叉的长时段客观写实中,表现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初期的力作。当文坛进入1930年代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期,叶圣陶虽然只有《一篇宣言》《多收了三五斗》几个短篇,但是其作品依然可与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一同进入革命文学作品行列。最重要的是,叶圣陶仍然保持着 he 独有的普通平民立场,以及冷静观察、客观写实的创作特点,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尝试不一样的书写,真实表现出社会现实中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革命诉求和革命内容。

Limit of “Real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aking Ye Shengtao’s Novel Creation as an Example

Yang Hongc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practice of creation of the May 4th writer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existi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e Shengtao is a typical case. On the one hand, his novel creation has a natural succession to the traditional realistic creation method, and on the other, it shows the demand for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ing realism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reation. Ye Shengtao’s novel creation is not devoted to the theme of general facts and transmission of grand narration, but to the tasting and feeling of his most familiar details of life and most familiar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s,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in his pleasant and natural narration, and to show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society of the times so that the perception of life could be touched with body temperature. Ye Shengtao’s “sincerity” as a man and the “calm” and “objective” realism believed in in his novel creation not only make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lism creation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 a complete and full way for the initial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moder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Ye Shengtao’s novels; common people’s position; limit of realism

责任编辑:孙昕光

中国现代文体学视野中的“型类的混杂”^{*①}

周海波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型类的混杂”是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创作的批评。梁实秋认为新文学文体特征及其功能紊乱,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诗可以叙事,这是文体功能的混杂,是浪漫主义过了头。但是,“型类的混杂”是现代文学的文体杂糅的表现,是新文学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和借鉴外国文学进行文体创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是新文学文体变异的艺术追求。新文学文体建设表明,文体发展即是文体的不断成熟与丰满,也是文体的变化与创新。文体的守正与出奇是坚持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美学原则,还是寻求新的文学形态,这是文体美学原则的分野。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文体形态;文体意识;古典主义;梁实秋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14-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2

“型类的混杂”是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提出的:“‘型类的混杂’亦是浪漫主义者的一大特点,例如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这是文学内部型类的混杂。诗与图画同为表现情感,音乐里奏出颜色,图画里绘出声音,这是全部艺术型类的混杂。”^②梁实秋将矛头直指新文学存在的问题,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文体类型及其形态给予根本否定。梁实秋对新文学的批评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偏颇与偏激之处,但同时也给予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态的可能性。

“五四”以来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既是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新文学初期作家、批评家对文体认识的模糊性,是现代作家、理论家徘徊于中国古典文体与外国文体之间的矛盾,也是现代文体发展过程中的类型杂糅及其文学现代性的创作现象,是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今天来看,梁实秋对新文学的批评似有“杞人忧天”之嫌,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观念和文学创作类型早就突破了梁实秋提出的美学价值规范。尽管如此,重新提出并思考“型类的混杂”的问题,并沿着这一思路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体形态及其特点,思考现代文学的美学走向及其文学史研究,仍然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的新秩序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写于梁实秋留学美国期间,带上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的鲜明印记。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矛盾关系中回望“现代中国文

* 收稿日期:2020-04-19

作者简介:周海波(1958—),男,山东昌乐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17ZDA275)、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梁实秋青岛文集”(QDSKL1601086)的阶段性成果。

②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学”，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浪漫主义过了头”的特征之一就是“型类的混杂”。从梁实秋批评的“型类的混杂”的现象来看，他实际指的是小说、诗、散文等各种文体杂糅的现象，也就是现代文体类型的混杂现象，他认为新文学文体类型及其混杂是对中国文体秩序的冲击与破坏。所谓“浪漫主义过了头”就包含着不遵从文学秩序而任意作为的意思，是文学创作中的毫无节制，就是“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在他看来，文学应遵从常态，体现常识，“换句话说，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①，但是浪漫主义者最反对常态，最不遵从常识，因而就会造成没有秩序的文体世界。这也就是梁实秋所批评的不遵守“文学的纪律”的文学现象。

“文学的纪律”是梁实秋拿来阐释“型类的混杂”的理论基础，文体类型的混杂是不守纪律的文学现象，而文学不守纪律也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其表现形态之一就是导致“型类的混杂”。他以现代小说和诗为例，指出了新文学创作中，小说和诗是最不守纪律的两种文体。梁实秋认为，小说的文体功能本是叙事，为读者讲述故事，但新文学的小说却成为抒情的工具。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位小说作家，但向来在小说中抒写自我、过度抒发情感的郁达夫，显然在批评之列。梁实秋批评说，“近年小说中常有把妓娼理想化”（如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沉沦》《秋柳》等），矛头直指郁达夫。此外，鲁迅、冰心、王统照、张资平等作家，也在梁实秋批评之列。在他看来，鲁迅等作家的小说显然存在着“型类的混杂”的问题。

梁实秋批评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从遵守文学的纪律出发，试图回到文学本体，以不同文体的特质阐释现代文体的创造。但是，他在具体阐述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很好地说明小说是如何发生“型类的混杂”的，也没有指出小说抒情何以不好；同样也没有说明散文写诗，诗可以叙事有何不美，问题何在。小说的文体功能在于叙事，而不在于抒情，但小说并不是不能抒情，作家完全可以用抒情的手法进行叙事，也可以使用叙事的方式抒情。问题在于，小说如何才能真正回到小说本体，更好地实现小说文体的叙事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梁秋实显然没有真正把握现代小说尤其是郁达夫为现代小说文体发展所作的贡献。就郁达夫而言，他的小说既没有过度抒情化，也没有诗化或散文化，而是努力回到小说叙事的本体，通过“一宗事件”叙述自我的生活，创造着现代小说独具形态的文体。如果就此批评郁达夫或现代小说，显然是梁实秋对现代小说文体的误读。

梁实秋所批评的“型类的混杂”现象，主要指向发展初期的新文学。新文学初期，文体概念、文体分类及其文体意识的模糊不清，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是典型的名不正现象。现代文学在“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②的过程中，首先致力于解决文学语言的问题，在文体类型方面则在传统与西方文学的融会贯通中重建新秩序，新的文体概念、新的文体形态在新的文体秩序中越来越呈现出新的文体美学特征。与此同时，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当作家、评论家的文类意识处于混沌状态时，就会明显出现中西杂糅、古今杂糅的现象。例如，胡适的文论就存在小说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作《论短篇小说》的讲演，第一次为新文学厘定了“短篇小说”的概念，但随后他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概念时，不仅将先秦寓言、神话传说、笔记杂记一类都视为短篇小说，而且将韵文、散文中的一些作品也视为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与诗、

^①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文的界限,打破了小说与散文、韵文的界限,诸如《桃花源记》《木兰辞》《上山采蘼芜》《石壕吏》等都成为胡适心目中的“短篇小说”,于是又出现了“韵文短篇小说”“散文短篇小说”“杂记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等杂糅的概念。1921年,张舍我就曾对胡适定义的“短篇小说”概念表示过忧虑,指出他对“短篇小说”的定义“非失之太严,即失之过宽,皆非也”。在张舍我看来,“短篇小说”在欧美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的近代之产物”,“正在生长与发达期中”,“故即欲为之立界说,亦必视为试验的物界说,而不能以之为永久不变者也”。因此,当新文学匆匆忙忙为“短篇小说”进行定义时,就出现了概念上的不清晰、文体上的混乱现象:“吾人试读今日报章杂志中之短篇小说而以严格之眼光批评之,大都不能副一短篇小说之名词也,其病在于受笔记体与杂志体、传记体等文章之毒,而与短篇小说,混为一谈。”^①以此文体代替彼文体,以其他文体的特征取代短篇小说的叙事,就会出现被人们批评的短篇小说文体混杂的现象。胡适在“短篇小说”命名过程中的“型类的混杂”,恰恰就是对短篇小说文体特征认识不清而导致其对中国小说、西方小说文体概念混淆模糊偏狭的问题。

1936年,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之际,《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举办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和编选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两项重要活动。林徽因选辑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录了《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刊后一年多的“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包括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凌叔华、老舍、蹇先艾等25位作家的29篇作品。因受到副刊及其出版周期的限制,“小说选”所收录的小说“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这本规模不大的小说选,“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②。《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与杨振声应《大公报》之邀出任编辑。沈从文作为重要投稿人和主要编辑,为这一报纸副刊的创办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负责大部分编辑事务,还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就发表了写于青岛的《〈记丁玲女士〉跋》,随后也发表过一些散文随笔小说一类作品。林徽因在选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除选编《过岭者》之外,又收录了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箱子岩(湘行散记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湘行散记之一)》《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湘行散记之二)》等三篇作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一部游记类的散文作品集,凌宇认为,《湘行散记》“是写实纪闻,以介绍特定地域的自然与人生风貌为目的的作品”,“在文体上不拘一格,具有抒情散文、游记、小说、通讯等各种文体因素”,“是散文中的‘四不像’。……表现出沈从文在散文文体上的大胆创造”^③。“散记”作为散文文体形态之一,属于写事记人的体裁,沈从文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几篇作品,也都分别以“湘行散记”为副题。林徽因之所以认同《湘行散记》的“散记”形态,并将其作品选入“小说选”中,主要从作品的艺术性考虑,看到了这些作品有故事、有人物、有描写、有叙事。正如胡适把《桃花源记》《石壕吏》等作为小说看待,是将作品中的小说因素等同于小说文体了。

实际上,林徽因及京派作家大多是文体意识尤其是文体类型意识并不很强的作家。这部“小说选”不仅表现出了林徽因对沈从文作品的偏爱与关注,还说明了她对编选作品的文体判断及其美学取向。从《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可以看到,林徽因对这部“小说选”的文体类型并不是特别关心。她在这篇“题记”中,除题目和开始部分使用了“小说”“短篇小说”的概念外,其他地

①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计红芳编:《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经典》,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0页。

②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页。

③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73、386页。

方几乎没再使用过“小说”一词，而是使用了“这部选集”或者“短篇”。这两个概念在这里都有具体所指，即“小说选”与“小说”文体。结合林徽因在其他著述中所使用的文体概念，则可以看到她的文体类型的意识比较复杂，甚至带有混沌的特点。1933年，林徽因在致沈从文的信中，使用过“文章”“韵文”“短篇”等概念，这几个概念中的“韵文”指的是诗，而“文章”和“短篇”则泛指文学作品或其他文体。“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是指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①，应该是指她与梁思成等完成的一篇题为《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的调研报告。从这些有限的材料可以看出，林徽因的文体观念主要限于诗与文学，而缺少具体明晰的类型特征。正因如此，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林徽因虽然考虑到了选集的“小说性”，却没有严格按照小说文体的要求选择作品。林徽因将沈从文的这几篇“散记”收录于“小说选”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说明，但从她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一文所表达的文学思想中，可以侧面地看到其编选理由。林徽因在表达她选编这部小说集的想法时说，除了“对题材的偏向以外”，主要考虑作品的艺术创造，“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的发展与结束”。林徽因也指出了“小说选”中不少作品在艺术创造方面的薄弱，既是“误会了短篇的限制”，也是作家对“生活大胆的断面”，“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的来做”^②。如果说林徽因编选“小说集”并不特别看重小说文体特征的话，那么，她更在意的是作品艺术描写上的“一段故事”“一两个人物”“某一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看重具有小说叙事的基本要素，或者一定的故事性。实际上，林徽因已经意识到作为报纸副刊在承载作品文体上的局限性，意识到副刊小说文体在描写上的特点，只不过由于京派作家在文类上的随意性而并不特别讲究而已。

这里并不是说林徽因不讲究文体，不注重文体分类，而是指林徽因及京派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文体及其文体类型的独特理解。林徽因以西方诗学体系为中心，在文体观念中，除了诗之外，将散文、小说等文体混合一起，不分彼此。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文体认识的矛盾心理。随着现代文体类型分类方法的变化，人们既想否认这种“型类的混杂”现象，又试图以更加清晰的文体命名解决这些跨界文体的问题，于是，“小说化散文”“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诗剧”等概念应运而生。1936年《学风》杂志第6卷第6期发表书评，对《湘行散记》的评价就在散文与小说之间游移不定，《湘行散记》“形式上好像是一部纪游的作品，实际上却是包含十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也可以当作游记来看，因为他所写作的范围就是他回湘时所经历的一切。这十一篇东西可以连贯着读，也可以分开来读，而且其中有几篇已在别的刊物上发表过了。”这种认为沈从文“是以小说体裁写游记，以游记体裁写小说的”，“所以当游记读可，当小说读也可”^③的观念反映出作者对《湘行散记》文体类型认识的矛盾。从文体类型来说，《湘行散记》已经超越了游记的文体范畴，作品的记“游”的因素让位于所记“湘行”的人情风物，或者说，作家不是以“游”的方式叙述湘西，而是在湘西特定的地域内叙述风景、风物与人物，有个人的回忆，有故事的叙述，也有人物的描写。所以，作家以“散记”名之，从文体概念和文体类型等方面说，是再恰当不过的。

现代文学“型类的混杂”也突出地表现在新诗文体方面。例如，郭沫若的《女神》是以“剧曲

①林徽因：《致沈从文》，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②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2-3页。

③芸非：《书评评介·湘行散记》，《学风》1936年第6卷第6期。

诗歌集”的文体形式出版的,这种清晰而具体的文体已经表明它不是一部纯粹的诗集,而是包含着两种文体在内的“剧曲”和“诗歌”集。但包括郭沫若本人在内,对这部作品的文体认识却相当笼统与模糊。郭沫若在《民铎》杂志发表《女神之再生》时,曾有“附白”,表明“此剧取材于”《列子·汤问篇》《说文》《山海经·西次三经》等,同时又在“书后”中说,“此剧已成于正月初旬,初为散文;继蒙郑伯奇、成仿吾、郁达夫三君赐以种种助言,余竟大加改创,始成为诗剧之形。就中郁达夫君读余散文旧稿时,赠余一诗,余尤得其暗示不少”^①。1921年8月《女神》出版,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标题下用括号注明“诗剧”。同一作品,郭沫若使用了“剧”“诗剧”“散文”三种文体命名,可见作者本人的文体类型认识比较模糊。如果说《女神之再生》因其文体形态可以视为“诗剧”的话,那么,“女神三部曲”中的《湘累》《棠棣之花》则与《女神之再生》不同,无论作品的表现形式还是命名,就只能属于“剧曲”,但在一些文学史以及《女神》研究中仍然被认为都属于“诗剧”文体。如楼栖就认为《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女神三部曲”就是“表现神话或历史主题的诗剧”^②,桑逢康也认为“《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③。其他如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都采用了《女神》为“诗集”或“新诗集”的文体概念。这些观点并无明显的问题,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神》的文体学意义。一般来说,“剧曲”是戏剧与杂曲的合称,徐慕云认为,“中国现有之歌舞艺术,除欧化之新剧,有声电影,以及黎锦晖氏所独创之半欧化歌舞而外,约分戏剧与杂曲两大部门”^④。也有以“戏曲”等同于“剧曲”者,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将戏剧、戏曲统用,戏剧的意义在于“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因此,“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⑤。也就是说,剧曲既突出了“剧”的言语对话性,也呈现了歌唱的音乐律动性。剧突出了文体的叙事性,曲则强调了文体的抒情性,前者与小说相关,后者与诗相连。“女神三部曲”在文体上并不一致,《女神之再生》受歌德《浮士德》的影响而呈现诗剧的特点,《湘累》《棠棣之花》整合西洋话剧和传统杂曲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既有现代特质而又合乎民族审美要求的体式。但郭沫若将不同文体的剧曲与诗歌合为一集,又表现出“郭沫若对于自己创作的‘剧曲’,在文体归属上也存在认知的混沌性”,是新文学初创时期跨文体的表现。实际上,《女神》研究中“忽略了这本作品集中有至少三篇剧作的事实,更忽略了‘剧曲’与‘诗歌’搀杂的别样意味”^⑥。

二、“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功能探寻

梁实秋在批评“型类的混杂”时,还特别指出了文体创造过程中的内部混杂:“小说本来的任务是叙述一个故事,但自浪漫主义得势以来,韵文和散文实际上等于结了婚,诗和小说很难分开,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很少有人维持小说的本务。现今中国小说,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和印象。散文往往是很美丽的,但你很难说他是小说。”^⑦梁

①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书后》,《民铎》1921年第2卷第5号。

②楼栖:《论郭沫若的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9页。

③桑逢康:《〈女神〉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④徐慕云:《改良剧曲刍议》,《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第2卷第5期。

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⑥周维东:《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⑦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实秋批评主要针对现代小说，但不仅仅限于小说，也包括了诗歌、散文甚至戏剧等文体。

梁实秋的用意主要在于从文学本体出发寻找“顶好的”文学。所谓“顶好的”文学，就是他心目中的古典文学。在梁实秋的观念中，所谓古典文学并不一定是古代文学，而是具有古典美学形态的文学。对此，他引述哈克敦的论述说：“一切文学的作品，无论是描写人物或是建筑格局，各型类均各有其确定不移的形式完美的规律。守此规律的即为适当；否则失败。”^①也就是说，古典文学拥有一定的艺术手段，诸如描写人物或讲究建筑格局等，同时具有一种规定性，呈现着“最好的”文学的美学特征。但是，当文体功能出现混乱状态时，文学的文体美学特征就会受到影响。而当新文学整体上出现文体的混杂时，作家的文体类型意识薄弱，概念混杂，从而会导致现代文学在文体类型方面的模糊不清，在文体功能上出现位移的非正常现象。

梁实秋对郁达夫等作家小说创作的批评，就是着眼于小说文体功能，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看待郁达夫的小说，郁达夫为现代小说提供了什么艺术经验，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等概念是否可以概括现代小说的某些文体类型，都是郁达夫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未解之谜。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文学立场上批评郁达夫，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却不能很好地理解郁达夫。简单地从古典主义的立场出发把郁达夫归为浪漫主义作家，或如茅盾、陈西滢、苏雪林等作家批评的那样，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在结构上存在缺陷，不讲究小说结构，或如文学史家那样概括为“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都没有真正接近郁达夫小说的文体形态，而片面地理解了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实际上，梁实秋批评小说抒情，是从小说的文体形态与文体功能的角度阐释文学的纪律。小说就是小说，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所以，在梁实秋看来，“形式的意义，不在于一首诗要写做多少行，每行若干字，平仄韵律等等，这全是末节，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其真正之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②。诗是抒情的，小说是叙事的，这是文体的基本属性，如果打破了这种“纪律的形式”，文学也就随之失去了“文学的精神”，这是型类的混杂，是现代文学文体功能的紊乱。郁达夫是坚持小说重在“具体的描写”观点的作家，在他看来，“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而小说的结构则与小说所叙述的“一宗事件有关系”^③。他反对那种“说带哲理的空话”^④，认为只有在真实的事实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合乎小说文体的艺术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并不是主张小说的文体功能是抒情，而是强调小说要讲述自我个人的生活事实或描写社会的“一宗事件”。他早期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以及后期的《迷羊》《迟桂花》等，多以作家本人所经历过的“一宗事件”为叙事主体。正如锦明所说，郁达夫的小说在《沉沦》时期，“拿他的生活作依据，创造一种普遍的意义相冲突——灵肉的冲突”，在“自我表显的时期中”，“大半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在“蜕变时期”，“他开始了那纯想象的创造”，以《过去》为代表的小说，“篇中的内容已充实了，艺术已精炼了”^⑤。也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是一种客观的叙事，多以事实的叙述为主，尽管这些事件具有“自叙传”特征，是个人私生活的书写，但仍然是“事实的”描写。也就是说，郁达夫以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成就了现代小说文体艺术，为现代小说创

①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②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③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7、21页。

④郁达夫：《读〈兰生弟的日记〉》，《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⑤锦明：《达夫的三时期》，《一般》1927年第3卷第1期。

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诗歌文体功能的混杂可能是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这里不仅具有“诗”与“诗歌”概念的混杂,也存在着诗歌本身的文体功能问题。“白话诗”“口语诗”“新诗”“诗”与“诗歌”概念的混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相关文体的认识,改变了诗与诗歌的文体美学特征。

1923年,诗人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51期发表《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提出“到底是什么是诗”的问题,认为“诗也有真诗、坏诗、假诗、形似诗”。徐志摩在文章中还谈到胡适说过的“笑话”：“我的‘尝试’诗体也是作孽不浅,不过我这一派,诗坏是无可讳言的,但总还不至于作伪;他们解决了自己情绪的冲突,一行一行直直白白的写了出来,老老实实的送到报上去登了出来,自己觉得很舒服很满意了,但他们却没有顾念到读他们诗的人舒服不舒服,满意不满意。但总还好,他们至少是诚实的。”^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对“好诗,坏诗,形似诗”的区别。这是徐志摩站在他的新诗立场上的审美判断,符合其诗的美学主张和原则的当然就是好诗,而其他的则被视为“坏诗,假诗,形似诗”。实际上,当我们从“型类的混杂”的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诗歌的话,对此可能会有另外的认识。这一点从新月诗派诗人、批评家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对待郭沫若《女神》的评价和态度就可看得出来。向来看不起“五四”以来白话新诗的“新月派”同人,却对郭沫若的《女神》一致好评,称赞《女神》的神思幻想。而对于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以及“小诗”等文体类型,则大多持否定态度。在“新月诗派”看来,《女神》是“诗”,胡适的《尝试集》是“尝试体”的白话诗,而早期诗人如朱自清、冰心等人的作品则只能是“新诗”。这些都冠之以“诗”的名义出现的文体,却不一定都是诗,而有可能只是“形似诗”,甚至是“坏诗”。

对于现代文学而言,诗是最能体现“型类的混杂”文体特点的。一方面,现代文学中的诗歌与诗的概念往往混杂使用,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文体概念。另一方面,诗与诗歌在概念内涵与外延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文体概念交叉混用,从而遮蔽了诗在现代文体发展中的意义。胡适在提倡“文学革命”时一般提及古典诗词,多以“诗”“词”或者“旧诗”等概念为主,而论述新文学时则主要以“白话诗”“新诗”等概念为主。早期胡适为了证明白话能够作诗,提倡“诗体的大解放”,以“尝试”体式写出了《尝试集》中的作品。对此,胡适本人大多以“白话诗”或者“新诗”概括。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其作品时,也以《白话诗八首》为题。郭沫若在《鳧进文艺的新潮》中说,他“偶然地写过一些口语形态的诗。象《死的诱惑》一诗便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间做的”,“副刊里面时时登载一些白话诗”,“我便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抄寄去投稿”。胡适有意识地将“白话诗”“新诗”区别于“诗”,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概念。郭沫若使用“口语形态的诗”时,明确将其与诗进行区别,“新诗”则是介于“口语诗”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及至“诗歌”概念的出现并被人们广泛使用时,由诗向诗歌的文体转化已经完成。从“诗”到“诗歌”,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本质上则是诗的文体形态与性质的转化。1922年,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猛烈攻击,首先批评的就是《尝试集》,认为《尝试集》“形式精神,皆无可取”^②,更不承认它是诗。实际上,“学衡派”“新月诗派”等使用的“诗”和胡适等人使用的“白话诗”“新诗”概念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甚至不是指同一类型的诗体。学衡派或新月派提倡的“诗”更多接近于西洋诗,是一种贵族化的诗体,而“白话诗”“新诗”等现代诗歌则是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大众化、平民

①徐志摩:《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努力周报》1923年第51期。

②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期。

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变体,是趋向于平民化大众化的文体。

三、“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新变

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梁实秋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型类的混杂”是现代文体变异的重大突破,不能理解现代文体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守常与变异的这一既旧又新的问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①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文学体式遵从古代承传的制式,符合礼制的规范,才有可能求得新的变化。在刘勰那里,他所遵循的规范就是“必征于圣”,只有明晓了圣人的旨意和做法,才能辨明事物并获得雅正的言辞。也就是说,无论文体如何变化,都不可能脱离圣人的经典著述,无论文章如何写作,都是在传统文体制制约下形成的。“据事制范”是文体范式的制订,也是对后世文体的规范,而后世所立之体,又是在传统所制规范中完成的。在刘勰这里,体与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由《礼》而立,制订了各种规范,后来的文体无论怎样变化,都不可能真正离开“宗经”这一宗旨。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②,对于经典著作的文体,首先要追溯它们的本源,才能够考察其流变,对不同的文体概念,先解释清楚它们的名称来历,才能够说清楚文体的内涵及其特征。这里所指就是文体的常与变,考释本原,梳理流变,这是文体学的要旨,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此,王国维作过更具现代性的阐释:“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有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③王国维没有说明帝王派与非帝王派的关系,但他对这两大派别的梳理中,隐含了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两大派别在不能调和中互为存在。王国维是一位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学者、诗人,他的追求是建立在对传统皈依的基础上。一部《人间词话》是对中国词学的总结性批评,以“词话”这一古典的批评体式,陈述“境界”这一古典文学的重要命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以古典阐释现代,以现代证实古典。在文体类型方面,王国维并没有特别坚持古典形态的文学,对于小说、诗歌、戏曲等文体,他都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批评著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理想中的文学,《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古雅”与中国文学文体形态的内在关系,特别强调了形式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方面,英国批评家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过“有意味的形式”,认为艺术表达的东西是他的感情,而感情的表达则是在一定的形式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作家艺术家通过形式表达感情时,形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家艺术家必须遵循一定的艺术形式。而形式的存在,“对于创作它的艺术家而言,则意味着对某个概念的完全认识和对某个问题完美的解答”^④。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形式,需要在正确的形式中进行创造。在这方面,贝尔的理论恰恰印证了王国维美学思想,“有意味的形式”与“古雅”具有同样的美学意义,一定的文体形态展示了审美境界,是文体形态的理想,是文体美学上的最

①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6页。

③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④[英]克莱夫·贝尔:《艺术》,马钟元、周金环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

高境界。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文体在不断的变异中求发展,没有变异,就没有发展,文体发展既是文体的不断成熟与丰满,也是文体的变化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文体的创新就是变异,就是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创新再造。艾略特曾对传统与创新有过论述:“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①由此来看,“五四”新文学形成之后,原来完整的中国文学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文体也受到新的媒体、新的作品的挑战。这时,文学艺术以不断的创新,传承人类文化的传统,将传统的美学形态与精神通过创新的文体形态呈现出来。人类早期以及新的文学形态出现时,文体类型往往是混沌的,是多种文体杂糅的。因此,过于强调文体分类,突出“型类的混杂”对文学的制约,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新文体”“新诗”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向现代的突破。梁启超通过“新小说”文体,借小说家的言论,“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实现其“新民”的社会理想。但是,什么是“新小说”,或者什么是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小说,他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阐述。通过梁启超及其同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大体看到,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文体应是具有词章之学的古典文章风范的文体。平子就认为,“小说与经传有互相补救之功用。故凡东西之圣人,东西之才子,怀悲悯,抱冤愤,于是著为经传,发为诗骚,或托之寓言,或寄之词曲,其用心不同,其能移易人心,改良社会”^②。可见,平子所认为的理想小说也应与经传、诗骚等文体具有相通之处,能够移人心、改良社会。与此同时,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也以词章之学作为翻译小说的审美理想。他一方面反对言必称古,“嗜古如命”,一方面又惊叹“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③。钱玄同曾指出梁启超的政论等文章“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④的问题。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到林纾的“林译小说”,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两类不同的文体,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等类型化小说作家,以欧美小说为模仿,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形成了“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的文体,这种文体融合了“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⑤文体要素,形成了跨文体的写作。而林纾的翻译小说,则以欧美小说创作为译本,同时又结合了中国古典文体的要素,如他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就看到了此作品“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与其说他“就其原文,易以华语”^⑥,不如说林纾以古典的词章之法和语言方式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以古典文体成就了外国文学的翻译。无论梁启超还是林纾,在其小说创作或翻译中,都误解了小说文体,当然这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当梁启超将小说作为宣传工具,将大量的议论、演说、论述嵌入小说之中时,林纾却努力将西洋小说中国化,以文章之义法赋予小说以古典的涵义。梁林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现代文体的不同道路,为中国现代文学“型类的混杂”各自开启了不同的大门。

①[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②平子:《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8号。文中标点为作者所加。

③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④钱玄同:《通信·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⑤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902年第1号。文中标点为作者所加。

⑥林纾:《(黑奴吁天录)例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在新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诉求以及新的美学原则下，中国传统文体如何在“宗经”中变异，现代文体如何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要，满足新的阅读群体的审美需求，这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诗与文章的文体形态，新的形态与新的表现方式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媒体、新的文化，都需要新文学家给予必要的回答。钱玄同说过，《尝试集》“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①。而谦逊的胡适却认为，他的“尝试”“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②。不仅如此，同时期的沈尹默、刘大白、康白情等人的白话新诗，大多在“新”与“旧”两者之间摇摆，没有形成新诗形态的稳定状态。

散文是文体概念最为复杂并且最晚获得相应文体命名的一种现代文体。一般来说，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如果说古代文章演变成为现代散文，在文体发展脉络上是不成立的。即如被周作人等特别强调过的晚明小品，在文体特征上与五四以后的小品文、随笔、杂感等也相去甚远。从文体创造的角度来看，现代散文与现代兴起的报纸杂志的文体存在一定的联系，也与外国小品随笔具有一定的关系。从文体类型方面看，美文、小品文、随笔、随感、杂感、散记、笔记、札记、游记，等等，都被纳入到散文文体中，甚至报告文学、速写一类的文体也被归于散文之中。现代散文在“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间摇摆，无法真正形成稳定的文体特征。而在文体内部，散文文体的功能比较模糊不清，它兼具叙事、抒情的功能，但叙事与抒情都不是散文真正的文体功能，散文的叙事与小说不同，散文家叙述的故事很难进入小说家的视野，而散文的抒情更无法与诗歌相提并论。不过，现代散文的魅力也正在于文体边界的模糊，有一定的故事和人物，有抒情和议论，理性与情感融合，在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载体的语境中，散文文体的跨界与破界成就了散文不同文类的审美特征。鲁迅称自己的杂感类作品为随笔、短评等，周作人称他的散文写作是在“自己的园地”里的劳作，沈从文称他的散文是“情绪的体操”，属于精神与情感方面的文体，呈现出了现代散文文体的美学变化。

文体边界的混沌状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文体相互融合的现象之一。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在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不仅具有传播的开放性，而且文体边界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体边界的开放性。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就说：“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借径于西洋的新文学。……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藉物。”所以，新文学的建设需要借鉴并引进外国文学的文体经验，“直用西洋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③等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周作人提倡的“美文”、王统照提倡的“纯散文”、胡梦华建议的“絮语散文”等，就是借鉴了外国文学的文体概念，“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④。在新诗创作方面，梁实秋认为“外国影响足使中国文学改换一个新工具”，因此，“五四”以来的“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是‘十四行体’，‘排句体’，‘颂赞体’，‘巢塞体’，‘斯宾塞体’，‘三行连锁体’，大多数采用的‘自由诗体’”，“在新诗的体裁方面很明显的露出外国的影响”^⑤。二是文体内部边界的开放性。梁实秋在批评“五四”以来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时，特别指出了“散文写诗，小说抒情”的文体内部的

①钱玄同：《〈尝试集〉序》，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②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③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

④周作人：《美文》，止庵校订：《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⑤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混杂现象,这是文体边界开放的现象。现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报刊媒体的崛起为社会提供了开放式的平台,而文化沙龙一类的公共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开放式的场所。在这样的空间里,诗歌、散文、小说各种文体共处,都有可能在一个杂志、一个栏目中出现,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促成不同文体试图寻找另类的表达方式。1921年1月《小说月报》改刊出版时,主要栏目分为“创作”“译丛”和“海外文坛消息”,文学批评或论文以单独的题目与上述三个栏目并列,“创作”和“译丛”栏目包括各种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所有作品没有文体之分。自1922年第13卷第1号开始,栏目分类发生变化,“短篇及长篇小说”“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研究”“海外文坛消息”“读者文坛”等,第13卷第7号开始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分开栏目发表。1923年1月,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后,多以混杂编排为主,不再明确分栏发表作品。这种分类或混合编排出刊的方式,虽然不能完全说明编辑者的文体意识,但从一个方面表现出现代报刊与文体混杂的关系,也反映了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

文体的守正与出奇是坚持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美学原则,还是寻求新的文学形态与美学原则,这是文体美学原则的重要分野。古典形态的文学文体往往坚守了文学一贯的美学原则,是贵族的、古典的,新的文体形态则是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美学突破,是写实的、社会的、平民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背景下的一次现代转型,同时也是在报纸期刊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出现并成为现代社会重要传播方式之后的美学变形。“型类的混杂”并不完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时期中国传统文体形态与西方文体观念冲突融合在创作中的表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文体新变的必然趋势。

“Mixture of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 stylistics

Zhou Haib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The mixture of types” is Liang Shiqiu’s criticism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ry creation. Liang Shiqiu pointed out the disorder in stylistic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new literature, and prose becoming poetry, novels expressing emotion and poetry becoming narratives are a mixture of stylistic functions and excessive romanticism. However, “the mixture of types” is the expression of style blend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It’s a problem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new literature inherit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for style cre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artistic pursuit for new literary style variations. New literary style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is not only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and fullness of style, but also the change and innovation of style itself. The integrity and uniqueness of style of whether to adhere to the classical form and aesthetic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or to seek a new literary form a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stylistics and aesthetic principle.

Key words: May 4th new literature; stylistic form; style consciousness; classicism; Liang Shiqiu

责任编辑:孙昕光

《野草》的主体性和矛盾性

——1940至1950年代有关鲁迅思想理解的分歧之一^{*①}

袁盛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摘要: 在1940至1950年代的左翼文化界,研究者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理解存在着一致和分歧。其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否敢于承认鲁迅于创作中呈现出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这一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胡风派一直强调主体性和革命性价值的统一,而冯雪峰、邵荃麟等理解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蕴含的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主体意志抛弃了,所谓鲁迅前期思想的消极性、矛盾性和局限性于此得以凸显,鲁迅也就成了必须依靠一种外在力量来予以拯救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键词: 《野草》;鲁迅;主体性;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 I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25-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3

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文学创作中一朵永葆生命活力的奇葩,因其思想与艺术表达的复杂、隐晦与神奇而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和喜爱。但在1940至1950年代,在左翼文化界内部,研究者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理解存在着分歧,而且愈到后来,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这种分歧愈来愈明显。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胡风派对《野草》所进行的研究和阐释也就成了一个被批判的焦点。^②主流派批评者与胡风派对《野草》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是否敢于承认鲁迅于创作中呈现出了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这种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其实,这些理解歧异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双方对于《野草》不同思想和艺术意蕴的理解,是在历史文化场域的变迁中逐渐定型并完成的。那么,这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思想认知过程呢?对于鲁迅认知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发生与建构方面是否有着某些更为深刻的关联?这些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邵荃麟曾于1945年9月发表过题为《鲁迅的〈野草〉》的文章。文中,他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对《野草》所蕴含的思想、历史与人文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试图把文本解读与对鲁迅心路历程的探讨关联起来,显示了《野草》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价值。他的以下论述为后来主流派理解《野草》时期鲁迅思想的局限及其特征定下了基调:“在他写《野草》以及这以后的期间,他的思想基础虽然和后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那时的思想还没有越出进化论的阶段,他还不曾明确认识促进这个社会进化的革命动力。因此当历

* 收稿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袁盛勇(1970—),男,湖南新化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② 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史更前进、民族危机更迫切、阶级矛盾更尖锐化的时候,在他自己思想上也引起一种从原来阶段向更高阶段跃进的强烈要求,这是需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的,《野草》的写作正在这个时期,所以他所表现的情感较任何时期更加激越,但是经过这个苦闷的搏斗,他的思想终于突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显示在他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作品中间的更彻底的思想。”^①这里提到《野草》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总体上仍然受制于鲁迅前期所具有的进化论观念,既为后来主流派批评者所倚重,也为胡风派鲁迅研究者所诟病。冯雪峰于1955年10月撰写的《论〈野草〉》一文可谓当时主流派观念在《野草》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

通过对《野草》中23篇作品和“题辞”的细致解读,冯雪峰认为这部散文诗集尽管具有一定的战斗意义,即表现了“作者对于当时黑暗势力的反抗和斗争”,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暗淡的情绪,尤其是反映了他的思想上的深刻而强烈的矛盾”。冯雪峰就是以发掘和梳理这个“矛盾”来作为其论述线索的。他认为《野草》抒写了悲观与乐观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绝望与希望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作品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正在吞噬着鲁迅的心,让他感到空虚和迷茫。冯雪峰写道:“所有这种种的矛盾,其实都只是反映着一种思想状况,就是:感到目前的黑暗势力很雄厚,而对于将来又觉得有些迷茫。”那么,鲁迅当时为什么会有此种思想状况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冯雪峰以为,这当然跟鲁迅当时所处的黑暗环境有关,因为写作《野草》的时期,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也是鲁迅感到当时置身其间的北京正在挤压和疏离他的时期,但是,除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思想上的原因”。那么,这个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冯雪峰主要从世界观的角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一,鲁迅《野草》时期的世界观也就是他的前期世界观,还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鲁迅当时所取的立场还是“革命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因此,鲁迅以他当时的世界观,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的发展,明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即是说,“对于无产阶级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有明确的、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在冯雪峰看来,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观的局限,才导致了鲁迅思想上的矛盾,进而导致《野草》中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其二,《野草》中呈现的矛盾性思想状态,“非常鲜明地反映着作者当时所体验的深刻的思想苦闷和强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而且,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寂寞、空虚和矛盾的痛苦,也包含着由于他当时同革命的主力还没有建立起具体的真正密切的联系而来的寂寞和不安”。究其世界观上的原因,鲁迅“前期的世界观,主要的还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他是“站在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而从事个人主义的斗争”。正因如此,冯雪峰以为《野草》明白地告诉人们:“作者所感到的空虚和失望,从思想上说,是由个人主义的思想而来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在他那里发生着动摇以及他自己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②显然,冯雪峰从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了进化论和个人主义思想对《野草》时期乃至前期的鲁迅所导致的历史局限性。鲁迅内心的矛盾,以及由矛盾而来的空虚和痛苦,都根源于此。但是,鲁迅并没有深陷于此种空虚和痛苦之中,他在寂寞中升腾而起的不安,加上其他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都有可能促使他进行世界观的质变。冯雪峰写道:“时代的条件,作者的一贯的人民立场和革命意志,都决定了他非前进一步而成为社会主

^①荃麟:《鲁迅的〈野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7页。

^②冯雪峰:《论〈野草〉》,《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73、296、298、296、298、299、300页。

义者不可。这就是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更进一步的更密切的结合,在群众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及为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①可见,冯雪峰论述《野草》终究落入了当时主流派研究者的窠臼。在他看来,《野草》时期鲁迅的作用就在于为知识分子展示了自身思想和世界观的局限性,而鲁迅最终听从共产主义的召唤,在党的帮助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因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的转变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在一定意义上,冯雪峰有关《野草》的论述也是他在言说鲁迅的过程中适时自我调整的结果。这个妥协以及自我蜕化的过程,胡风后来把它叫作“禅化”^②。

平心而论,冯雪峰对《野草》的论述自有其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对其所呈现的内在“矛盾”的理解。他在1950年代对《野草》“矛盾”的条分缕析,其实可追溯到他以前对于《野草》的理解。对于《野草》内在“矛盾”的把握和发掘,不能不说是冯雪峰的一大重要贡献。1946年,他写了部分《鲁迅回忆录》,多次提到对《野草》的理解。他认为,《野草》揭示了鲁迅内心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是黑暗的社会现实所造成,也是他本来的性格所造成,因为鲁迅尽管“最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然而却是最不愿意寂寞和孤独的人”。而且,这种执著的“矛盾”品格正是每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因为“一切的思想家都是在深刻的矛盾与苦闷中战斗着前进的”,而“矛盾的实质是联结在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一切具体事象和关系上面的”,也正因如此,鲁迅对矛盾的体验和书写,便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诚如冯雪峰所言:鲁迅内心的矛盾“总是反映着时代或社会本身的矛盾”,他所体验的黑暗与空虚“也不能不是时代或社会的空虚与灰暗的反映,尤其在这种时候,一切这样的思想家就都要经由这种矛盾的克服而更向前进”。而这种对于“矛盾的克服”正是反映了鲁迅所具有的那种宝贵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主要方面正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而敢于直面历史与现实乃至心灵的黑暗,敢于带着淋漓的鲜血突破已有思想的局限,正是此种人格的斑驳投影。在这种意义上,冯雪峰认为1924—1926年间的鲁迅,亦即写作《野草》期间的鲁迅,乃是最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跟黑暗进行战斗的鲁迅,也就是后来鲁迅自己所言“绝望的抗战”的意思。而这一切,正根源于鲁迅总是“相信他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与其说是物质的、外在的,毋宁说是精神的、内在的。正是在这里,冯雪峰也就有可能深入地触摸到鲁迅的精神动力学问题。他说:鲁迅“是把自己的生命付给民族的解放的人,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这样的民族志士者,是在他是更有思想的人。他和一切志士一样,是要肝胆涂地为民族的,然而他却是更要用血用心和生命去拥抱现实与思想或主义的人。他和那种可以今天讲这种思潮而明天讲另个的思想贩子实在离开得太远了,——那种人是体验不到现实的矛盾,也体验不到内心的矛盾的。鲁迅先生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现实和思想的矛盾的,在他对现实的把握是非同时有内心的思想的把握不可的。现实和历史的发展,对于他,必须成为他的精神的世界。于是,在现实巨大变化和发展的时候,在他的内心就发生着伟大的矛盾斗争和圣洁的痛苦过程。”^③显然,在内心的搏斗过程中,

①冯雪峰:《论〈野草〉》,《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

②胡风1979年11月15日在写给白桦的信中批评他建国前予以扶持过的田间道:“现在的‘歌德’派标本应该是田间。但诸位也许不知道,他不过是一名小‘侏’。看一看禅化之前的《给战斗者》和禅化之后的《赶车传》,当可推想到一二。他曾竭力逃避了若干年,逃避中还写了《戎冠秀》、《她也要杀人》和街头诗、小叙事诗等,但终于抵挡不住,倒下禅化了。这才平安大吉。”《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③雪峰:《鲁迅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309—312页。

鲁迅已经具备了把对黑暗的体验转化为光明的力量,也正因如此,鲁迅在《野草》中呈现出来的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因素,《野草》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也就成了一个战胜黑暗、面向光明的艺术载体。冯雪峰这种对《野草》主体性的理解,是直接通向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胡风派对《野草》的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时冯雪峰的理解具有相似的一面。而且,这相似的一面在邵荃麟当时对《野草》的阐释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

其实,邵荃麟的《鲁迅的〈野草〉》一文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派鲁迅研究者承袭了他对《野草》局限性和鲁迅思想局限性的指摘,但也同时遮蔽和放弃了一些真正通向鲁迅思想之本来的论述。比如,他在解读《野草》时,充分注意到其文本内部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这就使他有可能会直面《野草》所含有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并且把对这种复杂情感的考察带入到对抒情主体结构的探究之中。在他看来,《野草》尽管呈现了一定的绝望者和虚无主义者的心境,但并不能由此断定鲁迅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因为“当时鲁迅先生心灵中是在进行着最高度的强烈搏斗,他的情绪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动,宛如海涛冲击,此起彼伏:希望与绝望,更生与灭亡,胜利与失败,一切都到达最尖锐的顶点,而从这种搏斗中间,才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发出各样的灿烂火花。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才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地连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可见,邵荃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多么重视鲁迅在《野草》中所表现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且跟冯雪峰一样,也是把这种心灵的搏斗中所具有的惨烈的体验和古老中华民族的新生联系在一起:“一个昏聩的古老民族的觉醒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长期被毒害着被麻痹着的奴隶的灵魂,要觉醒过来是极其痛苦的。这是一种最剧烈的痉挛,一种希望与绝望的挣扎,一种悲痛与欣悦的搏斗。”正因如此,《野草》中体现出来的颤栗、愤怒与悲痛,“与其说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无宁说是历史的愤怒与悲痛,这些耀眼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炽热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①。这样,《野草》时期的鲁迅就有可能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状态下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民族新生的道路,鲁迅的脚印烙在鲁迅的中国,而其价值取向却决绝地指向未来,但更重要的是,他以执著于现实的批判姿态指向未来。这就涉及到了胡风当年较为器重的舒芜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命题——“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

二

“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舒芜1945年9月提出的。应该说,舒芜提出这个命题受到了胡风思想的重要影响,但他更感受并包容了整个时代对于鲁迅的隔膜、对于鲁迅思想尤其是《野草》中所呈现的一些思想命题的误解。可以说,舒芜与当时左翼文化中主流派人士的论述一样,也带有为鲁迅思想正名的意味。而且,他的理解虽然是用那种思想的片断形式表现出来,但只要不带偏见地去领会和认知,也是可以感受到他那颗灼热心灵的跳动和对鲁迅思想的深刻体悟。

^①荃麟:《鲁迅的〈野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5、7页。

舒芜认为,鲁迅的中国造成了鲁迅的道路,鲁迅的道路贯穿了鲁迅的中国。因此,这样的鲁迅的诞生是与这样的中国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而这样的中国原是旧社会的根底非常坚固的,所以必须正视它,并且毫不妥协地批判它的思想根基。鲁迅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①舒芜认为,这就是鲁迅开辟其思想与文化道路过程的扼要说明,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就正是“他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他的道路的路基”。所以,鲁迅在这样的中国“走”出其伟大道路的一个前提,就是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用他的正视黑暗的眼,正视黑暗的中国”。鲁迅正视黑暗与抒写对黑暗的体验,并非为了把人带入黑暗与虚无,而是为了促发一个光明又真实的中国的到来。但是,鲁迅所身处的又依然是一个灵魂古旧的中国。所以,他要向这样的中国诉说历史的真实,就惟有采取一种变形的话语形式和批判姿态。诚如舒芜所言:“在由鲁迅底光芒的逼射而显现出来的这样的中国,一切为了光明和真实的,也只有在光明之下和真实之中才能以其原形而存在而作用的东西,在这里都不得不要着种种与原形相反的形式,不得不变形。鲁迅的道路上,大抵都是经历了这种伟大的变形的东西,引导向真实与光明去。”正是要经历这种变形,所以鲁迅才不会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鲁迅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鲁迅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鲁迅的道路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斑驳暗影:

在这条道路上,是需要善良的,然而它的具体形式只能是恶毒;是需要和爱的,然而它的具体形式只能是憎恨。

在这条道路上,信任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怀疑;公平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偏狭。

在这条道路上,必须通过自卫,才能实现牺牲;必须通过冷酷,才能实现热情。^②

舒芜这种把鲁迅当作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来看待的思想显然源自胡风。因为胡风早在1943年10月鲁迅逝世7周年时就曾说过,作为一个思想的战士,鲁迅是一个具有强烈战斗色彩之道德律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对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而这也使鲁迅的面影在不同的对象和历史境遇面前具有了截然两样的风貌:“由一面看来,他是苦行的圣者,慈祥的佛子,由另一面看来,他是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的‘世故老人’。”^③但是,鲁迅的这种两面性特征却是同样根源于鲁迅人格的一致性。鲁迅的主体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坚强的、恒定的,借助胡风的话来说,鲁迅乃是一个心与力的结合。于是,鲁迅就有可能在体验黑暗的同时并不会为黑暗所吞没,在感受绝望的深渊所带来的颤栗时并不会沉入虚无之中。舒芜就此写道:“在这种场合,决定地支持着他的战斗的,当然就是内敛了的希望,深潜于内部的光明和开拓。倘内部没有这种光和力,则不但不能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而且即使乐观也乐观不了什么,即使可为也为不出什么的。”此种强烈的光和力,显然来自鲁迅精神的内部,是一种主体人格的力量,反映了鲁迅对于革命的爱和信,而“惟其有了战斗的爱与革命的信,所以虽憎恨而不超人,所以虽怀疑而不虚无,所以虽严刻而又不会成为‘神’或‘上帝’”。也正因如此,舒芜显然认同胡风关于鲁迅主观战斗精神养成的观点,而这其实正有可能从外在形式上通向主流倡导的思想改造的历史进程。所以,舒芜说,在鲁迅的道路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革命人’的养成,内在的蕴有光和开

①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1页。

②舒芜:《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舒芜:《回归五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2、202、201、210、201页。

③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拓力的‘革命人’的养成,由于这种内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样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养成;对于他,对于继承他的道路的人,这是最重要的。”^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革命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形成,所以鲁迅在《野草》中就会具有一种转化消极因素的积极力量。因此,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另一些胡风派成员比如雪苇和张禹对《野草》的相关阐释了。

之所以特别提到张禹和雪苇,是因为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俩的《野草》研究也是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之一来进行批判的,而且他们的研究确实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地方。^②总体上看,张禹和雪苇对《野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应该说,前者的研究不仅受到过后的影响,而且受到过胡风、耿庸等人的影响,这是可以找到显明的思想脉络的。

张禹和雪苇《野草》研究中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都主张对《野草》必须加以辩证的研究,反对采取琐碎而牵强附会的索隐式研究方法。张禹指出:“我们可以碰到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往往不把《野草》当作抒情诗来理解,而热衷于猜谜语似的找寻泥土‘象征’什么,乔木又‘暗示’什么……。这些人的动机常常是很可嘉的:他们希望在《野草》中找寻直接的、像在鲁迅杂文中常见的那种指示,或者想以自己的注释来强调《野草》的政治意义。但是,这种方法却是错误的。其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庸俗化了《野草》,丢掉了‘象征’或‘暗示’以上的意义。”这里所希冀避免的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此种方法若跟政治实用主义相结合,容易达到歪曲鲁迅创作及其思想的地步,诚如张禹所言:尽管鲁迅在《野草》中抒发的感情“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社会斗争;但谁也无权命令鲁迅,鲁迅自己也决不会以为,一定把每一件景物化装起来演一番说明某一社会问题公式的文明戏,才算是‘配合政治任务’的”^③。张禹在当时能够指出把鲁迅无条件政治化的缺陷,并且希望大家对此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以期让鲁迅研究更为切近鲁迅本身,确实难能可贵。

雪苇研究《野草》采用的是一种分类的辩证方法。他在总体上把《野草》中的主要篇章分为两组,一组以《过客》《希望》《影的告别》《死火》《求乞者》《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风筝》等9篇构成,并说明以《过客》为首篇;二组以《这样的战士》《秋夜》《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复仇》《复仇(其二)》《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的失恋》等11篇组成,并说明以《这样的战士》为首篇,而《死后》也可以重列在这一组。在雪苇看来,这两组既各有侧重,又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第一组主要是从心境底‘阴影’的一侧面来解剖自己;第二组,则主要是号召战斗及直接对于黑暗底攻击。后一组,是前一组底内在精神之外在底积极的发扬,而其总色彩,则又是统一。”他又同时指出,第一组文章中所描写的“‘阴影’的本身,也同时放射出战斗的光辉来。这就是如他自己论十九世纪东欧作家底作品时所说的话:‘即令是颓废和虚无,这也是战士底颓废和虚无。’何况这里决不是什么颓废或虚无呢?这不过是一时的心之波动与心之一角的内在斗争罢了!而且,这正是说明:《野草》里的这一组文字,正是他三十年如一日未停止过的、屹立于最前线的战斗之基础。有什么东西能比预备失败的前途而作舍命的斗争更为坚决,有什么东西能比知道自己的后面没有任何支持而犹要坚决与黑暗作战更为英勇呢”。这样,《野草》中的阴影和黑暗也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此种转换在雪苇的论述中表现为一种结构的回环,它不仅属于论述本身,而且凸现为《野草》的一种内在结构。

①舒芜:《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舒芜:《回归五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4、216、204页。

②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③张禹:《〈野草〉札记》,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上海:泥土社,1954年,第7—8页。

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思想和逻辑的场域,悲观的东西可以由此辩证地转化为一种乐观向上的动人姿态。正因如此,雪苇才会指出,第一组中的“《墓碣文》恰好是《这样的战士》的出发点。《墓碣文》不仅没有什么‘虚无’,且与他的全部作品同调,没有什么绝望与丧气”^①。这个论断显然跟邵荃麟当时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因为邵荃麟在40年代中期也曾指出:“在《野草》中间最被人们所熟记的,是那篇《这样的战士》,这确是最能代表当时鲁迅先生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的。有人说《墓碣文》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末我以为《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②也正因为如此,雪苇总结:《野草》中的“空虚感与寂寞感,在鲁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优势面而是劣势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③。显然,在雪苇、张禹等人的阐释中,《野草》中的阴影也是最终成了创作主体奋起搏斗的起点,而其转换的关键在于作者具有一种至大至强的人格结构,我以为,正是由于雪苇、张禹等人把握到了此点,他们论述中体现的辩证方法才能得到具体落实。所以,在对《野草》进行辩证的理解和把握中,注重凸现创作主体之人格力量在文本构造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了雪苇、张禹研究中的另一个特点。

雪苇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是拒绝向黑暗投降的,他所要求的是战斗,正如他笔下的过客,“无论前进的路是如何迷蒙不清与自己已经是何等的困顿,他仍要作决不休息的前进”,他内心所有的斗争,总是“出发于战斗,解决于战斗”。面对绝望与虚无这些阴影的侵袭,他宁愿以个体的方式承担,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说法,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这一切正是为了后代与别人。雪苇认为,这是“高度超越的自我牺牲底精神”^④,它也异常分明地体现在《影的告别》中:“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在雪苇看来,正是由于鲁迅具有这样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所以他才会最终战胜黑暗,而这也构成了鲁迅式战斗的内在的力的泉源。有了这种内在的力,鲁迅就会成为“这样的战士”,永远举起他的投枪,也就会战胜绝望、悲观与虚无,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就不可能成为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此观点显然与40年代邵荃麟、冯雪峰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张禹在文中也明确指出,《野草》更是表达了作者的人格力量。表达了他对正义、光明、自由、幸福的热爱,和对丑恶黑暗的压迫制度及其思想道德的憎恨;《野草》虽然表达了作者的所谓彷徨、怀疑、空虚以及颓唐的心理和感情,但是,因为作者在根本上是一个革命人,所以,他不会由革命的狂热转变为悲观、颓废之人。这表明,鲁迅的人格力量在《野草》写作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内涵。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雪苇、舒芜等胡风派成员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想法其实与邵荃麟、冯雪峰等人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张禹在后来的研究中无疑更多地承继了他们此时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当时的研究成果和文本解读中,更多地注意到了鲁迅的主体价值和人格力量。在对黑暗和阴影的书写中,它们之所以没有把鲁迅吞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具有一种坚强的主体人格和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野草》中不仅呈现为一种艺术的结构因素,而且以一种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姿态表达出来,因之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义。正是凭借它,鲁迅才会最终战胜黑暗,拒绝虚无阴影的蛊惑。而这些,倘若从理论的表现来说,其实都是

①雪苇:《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雪苇:《鲁迅散论》,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61、77、69页。

②荃麟:《鲁迅的〈野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6页。

③雪苇:《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雪苇:《鲁迅散论》,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6页。

④雪苇:《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雪苇:《鲁迅散论》,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62、77、71页。

通向胡风当时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这也表明,胡风派成员在当时感受到的那种历史氛围以及他们对于主体人格力量的肯定和渴望,其实也正是为国统区的另外一些左翼文化人所共同感受过的,这一点正显现了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历史内涵的不同。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仅邵荃麟在对鲁迅的认知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冯雪峰这位曾经跟胡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也对鲁迅的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蕴含的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抛弃了,把鲁迅所具有的那种主体战斗意志抛弃了。于是,《野草》中的鲁迅成了一个陷落在由“矛盾”所织就的黑暗深渊中的人,成了一个必须依靠某种外在力量予以拯救的现代知识分子。

比如,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中对于《野草》时期鲁迅思想中的矛盾给予了富有历史价值的说明,对鲁迅执着于揭示黑暗、反抗黑暗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种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是鲁迅思想和性格的最大特色,是“鲁迅思想提供给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价值之一”^①,鲁迅也因此并不是所谓的虚无主义者。但到1952年出版其《回忆鲁迅》时,冯雪峰对此作了新的改写,对《野草》的看法也就趋于消极了。他说:《野草》“更多地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的叫声,其中的思想就不能当作鲁迅先生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看,因为它表现得很隐晦,同时作为思想的著作来看,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并且其中好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阴暗的,有虚无感的,悲观而绝望的。自然,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感情,同时又被鲁迅先生自己在否定着,他同自己的虚无和绝望斗争,这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都看得出来的,但斗争的结果怎样呢?还是有些虚无和绝望,总之是矛盾,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②他后来写的那篇《论〈野草〉》,正如前面所指出,更是对鲁迅思想中的所谓个人主义的矛盾从世界观的角度作了系统性的论述,认为鲁迅当时已经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革命现实的发展,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主体精神成了鲁迅思想发展必须克服的障碍。于是,《野草》就成了鲁迅思想必须加以改造的证明,也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加以改造的证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在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地方,冯雪峰也颇费心思地做了再三改写,比如对“黄金世界”的理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发生了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黄金世界”是鲁迅在《野草》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对黄金世界的质疑当然受到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包含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想当年,曾经向往于民国建构的理想以及民国建立之初的新鲜气象,给鲁迅带来过莫大激情和快乐,但是后来民国现实的沉重又让其心头蒙上了几多失望的阴影,所以,你叫他怎敢相信人们对于“黄金世界”的预约呢?其次,鲁迅质疑“黄金世界”也是根源于他的人生哲学,这个哲学观念的核心就是执着于现在以及在此之上的行动。在这意义上,鲁迅显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把理想的到来建立在这个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但是这是否能说鲁迅就反对希望和“黄金世界”的存在呢?不能。因为没有它们的存在,鲁迅就会完全沉落于一片黑暗和虚无之中,他不仅会为外在的世界所吞没,也会为内在的世界所淹没,鲁迅所强调的,主要在于如何坚守一条从现在抵达未来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根基

^①雪峰:《鲁迅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314页。

^②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只能是执着于现在。所以,为鲁迅所反对的“黄金世界”应该说是一种没有现实依据和行动的幻想,是鲁迅对某些虚妄的理想主义者的质疑和反对。显然,鲁迅对“黄金世界”的理解是与他的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冯雪峰在当时也作了积极的理解和评价。

后来冯雪峰在重写这部分回忆鲁迅的文字时,就开始表示了一种犹疑,认为鲁迅对“黄金世界”的阐释还存在着矛盾的一面,消极的一面,“跟他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时的向前发展的要求,是显然不相符合的,至少在他的情绪上”^①。于是,鲁迅在《野草》中提出的“黄金世界”的命题就有可能体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而且只有这样理解,冯雪峰才有可能把1927年以前的鲁迅重新纳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的轨道上来,才能让“鲁迅”在当时发挥其引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意识形态化作用。到了写作《论〈野草〉》一文时,因为正是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之后,因而,他的写作动机和理论背景就有可能正是针对胡风派的鲁迅研究了。当然,他也有可能想借此对自己以往的鲁迅研究进行一番较为自觉的清理,所以,才会对鲁迅《野草》时期的思想局限性进行一番新的考量,也才会对鲁迅“黄金世界”的命题给出赤裸裸的指责。于是,在此时的冯雪峰看来,鲁迅所言“黄金世界”就是喻指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或是泛指人们所理想的新社会了。^②这样,鲁迅前期对黄金世界的质疑就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质疑了,《野草》时期的鲁迅当然也就有了某种深刻的思想局限性。言外之意,伟大如鲁迅者,也会由于进化论、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制约,而缺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向往,由此可知,对于鲁迅的思想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党的帮助显得何等重要。正是在这样的阐释中,冯雪峰不仅否定了胡风派对《野草》所蕴含的主体性及其革命性价值的理解,也否定了自己和邵荃麟等人此前对《野草》比较深刻的理解。本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跟胡风派具有相通的一面,这就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其现实主义理论,而胡风理论的产生又在一定意义上根源于他对鲁迅的理解。所以,在对鲁迅和胡风的理解上,冯雪峰、邵荃麟等人原本是有可能跟胡风派产生更多共鸣的。变了的不是《野草》及鲁迅本身,而是冯雪峰等人的观点。

如果说冯雪峰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野草》的阐释更多是从研究者内部瓦解了此前对于这部作品及鲁迅思想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解的话,那么,陈涌等人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于胡风派《野草》研究的批判,就是从外部来剥离人们此前对于这部作品及鲁迅思想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解。正像陈涌在批判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时所采用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有罪推论一样,他在批判雪苇、舒芜、张禹等所谓胡风派的《野草》研究时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于是,胡风派的《野草》研究也都是出于一种反革命的需要,《野草》研究成了他们反动政治行为的一部分。由此出发,胡风派的鲁迅研究也就毫无可取之处了。陈涌指出,“胡风集团在有关鲁迅的问题上对我们所作的斗争,是他们对我们所作的反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其成员在鲁迅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从胡风集团所宣扬的一般的反革命观点出发,又从而加深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观点的”^③。这个观点显然是从当时主流观点而来,胡风集团既然已经是反革命集团了,那么,这些成员当然就是反革命分子了,他们在鲁迅研究上呈现出来的观点当然就是反革命的了。因此,陈涌对胡风派鲁迅研究的批判,本就不是立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倾向于政治批判。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②关于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黄金世界”这一命题理解上的变化,张梦阳曾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详见其《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60页。

③陈涌:《保卫鲁迅方向,粉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思想》,《文学评论集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97页。

陈涌以为,鲁迅在《野草》中表达的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因而充满了彷徨、失望、怀疑、感伤、空虚和颓废的感情,但是,胡风派比如雪苇、张禹,不是把这个方面的内容加以遮蔽、模糊或者缩小了,就是把它加以张扬、扩大和夸张了。具体而言,雪苇是“更阴险地把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极的因素,实际上已经为鲁迅后来所抛弃了的消极的因素,也说成是完美无缺的,积极的,甚至是无比积极的”。此处所言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就是指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而它在当时被人笼统地叫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种思想形态。前面指出,在雪苇眼里,《野草》中的阴影和黑暗最终能够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这是因为鲁迅具有一种至大至强的人格,按照舒芜的说法,乃是由于鲁迅有着一种内心的光。陈涌对此表示不可理解,认为雪苇是在“不耻羞耻地假鲁迅之名来明目张胆地散布个人主义思想”,因为,“按照雪苇的逻辑,便是,还不能确信斗争的前途,还感到孤独寂寞的战斗者,即暂时还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是比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战斗者更为‘坚决’、‘英勇’的,个人主义是比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更值得歌颂的”。“如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的鲁迅,已经不但毫无缺点和限制,而且比什么都更理想的了,那么,鲁迅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呢?”显然,陈涌对雪苇在《野草》研究中张扬鲁迅的主体性力量的做法是表示反对的,因为这会妨碍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心和折服,也会妨碍人们对鲁迅前期思想中的矛盾性予以正确的理解。至于张禹,陈涌说,他是在“步雪苇的后尘”,因为他也认为《野草》中的感伤、空虚和颓废的情绪,并不使人麻木、昏沉,而是感到“更清醒、更活泼”,但是,“他宣扬反动思想是更加隐蔽也更加巧妙了”,原因在于,他至少在表面上还承认“鲁迅曾经有过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变化过程”^①。陈涌对张禹的批判是份量最轻的,是一笔带过的。

关于舒芜,陈涌认为他写于1945年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一文,也是一篇假鲁迅之名来进行反动思想宣传的文章,它跟雪苇阐释《野草》的文章有同有异:“不同于雪苇的地方是在于,雪苇抓住了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一些消极的因素,但掩蔽它,至少是模糊它和缩小它,并且极力把它描写成为积极的,甚至是无比积极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欺骗和蒙混读者;而舒芜呢,他也抓住了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极的因素,但他不加以掩蔽、模糊或者缩小,相反的是加以张扬、扩大和夸张,使得我们看到的鲁迅,不但不是雪苇所描写的毫无缺憾,而是相反的,变成了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了。但对于这些,舒芜也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加以宣扬,这又是和雪苇相同的。”之所以说舒芜把鲁迅歪曲成了一位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中国便是鲁迅的中国,也是鲁迅的基本认识,是鲁迅道路的根基,也是鲁迅精神的一种表现。而这,正为陈涌所痛恨。其实,陈涌说舒芜把鲁迅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乃是一种莫大误解。因为,陈涌的批判显然忽略了舒芜在论述中一再强调的鲁迅内心所具有的那种坚定的主体力量,或者说,陈涌有意省略了鲁迅的主体性力量。而且,舒芜跟胡风一样,他们置身其间的还是国统区的现实,因此,他们标举正视现实的黑暗,就像鲁迅所曾主张的那样,也并非是否定进步的力量,而是为一种现实主义和人生哲学观念所决定了的清醒态度。当然,在舒芜把这种态度提升到一种普遍化高度的时候,也确实包含了对于左翼文化内部所具有的一些不良思想习气的抨击。

^①陈涌:《保卫鲁迅方向,粉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思想》,《文学评论集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69、72、74、74页。

Subjectiv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Weed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u Xun's Thought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50s

Yuan Shengy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In the left-wing cultural circles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50s, researchers held same and divergent views 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Weeds* and therefore on Lu Xun's thought. Th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hether or not they dare to admit Lu Xun's ideological negativity and contradictions in his creation, and whether or not these are the signs of the limitation of Lu Xun's early thoughts. The Hu Feng School always emphasized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revolutionary value, but Feng Xuefeng, Shao Quanlin and others underwent major chang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changes is to abandon the sober realistic spirit and subjective will contained in *Weeds*. As a result, the so-called negativity, contradiction and limitation of Lu Xun's early thoughts are highlighted here. Thus, Lu Xun has become a modern intellectual who must rely on an external force to get rescued.

Key words: *Weeds*; Lu Xun; subjectivity; contradiction

责任编辑:孙秋英

现代文学红色经典的知识社会学考释^{*①}

王寰鹏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考察现代文学红色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系”问题是对其进行阐释的必要任务。从中国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意义变迁和叙事元素的延续、变异都深刻地体现在两类文本之中,这是赓续新文学传统的表现。红色经典是与欧美左翼文学时间距离最小的文学形态,它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红色经典与世界左翼文学实时互动的史实,使后者成为红色经典不可或缺的释义学背景。红色经典同样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的知识建构理应经受知识社会学的检视。

关键词: 红色经典;知识社会学;文学传统;释义背景

中图分类号: I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36-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4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1950—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系”^②问题很值得探讨。作为特殊历史的文学史不但要关注静态的形式价值,而且要触及动态的文学之“在”的血脉;在此知识建构过程中,历史主义是比纯粹形式先验论和单纯质料先验论更为有效的方法。“历史只能从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不能‘跳出’历史之外,占据一个在历史之外存在的静态的、独断的立场来进行体认。”^③如此看来,红色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系问题就理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必要任务。从最显在位系关系看,红色经典的创作实践不仅继承了中国新文学传统,而且与世界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实时互动关联,它不是中国大陆范围内封闭建构、自说自话的文学现象,而是世界文学同频共振的文学史现象。从世界范围看,中外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很大的时间差,如中西启蒙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都有很大的时间距离,但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广义的中国左翼文学却是与欧美左翼文学时间差最小的文学形态。二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文学现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不应被忽视的史实。这一历史景观启示我们,在阐释红色经典时至少要将中国左翼文学和欧美左翼文学作为不可或缺的释义学背景。如果把红色经典放入世界文学格局中考察,可以说,它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

* 收稿日期:2020-03-16

作者简介:王寰鹏(1965—),男,山东安丘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研究(1917—2019)” (20BZW147)的阶段性成果。

②卡尔·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定义为:“有可能把知识社会学展现为关同,于知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而不引起任何认识论问题。”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91页。“位系”是卡尔·曼海姆用来描述知识生成的社会条件和存在条件的重要范畴,其含义之一是:“一个问题未成为现实问题之前,不会成为知性问题。见[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③[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

红色经典对中国左翼文学的继承不仅表现在文学外部,更表现在文学内部。深入文本是探查二者关系的必由之路。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40—1970年代的解放区与大陆中国文学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政治组织者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的管理上,而在创作上则已经大相径庭。此类观点割断了文学写作传统的连续性,以外部描述遮蔽了文学内部传统延续的事实,它实际上是由某种主观意识所导致的知识体系的断裂。事实上,文学传统的延续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文本传统是更为根本的所在,包含在文本中的意义元素、叙事传统才是最需要认真勘定的精神传统。

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与红色经典的革命理性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革命理性是中国左翼文学的灵魂,阶级论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思潮渗透到左翼文学之中并延续到1950—1960年代文学里。革命的目标是破坏一种旧制度、创立一种新秩序,社会主义是破坏过程的结果,也是新建过程的开始,它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归宿。“汉语知识界的一个流行误识是,仅把资本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视为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则被视为封建复辟。这种论断尽管流行,却很成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源流于法国启蒙运动,它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构想。”^①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它当时并不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红色经典则代表着初步获得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没有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也就不可能有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话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完整逻辑过程。红色经典的理性特征比左翼文学更为明晰,其意义焦点更为集中、意义体系更加完备,它是一种意义生产的再生性升华的标志。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由初步渗透于文学中到在文学中全面展开,这是一个强大的“实践-意识”传统,红色经典作家正是在认同这种“实践-意识”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深入其文本内部,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实践-意识”的传承。从知识位系的角度看,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书写并非始于红色经典,早在左翼文学时期就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叙事。也就是说,红色经典对农村变革的理性思考可以在左翼文学中找到其源头。1930年,洪灵菲在其长篇小说《大海》中就曾开列出12项农村革命的成就:组织了农民自卫队;结束了农村的私斗;解除了对农民的剥削;集股建了消费合作社;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开设了革命小学;妇女得到了解放;制订了劳动保护法;没有了叫花子、偷窃;设立了公共看病处,免费为农民看病;建立了交通网;设立了村俱乐等。^②这部小说中显然有一种被预先透支的现代性,在作者笔下似乎一个现代大同社会已经降临中国乡村,而事实上当时左翼作家所预约的美好愿景是一个十分浩繁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工程,它到红色经典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且其实施过程相当艰难。中国左翼文学提前透支现代性的激进表现遭遇了现实的挑战,正如马尔库塞所论:“在伟大的历史性革命运动中,想象曾经在短暂的时期内无拘无束地参与制订过一个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自由机构的方案;接着,它却牺牲于有效理性的需要。”^③马尔库塞的论述不仅适合于左翼文学,同样也适用于红色经典,《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同样受到后来现实的有效理性的质疑。这类小说是试图消灭私有制、改造人性并为此执著努力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价值

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②洪灵菲:《大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③[美]赫·马尔库塞:《新的感受力》,赫·马尔库塞等:《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52—53页。

的“应然”指向与左翼文学一脉相承。对这个“应然”指向的评价尽管不是今天的事情,但必定是明天或后天的任务,否则,我们将失去进步的能动性。《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无疑是体现《大海》所提出的乡村变革的“实践-意识”的全面展开的文本。红色经典的革命理性正是在左翼文学基础上进行深化与拓展的结果。

红色经典作家或直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或受到左翼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这类史实必须予以重申,因为它是红色经典作家延续“实践-意识”的直接证据。1933年梁斌在北京加入“左联”,他的“第一篇反映二师学潮和高鑫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发表在北京左联主办的《伶俐》月刊第二期上”^①。这个短篇可被视为是《红旗谱》的“前文本”。吴强、欧阳山都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联”,后者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②同样是在1933年,孙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流浪,父亲托人在市政府为他谋到一个职位最低的公务员差事。孙犁回忆当时读书的情况时说:“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③上述刊物中除《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他全都是“左联”创办的刊物。周立波于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从事编辑工作。杜鹏程回忆说:1934—1936年间“我在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接触了左联和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象巴金的《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哭诉》等,许多作品都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④。由此可见,大部分红色经典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文学教育与左翼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左联”的宗旨和左翼文学作品深刻地影响、培育了他们,其建国后的创作很自然地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

知识社会学非常注重对价值等级体系的分析(如马克斯·舍勒),其中也包括对文学作品中价值转换问题的分析。按照舍勒观点,与人的“精神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美丑)、“公正价值”(对错)以及对于认识真理的纯粹认识的价值在内的领域)相对应的是由那些追求真理、美以及正义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共同体”。^⑤从价值观转换的角度看,红色经典继承了左翼文学把个体渴望价值融入集体渴望价值的传统,或者说红色经典瞄准的是利益共同体的最普遍、最优先的渴望价值。红色经典在左翼文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推进了这种渴望价值的传播与认同。红色经典渴望价值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它的渴望指向在新文学发端期就已经萌生了。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建立、民族的复兴,还是自主、平等的渴望价值都不是红色经典所首创,而是继承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结果。比如,在红色经典中普遍渗透着男女平等的观念,这个价值追求并非始于红色经典,早在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中就有了这样的追求。五四文学首倡男女平权思想,左翼文学在书写革命的同时继承了这个思想脉络。左翼文学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如黄曼曼(洪灵菲《流亡》)、马林英、玉青(华汉《马林英》《两个女性》)、梅春姐(叶紫《星》)、余玥(白薇《炸弹与征鸟》)、素裳(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梅行素(茅盾《虹》)、女兵(谢冰莹《女兵自传》)等等,都是明确表达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意识的重要文学形象。这个价值理念在《红旗谱》

①刘云涛等选编:《梁斌研究专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②燕绍明辑:《欧阳山年谱》,欧阳代娜编著:《百年欧阳山——欧阳山访谈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97-398、12-13、16-17页。

③孙犁:《书的梦》,《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④陈纾、余水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杜鹏程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⑤艾彦:《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译者前言》,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

《山乡巨变》《创业史》《青春之歌》中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如梁斌就曾经明确表示:“在《红旗谱》开始的几章中,除了阶级斗争之外,我首先提出了妇女问题。”^①《山乡巨变》中的女主角邓秀梅就是男女平等理念的有力倡导者,乡村妹子盛淑君便是邓秀梅最热烈的响应者和行动上的支持者;在《三家巷》中,我们看到胡柳、胡杏也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青春之歌》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林道静追求革命的道路与追求女性权利的道路是重叠的。上述观念其实是对整个现代文学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赅续。左翼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林道静等人物之间构成非常明显的互文关系,她们都是林道静、邓秀梅、盛淑君等人的精神前辈,后者比其前辈有了更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更现代的行为特征。

如果我们把茅盾的长篇小说《虹》与《青春之歌》进行简要比较,就会发现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之间有一种价值转换的继承和变异关系,这是一种统一性感觉结构的延续的结果。梅行素与林道静的人生轨迹都有一个从个体到群体的过程,但前者对这个过程的意义没有多少认识,后者却对此有了清晰的认知并自觉付诸行动。左翼文学的先驱早已认识到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红色经典中的集体主义形象正是左翼文学初步走向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的延展。^②梅行素是带着青春张扬、愤世嫉俗的气度冲出夔门的新女性,她要征服环境、征服命运,甚至征服自己的女性和母性。她鄙视弱者,发誓不做被动者,这是一个五四新文化熏陶出来的新女性。在婚姻上,她抗拒父命的方式是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而给他一个教训,她要“进牢笼里去看一下,然后再打出来”。在梅行素身上有很多十分矛盾的特征,她既有明显的个性主义、崇尚自我的表现,又有对五四“新文化者”的高度怀疑,甚至能尖锐地指出五四落后后新文化运动的尴尬局面。婚后为躲避丈夫,她进入教育界,却目睹了泸州教育界的齷齪。冲出家庭后,她面对的依旧是枯燥与黑暗,成了一个“于人无益,于己有损”的新女性。在上海当面对梁刚夫等人的政治行动时,她起初采取“看把戏”的态度,并打算独立门户干政治活动。对此时的她来说,“永不曾有过一件事使她感得个人以外尚有群的存在”。当梅行素爱上梁刚夫后,曾经靠美丽聪明能够颠覆一切男子的她却无能为力了,梁刚夫及其事业给她造成了无名的压力。在梁刚夫的引导下,她开始读马列书籍,新知识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宇宙。梁刚夫评价梅行素的初恋说:“你们做了一首很好的恋爱诗,只可惜缺乏了斗争的社会的意义。”这深深地刺痛了她,她就连在梦中也受着“社会意义”的压制。梅女士在革命与本能的双重压制下,几乎丧失了原本自我。最终,梅行素决定:“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在抗议巡捕枪杀市民的行动中,她和梁刚夫等人参与组织了上海反帝反军阀的游行示威,她勇敢地冲在反抗人群的最前面。^③根据刘小枫的观点,“主义”话语普遍存在于19世纪至今的知识社会中,它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典型现象”,也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课题:“‘主义’话语是带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此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④从《虹》到《青春之歌》,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主义”话语在不断延续并逐渐得以净化和强化。之后,这种“主义”话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开始被耗散、被消解。“主义”话语在文学中的式微是一

①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文艺报》1958年第5期。

②如蒋光慈曾说过:“现代革命的潮流,很显然地指示了我们,就是群众已登了政治的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不重要的地位上了。……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他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他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1928年《太阳月刊》2月号。

③《茅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48、67、83、175、208、241、252页。

④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199页。

种全球化知识现象,这也正是我们称红色经典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的理由所在。从梅行素到林道静,我们看到了一个伦理观念逐渐聚焦、渐趋清晰的过程。梅行素的伦理面貌是模糊不清的,她身上混合着五四青年与革命女性的双重油彩。这种特征在林道静身上已有所减弱,林道静已没有梅行素的青春张扬式的决绝与傲气。二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极为相似,如女性解放、家庭婚姻、自由恋爱、人生出路、革命运动等。除此之外,林道静还面临着新旧文化道路、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其中后一问题演变成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她们有很多同质的困境,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在林道静那里,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比其前辈更为迫切的问题。尽管在梅行素那里已经遭遇过“问题与主义”之争^①,但是这个事件的文化意义在《虹》中并未得到系统展开,而到《青春之歌》时,“问题与主义”之争被赋予了两种文化道路抉择的意义,具体表现就是革命道路与书斋道路的尖锐对立。^②在林道静身上,虽然本能与革命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是支撑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因为对林道静来说,本能与革命已经逐渐呈现为顺向发展的态势,这在梅行素那里却是一种尖锐的冲突。对梅行素来说,生命的力比多只能在革命行动中才可得以释放;而林道静则既拥有革命事业又拥有了革命恋人。林道静的乡村革命经历是梅行素缺乏“斗争的社会的意义”在新阶段的补偿,这个发端于左翼文学的问题,中经延安文学发展成为红色经典的核心问题。左翼文学与红色经典都涉及伦理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同步性问题,但前者相对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却已经相当清晰、明朗。通过上述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学中初涉革命的新女性与红色经典中的革命女性既有传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变异,这是典型的由整体环境所决定的、由诸多意义元素所造就的“意义变迁现象”。^③林道静的精神前辈还可以在左翼文学的其他作品中找到,黄曼曼、玉青、梅春姐、余玥、素裳等都是与林道静非常相似的人物。林道静形象不仅重复了左翼文学中其前辈们的人生轨迹,而且继承、发展了她们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更明晰、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红色经典由过去的意向性“意义”向现在的意向性“意义”发展的脉络深潜于文本之中,这种知识景观是整个现代文学内涵性演进的必然呈现。

二

文学经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它是“社会知识之一种,不是个体趣味选择了文学经典,而是知识的生成机制造就了文学经典。文学的经典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生成的社会机制”^④。梳理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就是为了看清这种机制。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之间不仅存在意义变迁现象,而且还存在叙事元素的延展与变异现象。通过更深入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在叙事传统上的逻辑演进轨迹,因为故事与人物是叙事文本最重要的两大元素,由此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看出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文学经典之间的继承与变异关系。

马克斯·舍勒认为,就整个认识发展史而言,爱或恨作为最初的行为方式,既是所有实践立

^①“胡博士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应时而起地成为流行语。梅女士觉得韦玉也中了‘主义’的毒,无抵抗主义的毒。”《茅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②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73-174页。

^③“意义变迁现象”是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④王寰鹏、张洋:《“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哲学反思》,《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场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各种认识的出发点,其间价值偏重难以回避:“在认识进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认识所把握的对象在被智性认知、分析和判断之前,首先必须被爱或恨。无论如何,‘爱者’要比‘知者’先行一步。同样也不存在这样一片存在领域……,对它的研究可以避开一个偏重阶段,便直入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这种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经常伴随着该领域的形而上学化(把它错误地提高到‘绝对’意义高度)。”^①舍勒把爱或恨认定为认知的初始方式,而在文学作品阐释中分析这种爱与恨也是不可或缺的,叙事作品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恰恰是传达情感意向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在故事结构上,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传承关系亦非常明显,其典型文本之间存在着故事编织上的同质同构性。通过比较华汉(阳翰笙)的《两个女性》(1930)和《青春之歌》的故事结构,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两个女性》和《青春之歌》都表现出将女性作为争取对象并对其进行规训的取向。《两个女性》中知识女性玉青对冷淡了信仰、脱离了政治、走向书斋的丈夫丁君度教授越来越反感,而对投身革命实践的旧日恋人云生的归来却惊喜万分。大学时代的玉青曾同时爱上老师丁君度和同学云生,最终她选择了痴情、奋进、有理论的丁君度。当革命内部发生分裂、流血的日子真的到来时,丁君度发表声明不再过问政治,玉青却非常关心当前的政治斗争,丁君度试图扑灭她对政治的热情但未能成功,因而曾经志同道合的夫妻发展到势如水火。云生的归来重新燃起了她对旧日恋人的激情。从事革命实践的金文女士成了她崇拜和仿效的榜样。以金文为自省的镜子,玉青对自己婚后没有进行奋斗而愧疚。在云生组织的纱厂工人大罢工中,玉青积极参与,而丁君度却漠不关心、冷嘲热讽。罢工失败后,玉青与丁君度决裂,同云生一起到南方去参加革命。很显然,《青春之歌》与《两个女性》在故事结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玉青与林道静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说,《两个女性》就是《青春之歌》的“前文本”之一。林道静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个人情感上重复了玉青的人生轨迹。金文作为玉青的榜样,恰如监狱中的林红为林道静树立的榜样。这种从情节到人物行动的结构性一致完全是虚构的巧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呢?这两部小说都以革命为标尺来测度复杂多变的人的感觉世界,并且把这个外在的尺度置换为女性的内在价值尺度。女性被叙事者视为重要的言说革命的对象,这是源于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女性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叙事中都成为了被争取的对象。从《两个女性》到《青春之歌》,中国现代文学又走过了30年。30年历史在文学史上不算短,为什么二者如此相似呢?我们认为,所有具备一致价值取向的文本都天然地构成互文关系;一种渗透到文学之中的潜在的伦理力量至少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其实这种伦理力量的萌生期更远一点可追溯到1900年代,这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运动过程。不管杨沫是否读过《两个女性》,上述两个文本之间都构成了典型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互文关系的典型案例。很巧合的是,当《青春之歌》完成后,作者曾托白杨找到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的阳翰笙,请他为出版社审阅初稿,后者因工作忙碌没能审阅。^②互文是一种无形的网。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文际关系,实质上它逃脱不掉人际关系,互文背后折射出的是人的社会性联系,它是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上述两个文本的高度相似性说明,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知识者分化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上述文本现象的存在,虽不能作为判定它们就是现实的客观反映的根据,但至少可以说它们都是一种时代潮流的折射,它们所折射出的是同一个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伦理变迁的脉络。《青春之歌》是带着明显的历史惯性的文本,它不仅延续了左翼文学的

①[德]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08页。

②老鬼:《我的母亲杨沫》,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精神,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青春之歌》如何赓续五四新文化精神、如何借用新文化资源,是很值得探析却被现有知识体系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的问题;虽然有革命元素的加入,但林道静面临的问题与五四青年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即使有对革命的描写,这部小说也是在另外的维度上丰富了五四文学传统,而不是割断了五四文学传统。

我们再来看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赓续关系。毫无疑问,它们同样明显地体现了情感意向(爱与恨)的延续性表达。红色经典的人物形象与左翼文学的人物形象的特质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他们之间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联。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被颂扬的人物有两个变化的特征:一是人物的伦理面貌不再模糊不清;二是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更加突显。前文提到的洪灵菲的《大海》与梁斌的《红旗谱》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可以说,《大海》中的锦成叔就是《红旗谱》中前期的朱老忠;裕喜叔则是与严志和性格相似的人物。锦成叔闯荡南洋、见过世面、“有主见而不容易屈服”,他是一位满身豪气的农民,不但有钢铁一般的体格,而且像虎豹一样有力,像狐狸一样机警,他依靠个体的力量巧妙地逃避阶级的压迫,凭借自发的本能向社会反抗。但是,有组织的现代革命机制必然要否定单靠个体力量反抗社会的行为,这是3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叙事的一个明显趋势。在《大海》下部,当阿九当上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时,锦成叔反而成了相对落后的人物,他不相信儿子阿九能管理好村子,阻止老婆去参加妇女会,并动手打了她。锦成叔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真实,他是一个未经提炼的、“本着一种原始的、野兽性的本能,在向着社会反抗”的农民形象。^①小说最后,锦成叔逐渐臣服于个性远不及自己刚烈、勇猛的阿九面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锦成叔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也就等于宣布了个人英雄主义与现代革命运作方式的抵牾。朱老忠与锦成叔的差异是由文学典型化程度所造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体现的也是个体的、自发的激烈反抗,后来的朱老忠(《播火记》)逐渐成长为有组织的乡村革命的领导者,而锦成叔却只停留在底层自发的反抗者的层面。这种差异表明,朱老忠这个人物实际上承担了锦成叔和阿九两个人物的功能,为了避免性格不突出(如阿九)的缺陷,朱老忠便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承担了被颂扬者的功能。

在左翼文学中还有一类很特殊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反叛父亲(父权)作为革命行动的支点。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他背叛地主父亲李敬斋,领导农民反抗父亲,并同意暴动的农民烧毁了李家老楼;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中的胡巧鸣也是这样的人物,他直接与土豪劣绅父亲胡蓉生对抗,自作主张到乡下开仓捐粮低价粜谷,救济荒年的老百姓,最后死在了父亲的枪下。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形象。《红旗谱》中的张嘉庆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这个神枪手带领村民抢了地主父亲的棉花地。《风云初记》中的女干部李佩钟也有类似的作为,她公开审问、处理了不支持八路军抗战工作的公爹。《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也都有违抗父命的行动。由此可看出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中这一类人物的传承关系,他们的革命激情和力量都来自对传统伦理的突破和对革命伦理的认同。无论在左翼文学还是在红色经典中,这样的人物都是通过反抗父辈(父权)实现反抗阶层固化、追求新价值的形象。上述人物形象明显地突破了常规“教养”的限度,有一种超常规的激情化伦理取舍,他们的出现总能引起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安。舍勒曾经把个体、民族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命名为“精神气质”,他说:“这精神气质的根本乃首先在于爱恨的秩序。这两种居主导地位的激情的建构形式,尤其是不受教养因素影响的建构形式。这系统恒常支配主体如

^①洪灵菲:《大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01页。

何看他的世界和他的行为活动。”^①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上述现象是一种由一个价值层级向另一个价值层级突破、转化的文本迹象。

从人物类型的变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红色经典对左翼文学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左翼文学中最清晰的人物类型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其中,民族资本家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宋霖笔下的萧鹤声(《滩》)等。红色经典中最显著的人物类型却是:农民、军人、革命先烈、知识分子革命者,其中知识分子革命者和工人形象相对减少,民族资本家形象更少,只有少数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形象(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革命军人形象(《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是红色经典贡献给现代文学人物画廊的崭新类型,左翼文学虽然涉及到武装斗争但并未出现标准的这类形象。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人物类型的总体变化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说明红色经典既从左翼文学形象谱系中继承了一部分人物形象,又删除或削弱了一部分人物类型,并重新造就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类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作家技术操作的结果,而是文学的历史运动的结果。“一种思想功能的变化总是涉及到意义的变迁——这是如下观点最根本的一种表述:历史是意义的一种创造性中介,而并不仅仅是只实现那些预先存在的、自足意义的被动中介。”^②

总之,无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方面来看,还是从前述的“实践-意识”、价值转换、意义再生的角度来看,左翼文学都是红色经典的最显明的“前文本”,这正是红色经典在文学知识链条上最基本的“位系”所在。红色经典全面继承了左翼文学(包括延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发展了这种传统,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外部组织方式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文本的内部构成元素上。

三

中国红色经典与欧美左翼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观照,就难以实现对红色经典世界化视野下的更深刻的理解。考察红色经典在知识链条上的位系,是理解这类特殊文学作品的必备条件;红色经典与欧美左翼文学同步共振的事实,决定了欧美左翼文学是我们阐释红色经典不可或缺的释义背景。红色经典很好地融汇了世界左翼文学的传统并赋予世界左翼文学传统以中国风貌。众所周知,在域外文学中苏联文学曾经是中国当代作家学习的榜样,它对红色经典产生了直接影响。早在延安时代,苏联文学就是被接受的重要资源,杜鹏程等作家都谈到战争年代对苏联文学的学习借鉴。^③19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不久便首批推出“苏联文艺丛书”,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卫察里津》《铁流》以及A·托尔斯泰的作品等,为中国作家向苏联学习提供了比战争年代更好的条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也是从前苏联引进来的。《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从鲁迅一代作家就开始译介的作品毫无疑问是红色经典作家思想与艺术上借鉴的资源。1950—1960年代中苏文学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作品(包括红色经典)的双向译介上,还表现在作家的互访活动上,对此无需赘述。^④在《红旗谱》中,保定二师发生爱国学潮,校园被军队包围,在学校坚守的学

①[德]马克斯·舍勒:《爱的秩序》,林克译,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第41-42页。

②[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③杜鹏程:《学习苏联文学的点滴回忆》,《延河》1957年11月号。

④李岫、秦林芳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4-571页。

生们一边坚持斗争一边传阅《铁流》《士敏土》《恰巴耶夫》《母亲》等小说(《红旗谱》第52、56节)。在《红日》中,女战士姚月琴送给恋人胡克的礼物是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红日》第4章第16节);副军长的恋人华静既读过《红楼梦》《西厢记》,又读过《母亲》《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毁灭》等(《红日》第8章第34节)。上述文本迹象足以表明,红色经典作家是善于借鉴他国左翼文学作品的作家。

就整个20世纪30—60年代欧美文学来看,其激进的政治倾向也非常明显,这是与左翼文学、红色经典同时代的具有直接参照意义的域外文学,但这个释义背景却很少被当下研究者纳入视野之内。在美国30—40年代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激进左翼文学作品就有杰克·康罗伊的小说《无产者》(1933)、罗伯特·坎特韦尔的小说《丰饶的土地》(1934)、亨利·罗斯的小说《称它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2,1936)、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还有曾访问过苏联并加入共产党的美国著名作家德莱赛的政论集《悲剧美国》(1931)、赖特的《土生子》(1940)、马尔兹的《潜流》(1940),等等。德莱塞的作品早在3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① 马尔兹在他撰写的《潜流·中译本序》中甚至把自己塑造的小说主角与《鸡毛信》中的海娃进行了并行表述。^② 就欧洲文学来看,这个时期称得上经典的激进左翼文学盛极一时。与德莱赛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作品也很早就为中国作家所熟悉。^③ 1988年布克出版社出版的M·凯斯·布克的《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一书指出:“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社会的笼罩使英国左翼文学在1930年出现高峰,数百部左翼小说发表,‘吉朋的小说《苏格兰三部曲》成熟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本时期左翼作家还创作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实验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同时,考德威尔、福克斯、韦斯特等文论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出重要贡献。”^④30—40年代在法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有一些史实值得特别注意,即1930年代有多位法国作家写过关于中国、中国农民和中国革命的作品,比如法共作家瓦扬-古久里、安德烈·马尔罗、克洛德·鲁瓦等。瓦扬-古久里曾于1933年访问中国并与鲁迅会晤^⑤,他根据在上海及附近农村的调查,写出了几篇真实生动地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报道体小说,包括《一只苍蝇被压死了》《二妹和三妹的故事》《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等;法共左翼作家马尔罗曾写过两部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分别是写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1928)和写“四·一二”政变的《人类的命运》(1933);法共作家克洛德·鲁瓦“甚至写过《镜子里的中国》(1953)和《中国诗歌的瑰宝》(1967)等四部关于中国的书”^⑥。4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出现了阿拉贡的六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1944,1949年),早在1959年翻译家罗

①早在1930年代初,革命文学先驱瞿秋白就撰文介绍美国左翼作家德莱塞。他在题名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中说德莱塞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无穷的光彩”,并指出“德莱塞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美]西奥多·德莱赛:《美国悲剧·美国梦的牺牲品(代译序)》,潘庆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IX页。

②马尔兹:《潜流·中译本序》,黄星圻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2页。

③冯至这样评说布莱希特:“三十年来他密切地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的诗歌和戏剧有许多处是取材于中国革命的故事,他的戏剧理论受过中国戏剧的一些影响,此外他也曾把中国的诗译成德语。”冯至:《布莱希特选集·后记》,[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戏剧选》,冯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26页。

④陈茂林:《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宝典》,《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⑤《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2页。

⑥吴岳添:《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4-75、87-89、161页。

大冈就在《文学评论》上撰写长文介绍过这部小说。^①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以共产党人为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纳粹即将占领法国时人民的苦难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有学者曾这样评论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引人注意的是,今天,当人们论及20世纪西方文学时,几乎极少再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似乎它只是一场已经过去了的没有真实性的梦幻。”“已经消逝了的东西,并非不曾存在过的东西。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法国曾经显赫一时。”^②柳鸣九通过大量史实广泛阐述了当时的法国左翼文学,他深刻地指出:“文学界名流和知识界精英的左倾与跟共产党的同路而行,可以说是2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个重大社会现象,一股明显而强大的潮流。”“这不仅仅是法国20世纪文化与文学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也是西欧国际共运的发生、发展与衰落的一个重要侧面,对这段历史作出社会的、政治的分析与评论,不是笔者分内之事,也不是一件虽吃力尚可讨好的事,这里,笔者只想指出,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政治左倾高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不可能不有一个难以抹杀的历史地位。”^③可以断定,自30年代起知识分子趋左绝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列举了很多欧美知识分子转左的事实,详细讨论了30年代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提供了这样一段关于英国左翼力量的资料:“有充分的数字证据表明,投奔左翼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除了‘左派读书会’兴起以及其他大规模政治信仰转变的现象外,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1930年英国共产党仅有1367名党员,到1939年则刚刚超过1.5万名。而大部分人都在剑桥大学读过书!”^④从20—50年代欧美文学的走势来看,现代政治风云在文学创作中的印痕非常明显。不管当时中国红色经典作家对欧美左翼文学有多少了解,他们与欧美左翼作家处于相似的大政治氛围之下,其作品与前述文学形态同处于一个大的共生性文学场域。实际情况是红色经典作家对苏联文学、欧美左翼文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杜鹏程、柳青、周立波等都对苏联文学、欧美文学有过广泛涉猎,柳青、周立波还对苏联、欧美左翼小说进行过翻译介绍。中学时代的柳青“经常到省立图书馆去看美国进步杂志《亚细亚》和英国的《左翼评论》,星期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⑤。周立波翻译过苏联左翼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捷克左翼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秘密的中国》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同是震惊世界的报告文学,而且它的出版时间比后者还要早几年。^⑥早在1930年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前期作品就被介绍到欧美国家,如1933年美国左翼作家伊罗生邀请鲁迅、茅盾编写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所选作品多数都是左翼作家的作品,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即入选鲁迅、茅盾推荐的篇目。^⑦其实,红色经典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产生的,红色经典作家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作家群,而是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左翼文学颇有关联的群体。仅从同时代红色经典的英语、德语翻译情况就可看出红色经典的开放性传播接受的一些情况。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在1954年就被翻译为德文并由柏林的人民和世界出版社出版;《红日》英

①罗大冈:《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②柳鸣九:《超越荒诞——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③柳鸣九:《超越荒诞——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④[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城、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93页。

⑤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郗持文:《柳青传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⑥《周立波传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张永建等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立波研究专集》,1979年(未正式出版),第1页。

⑦鲁迅:《〈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1页;顾钧:《〈草鞋脚〉与〈中国论坛〉的关系》,《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

文版于196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林海雪原》英文版在196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根据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红色经典中“在西方最为知名的小说是《红岩》”,其英语译本在1974年由斯图加特的新路出版社出版;《敌后武工队》在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①1959—1965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进步文学作品^②,同时红色经典也被翻译成上述国家(不限于这些国家)的文字出版。红色经典与世界文学之间,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联系更是一种文化共振的联系,红色经典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通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红色经典同样也不例外。在讨论红色经典时,我们不应忘记欧美左翼文学传统对红色经典的滋养,否则,红色经典就成了完全与世界文学隔绝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红色经典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是多元开放的、世界性的,而不仅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传统,世界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也曾滋养其创作。红色经典的革命书写是世界革命潮流的折射,其抗战书写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主义建设描写是国际共运实践的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红色经典同样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而出现的强烈政治性特征,其实是上承中国新文学传统并被世界政治走势、世界左翼文学潮流所裹挟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红色经典必须被放入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认知,它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这一潮流的形成有人类共通的愿景。学术界对红色经典的这个大背景的忽视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盲视。如何认识红色经典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问题也是正确评价红色经典的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同样要有一个全球化视野,红色经典的政治性是特殊年代知识生产的鲜明印记,是与世界左翼文学激进表现同步的历史特征,红色经典的政治性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政治性的重要表征之一。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全球性激烈对抗的年代,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努力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对世界来讲则是历尽战争劫难的时期。40—50年代,残酷的全球战争和局部战争绵延不断,在全球性政治与经济对决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被上演。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还是在美国和苏联争夺在中国利益的年代,最终结局是他们都没能在中国获取其想要的东西。中国人要独立自主地重新安排自己的事情,这当然包括规划社会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新文化的重构。这种安排顺理成章地还要包括一整套被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为“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的规范。^③红色经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当起了确立样本和规范的功能。在此背景下,最超然的艺术也会内在地存在政治要素,这正像在1830年代一个不谈论政治的人就不是法国人一样。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只能是政治性文学,没有政治性也就不存在当时的红色经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对一种不为社会政治问题‘束缚’的文学的提倡,在中国现实环境中,或者是自觉对抗文学激进力量的,或者虽是无意,但在文坛格局中,实际上成为一种对抗力量。这就是说,摆脱政治束缚的文学主张,就是一种政治主张。加上中国文人的心理传统,使有关文学‘独立’的诉求,总带有复杂的、可疑的品质。”^④试图把所有文学问题都翻译成纯粹艺术问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从知识位系来看,红色经典中的政治热情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被点燃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在一种既反传统又遵循传统的无意识机制中不断燃烧的热情,恰如费正清所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新的教育制度——著者)中进行

①[德]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页下注释1。

②李岫、秦林芳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7—579页。

③[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3、170页。

④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52—153页。

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了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①今天,我们认识这段文学史必须看到它与世界传统、中国传统、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的多重关系,不能脱离动态的历史关系而人为地扯起一块无知之幕。单一地提纯红色经典的阐释背景或武断地固化红色经典的阐释话语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对文学史建构来讲,如果只谈其他时期文学的世界化而不谈红色经典时期文学的世界化,那只能是一种知识生产的骗局,文学史的知识建构理应经受知识社会学的检视。

Study on Red Classic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ang Huanp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t is a necessary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ellation” of red classics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From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to red classics, the change of meaning and the continuation and vari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are profoundly reflected in the two kinds of texts, which is the expression of continuing the new literary tradition. Red classics are the literary form closest in time to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eft-wing literature. It is the last paradigm of moder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red classics interact with the world’s left-wing literature in real time makes the latter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hermeneutic background of red classics. Red classics are also an organic part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be examined by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Key words: red classic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iterary tradition; hermeneutic background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强制阐释、公共阐释与中国阐释学的 创造性建构^{*①}

傅永军

(山东大学 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张江所致力建构的“中国阐释学”在时间上晚于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诠释学建构,但在理论建构的系统性、理论的说服力以及自我证成能力诸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张江的中国阐释学建构重回文本诠释学,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中国阐释学的系统建构,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提出了“阐释π”这个原创性概念。张江将阐释视为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不仅强调阐释的认知功能——对客观性的文本意义的揭示,而且更加突出阐释的实践功效。他的中国阐释学建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传统之上,兼具哲学的认知理论和阐释的社会理论二个面向,实为理论创造性建构之可效仿之典范。

关键词: 西方诠释学;中国阐释学;强制阐释;公共阐释;张江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48-1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5

自20世纪70—80年代西方诠释学逐步传入汉语学界以来,它快速地对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影响,以三种方式塑造出汉语学界诠释学研究的基本学术版图。这三种方式包括:一是将传统经典注解置于现代学术范式中进行考辩探究,揭示文献、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激活其阐释的功能;二是返回传统,对中国经学中长久持存但在近代被中断的经典注释传统进行挖掘整理,反思重构中国经典诠释学,特别是儒家经典诠释学;三是尝试以不同方式审视、发挥、重组中国哲学的丰富诠释经验与诠释传统,积极促进传统诠释经验和意识的现代化与理论化,致力于构建一门区别于西方诠释学的中国诠释学。其中,以第三种方式最具创造性且对中国的诠释学研究影响巨大。检视汉语学界中国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发现六种以体系性方式存在的中国诠释学: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的“东亚儒家诠释学”、林安梧的“道论诠释学”、张江的“中国阐释学”和潘德荣的“德行诠释学”。这六种分别以不同名称标示的“中国诠释学”理论,既是汉语学界华人学者在诠释学领域所取得的较为完整、系统和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也是汉语学界华人学者在“中西对话”“古今之变”之大的历史视域中,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进行现代性改造最有典型代表性的模式。尽管在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哲学基础、朝向什么维度重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国诠释

* 收稿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傅永军(1958—),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视阈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化路径研究”(14AZD092)的阶段性成果。

学的旨趣、宗旨、任务与目标等问题上,这六种各具特色的中国诠释学存在着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均以自身实际的理论创造活动实践着将中国经典诠释之观念、思想与方法努力融入并推进到世界性哲学舞台中去之哲学慧命。

相比较而言,张江所致力建构的“中国阐释学”在时间上晚于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诠释学建构,但在理论建构的系统性、理论的说服力以及自我证成能力诸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张江的中国阐释学建构重回文本诠释学,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中国阐释学的系统建构,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提出了“阐释 π ”这个原创性概念。张江将阐释视为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不仅强调阐释的认知功能——对客观性的文本意义的揭示,而且更加突出阐释的实践功效。^①他的中国阐释学建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传统之上,兼具哲学的认知理论和阐释的社会理论二个面向,实为理论创造性建构之可效仿之典范。

本文旨在对张江的中国阐释学作出初步的讨论,主要剖析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历史步骤,探幽中国阐释学的内部结构及其建构原则,通过讨论、汲取汉语诠释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成就,为汉语诠释学的研究与思想传播别创新局,进而对中国阐释学研究视野的拓展提出一种宏观展望。

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

在与著名社会理论家、英国伦敦大学哥尔德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就阐释学问题进行对话时,张江明确指出,他的阐释学研究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强制阐释论”,另一个是“公共阐释论”。“从理论逻辑讲,两者其实是同一个范畴的问题,不仅所围绕的主题相同,而且出发点和目标无异。”然而,如果对它们加以更为细致的判分,则可以将“强制阐释论”看作是先行作为“公共阐释论”奠基的理论。正是通过对“强制阐释”现象——在张江看来,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对文学文本所作的阐释中,因此,他对强制阐释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的文本解释——的研判、分析、批判,他将阐释引申为一种公共行为或社会行为,是一种经由公共理性完成的“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唯有在公共性维度上理解阐释现象,阐释才能在澄清文本意义的同时,达成提升公共理性,扩大公共视域,在理解和对话中释放公共职能,进而超越并升华个体理解与视域、协同与提升公共性、实现阐释的教化与实践之效能,彰显“公共阐释”的公共的社会价值。就此而言,公共阐释论“对于阐释学的发展乃至社会理论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②。从研究者角度看,讨论张江的中国阐释学,其切入点必然是自“强制阐释论”开始。

在张江看来,所谓强制阐释,是存在于文学之文本阐释中的一种现象,它表征着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缺陷和问题。张江这样定义“强制阐释”,他指出:

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自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

^①张江、[英]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②张江、[英]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建构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①

张江对西方文论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强制阐释持一种强烈的批评立场。在他看来,强制阐释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领域出现,并逐步扩张泛滥,成为西方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一种普遍方式,在“生态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幽灵批评”“混沌理论批评”等西方文论不同形态中都有典型表现。“强制阐释”作为一种将批评者自己的意志、观点和理论强加给被阐释文本的解释活动,既否定文本本身拥有确定的含义,也不承认文本中存在着作者意图,更是赋予阐释者对文本意义进行无限阐释的权利与自由,甚至允许阐释者可以使用某个现成的理论强制扭曲或裁剪一个文本,从而彻底否定了文本阐释中的客观主义立场,结果导致西方文论论域频频出现各色混乱景象。“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口号与观点,比如说‘作者死了’,然后否定文本本身具有相对确定的意图,接着又把批评家混同于普通读者,以为批评家可以跟读者一样,作各种背离文本的解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也死了。那还有谁活着呢?就只剩下理论和理论家活着了。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以理论为中心或理论主宰一切的时代。”^②

拨乱必先反正。张江要求返回文本阐释的客观主义立场,重申阐释的符合论原则,要求阐释立足于文本,受制于作者意图,围绕文本说话,目的是揭示自在存在于文本中的客观意义,由此区隔开两种阐释立场:一种是从阐释者自己坚守的理论出发,裁剪文本、自由阐释以证成自己所持守理论正确性的主观主义阐释立场。“强制阐释”即为其典型表现。另一种是从文本出发而非从先行具有的理论出发,将阐释的有效性与阐释对文本意义的真理性揭示联系在一起的客观主义立场。两种不同的阐释立场,实际上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原则的对立。“强制阐释”将阐释中的文本自在意义对阐释者主观能动性的限制消解掉,同时又突出强调阐释者的“前见”支配着阐释作为一种认识活动而抵达的结论,因而在实际阐释活动中“颠倒了认识起点和终点的关系”,从而导致“合理的、确当阐释的基础已经丢失”,其结果是将“作者意图与结论”之间的时间继起关系颠倒为“结论支配意图”的逆相关关系。与“强制阐释”不同,正确的阐释应当坚守认识的符合论原则,在作者意图与结论之间坚持以文本为中心,阐释表现为一种由作者意图到结

^①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江用更为平白的语言对“强制阐释”概念作出解释,他指出:“首先要明确‘强制阐释’的概念。我给出的定义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话有些绕,我一句句打开解释。所谓‘背离文本话语’是指: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离开了文本,对文本作文本以外的话语发挥。这些话语可以离开文本独立存在,无须依赖文本而发生。文本只是借口和脚注,是阐释者阐释其理论和学说的工具。所谓‘消解文学指征’是指:阐释者对文本和文学作非文学的阐释。这些阐释是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实际上并不包含文学的文化阐释,它们没有多少文学意义,不能给出具有文学价值的理论研讨,把文学文本释作政治、历史、社会的文本。所谓‘前在立场和模式’是指:在文本阐释之前,阐释者已经确定了立场,并以这个立场为准则,考量和衡量文本。在这个立场面前,文本是第二位的,是张扬立场的证词,一切阐释都围绕立场,立场决定阐释。这里的模式也是阐释展开以前先定的。阐释者用一个前定模式,对文本作符合要求的剪裁,将文本因子镶嵌于模板,而无论文本含意是否符合模板。这种方式常见于语言学或数学、物理学方法的演练。至于‘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是个目的论的企图,意即论者的阐释不是为了揭示文本的本来含意或意义,而是为了论证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很明显,这个意图和结论也是前在的。在阐释文本以前,意图和结论就已确定,阐释者要利用文本证明结论,实现意图。在认识路线上,意图和结论是两个不同但又相续的过程。意图是指,论者持有现成的理论,去寻找文本,捕捉证据,证明理论;结论是指,论者一旦明确意图,结论随之而出,他要得到的结果,必须与结论相符。意图决定结论。”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②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凯撒·贾科巴齐:《文本的角色——关于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论的时间顺序,阐释活动表现为对以作者意图所标示的文本意义的揭示与把握。也就是说,“公正阐释的基点是承认文本的本来意义,承认作者的意图赋予文本以意义,严肃的文学批评有义务阐释这个意义,告诉读者此文本的真实面貌。在此基础上,才有对文本的多元理解和阐释,才能够对文本做出更合理更深刻的解析和判断,实现对文本历史的、当下的发挥和使用。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在平等对话中校正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则,是批评伦理的基本规则”^①。

文本阐释所遵守的符合论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伦理之基本原则。这种批评的基本伦理原则,从认知角度看,又是一种阐释所要求的真理性原则。显然,就如同伦理原则是一种超越了个体道德反思意义上的普遍交往规则一样,其作为认识原则也必然要超越个体的主观知识而要求一种普遍性。这预示着阐释必然要以“公共的”方式存在和表达。因为,阐释不能是阐释者无限制的自我展示的思想游戏。“阐释作为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从文本对象自在的意义出发,以概括和总结出我们关于社会的确切、恰当的理解和认识,即基本符合事物发展本来面目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个人关于社会的阐释要能够说服人,就必须有公共的承认,提升为公共阐释。”^②职是之故,“强制阐释”隐含着自身的否定性因素,也只有在“强制阐释”之否定因素出现的时候,阐释的辩证要求才能将阐释的真理性以一种非强制的理性方式表现出来,寻绎出“公共阐释”概念。

张江这样定义“公共阐释”概念,他指出:

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这里的“普遍的历史前提”是指,阐释的规范先于阐释而养成,阐释的起点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以文本为意义对象”是指,承认文本的自在意义,文本及其意义是阐释的确定标的;“公共理性”是指,人类共同的理性规范及基本逻辑程序;“有边界约束”是指,文本阐释意义为确当阈域内的有限多元;“可公度的”是指,阐释结果可能生产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理解;“有效阐释”是指,具有相对确定意义,且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为深度反思和构建开拓广阔空间的确当阐释。^③

张江赋予公共阐释以“理性”“整体性”“公度性”“反思性”和“建构性”五个特征^④,强调阐释是一种公共的理性行为。在他看来,西方的“Hermeneutics”一词,将阐释必然是一种公共的理性行为表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Hermeneutics”一词,直接关联于宙斯的信使赫耳墨斯(Hermes),赫耳墨斯的职责就是将宙斯的话语通过翻译、理解解释给世人,这是一个送信传话的过程。“而送信的过程则是这样的:首先是宙斯有想法,有话要说,但不是宙斯自己对自己说,如果是宙斯自己对自己说,那就没有赫耳墨斯什么事了,这是一层意思。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已经肯定,宙斯必然是要对别人、对外人说话。姑且不论为什么宙斯的话必须要由赫耳墨斯传达,或者宙斯是否有别的传达意思的方法,至少可以证明的是,宙斯的话是要对外说的,他知道自己的话不对外说是没有意义的。赫耳墨斯作为传信人,作为信使,要把宙斯的本意传下来,以达到公共性的效果。虽然古希腊没有创生像中国的‘阐’这样一个字,即用两只手推开门闩以表达阐释的公共性这个意思,但是西方用关于赫耳墨斯的故事表达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的企图是昭然可

①张江等:《关于“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②张江、[英]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③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④张江、[英]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见的。”^①这至少从词源学上证明,只有具备了公开性、公共性的阐释,才能进入对话、交流、协商过程,才能摆脱话语独白状态而成为有意义的、摆脱了私人性且可以公度的诠释。

可以公度的阐释是一种公共的理性行为。而作为一种公共的理性行为,阐释就是“居间说话”,它涉及在话语发出者(文本的原作者)、阐释者和阐释性行为(阐释的话语)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交往关系。一方面,具有公共性的阐释要求阐释者作为“传信”的人,说出的话语应当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者的意图,而不能将基于自身主观理解所生成的解释强加于作者身上,以造成“强制阐释”。另一方面,又要承认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阐释者与原作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有着“间距”(时空的与语言文化的),因而对自己所负责传达的话语的阐释不可能是作者意图的机械复制,总有“溢出”原意的地方。由此就产生出两个问题:

第一,居间说话者保持和发挥原作者意图的限度,他应当受到怎样的约束?

第二,居间说话者对所传达的原作者话语进行“发挥”或“衍义”的权利(或机会),阐释者溢出作者意图而生成的阐释话语如何获得承认?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涉及一个阐释过程中的这样两层关系:一是居间说话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居间说话者与原作者话语之间的关系。

张江在阐释学上捍卫作者的地位,他将作者理解为“话语创始人”,不仅是自己著作的书写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有着深刻永久的影响,而且以自己完成了的书写为基础,将自己创始的话语不断扩张和繁衍,继续发挥方向性的影响。由此来说,作者不能虚无,作者永远不死。^②这决定了张江必然要求居间说话者的传信必须以作者原意为阐释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判据标准,阐释者对作者原意的忠诚是阐释的本体性要求。在这种本体性要求下,居间说话者与原作者话语之间最合乎理性要求的关系应当是复制关系,只有当复制关系不可能时——事实上,不可复制性才是居间说话者与原作者话语之间关系的常态,阐释溢出作者原意不可避免时,公共阐释论才不得不接受阐释者的对作者原意的“背叛”。但是即便如此,在张江看来,阐释者对作者原意的“衍义”也不是一种“颠覆”,它实际上如同水满而出,“即沿着河道下去,有时是要漫溢的,从而生出许多湿地,但其中并没有改道的意思,而且,目标也很明确,即朝着大海而去。‘衍’也有约束的意思,虽然水有时要漫出去,但原来的河道还在”^③。张江将其处理成坚守与发挥的关系,并将其解读为阐释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如此一来,就必然迫使他去思考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居间说话者在阐释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以及溢出作者意图而生成的阐释话语获得承认的途径问题,即上述所提及的第二个问题。

张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预设是,在阐释学历史上,被公众所接受的阐释并非都是合理合法的阐释即没有曲解作者原意的阐释,许多谬误的阐释即阐释者的主观解释被公众所接受也不乏先例。这实际意味着,阐释活动不得不容受阐释者的主观性,作者的退场与虚无化似乎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因为作者若时时在场,那么阐释者的主观阐释就没有存在的任何空间。如果说,公共阐释不得不接受作者经常退场这一事实,那么,问题的焦点就成为,在作者不在场的时候,居间说话者依据自身主观性说出的阐释性话语又是如何成为被接受的公共性阐释的呢?实际上,这是公共阐释论承认作者原意说和坚持“复制式”客观阐释所必然给自己带来的问题。

①张江:《关于公共阐释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之一)》,《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②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③张江:《关于公共阐释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之一)》,《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张江要求回到公共阐释的话语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作者原意支配下,在作者缺位的情况下,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既不能交给作者去裁决,也不能交给阐释者本人来决定,而阐释的接受者对其也没有决定权,因而只能交给公众的公共理性。公众运用公共理性对阐释进行理性审视,便可以使得阐释存在的基础由个体阐释提供合理性说明转而建立在公共阐释之上,由此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存在。结果,阐释超越于个体阐释,经由公共语言和逻辑的组织,而成为运用公共语言、公共理性、可公度性的话语,即被公共性承认的阐释。因此,张江主张,“阐释就是一个争取公众承认和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是一个为争取公众承认和实现其公共性而斗争的过程”^①。

然而,公共阐释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思想断裂。一方面,张江主张诉诸公共承认而赢得阐释的真理性,但另一方面,张江又认为诉诸公共承认赢得的阐释的真理性是一种不可避免有着暂时性特征的相对真理。因为,一种阐释“今天经过斗争或明天经过斗争赢得了公众的承认,却不一定就是真理。随着公众理性水平的不断提高,或者有新的考古发现,有新的材料被挖掘出来,曾经被公众承认的某个公共阐释就会被否定,就会出现新的公共阐释。抑或,某个公共阐释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甚至被不断重复着的,然后变成知识,进入人类知识体系”^②。这种在肯定句式之后又加上否定限制的表述,如果是在真理符合论意义上指称阐释的真理性的话,就极容易坠入伽达默尔所说的那种“黑格尔式陷阱”,即将阐释的真理性诉诸思维的无限之中,而只有将文本的意义与作者意图相脱钩,成为一种在阐释者的历史意识中不断实现出来的效果历史意识,才能够与这种表现为“恶无限”的反思意识相诀别。我们从伽达默尔下段话中可以清晰地体味到这个意思。伽达默尔说:

在任何地方,诠释学要求只有在知识的无限性中,在全部传承物与现在思维性的中介过程中才能实现。这种诠释学要求根据完美的启蒙运动的理想,根据我们历史视域的完全开放,根据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可在无限的知识中得以消除而提出的,简言之,是根据历史认知精神的无所不在(Allgegenwärtigkeit)而提出的。^③

然而,公共阐释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出现在意识哲学范式中的困难。由于坚持作者原意说,由于作者在场始终是一个不可能充分实现的理想,张江只能将阐释的真理性、合理性甚至有效性交给无限意识,在对象意识的无限进展之中完成。如此一来,就消解了任何一次实际的阐释成为真理和获得合理的有效性的可能。在时间中形成的阐释都会因为自身的历史性而成为相对合理性的阐释,而阐释作为一种理解活动总是要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将被阐释对象带入新的历史处境之中,新阐释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在根本意义上,公共阐释内在地产生了自反性,知的暂时性和怀疑的普遍性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融入了公共阐释论。

二、阐释的逻辑

按照公共阐释论的要求,公共阐释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行为。一种公共行为,就必须使用公共语言;一种理性行为,就必须遵循逻辑规范。张江说:“阐释,作为理性及协商行为,与体验、直觉以至梦呓相区别,逻辑上的一贯性与约束性,是其生成和展开的先决条件。作为理性行为,阐释的基本思维过程,必须符合普遍适用的逻辑公理化规定,并被其具体的范式与规则所制约,使主体自洽的理解与反思成为可能。作为协商行为,阐释将独立主体对现象的理解与认知,理性

①张江:《关于公共阐释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之一)》,《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②张江:《关于公共阐释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之一)》,《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③[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3页。

地呈现于他人,且被有限群体确证为真并广泛接受,不仅要遵守一般的逻辑规则,而且要由符合协商要求的特殊逻辑所约束。”^①

阐释逻辑的提出,首先出自将阐释学建成一门科学的要求。按照张江的理解,任何内容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只有在合理的规范与约束中展开,并且恪守基本逻辑规范与方法,才能称得上科学。这个要求不仅要对自然科学提出,也要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阐释学亦如此,诸多有关阐释生成与展开的元问题,譬如,阐释的确定性和开放性的逻辑基础是什么;阐释的收敛与开放根据为何;收敛是不是规范为一,开放是不是无限多元且无边界约束;多种阐释视角及结果,是连续还是离散;阐释的标准立足于真假还是可接受性,如此等等,诸多复杂问题,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各持一词的迷狂偏执,反来复去的踟蹰不前,没有为各方基本认可和接受的一般规则。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理性地考察,从来没有阐释逻辑上的考辨与追究,无公理可依据,无规则可约束,无标准可衡量,是阐释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系建构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②

阐释逻辑的提出,亦出于阐释学解决自身诸多理论难题的需要。按照张江的说法,“从古希腊起,阐释就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以求真寻本为标的,苦心确证文本书写者意图及文本呈现的自在意义;一条以脱离及超越对象约束为追索,无限阐扬释者主观意图,实现阐释文本的新创建”。在中国,阐释的这样两条路线,表现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争,“训诂明而义理明”与“义理明则训诂明”之争。它们之间的区别,将诸多阐释学的重要理论难题明白地揭露出来,如阐释的确定性与相对性、阐释的开放性与收敛性、阐释开放性中的多元性与有边界约束的聚集性、阐释之多种视角及结果的连续性与离散性、阐释标准的真理性与有效性,等等。在张江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逻辑。“阐释本身具有再生产和再创造意义,这种意义的创造与呈现,同样需要为他人理解和接受。阐释必须依据科学自洽的逻辑规范而有序展开,否则,无理解,无表达,无阐释。逻辑是理性生成和演进的基本形式。无论理性及思维的具体内容如何,其生成与展开形式是且只能是逻辑。理性在确定的逻辑构架内生成与展开。由此,阐释必须要符合自身可能生成与展开的逻辑依据。”^③

阐释需要逻辑,但需要什么样的逻辑?张江认为,阐释逻辑的建构既要吸收经典逻辑的理论经验,又要吸收非经典逻辑的理论经验,但非经典逻辑对阐释逻辑的建构更具有启发价值。阐释逻辑可以从概率逻辑、多元逻辑、模态逻辑、亚相容逻辑,以至协商逻辑、偏好逻辑等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理论和实践资源,用于阐释逻辑的形式构造。这样考量的主要原因在于,阐释毕竟是精神科学的事情,经典逻辑的形式化要求固然重要,但仍需更多地考虑精神现象的特征,以及开放、交流、协商在精神活动中的重要性。张江以协调逻辑、偏好逻辑和多值逻辑等为例,佐证自己的观点,并据此提出了建构阐释逻辑核心关切的问题:

阐释逻辑的基本构架,应当依据阐释的本质规定而建构。从当下的境遇看,我们认为应首先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度切入,解决阐释学理论建构问题上的核心关切,并生成自洽完备的阐释公理与规则系统。

第一,阐释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是指,其一,对象的确定性,亦即阐释是对确定文本的阐释,而非他文本的阐释。对确定文本的阐释,以文本的意蕴呈现为核心。其二,语境的确

①张江:《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

②张江:《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

③张江:《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

定。文本阐释是确定语境下的阐释,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语境。在确定语境下,语义确定。不同语境,生成不同意义。其三,目标的确定性,或曰主体对阐释的确定性追求。亦即阐释的目的是给予他者以确定性的意义,而非游移的、自相矛盾的模糊义堆积。

第二,阐释的开放性。对确定文本的阐释是开放的,亦即对同一文本的阐释结果多元。面对文本或现象,不同阐释主体对其理解与阐释可以不同。经典逻辑的矛盾律,在理性主体的独立阐释范围内有效,在主体间多元阐释域中无效。对同一对象的阐释,独立主体之间可以不同,甚至彻底对立。亦此亦彼是主体间阐释之常态。

第三,阐释的收敛性。在有限论域中,阐释的多值结果总体收敛。即在公共视域下,多数阐释者对确定文本的阐释,趋向有限重合,且阐释者越多,重合几率越大,亦即收敛趋紧;在知识共通的阐释群体中,对确定文本的阐释,其重合几率高于其他领域。在此过程中,阐释的公共性得以实现。收敛为有限收敛,非唯一。

第四,阐释的融贯性。融贯、完备的阐释是阐释的目标。其一,对文本的阐释由部分达及整体,由整体而理解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互融贯,最终把握整体。其二,确定语境下的独立词语意义建构语句意义,确定的语句意义强化或证实词语。词语与语句意义的相互融贯,维护阐释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其三,阐释空间的三维结构,即文本制造者、自在文本与阐释主体构成的三维向度相互融贯。文本中的作者,文本的源蕴含,阐释者的阐释及再造文本,构成连续的完备系统,而非无关联或关联度极低的无端离散。

第五,阐释的可接受性。阐释的有效意义,由公共理性的接受程度所决定。基于文本的阐释,其合理与澄明准则,约束于阐释本身之能指与所指的有效重合,可直观表现为多方视域不断扩大重合的面积或范围。阐释的可接受性,实现于多种阐释的相互博弈。^①

张江显然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理解阐释逻辑,这与他要求重回方法论阐释学、努力将阐释学打造成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学术目标密切相关。从方法论立场理解阐释学,比从本体论立场理解阐释学,显然更需要阐释学与逻辑学的结合,就像张江所说的那样,缺少逻辑,阐释学无公理可依据、无规则可约束、无标准可衡量,如何以科学自居?阐释需要一种逻辑,无论是对本体论阐释学,还是方法论阐释学,都是容不得怀疑的事情。因为,阐释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无论是对事实的描述,还是对意义的解释,都必然要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概念要清晰,命题表达不能相互矛盾,推理要有理有据,如此等等。不仅如此,阐释活动对文本意义的揭示也必须符合逻辑要求,阐释者必须给出如此进行阐释的理性说明。而任何一种理性说明不是来自对事实的分析归纳、研判推论,就是来自一种基于上位理论或理性成果的分析式获得,或者演推式扩展说明。就此而言,一种阐释即使没有明确自己遵循了哪些逻辑公理、方法规则,但阐释者的阐释活动在实际上是逻辑地展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我们在哲学诠释学那里,照样会发现逻辑的作用,伽达默尔就主张一种以问答方式呈现的诠释学对话逻辑。以是观之,阐释学不是要不要逻辑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逻辑的问题。我们必须清楚,阐释的逻辑是一种特殊逻辑,这种逻辑不仅要满足正确表述阐释结果的逻辑要求,更需要满足阐释揭示文本之事情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真理的逻辑。作为一种真理的逻辑,它必须与一种阐释理论对真理性阐释的理解相一致,或者说,它就应该出自阐释理论的元哲学要求。就此而言,基于正确理解的方法论要求,张江要求借鉴非经典逻辑,为公共阐释所追求的阐释的诸多理论要求的合理性提供根据,在我看

^①张江:《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

来,如此建构的阐释逻辑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统一的元哲学基础上处理来自不同逻辑在根基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冲突、紧张与对立,如何在统一的阐释逻辑的哲学根基上融会吸纳来自不同逻辑的理论成果,并避免来自理论上的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的指责。

三、阐释的无限与有限

在公共阐释论那里,从易于理解角度说,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划分:对阐释逻辑的探究是为了给阐释的真理性提供直接的形式化保障,而对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讨论则是为了给阐释划定边界,对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事关阐释学的基本问题给出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解决。

张江将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问题的源头追溯至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在他看来,“远自古代希腊,从色诺芬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不同传承开始,关于阐释的开放与约束就已生成无尽争论。上溯中国春秋战国,孔孟与老庄对阐释目标的确定与追求,亦有相互对立的两条路线”。由于阐释活动必然涉及阐释主体在文本阐释方面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诠释问题,并且,因为阐释者的创造性阐释使得被阐释文本的意义被不断扩充,而内扩充的文本意义又大大提升了原文本的价值,所以,阐释中的原作者与阐释者的关系、文本及阐释的开放与约束,就始终是阐释活动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坚持阐释具有绝对开放性、文本具有无限意义的一方,与坚持阐释必须被约束到文本原意上、阐释活动必须聚焦在作者意图之上的另一方,相互抵牾,彼此相向。虽然自古到今,坚持文本意义无限开放和阐释具有绝对开放性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文学阐释领域,受接受美学影响,流行的观点将阐释的无限开放当作对象文本及阐释本身获得意义的先决条件,但是,另一路线的阐释理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西方,受益于圣经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的传统,有人主张保卫作者,坚守意图;在东方,受益于儒家解经传统的影响,训诂与注疏之学于当今文学经典的研究,仍为潮流之主导”^①。由此可见,两条阐释路线孰是孰非,一时难有定论。这也说明,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关系的理性解决,让阐释中存在的这些重要的关系之间消弭张力、达成平衡、和平相处,是当代阐释学研究中重之又重的问题。

为解决阐释学中这些必须面对的难题,张江首先要求厘清几组基本概念。

第一组是“文本开放”与“阐释开放”。前者指的是文本对他者敞开开放、无约束的理解与阐释,而后者指的是阐释自身的开放,指称着阐释本身的自由。“以阐释的开放代替文本的开放,将阐释意义的无限代替为文本意义的无限,违反阐释逻辑。”^②

第二组是“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有效边界”。无边界的阐释意味着阐释的无限性,阐释不受约束,有边界的阐释指示出阐释的有效性,即阐释的有效边界。作者意图、文本的确定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文本在当下呈现出的主题倾向等等,都可以被理解为阐释的有效边界。

第三组概念是“意蕴”“可能意蕴”“意蕴可能”。“意蕴”指的是包含着作者意图于其内的文本的原意,“可能意蕴”指的是在阐释中呈现出来且不为作者所知的、处在可能状态的文本意义,“意蕴可能”即阐释者通过阐释对文本自在意义的自由发挥的可能性。

第四组概念是“诠”与“阐”。“诠”即确定、追索、言说文本的本义,“阐”则侧重阐发文本大

^①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②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旨,衍生义理,“诠在有限中无限;阐在无限中有限。从诠与阐的本性说,诠与阐都以文本的开放为前提”^①。

第一组概念的厘清确立了正确理解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基本前提。第二组概念的厘清,揭示出“阐释可以无限,但非全部有效。只有为公共理性接受的阐释,才为有效阐释,才可能推广和流传,并继续生成新的意义”^②。第三组概念的厘清区分开了文本的能指(可能意蕴)、阐释的所指(意蕴可能),以及阐释有效性与文本的能指与阐释的所指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第四组概念的厘清,澄清了“诠”与“阐”之间在目的、路线、标准上的差异,使得谈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有了现实的根据。

据上所述,张江作出了关于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基本判断:“阐释是开放的,同时也是收敛的。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开放与收敛平衡,无限与有限相融,无限在有限中展开,有限约束界定无限。”在这个基本判断中,“阐释的无限”指的是“对确定的对象文本,阐释可创造无限意义”;“阐释的有限”指的是“阐释为多种条件所约束,其总体结果是收敛于有限论域之内”;“阐释的收敛”,意味着“公共理性的承认与接受,约束阐释向有限收敛”;“阐释的有效性”,揭示了“阐释的开放为无限,但是,无限生成的阐释绝非无限有效。阐释的有效性由公共理性的承认和接受所决定”^③。

对这个基本判断,张江又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看来,阐释的开放性源自文本的开放性,文本的开放性至少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意义无限地展开;一个是阐释者的主体性解释活动使得文本自身产生无限的意义裂痕,衍生出新意义,从而开放阐释的无限性。公共阐释论尊重阐释的主体性,赞成阐释的开放性,反对对文本进行文物式研究,文本的开放性允许“阐释主体对文本做多元而非一元、多义而非单义的理解与阐释”。但是,公共阐释论反对文本诠释上的无政府主义,认为阐释应当存在一定的“限定的标准”,即它要求“对一确定文本的阐释,确定于该文本之所能蕴含的意义,而非游离于该文本之外的其他意义,亦即阐释主体的对象是此文本而非他文本”,从而要求将“阐释之无限可能,约束于可能区间。此约束说明,无论何种文本,只能生产有限意义,对文本的无限阐释约束于文本的有限之中。以此文本作对他文本的阐释,或为阐释者的自我阐释,违反阐释逻辑”。由此可以推知,阐释会随着阐释的丰富性展开而表现出收敛性,“即阐释向有效点位集中”。也就是说,由于作者赋予文本中的意图即作者原意是有限的(“可能意蕴”的有限性),阐释者对文本的主体性发挥因此应当受限于文本之有限意义(文本的“意蕴可能”的约束要求),阐释者的阐释唯有收敛于文本自在意义之上,才能获得接受者更多的承认,才能实现阐释的公共性而成为有效的阐释。争取承认和成为有效阐释规定了阐释的收敛。“阐释的开放,并不追求无限结果,而是在多元比较中,争取和辐射有效的阐释力量”^④。据此,公共阐释论给出了自己关于阐释确定性的理解,阐释的无限与有限、阐释收敛的聚集点以及阐释的有效性要求都指向文本的自在意义,这个自在意义由作者所赋予。因此,阐释的确定性要求必然联系着阐释对作者及其意图的理解与解释。当然,由于作者和文本经常以历史性方式出场,即使允许阐释者放弃文本的自在意义,允许文本的自在意义在解释者的阅读中

①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②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③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④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自由呈现,但这种自由呈现的合法性依然要受到公共理性的限制与裁决。“在确定条件和语境下,公共理性的标准是确定的。语言、传统、当代境遇决定公共理性对阐释的态度”^①,也就间接为阐释的确定性提供了判断标准。

这样,围绕文本的自在意义,公共阐释论确定了阐释的目的、有效性判准以及确定性标准,并据此在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公共阐释论的平衡关系。通过对这种平衡关系的进一步证成,张江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 π 与正态分布”理论。

张江从圆周率 π 获得启示,去思考诠释的性质与特征。在他看来,在诠释之诠的意义上,诠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 π ,首先是追索文本的自在意义及作者的本来意图,诠释的目标是寻找和确定文本的 3.1415。这个过程如同寻找 π 值一样,是在一个反复进行的阐释过程,达成理解之目的的,是一个“不断追索,不断修正,不断靠近真相”的过程。

其次,即使经过反复的阐释过程,公共理性确认了经典文本之本义,即确认了 π ,诠释亦不会停止。“它会向更深入的方向探索,以求证更精准的 π 值”,这表明诠释是一个无限展开且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阐释之间相互作用,“以至互证,共同诠释 π 的无限意义”。

第三,对文本意义的这种无限诠释是有着约束性要求的,即“诠释的无限约束于有限,在有限中展开无限”。正如 π 是有区间的那样,对文本的“诠”的无限性也不能是一种离开文本之无约束的无限衍生,它是在文本自在意义约束下的无限展开。也就是说,文本自在意义的存在限制着诠释,不让其随意地展开,但接受文本的约束却又能够使得文本意义对阐释开放无限的可能性。可见,“诠释 π ,是对阐释开放与收敛、无限与有限关系的象征性说明”,它是无限诠释的区间界定。在这个区间之内,“诠释是开放的、无限的,无限开放的诠释,收敛于阐释的起点与极点之间”^②。这样,公共阐释论就给出了关于阐释的一个新概念:阐释的正态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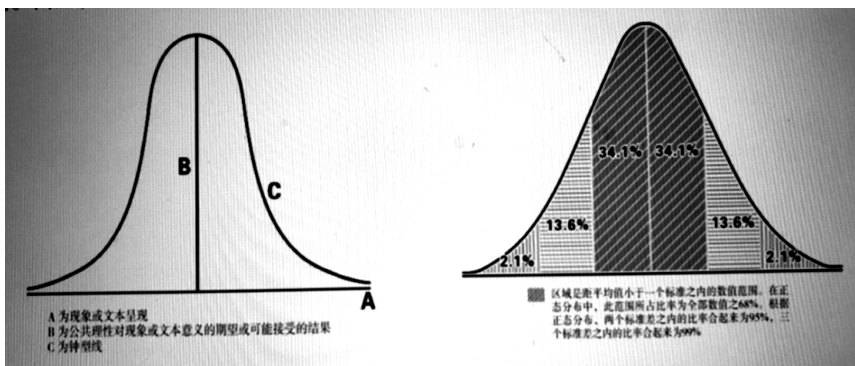


图1 阐释正态分布图

所谓正态分布(这里采用最简单的标准正态分布),即一钟形对称曲线,依曲线最高点向下横轴作垂直线,以此线为中心,钟形曲线两边呈对称状态,平滑均匀下降,开口逐渐扩大,无限趋近于横轴。曲线与横轴间面积为1,相当于概率密度函数从正无穷到负无穷的积分概率为1,即概率总和为100%。概率分布以中线为集合,大多数分布集中于中线周围,其所占面积为全部面积的绝大部分。此分布规律,用于阐释学分析,其横轴为现象或文本呈现;其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全部独立阐释的结果分

①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②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布于曲线面积之内。

张江用正态分布曲线对阐释的开放与收敛、有限与无限、扩张与约束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①,并据之得出了“阐释 π ”概念,以图 1 示之。

张江认为,正态分布是显现和说明阐释无限与有限关系的最好方法与工具。它既解决了公共理性如何约束阐释问题,又给出了一种定量地分析阐释现象的可能性,其前景可期。

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仍在于这种阐释正态分布分析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显然,在张江的阐释概念系统演绎中,亚里士多德实体的存在论构成了其阐释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在亚里士多德实体主义的意义上,我们将文本的自在意义视作可以通过阐释的阅读(本质的表象)呈现出来的“事情本身”,那么张江的“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无疑很好地解决了阐释的无限与有限的关系这一难题。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主义在康德那里首先遭到严重的质疑,之后又遭到了现象学较为彻底的解构,其在哲学的基础追问上已经显示出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康德以其对对象与表象关系的重新追问,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与属性、本体与表现、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是一种未加证实的形而上学预设。在事情的“是其所是”和“是其所现”之间并不存在同构关系,也就是说,对阐释中阅读经验的不断追问证成的也只是在有理性那里获得更多理性认同的“阅读经验”,它依然是“文本自在意义”的“表象”,不过是获得更多有理性的人认同的“表象”而已。被证成的是一种理性共识,而非“事情本身”,因为“事情本身”不可能以可以经验到的表象方式表现出来。以可经验方式存在的感性表象与以不可经验方式存在的理智表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绝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以理解的方式打通“是其所是”和“是其所现”。人唯一可以打通的是我们在“表象”意义上实现出来的“共同感”,即我们可以拥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经验。就此而言,公共阐释论还需要为自己的“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提供一种新的哲学基础,才能完全驳倒基于现象学之上的关于意义诠释无限开放之观点。

四、中国阐释学建构的探索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张江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

为了辨明中国阐释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并据之讨论建构的基本路径,张江借用中国传统

^①张江给出的六个方面的说明,具体为:“其一,独立主体对确定现象或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其结果无限,且非确定,不可预测、离散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其概率密度函数为标准正态分布。阐释的无限开放,为正态分布的敞开状态,投射为向底线两边无限延伸,但无相交可能。其二,曲线之中轴,为公共理性所期望或接受的有效阐释。对确定文本的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实现,投射为正态分布之中线。由公共理性的相对性所决定,对同一文本的公共理解与阐释非一个中心,即阐释的正态分布中心可为多元,并以不同中心构成不同投射面积。其三,阐释主体数量足够,全部参与主体对确定现象或文本的阐释结果,可从正反两个方向,大概率地趋向于中心,生产方向大致同一的结果,实现独立阐释的公共性,并投射为以中线为核心的有限面积,使无限离散的阐释呈有限态势。当阐释者的独立阐释与公共理性期望相差较小,其概率方差抽象为 1,此类阐释所占面积,将接近全部面积的 70%,即 70% 以上的阐释,服从于公共理性的约束,约束于公共理性期望域之内。其四,阐释的有效边界,由抽象为 1 的方差决定。阐释无边界。背离中心轴的独立判断无穷,但越远则接受者越少,无限渐进于底线,不可能达到,所占面积可忽略不计。渐近线的投影,证明阐释无边界。有效阐释有边界,可称为阐释的有效边界。方差的对称约束,就是阐释的有效边界。如确定抽象为 1 的方差为标准,近 70% 的阐释集中于公共期望域内,数值为 1 的方差,为阐释的有效边界。其五,公共理性的期望是变化的。为当下公共理性接受的阐释,未必是真理。随着公共理性的进步或退化,若干曾经边缘化的阐释,可能移进中心,并生产更多的同质性阐释,集中于新的公共理性接受的有效面积之内。其六,所谓论之 π ,作为正态分布的特例,其中心期望值为 3.1416,同样为阐释的正态分布所容纳。由此,我们可称阐释 π 。”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0 期。

的训诂学、语言学、文献学和考据学等的知识与方法,对涉及中国阐释传统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正。这主要涉及“阐”“诠”“解”“释”“解释”“理”“性”等。下面,笔者仅对张江的“阐”“诠”辨和“解”“释”辨进行转述归纳^①,以一斑窥全豹,讨论张江有关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学术构想。

(一)“阐”“诠”辨

张江认为,阐释是一种公共的理性行为。一种阐释如果仅为私人对语言性存在物的把握,放弃以公共性方式言说,至多是一种私人性理解,就根本谈不上是一种理解。理解的公共性是阐释生成即存在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字中找到根据。“汉语言文字起源之初,戮力于象形。一字一词皆为整体图形,形即义,义即形,视之读之,其形其义共时共在于此。尤以公众共见之象为标志而明义,非隔、非臆、非折转,其公共性、共同性大开。此造字之法,从根本上影响汉语言民族之思维方式,使其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②

“阐”这个字就将上述意涵展示得淋漓尽致。张江援引《说文解字》进行证立。

《说文·门部》:阐,开也。从门(門),单声。《易》曰:“阐幽。”

“阐”这个字的本义、形和声,均与“开”相关,本义为双手开门、洞开通达、祛除掩蔽。于部首所属说形,只有对“门”言“开”才有意义,从与“门”字相关的“问”和“闻”字的古字原形可以坐实,“首义为‘开’的‘阐’,因部首归门,从而可引申为‘闻’与‘问’,且为开门之‘闻’与‘问’。”^③再说声,“阐”取单声,意在贯注阐之“大”“广”“众”诸义。由此可以确认“阐”的引申义,“阐”是确定的主体(开门之手)主动去认知、说出的行动,它向外、向显、向明,敞开言说,诉求对话,其公开性、公共性之要义昭然若揭,决无疑义。由此推知,“阐”大致有如下意义:它意味着克服理解障碍而在相互开放中构建合理的主体间性;它意味着从内向外,让阐释主动向外打开,争取公共承认,并在公共承认中实现自我确认;它意味着敞开阐释者的自身见识,实现阐之向明、向显的公共追求;它还意味着“阐”之开启是在与相关主体的价值选择相关的条件下完成,阐释必须祛隔去障,面向公共,但阐释的可能性与主体性的选择密切相关。

“诠”字亦可如此辨析。《说文·言部》:诠(詮),具也。从言,全声。从义说“诠”,诠的本义为具备、具有,释义为解喻,明也,证也,意解为“释”。从形说“诠”,“诠”从言,“表达了‘诠’从‘言’的意义,即有言,有问,有训,有宣且互宣之意,体现了‘诠’之基本特性”,即明示出来的“言”,这种言为自言、为命令、为教令。从“声”说“诠”,诠,“全声”,有完备、完全意之谓,也就是说,“诠”为全诠和全释,要求对需要释义的词从义、形、声诸方面进行释。而“诠”的引申义,则指向解释、诠释,指向事理的说明、真理的揭示,所以,“由‘诠’而结构的双音词,也多有强调其真、其正、其择序义”^④。

对“阐”和“诠”的辨析,可断知:“中国古代阐释史上,‘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比较而言,‘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决无疑义,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阐’之核心要义定位于此。‘诠’之

^①由于本部分所涉及研究内容的特殊写作方式,我在这里做的主要工作不是分析,而是转述归纳,此部分研究应该归属于古文字学、训诂学、语言学等,为我的学力及知识储备所不逮。另外,我对本部分研究的兴趣也主要在其所显示出来的有关中国阐释学建构之学术路径及其战略的思考。

^②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③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④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实、‘诂’之细、‘诂’之全与证,亦无疑义,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诂’之核心要义亦定位于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阐’尚意,‘诂’据实,尚意与据实互为表里。‘阐’必据实而大开,不违本真;‘诂’须应时而释,不拘旧义。‘阐’必据词而立意,由小学而阐大体;‘诂’须不落于碎片,立大体而训小学。”^①

(二)“解”“释”辨

张江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对“解”和“释”的意义辨析,是他力主在汉语语境下将西方的 Hermeneutics 翻译成“阐释学”,而不是“诂释学”或“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字学根据。他指出:“深入考查‘解释’义,特别是作为单音字的‘解’与‘释’的本义,并与‘阐’及‘诂’的意义与使用相比较,我们认为,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诂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厘清中国古代阐释学之构建路径,可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体构建提供可靠的文字学根据。”^②

“解”之考辨。张江指出:“《说文》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中国古代有关阐释学称谓诸字中,‘阐’‘诂’‘解’‘释’四字,‘解’最为古老。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象形兼会意的字。”^③综合古语言学家的各种考证,判与分应是解之本义。也就是说,无论对“解”字如何理解、引申与发挥,其要义为分而解之、分而别之,则不应有分歧。

“解”字在阐释学意义上,大体可进一步引申为:(1)“释”与“说”;(2)“开”与“除”;(3)“晓”与“达”。第一种引申义表述出“解”字的“解释”和“解说”之义,明确彰显出“解”所具有的阐释与诂释之诉求,解而析之,由“解”而析取出被解之物的意义。第二种引申义则表述出“解”字所内含的解惑排疑之意涵,从中可以体味到其与“阐释”之“阐”的深刻联系。第三种引申义则表述出“解”与阐释学之“阐”在阐释目的上的关联,“解”文本之“道”(自在意义)而公开之,而明白示于人,阐释的公共性、争取承认以及意义阐释的实践效能豁然明朗,“阐释之本质是将现象之道理或本质释之于人,说服人,争取人,乃阐之根本”^④。

“释”之考辨。张江指出:“《说文》采部:‘释,解也。从采,取其分别物。从睪声。’‘释’,亦单音字,动词,独立用。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无此字。但‘采’与‘睪’分解,可见‘采’之甲骨文形。”而“采”义训为“辨别”,乃“分”之义。形训与音训亦为“分”之义。可见,“分”乃“释”之核心本义,由此而引申出“解”之阐释学的首要之义,即“解说”与“阐明”,这样,从古文字学角度看,“‘释’与‘解’互训,‘解’乃‘释’之本义”^⑤。

“释”字在阐释学意义上,大体可进一步引申为:(1)“散”;(2)“消”;(3)“去”。第一种引申义强调“解”疑难和“消”疑问之意,突出了“释”的深刻性,“立志于分而不聚,尤其是不复行列,即背离本相与规则而聚”。第二种引申义与第一种引申义虽有相合之处,但更加强调“消灭”“消失”之义,“这当然有‘解释彻底’‘不留间隙’意,但亦难免‘器中空也’,‘消雾埃于中宸’,弃阐释之开放与协商意,陷独断与封闭之泥淖”。第三种引申义与第一种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着重强调

①张江:《“阐”“诂”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②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③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④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⑤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释”的去疑功能,阐释以释解疑难,阐释以去除疑问。^①

在汉语语言表达中,“解”及“释”经常放在一起使用,它们同构为双音词,虽然“解释”一词含义丰富,但重在分析说明,或仅在分析说明,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此而言,张江指出:“‘解释’,定义为偏正结构之词组。即以‘释’为中心,‘解’为动词状语,修饰解,表达以‘释’为目的,以‘解’为方法的释解性追索。诠释与阐释亦如此,两者皆以‘释’为中心的偏正词组,以诠或阐的方式,实现‘释’之目的及过程。由此,阐、诠、解之间,其不同目的与方法论深刻差别得以呈现。”^②职是之故,Hermeneutics 在汉语语境下,赋予它的一个合理名称应该是“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不能是“解释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张江建构中国阐释学学术构想的基本思路:首先,张江主张,建立中国的阐释学,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在充分吸收西方相关优秀成果的同时,回到中国传统,回到中国的实践,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人文精神特质和学术传统的方法论阐释学,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这促使他返回中国传统,“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厘清中国古代阐释学之构建路径,可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体构建提供可靠的文字学根据”^③。

中国古代从来就有两条差异深刻的阐释路线。一条由孔孟始,重训诂之“诠”;一条由老庄始,重意旨之“阐”。前者由两汉诸儒宗经正纬,至清初学者返经汲古,依文本,溯意图,诠之训诂索解,立信于世。所谓“以意逆志”是也。具有中国本色之阐释学根基于此。后者,经由两汉阴阳教化至魏晋、宋明辨明言理,“阐”之尚意顿悟,开放于今。所谓“诗无达诂”是也。具有中国本色之阐释学光大于此。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为构建当代阐释学提供思想源泉与无尽动力。^④

其次,张江强调,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应当以公共阐释为核心范畴。公共阐释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形成的一个新的阐释概念,它可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共同的基础性概念,中国阐释学应当是基于公共阐释建构起来的,可以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思想体系。张江说:

理解并承认阐释的公共性,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重要起点。此其公共性,并非人之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阐释生成及存在之基本要素。阐释的公共性,由阐释主体及其间性而定位;由阐释之目的和标准而使然;由阐释行为的实际展开及衍生过程而主导。阐释之所以为阐释,就是因为它是公共的。任何放弃公共性的言说,不可谓阐释,最多可称私人理解,或未及实现的阐释。汉字“阐”(“闡”)及“诠”(“詮”)清晰蕴含此义。研究及立论于阐释之学,应重“阐”及“诠”之训诂。由此,我们从考据入手,追溯单音词“阐”与“诠”之本义及引申,汲取“阐”与“诠”之优长,坚持以“诠”为根据,以“阐”为目的,创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原理。^⑤

基于这种学术构想,张江近年来倾全力于公共阐释问题的系统探究,从反思批判强制阐释到系统阐述公共阐释概念,再到讨论阐释的逻辑和建构“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系统解决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诸种重要阐释要素之间的张力平衡关系,厘定阐

①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②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③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④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⑤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释的边界约束,给出阐释的目的要求,一个系统的公共阐释理论体系已然形成,为中国阐释学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建构并最终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张江所倡言创建的中国阐释学主要是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阐释学。在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中,他在注意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方法、逻辑规则的同时,特别强调对中国经典阐释方法的现代性改造及其创造性转化,为中国阐释学所用。张江认为:

阐释是理性行为。理性方法的选择,决定阐释的进入路径,决定阐释的呈现方式及水平。中国古代哲学及其他理论之一般方法,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以归纳、综合为重,演绎、分析为轻,使阐释——特别是美学与文艺的阐释,既有大象无形、文约意广之长,亦有混沌弥漫、无界无疆之弊。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自古希腊始,就是一条与古代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20世纪以来,以数理逻辑的精密发展为标志,分析哲学将西方思辨方式中,重演绎、重分析、重确切概念与论证之倾向,推向新高点。在阐释学的一般方法上,既有分析严格细密、证据充分清晰之长,亦有囿于碎片,弱全局统观之弊。坚持阐释落脚于理,正确的路径与方法选择,当为重要之点。^①

诠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重视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问题,融合诠释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以创造诠释学新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西方学界以保罗·利科为代表,张江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我们相信,无论阐释学今后怎样发展,方法论阐释学决不会缺席,因为只要存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人们就必然会要求思想家提供恰当的方法、合乎逻辑的规则、有效的规范,指导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正确而合乎理性地进行。

总而言之,张江关于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学术构想是明确而重要的,他的探索是系统而富有成效的。目前,他的探索主要在方法论层面系统展开,我们更希望看到他对方方法论阐释学之哲学基础的理性观照,明确阐明他的中国阐释学的存在论立场,并回应来自哲学方面可能出现的对自己基本立场的挑战性质疑。因为,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中国阐释学应该是什么样的阐释学是一个在事实层面容易达成的共识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如此的中国阐释学如何可能,则是一个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对被阐释之物及其阐释活动的不同哲学理解,经常会在阐释学的存在基础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而言,对阐释学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的批判反思,夯实其哲学根基,是一门被称作“中国阐释学”的新学科能否成立的关键。

(说明:作者在本文发表前夕,收到张江教授惠寄的新论文《阐释与自证——心理学视域下的阐释本性》。在该文中,张江教授把“自证”理解为阐释的本质,并据之解释阐释的生成及展开方式。本文的研究没有涉及这一新见解。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依据对张江教授此前公开发表论著的分析。)

^①张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Fu Yongjun

(Center for Chinese hermeneutics,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Zhang Jiang's "Chinese hermeneutics" comes later than the Chinese hermeneu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but it is unique in the systematicnes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theory and the ability of self justification. Zhang Jiang'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goes back to text hermeneutics, from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to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n to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ming of hermeneutics in Chinese context, the publ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the boundary constraint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tension of finiteness and infinity with the objectivity of interpretation original concept. Zhang Jiang regarded interpretation as the basic wa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social existence. He not only emphasize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interpretation. His Chinese hermeneutics is based o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t has two aspects: philosophical cognitive theory and interpretative social theory. It is a model that can be imitated for the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Key words: Western hermeneutics; Chinese hermeneutics;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public interpretation; Zhang Jiang

责任编辑:王盛辉

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三次转向与意义生成^{*①}

付昌玲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 作为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西方文本理论发生过三次转向。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相继开启了文本理论从研究作者到研究作品的转向,其意义是客观、稳定的;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出场,致使文本理论从作品转向文本,文学意义由封闭走向开放。随着电子网络的普及,一种新型的文本实践——超文本形成,使文学意义呈现出对话性、交流性,这对于指导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理论话语和体系建设,尤其是当前在电子媒介的倾轧下,如何实现文学文本的突围、重建,能够提供某些经验教训以及富有科学性的建设指导。

关键词: 文本理论;文学意义;后结构主义;超文本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65-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6

文学文本理论是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特里·伊格尔顿对此确定了两个时间标志:第一个是1917年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方法》,开启了西方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阶段,从研究作者和创作转移到将作品视为封闭自主的符号系统,致力于研究作品自身的语言和结构功能;第二个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出场,区分了“作品”与“文本”,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也因此对读者解读给予关注。^②伊格尔顿对文本理论发展的这两个时间点的概括,有其准确性的一面,但他当时显然并未预测到互联网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了文本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的改变,由此出现的超文本,通过网络链接的方式进一步实现文本的开放性,在新世纪有愈演愈烈之势。

伴随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同时取得重点关注和进展的是对于20世纪文学意义的研究。美国著名文论家奥尔森曾这样描述:“过去半个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进展就是意义范畴在理论上引人注目的上升。意义范畴不仅被作为手段应用于文学的语词和语句的分析,还被应用于分析文学作品自身。”^③这似乎说明了文学意义也应该是西方文本理论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意义及文学意义的研究,并非凭空兴起,而是与20世纪解释学和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遍及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对于20世纪文学意义而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所指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西方文本的理论嬗变。

* 收稿日期:2020-04-01

作者简介:付昌玲(1977—),女,安徽东至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知识增长的历史与逻辑研究”(19BZW022)的阶段成果。

②[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前言》,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S.H.Olsen, “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Work”, *New Literary History*, 1982, No. 14, p.13.

一、文本理论的作品转向及意义生成

20世纪以前,特别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情感论、才性论、天才论、想象问题、灵感问题是文论研究的重点。浪漫主义把诗人视为神一般的法式和英雄,在提升诗人地位的同时也强化了古典主义的诗人崇拜,由此确立了作者中心的表现论范式。“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文学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的幻想”(弗洛伊德)等理论主张具有很强的辐射力。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将作者视为具有超能力的创作主体和作品的中心,作者是作品的“父亲”,作者意图是作品意义阐释唯一可靠的根据,因此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特质的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关心的重点发生转移,主体如何获取知识、世界怎样向人展开、意义如何得以生成诸问题备受关注,语言哲学显赫一时,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一种作品论的“客体取向”取代了浪漫主义的作者中心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到英美新批评、早期结构主义,批评家们立足于“文学性”,告别传统的未作区分的文学研究,把目光从作者身上转移到作品身上,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以作者为中心的研究方向,树立了作品的中心地位。

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占据文坛领袖地位的象征主义批评,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认为文学研究必须有现实客观依据和理论依据,也就是语言。“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极富斗争精神和论争精神,他们摒弃了曾经影响文学批评的神秘的象征主义,秉持客观的、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作品的客观实在。”^①在此之前的文学理论以作者为研究中心,以探寻作者意图在作品中的“象征”为目的。俄国形式主义则打破了作者对作品的束缚,指出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象征”,而是要通过对语言和结构的研究,揭示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即“文学性”。

什克洛夫斯基宣称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并以工厂情况作比喻,只对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感兴趣,而非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或托拉斯的政策。雅各布森则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即文学性,或者说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将文论研究的核心定位在语言本身及其组合规律,反对文学研究的外部批评,认为作品是一个符号系统,一切意义都在作品内部,在于符号的特殊结合。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的诗的功能,即一种指向信息本身的倾向,是因为信息而不是其他因素专注于信息。”“由于增强了符号的可触知性,诗的功能因此扩大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对立。”^②也就是说,语言的功能并不在于临摹和表现对象,而在于语言自身的可触知性,语言并不指涉外物而是指向自身。文学作品与外在的观念、现实和超验无关,仅仅是语言活动本身。这种转向语言自身的取向将作品视为独立自主的系统,在驱逐作者的同时,将研究客体孤立起来,导致“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被偷换成了对所有‘别的东西’的单纯拒绝和否定”^③。“文学性”概念的提出彰显了作品自身的独特性,作者的权威被削弱了,作品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作者为中心的主体取向逐渐向以作品为中心的客体取向转变。

^①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87.

^②[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78页。

^③[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3、210页。

俄国形式主义以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分裂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使作品成为自足自为的存在,而英美新批评则是以“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将作者意图、读者阐释和作品区分开来,主张消除文学作品以外的一切主观因素,对文本进行科学、客观的“细读”。新批评文本理论的核心是语言问题,它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封闭的有机统一体,视为一个孤立的与外部现实没有任何联系的客观存在物。这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封闭的作品观的延续,其对作品整体结构的体察也蕴含着结构主义的先声。

首先,新批评深受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影响,把作品视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客体。他们极力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在批评过程中的无意识出现,排除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的影响,提倡“细读法”,以实现客观的、科学的批评。在英美新批评派看来,作者及其意图与作品完全是两回事,作者意图并不是也不应是文学研究的恰当标准。作者一旦完成作品便不具备对作品的控制权,作品成为脱离作者的独立存在;更重要的是,诗的语言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公众的。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坚称:“意图说的谬误在于混淆诗和诗的来源,是20世纪哲学家们成为‘起源的谬误’的一种特例。它试图从诗的心理原来来推演批评标准,却以文学传记和相对主义告终。”他们认为“作者意图论”是浪漫主义的谬说,是历史上许多有关文学的误解、偏见和谬说的遗绪。因此,文学研究要划清作者与作品的界限,将诗人私事与诗歌分析区分开来,避免将诗人与诗歌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对作品作科学、客观的分析。其次,除了“意图谬误”外,新批评还认为读者存在“感受谬误”,试图清除读者感受对文学批评客观性的影响。新批评认为,读者方面存在“感受谬误”,读者从诗歌的心理效果来推演批评标准,不是落入印象主义的窠臼,就是落入相对主义的泥潭:“无论是意图说还是传情说,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将导致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诗本身,趋于消失。”^①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新批评对于作品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的认识。他们看到了掩盖在文学语言悖论与含混之下结构的稳定性,正是结构的稳定协调了作品的矛盾,使得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在批评家们看来,语言的悖论、反讽、含混性等特点使作品充满矛盾与悖论,而在结构的协调下这些矛盾与悖论又实现了和谐,从而使作品成为一个矛盾而又统一的有机体。沃伦在转引桑塔亚那的评论时曾指出:“正如桑塔亚那所说的,‘诗歌是一种稀释,一种重新安排,一种原始经验的回响,诗歌本身就是对眼前事物理论上的想象’。这难道还没有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诗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个别的成分,而是取决于我们称之为一首首诗的那一整套相互关系即结构?”^②“结构原则就是协调关系,也可以把结构视为关系的体现。在创作过程中,结构不仅规划了形式,而且也规划了内容,结构的价值表现为将文本规划为有机统一体。”^③而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研究作品中的反讽、悖论与含混,以及所有这些手段如何造成了作品既充满张力又和谐统一的特质。对此,乔纳森·卡勒评价道:“新批评注重研究歧义、悖论、讥讽、含义的作用和诗歌比喻,努力说明诗歌形式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是如何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做贡献的。”^④新批评着力研究文学作品是如何成为一个包含着对立元素的统一结构的,虽然他们看到了作品内对立因素的复杂性,但忽略了这些对立因素的流动性。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同样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和前提,尤为推崇索

①[美]威姆萨特、比尔兹利:《传情说的谬误》,赵毅衡选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91页。

②[美]沃伦:《纯诗与非纯诗》,赵毅衡选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③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④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9.

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法国权威结构主义研究者F·瓦尔指出:“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以视为是结构主义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significant)——所指(signified)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取得其结构。”^①结构主义者明确指出要按照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作品,他们认为“系统高于其构成部分,力求从部分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系统的结构并展示语言变化的有机性”^②。语言学中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每一套符号都是一套独特的语言体系,“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的所有构成部分由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联结在一起。该系统把各部分组织在一起,它们是相互联结、相互区别、相互限定的清晰符号”^③。因此,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品是像语言一样封闭自足的符号系统,作品的意义与作者和读者无关,它产生于语言符号本身内部系统的区别与差异,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仅仅在于自身。由此,作者彻底被排除在文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之外,伴随着以作者为中心的主体取向到以作品为中心的客体取向的转变,封闭的作品观在结构主义这里确立起来。

结构主义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将作品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自为自足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是由诸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关系的综合就是结构;重要的是结构的整体性,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的,因而个体只被看作整体结构中的诸‘节点’,它们只能起传递‘结构力’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说,世界不是由‘事物’组成的,而是由‘关系’组成的,事物不过是关系的支撑点。”^④结构关系的整体性决定了一切个体的性质,决定了作品的物质存在,因此要从统一性把握作品,把作品的成分作为动态整体。文学研究的重点在于作品的结构而不在于其他,因此文学是一种把注意力引向其自身的、本身具有目的的系统语言,文学作品也由此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整结构的符号系统。

结构主义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宏观性,把研究的重点完全放在作品内部的结构上。问题在于,结构主义深信语言和结构在逻辑上都是先于作品存在的,因而只剩下了枯燥的语言技术层面的分析。塞尔登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建立‘科学的’文学结构主义并没有产生印象深刻的成果。不仅是文本,而且连作者都被勾销掉了,因为结构主义把实际作品和创作者都置于括号中了。以便把真正的研究对象——体系——孤立出来。”^⑤同时,为了紧密把握客体的深层结构,追求科学、建构体系,甚至不惜脱离现实本身。正如伊格尔顿所批判的那样:“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世界的意识,却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对于任何相信意识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实践的,是不可分割地与我们在现实中的活动和作用与现实的方式联在一起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注定是自我拆台。”^⑥结构主义在研究现实的文学作品时,只关注共时的、抽象的结构和体系,却忽视了历史的维度,使得结构主义文论成了一种脱离实践的理想逻辑论证。

进一步考察西方文本理论从作者转向作品后的文学意义。可以说,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陌生化”,还是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有机统一”,抑或是结构主义的“结构”“整体”观念,都将目光放在作品内部研究上,认为作品与作者及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割

①李幼燕:《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②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83.

③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83.

④李幼燕:《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⑤[英]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⑥Terry Eagleton, *Litera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37.

裂了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把文学视作一个具有稳定不变根基的事物,文学系统独立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独立于其他要素之外,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他们都追求文学性,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定义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语言性’和‘文字性’的探究。此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性’问题的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所关注的文学语言形式的‘文学性’,转向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文学文本的构成特征和组合方式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英美新批评注重在大的历史语境及文本语境中探究具体词语的含义。法国结构主义则重点关注文本的内在结构要素,文学性随之演变为对文本深层结构的挖掘和对神话原型的追溯”^①。就文学作品而言,作品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与结构,作品是一个自主的、相对封闭的系统结构,其意义也是客观的、确定的和稳定的,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其意义的关系,也是确定的和必然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对作品自身语言特性的发现,到英美新批评以“细读法”分析作为有机统一体的作品,再到结构主义完全地以整体、系统的观念体察作品,这些派别从不再关心文学语言的指涉开始,逐步发展到只关注文学语言自身,探究文学语言的形式、技巧或者支配文本成型的深层结构,作品意义指向语言自身,能指排列组合,并形成一个共时的总体结构。由此,作品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走向自我封闭,成为一个具有稳定的根基和惟一的意义的有机统一体。

二、文本理论的文本转向及意义生成

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从结构主义内部发起对结构的颠覆。结构主义作品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它由能指排列组合,并形成一个共时的总体结构,文学研究就是分析语言、表现技巧以及支配文本成型的深层结构;作品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与结构,作品与作者及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解构主义文本论则立足于语言学领域,从理论上论证了稳固结构的不可能;突破内部研究的壁垒,将文学研究由内部转向外部,注重研究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文本意义的生产性。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中论述了这种转变:“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温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②在解构意义的过程中,意义由单一走向多元,作品由封闭走向开放。

解构主义文本观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后诸多理论派别的文本理论,解构的文本理论首先是对语言的解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哲学领域德里达扔下重磅炸弹,导致了理论风向的急遽转变。先是1966年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学术讲演,接着于次年发表了引起强烈反响的三部曲力作《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和《声音与现象》。在这些著述中,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想提出质疑与抨击,同时也宣告了结构主义时代的结束。德里达、德曼等人激烈反对结构主义那种恒定、封闭、自主的文本结构,主张立足文本内部,从语言与结构的不稳定性出发,揭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建构生成过程。

德里达为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理性的稳固统治,主张从语言和意义的不稳定性出发,

^①胡友峰:《论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转型》,《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②[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拆解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在结构主义文论中,文本被视为供读者消费的成品;文本的意义是可数的,不论它多义与否,它总是被当作一个封闭自足的实体;文本的符号世界总是隐含着一定的结构,可以通过客观的分析把握文本的符号世界;文本被动地提供给读者,读者的主要任务是解读——发现一个内控的规则,阅读被视为阐释一个(或更多个)目标的意义行为。然而,德里达发现:当读到某一能指时,所指并不应声而至,相反它迟迟不露面,甚至永远不露面,所谓“所指”只是一场无尽的延搁而已。在文本里,能指不断激增,意义不断延迟,文本因而是变化的、开放的,而不是结构主义文论所认为的固定的、封闭的。这样,文本被视为一种增殖力、生产力,并在活动和动作中不断生产和转换。

德里达的“延异”观认为意义永远处于无尽延宕的过程中,没有稳固、确定的意义,只有滑动的、漂浮的能指。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生成和增殖。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只有靠符号内部的区分才能辨别,而符号内部的这种区分,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因此,意义只能在这种区别的过程中无限地延宕。德里达称这种展现意义的方式为“播散”,我们无法获取确定的意义,只能捕捉意义“播散”的痕迹。从这一立场来看,文本分析就在于探寻其中的裂隙和差别,并将其无限延搁下去,文本阐释的目的就是推翻形而上学大厦,以开放的姿态发现和揭示文本复杂的内蕴。而就文本构成而言,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还在于语言的本质特征是隐喻性,这导致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文本既指向现实世界,但与其象征物之间总是有一定距离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裂隙为阐释提供了空间,因而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结构主义所致力追寻的语言背后的单一的稳定的意义,愈发变得不可能。

以“耶鲁四人帮”为首的解构批评家们也是从文本内部出发,试图通过对语言多义性的发掘,打破封闭的文本体系。他们虽然也与新批评派一样提倡细读批评,但其目的不在于证明文本的有机统一性,恰恰相反,他们要通过对文本语言的细读寻找解构的线索,以语言的寓言性、隐喻性来揭露惟一意义的虚幻性和稳定结构的不可能性。以德里达和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本观的立论基础也是语言学,但其重心并不在于对语言的技巧或结构进行浅层分析,而在于通过对语言隐喻性的研究,揭示意义的不可留驻性,以打破封闭的、稳定的作品观念。乔纳森·卡勒曾这样评价:“有效地教导人们怀疑意义,告诉人们‘毫无根据的答案之危险’,这些答案为粗暴的强加提供了借口。”^①封闭的作品分析认为作品背后具有惟一稳定的意义,而在解构主义文本观这里,意义是不确定的、开放的,因为语言的表达方式是含混的、模糊的、非直接的。语言与理性并不紧密结合,事实上语言根本无法精确地传达具体感受,文本也不存在稳定不变的意义和结构。解构主义文本观颠覆了封闭的作品观,文本具有巨大的生产力和分解力,而意义则变得渺小而不可追寻。文本的意义永远在漂浮之中,意义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地生成,文本的意义由封闭走向开放,“作品”与“文本”也开始分道扬镳。

后结构主义不仅是对文学与作品进行区分,更是用文本概念取代作品概念,以阐发文本意义的生产性,表达某种激烈的解构主义思想。生产性概念的强调源于克里斯蒂娃,她多次重申,文本也就是生产性。这意味着:(1)文本与它置于其中的语言的关系是重新分配的(解构的——建构的),因而通过逻辑和数学的范畴探究文本比纯语言学的范畴更好;(2)诸文本的交换,亦即一个文本的话语空间中的互文性,这些话语来自其他文本,彼此交错并中立化了。罗兰·巴特借用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指出作品与文本的首要区分在于作品具有消费性,文本具有生产性,即意义

^①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60.

的生产:“作品可以被拿在手里,而文本则维系在语言之中,它只存在于言说活动中(更准确地说,惟其如此文本才成其为文本)。文本不是作品的分解,而作品是文本想象性的附庸;或再强调一次,文本只在生产活动中被体验到。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文本绝不会停留(比如停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文本的构建活动就是‘穿越’(尤其是穿越某个作品、几个作品)。”^①作品是物质性的存在,比如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一本书;而文本则是“方法论的领域”,是一种生产和转换过程,是能指再生产的无尽开放过程。作品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结构,而文本不受任何分类和等级系统的限制,它存在于活生生的语言活动中,不停止在任何一点,不确定任何终极或中心,呈现出无限的生产性潜能。

文本的生产性概念还体现在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文性”,这是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又一个重要的概念。1969年,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中提出“互文性”的重要概念。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引用语的马赛克,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创造。互文性指在一个文本内产生的文本互作用,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定义如下:“互文性就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②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没有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文本向其他文本开放,每一个文本吸收转换其他文本。巴特在强调差异和多元是文本基本属性时,明确地将互文性看作是文本存在的条件。他指出,文本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编织物”。“[文本]是经由编织而成,它们在一种巨大的立体声中不断地贯穿于文本之中。每个文本都依存于互文状态,互文本身存在于一文本和另一文本之间,它不应与文本的某种本源相混淆:试图找到一个作品的‘来源’。‘影响物’也就落入了起源关系之神话的窠臼;构成文本的引文是匿名的、无从查考的,而且也是已被阅读过的:它们是不加括号的引文。”^③这形象地表征了文本的特征在于其开放性、未完成性,是有待进一步编织的动态语言系统。

通过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解构和对文本生产性、互文性的揭示,文本与作品彻底分道扬镳,动态的、生产性的、互文的文本概念取代了静态的、固定的、封闭的作品概念。文本是开放的,“文本就是回归语言。像语言一样,文本是被结构起来的,但却是去中心化的,没有终结。……结构是一个既开放又无中心的系统”^④。作品这一概念是固定的、不变的,文本则具有流动性和差异性,文本的过程建构了一系列断裂、重叠和变动,充满了差异、变化和断裂,传统作品观的“有机统一整体”观念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既开放又无中心的系统”。按照巴特的观点,传统的中心化结构的作品概念被网状结构的文本观念所取代,也意味着一个作品具有一个特定本源的形而上学观念走向终结。整体和结构有赖于预设一个中心,但当中心不复存在时,结构的存在也不再合法。“这个契机提供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中心所指、本原的或先验的所指决不会出现在一个差异系统之外。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扩大了表意的范围和表意的游戏。”^⑤中心和本源的缺席导致德里达所说的“差异系统”内表意范围和表意游戏的无限扩大,所指无限延迟,从而彰显出文本的巨大的生产潜能。

此外,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文本逐渐超出了传统的文本范畴,走出语言学范围,文本外延被

①[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杨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②程锡麟:《互文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③[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杨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④[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杨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⑤[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页。

无限扩展。巴特强调的“文本”内涵就十分丰富,他强调:“从学理上,我们不能把文本概念局限在书面文字(文学)内,只要有能指的超越,就有文本。所有表意实践均可能产生文本: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①出现了哲学文本、史学文本、心理学文本、文学文本,有了“画面文本”“建筑体文本”“舞蹈文本”等称呼。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甚至指出“文本之外无他物”,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文本的世界。这里的文本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是包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这种泛文本的概念是由文本概念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产品本身,而逐渐泛指生活中一切可以进行符号分析的文化产品,几乎可以指向人类的所有表意实践和符号。文本既可以指文字和文学,又可以指一切艺术,甚至还可以指社会上的事物乃至整个世界和宇宙,具有文化的内涵。这种文本概念涵义的泛化,其实是以对“世界的修辞性质”的发现和“世界的文本化存在”的强调为根据。这种发现和强调以后索绪尔时代为背景,体现着后结构主义的精神追求。

总之,泛文本理论在首肯语言自身建构功能的基础上,认为一切都是文本。那么,泛文本视域下文本之间的互动已经横向扩展到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所有文本符号之间的关系,“对该文本意义有启发价值的历史文本以及围绕该文本的文化语境和其他社会意指实践活动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知识网络”^②。这个知识网络以文化中所包含的多种因素激活文本中存在的各种意义和多种阐释,蕴含包括文学、历史、文化、政治等在内的各种的互文关系,在肯定了文本开放性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文本与世界的相关性,将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重新带回文本视野,从而充分关注到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而进入一个无限延伸的意义网络。

三、文本理论的超文本转向及意义生成

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一种新型的文本实践形成了,这就是超文本。与泛文本的横向展开不同,超文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文本的线性和因果逻辑构造,实现了一种非线性的文本叙事。“超文本”(hypertext)一词是1965年泰得·纳尔逊提出来的,它是一种电子文档,其中包含链接,可以自由地跳跃到本文档内的文字段落或者其他文档。超文本是一种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数据系统。所谓“非线性”指的则是非顺序地访问信息的方法。构成超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节点,节点可以包含文本、图表、音频、视频、动画和图像等。它们通过广泛的链接建立相互联系。超文本文学实践也形成了大量的文本成果,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超文本的出现不单纯是一个技术进步的问题,它蕴含了内在观念的演变。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主体性的凸显。在这个流变过程中,超文本的实践把此种流变推向了一个高峰。就其形态而言,是后现代文本观的演练。超文本的实践也改变着人们关于文本的观念,形成了新的文本特点。

首先,确定的文本意义的彻底消失;其次,文本的无限性;再次,在超文本中,我们看到读者的主体性上升到了历史的最大值。单纯从文本观念流变的过程来看,泛文本观念和超文本文学实践的出现是一件大事。它们大大拓展了文本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文本的大家庭。泛文本完成了文本自身的横向拓展,使文本向社会历史的开放具有了可能性。而超文本的实践则截断了文本的线性时间的流逝,文本成就了读者意义上的作者。

①[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自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1985年,第304页。

②董希文:《互文本:一种挑战传统的文本观念》,《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文本的“本”在宽泛意义上来看含有“载体”之意,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即使是广义的泛文本也总要凭借其他物质媒介而存在,媒介的革新深刻影响着文学的书写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的改变。纵观历史,从原始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再到电子时代,文学文本呈现出“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从结绳记事到口传文学,原始先民曾利用过诸多物质载体传达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直到文字的发明,才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传播与保留。而印刷技术的使用,更是使得远距离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尽管如此,从文字形态的文本到印刷形态的文本,在书写方式上仍然呈现出作者发挥自身独特的艺术才气,秉持对“原创性”和“经典性”的追求,利用实体性的纸和笔进行写作,在存在方式上呈现着以某种实体性物质为载体,在传播方式上呈现着其物质媒介自身的“厚重、笨拙与私密”,其生产和传播受到物质和实体的限制而在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时空距离”。总之,在传统的“原子化”书写的情况下,传统文学依据原子世界的真理,强调自身的原创性和独一无二性,并在实体性载体的依托下存在和传播。而互联网的发展使文本实现更为便捷的电子化从而以“比特”化的方式存在,欧阳友权将其称为网络技术的“比特赋型”。

“比特”,即 bit,指的是0和1组成的计算机二进制数位,是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最基本粒子。电子计算机将原子世界上所有复杂的事物通过“比特组合”转化为电子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比特化的虚拟网络世界。而文本的比特化存在就意味着文本的物质载体由传统的纸质印刷文本形式转化为二进制的电子信息形式,成为存在于虚拟的赛博世界和网络空间的文本存在。这种“由电子化的比特取代传统的原子形态”可以说是文本形态的一场重大革命,而非线性“超文本”的出现和发展则是这场革命的显著标志。超文本概念的提出者泰德·纳尔逊,曾经对超文本作出解释:关于超文本,指无序的写作——枝叶蔓生的文本,它可由读者选择,在互动的屏幕上阅读效果最好,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一系列的文本块,由可供读者选择不同通路的链接点连接而成。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超文本通过链接而达成的非线性、动态性、互动性和多路径的特征。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在当下网络化的语境下,超文本更是依赖网络链接以非线性存在方式实现了文本的开放性。

首先,由“原子化”文本到“比特化”超文本不只是文本“呈现”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链接使文本拥有了“接通”其他文本的可能,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文本网络,从而使文本存在具有了非线性的特征。超文本通过网络链接将各种信息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非线性立体的网状文本,成为包含着无限链接可能性的开放空间。依靠计算机网络技术,我们通过点击链接可以自由地在无数的文本之间穿梭,各类文本在网络的链接下相互连接和指涉,从而联结成为一部绵延不绝的大书。对此,欧阳友权称为“看不到地平线的超文本的海洋”。被网络链接共时的连接起来的文本,一起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文本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文本的边界被不断打破、连接、延伸,进而被消除,文本得以向所有文本开放,形成没有中心、没有终结的开放性文本。另外,严锋认为,超文本的互相“链接”将结构主义所说的“文本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链接不仅打破单个文章与文章之间的界限,还解构了传统文本中“正文”与具有边缘地位脚注、尾注的区分,没有所谓的中心文本,脚注、尾注通过链接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正文。在这种解构下,文本各要素能够平等地和平共处,实现一种文本的乌托邦。在这样一个乌托邦内,各文本相互对话、地位平等、彼此开放。

其次,超文本的非线性存在方式还促成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乃至换位,打破“创造者”和“接受者”的界限,进而导致文本的未完成性、可创造性和无限开放。在传统的书写模式下,作品因依

靠原子化的书写媒介和传播载体存在而先在地被物化,作为读者无法自由地对作品进行加工、改造或重组。并且,因为传统文本的线性特征,读者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不可逆的线性阅读,因而限制了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这不仅是对读者主动性的打击,也是对文本意义开放的阻碍。网络化语境下的超文本则要开放和灵活许多。其一,超文本的结构是开放的,它处于“持续在线、脱机、移动、重建、增添、删除、链接、脱钩的过程中”^①,因此,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暂时的、生成的和随机的。其二,超文本的阅读是自由的、非线性的、主动的。超文本的多重链接,一方面打乱了文本的线性秩序,读者可以不再线性地阅读文本,在此情况下,文本固定的阅读顺序和确定首尾带来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直觉”不复存在,文本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同于印刷技术下的线性文本尝试展现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和系统化了的有关世界的图景”,超文本非线性的存在方式和多路径的传播方式,导致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变为文本间的自由跳转。这就使得超文本的世界是不稳定的,我们从一处文本出发,随着网络链接一次次跳转,可能会被带往不同方向,路过不同风景,这里充满了碎片、偶然与不期而遇的惊喜,超文本也在这一次次自由跳转中走向无限与未完成。另一方面,网络链接带来的具有多重选择的网状路径也为读者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样一来,不同读者依据自己的审美需求和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链接方式就会对文本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种自由、立体、主动的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对文本的创造,对文本意义作出了丰富多样的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有限的和固定的,而具有了被不断发掘和创造的可能,呈现出意义的不断生成,文本的丰富内涵得以敞开。

最后,“比特化”的超文本作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虚拟文本,相对于“原子化”文本费时费力的传播来说具有“体积小、容量大、耗材少、传输快、辐射广阔、准确性高、易于检索、复原和复制、节约时间和空间”^②的优点,具有不受时空限制进行实时传播的特点,文本以光速流动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这种高效快速的文本传播使得文本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打破时空的限制,超越作家、民族、国家的界限,为文本意义的高效生产和广泛交流提供便利。

总之,在网络化语境下,超文本非线性存在方式导致的文本无中心、无边界和相互指涉,使文本呈现出未完成、可创造和无限开放的崭新面貌。这可以说是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的呼应,它将无始无终的、自由流动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理念实体化为网络的赛博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在读者与超文本之间形成一种交互性的意义生产方式,文本的意义在读者不同阅读方式下呈现出开放性特质,在对网络超文本的阅读中,读者积极参与了超文本意义的生产”,“传统意义上作为文本意义的接受者乃至解释者的读者,在电子媒介的介入下,成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参与到文本结构、文本意义的生产之中”。^③

结语

在西方文本理论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模仿论阶段,文学意义由作者决定和生产。在西方文本理论的作品转向阶段,文学意义主要由作品语言生成。后结构主义视域中的西方文本理论,从作品转向文本,凸显了读者对于文学意义的作用。而以电子媒介发展为基础的超文本,开启了文学意义的多元性、对话性、交流性。这对于建立一种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相互对话的文学意义观至

①黄鸣奋:《网络文学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②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③胡友峰:《论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转型》,《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关重要。

此外,文学文本理论为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意义,深入开展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十分有效的方法。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介绍了一些西方的文学文本理论,甚至形成过短暂的介绍与研究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高潮,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国内不少学者把西方的文学文本理论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冷清,对西方文学文本理论许多基本问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上面,对其发展逻辑的梳理不够充分,对其最新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也不够深刻。因此,只有深入了解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形成、发展、分化、转向,才能对文学理论的价值、意义及其局限性有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这样,以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形态为参照,挖掘梳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本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理论话语和体系建设,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快速普及的时下,如何实现文学文本的突围、重建,或许能够提供某些经验参考以及富有科学性的建设指导。

Three Turns and Meaning Generation of Western Text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Fu Chang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ext theory has witnessed three turns. First, Russian formalism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new criticism successively opened the turn of text theory from the study of authors to the study of works. Their literary significance is objective and stable. Then, the emergence of French structuralism and post structuralism has led to the shift of text theory from works to texts, and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has changed from closeness to opennes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network, a new type of text practice -- hypertext has been formed, which makes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dialogic and communicative. This may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s well as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guid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for how to realize a breakthrough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exts in the jostling of the current electronic media.

Key words: text theory; literary significance; post structuralism; hypertext

责任编辑:孙昕光

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趋向^{*①}

李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 语言产业经济学是在产业经济学的视野下、运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对语言产业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语言产业是一个以新技术为重要特征、以高端服务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与传统产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结合“语言产业”的产业特性,在产业经济学的视野下,建立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对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基本范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搭建起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分析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自2010年以来的演进过程,同时,从语言产业自身发展、国家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对语言产业经济学现阶段的研究任务及未来发展趋向进行探讨。

关键词: 语言产业经济学;语言产业;学科构建;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76-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7

语言产业经济学是以语言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关于语言产业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语言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特别是一个以新技术为重要特征、以高端服务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其在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与传统产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进一步梳理语言产业的产业特性,探析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对语言产业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内容,并搭建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相关概念

(一)学科定位

语言产业经济学是在产业经济学的视野下、运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对语言产业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语言产业的产业结构、供需状况、比例关系、投入产出情况、行业构成、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地区分布、产业发展政策等。

从现阶段的学科定位来看,语言产业经济学是介于微观、宏观经济学之间,对中观层面经济活动及规律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经济学学科,以解决语言产业实践问题、推动语言产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概而言之,语言产业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语言经济学深入实践领域的需要。

(二)相关概念

* 收稿日期:2020-07-19

作者简介:李艳(1974—),女,河北邯郸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消费’新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6BY053)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及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北京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及其发展策略研究”(SZ20201028013)的阶段性成果。

语言产业经济学是对语言产业所进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语言产业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产业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的亲缘概念,服务经济学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

1.语言产业:语言产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语言产业是以语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出各种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产业形态。目前,较为典型的语言产业业态包括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创意、语言康复、语言会展、语言能力测评等。

中国语言产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各个行业起步有先后、构成与规模亦不均衡。其中,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行业起步较早,企业数量众多、整体规模较大;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行业起步虽略晚于前两个行业,但后来居上,呈高速发展态势,注册资本量巨大,并且为其他语言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促使传统语言业态现代化,如语言出版、语言测评行业等。随着对语言资源经济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语言产业在语言资源保护、传承以及相关产品研发、传播中的重要功能日益显现。当前,经济发展从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阶段,进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阶段,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主要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构成的新动能中,以新经济为特征的语言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直接为新动能的壮大贡献力量;同时,以语言智能为代表的语言技术行业为其他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提供着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①。

语言产业研究旨在对国民经济中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或者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语言行业进行分类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掌握其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对语言产业的发展对策进行探究。

2.产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语言产业经济学的亲缘概念

产业经济学是以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其研究内容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等,既包括产业内各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研究,也涉及单个企业内部的结构问题分析等。产业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70年代后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狭义研究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以聚焦于产业组织研究为主要特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从产业组织扩展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以及产业政策,被认为属于广义研究。^②

关于产业经济学与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关系,研究者的观点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经济学是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并侧重于应用研究的一门学科,但持此观点的学者也关注到近年来产业经济学呈现出向理论化学科发展的趋势,不仅促进了规制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开始产生影响。^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视为介于微观、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因为其既不同于研究单个企业和消费者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也不同于研究国民经济总体的宏观经济学,而是对产业间、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经济关系等中观层面经济活动及规律进行研究的理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延伸,产业结构、关联、布局、发展等理论是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具体化,微观、宏观经济

①李艳、贺宏志:《大力发展语言产业 服务国家语言战略》,《中国教育报》2020年10月10日。

②王定祥、冉光和、李伶俐:《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交融》,《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③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

学正是通过产业经济学实现紧密连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①

由于语言产业本身的特性,有必要在产业经济学领域进行专门的语言产业经济研究。语言产业是一个以新技术为重要特征、以高端服务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与传统产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结合“语言产业”的产业特性,在产业经济学的视野下,建立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语言经济学是对语言变量进行的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问题,同时也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语言及言语行为对经济理论、方法或经济绩效的影响与作用。近年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如关注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认为语言学习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包括母语水平和使用外语的人数、熟练程度在内的国民总体的语言能力,是该国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经贸往来,降低经济活动协调、管理、信息交流的成本。^②

目前,语言产业引发的经济现象日益成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经济学与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关系是: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语言问题,后者的研究对象为语言产业,语言产业是语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侧重于对语言的经济属性及相关问题的理论阐述,后者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对语言产业组织、政策等问题的实证思考;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后者是前者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③

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团队黄少安教授认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未来应关注三类问题:一是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语言起源和演变、语言人力资本问题等;二是具体的语言经济问题,包括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经济效应评估、语言扶贫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对语言产业的研究,包括语言产业的宏观政策、语言产业规划等。^④从中可以看出,语言产业经济学是语言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可以说,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是语言经济学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其从诞生之始就肩负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使命。语言产业所属各行业发展状况、运行方式不同,亟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微观、中观、宏观相结合,要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因此,构建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3. 服务经济学: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

服务经济学是以服务产业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是研究服务产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服务产品或服务经济学的主体经济范畴。^⑤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希尔(A.G.B.Fisher)被认为是服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其提出的“三次产业”理论对产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依次从第一产业(农业)占优势的经济过渡到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占优势的经济。二战后,欧美国家国民经济中服务部门迅速发展,催生了服务经济学这一新学科,该学科代表性学者、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R·富克斯(Victor.R.Fuchs)认为,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社会对服务业和服务

①简新华:《产业经济学发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经济评论》2000年第3期。

②黄少安:《经济学视野中的语言:几个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yyx/yyx_tpxw/201611/t20161125_3289739.shtml。

③李艳:《语言经济学和语言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zt/zt_xkzt/xkzt_yyxyz/yyzjdjxky/yycy/yjyyxyyeydgy/201611/t20161124_3288949.shtml。

④孙美娟:《拓宽语言经济学研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6日。

⑤白仲尧:《谈谈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财贸经济》1987年第4期。

产品的最终需求增长加快,推动了专门为生产企业服务的组织产生,从而使服务业就业人数急剧增加。当一个经济体中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超过 50%时,便可以认为该经济体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①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富克斯的理论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都不再以物质产品为主,而是以服务为主。^②

服务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的生产、扩散与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以科技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核心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建立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配置的基础上;国民收入水平、社会分工深化、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和虚拟经济作用等是影响服务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充分认识服务产业的功能,特别是大力发展以高知识性、高技术性、高创新性及高产业融合性等为特征的高端服务业^③,对于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产业中的核心产品与服务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少部分隶属于第二产业的相关机器设备生产、加工。语言产业主要属于服务产业,其中多个行业属于高端服务行业,服务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可以为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参照。

二、2010 年以来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演进

(一)语言产业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2010 年是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 年来,国家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语言产业各业态的蓬勃势头、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分别为语言产业研究和语言产业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宏观背景、产业背景和学术背景。

伴随着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测试等相关经营活动的出现和发展,2000 年之后,国内有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的命名产业、围绕语言学习展开的语言消费活动,但在 2010 年之前未有对语言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分类与特征等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语言产业的研究相对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同一时期,欧美与语言产业有关的报告多来自行业协会,并且较多地集中在语言翻译、语言培训等领域。2010 年,“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2018 年更名为“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语言产业研究进入专门、系统研究时期。我国正处在人口大流动时期,学习者、投资者、工作者在城乡间、国内外流动,使得语言教育、语言翻译等产业拥有强大活力。2011 年,国家语委在“十二五”科研规划中开始将“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列为重要科研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我国第一个以语言产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所开展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在我国语言规划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④ 从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现实需求出发,在 2010 年至 2012 年这一时间段,《语言的经济学属性》(李宇明,2012)、《发展语言产业,创造语言红利——语言产业研究综述》(贺宏志,2012)、《语言产业的概念界定及要素分析》(陈鹏,2012)、《语言产业视角下的语言消费研究》(李艳,2012)等论文及《语言产业导论》(贺宏志、陈鹏,2012)一书对语言产业研究的背景与意义、语言产业的概念界定与行业分类、语言产业中的生产与消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为语言产业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①王述英:《西方第三产业理论演变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②邓雄才、陈洁:《基于服务经济学的服务业发展探讨》,《经济论坛》2007 年第 16 期。

③李文秀、夏杰长:《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4 日。

④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语言文字应用》2012 年第 3 期。

(二)语言产业经济学十年的演进

10年来,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以下脉络:一是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研究维度、研究框架的思考,如对语言消费基本理论问题与研究框架的思考等;二是由对产业特征与行业状况的研究到对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的宏观思考,如对当代中国语言产业发展的三次浪潮的梳理、对语言产业战略规划维度以及相关语言政策的思考等;三是语言产业研究进一步实现与语言企业、地方经济发展的对接。

1.语言产业的内涵与外延逐步清晰

随着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步伐的不断加快,学界对语言产业相关问题研究不断深入,并逐渐显现效果。2016年以后,语言产业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思考公共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的关系问题,认为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规范与标准、语言资源整合与保护、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语言数据库建设和语言研究在内的非营利性的公共语言服务是语言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有必要观照语言产业的整体建设与发展环境,为其研究设立一个相对宏观的研究边界,将提供公益语言服务的政府机构、语言事业单位也纳入语言产业的调查与研究范畴。

这种界定可称为“大语言产业观”,以区别于之前以语言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产业界定方式。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大语言产业观”不是对语言产业边界的无限放大,而是基于对语言服务体系,特别是对公共语言服务与营利性语言服务(语言商品)相互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而提出的一个研究概念。^①

以对语言培训行业的研究为例,2010—2014年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是以营利性质的语言培训机构作为主要的调查和研究对象,如2012年李艳等的北京语言培训业状况调查、2013年李艳、陆洁关于产品供给视角下美国语言教育培训行业的研究等。^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在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团队所承担的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应该将融合在公共教育体系中的公共语言教育作为语言产业的一部分,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语言产品的经济效应,少付费或不付费的语言培训并非没有产生费用,而是主要由公共财政或社会捐助来负担,其实际上是费用的支付主体发生了转移。^③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语言培训纳入研究范畴,有助于更好地进行语言产品需求与供给等方面的研究。

2.研究体系搭建及学科建设不断推进

语言产业经济学是一个涉及多个交叉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在完成了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分类、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需要对研究对象所关涉的问题、领域进行通盘考虑,理清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搭建研究体系。

在研究体系上,语言产业经济学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1)宏观研究主要是对语言产业与社会、文化、经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相互关系、作用方式以及宏观发展策略的研究,如结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语言产业在国家宏观战略中的定位与发展规划;围绕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目标与任务,研究语言产业整体发展规划;对语言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协调发展策略的研究等。(2)中观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产业中各语言行业的主体构成、投入产出等运行状况,行业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协调发展的策略,语言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之间的互动

①李艳:《基于大语言产业观的语言培训业供给侧治理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②李艳、陆洁:《产品供给视野下美国语言教育培训行业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陈鹏:《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研究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3期。

关系与协调发展策略等。(3)微观研究主要包括对语言行业中不同类型语言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方式的调查研究,对语言产品需求与供给、研发与生产等方面问题的探讨以及对消费者语言消费行为的具体分析等。

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国语言产业论坛”“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等学术论坛、《语言产业研究》等学术刊物为推动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启动了语言产业研究、语言经济学等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工作,为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届,使“语言产业”不断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聚焦,进一步带动了学界对语言产业经济学相关问题的探讨。

三、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与研究内容

2010年以来,以语言产业实践与研究的发展为背景,经过10年的积累,语言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轮廓、理论脉络逐渐清晰。与“服务产品是服务经济学的主体经济范畴,服务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是围绕着服务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展开的”^①一样,语言产品(服务)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的主体范畴,以此为“圆心”,勾连起语言需求、语言消费、语言供给等基本范畴:在语言产业运行中,对市场语言需求的分析,是语言产品(服务)研发与生产的基础;对语言消费状况的研究,为语言产品(服务)的供给策略及后续研发提供支撑。

(一)基本范畴

在语言需求、语言产品、语言消费、语言供给所构成的链条上,基于对语言需求的认知与把握,语言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者不断满足并引导语言消费。在语言消费中,消费者也不断产生新的、多元化的语言需求,对语言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形成刺激,从而在这4个基本范畴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系统。^②

1.语言需求

语言需求指对语言产品(服务)的消费需求,包括个体的语言需求和群体的语言需求。语言需求是产生语言消费行为的动因与基础,也是语言产品生产与供给的前提。

语言需求可以细分为以下五种:(1)语言能力提升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有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测试等方面的产品(服务);(2)语言转换方面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有语言翻译方面的产品(服务);(3)语言技术方面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有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方面的设备、软件等产品(服务);(4)语言创意与艺术方面的需求,包括命名服务、书法艺术、字体设计等;(5)公共语言产品(服务)方面的需求,包括对语言学术研究、语言资源整合与保护、语言数据库、语言标准、语言政策等产品(服务)的需求。

2.语言产品

语言产品是语言产业概念的一个关键点,语言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生产出语言产品以满足客户的语言需求。客户因为有语言需求,就会消费语言产品,当语言消费行为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和规模就形成了语言产业。因此,是否能够满足某种语言需求,也可以作为判断某种产品(服务)是否属于语言产品(服务)的标准。相应,能够满足前述语言需求的产品(服务)就可以归入语言产业(服务),提供这些产品(服务)的主体可以归入语言产业。

^①白仲尧:《服务产品是服务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商业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②李艳:《语言产业视角下的语言消费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

根据产品的性质,还可以将语言产品进一步划分为纯语言产品(如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创意等)、语言科技产品(如语音处理设备、字库、机器翻译设备、语言测试设备、文字识别软件等)、综合语言产品(如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测评等)和公共语言产品(主要指由国家、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提供的非营利性质的语言产品,如通用语言标准、语言数据库等)。^①

3. 语言消费

语言消费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狭义、广义两大类:狭义的语言消费指对隶属于语言产业的各行业提供的所有语言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消费对象包括语言出版、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测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康复、语言会展等业态的产品;广义的语言消费包括以语言产业为供给主体的“典型性语言消费”和以窗口服务行业为供给主体的“伴随式语言消费”。

此外,对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科研院所及社会公益机构所提供的语言政策、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语言教育、语言数据、语言康复等产品(服务)的消费,也可归入“典型性语言消费”,相对于以语言商品为对象的狭义语言消费,对这类具有语言福利性质的公共语言产品的消费属于广义的语言消费。语言消费的研究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主要是回答“是什么”;第二层主要是解决“为什么”,即语言消费的动力机制问题;第三层主要是探讨“怎么样”,即语言消费是怎样推动生产的、产生了怎样的效益。三个层面的研究既层层推进,又首尾相连,第三层直接为第一层所提出的供需问题作出宏观决策的回应,从而构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关联系统。^②

4. 语言供给

语言供给指对语言产品(服务)的供给,即语言产品(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在一定时期内,有意愿且有能力供应的产品(服务)量。对语言供给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语言产业总供给问题的研究,即研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语言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总供给能力增长、总供给质量提高,还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规模、结构的匹配问题;二是对某一类语言产品(服务)供给问题的研究,如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技术产品(服务)的供给问题分析,其往往是针对语言产业中的具体行业所进行的研究。

语言产业所属各个行业的发展状况、运行方式不同,根据对各语言行业投入产出状况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整个语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贡献度的研究,可以将微观、中观、宏观视角的研究连接起来,理清(语言需求、语言消费)⇌(语言供给、产业结构、投入产出)⇌(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语言产品(服务)的生产、消费为核心,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体系。

(二) 研究内容

综合产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结合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目标,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结构研究(结构-关联度-比例)、政策研究两大板块(见表1)。

1. 结构研究

一是对产业机体的构成分析,包括语言产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布与发展状况;语言产业的内部结构与运行方式(产业组织、产业布局、技术结构、产业链等);语言产业中的行业构成(各语言行业的主体构成、行业规模、运行方式、在语言产业整体发展中的作用等);语言产业在

^①陈鹏:《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研究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3期。

^②李宇明:《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教育导刊》2014年7月上半月刊;李艳:《语言消费:基本理论问题与亟待搭建的研究框架》,《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4期。

国内不同区域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分析;语言产业的供需与消费结构等。

二是对三组对象的关联分析,首先是语言产业的社会功能(语言产业与人、文化、经济、政治、教育、艺术等的关系);其次是语言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如语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辐射作用、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及相互影响状况等);再次是语言产业中各语言行业之间的关联度(如对各语言行业在产业内部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三是从两个比例看产业绩效,包括语言产业及各语言行业的投入产出状况(语言产品、企业、行业、产业的成本投入与利润产出,产品质量及市场评价、社会影响等);语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及发展趋势、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拉动作用及对于特定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等。

2.政策研究

包括对国家发展战略中与语言产业经济发展相关的宏观政策的研究;研制推动语言产业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结合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地方语言产业发展的思路对策等。

表 1 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构成

研究板块		具体研究内容
结构研究	构成	(1) 语言产业的内外结构、行业构成、区域分布
		(2) 语言产品(服务)的需求、供给、消费结构
	关联	(3) 语言产业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
		(4) 语言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度及相互关系
		(5) 语言产业中各行业之间的关联度及相互关系
	比例	(6) 语言产业及其所属各行业的投入与产出状况
		(7) 语言产业在国家与地方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
政策研究	(8) 语言产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宏观政策	
	(9) 语言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产业政策	
	(10) 区域语言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路对策	

四、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趋向

在新技术变革、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进入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面向语言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家战略发展的新布局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趋向:

(一)面向语言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语言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既包括国家发展对语言产业提出的新要求,也包括个体发展对语言产品(服务)提出的新要求,还包括语言产业自身在产业升级中需要面对的新要求等。为此,需要围绕着“理念”“技术”“人才”这三个关键词,以推动语言产业的发展、增强语言产业的服务能力为目标,拓展与深化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及改革发展、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建设要求。与此相适应,语言产业需着力探讨如何以科学的理念为指导、以先进的技术为支撑、以高端的人才为根本,并建立有效机制,实现这三方面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有效增强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首先,通过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出版、语言测试、语言康复等行业的产品(服务)优化升

级,满足语言需求,更好地提升国民语言素养与国家语言能力。其次,大力推动语言技术行业发展。当前,各国相继以国家力量抢占人工智能竞争制高点,争相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以期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语言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语言智能的发展将直接推动人工智能体系的进步,因此,以语言智能为核心内容的语言技术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包括在城市治理中运用语言智能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开展与国内外、全方位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过程中,研发语言智能产品以及语言服务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在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康复等语言行业中开发及升级相关语言技术。再次,通过各种语言产品与服务,推进语言文化传播,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

(二)面向国家战略发展的新布局

语言产业因其具有的文化、经济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围绕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在这些目标的实现中,经贸往来、沟通交流等都要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使用具有多语言、多文字的特征,这些特征使粤港澳大湾区在城市建设、经济活动中产生一些独特的语言需求,相应对语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①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通过对粤港澳语言产业整体状况的调查,结合港、澳及“珠三角”九市的特色资源及其在协同发展中的不同定位,为当地语言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包括如何有效开展专门、深入的语言需求与语言消费调查;如何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需要的语言产业人才储备;优先、重点发展哪些语言行业以及在不同城市如何实现错位发展;如何通过语言产业相关业态的发展,为深化语言文化认同、构建和谐语言生态服务等。

(三)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关照人类的共同命运以及与此相关的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共同体。共同的意识与价值认同以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包括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在内的所有的交流都是以语言沟通为基础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在每一“通”的实现过程中,都会有“语言”的参与,都离不开语言消费。可以说,语言产品(服务)的供给状况及满足需求的状况如何,将会对“互联互通”产生直接的影响。^②如何发挥语言产业的作用,通过促进互联互通的顺畅实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服务,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需持续跟进的研究内容。

同时,在全人类共同遭遇重大突发灾难时,语言产业在信息传递、沟通交流等方面也责无旁贷。在抗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动员阶段,标语、顺口溜等语言产品与疫情扩散抢速度,迅速、广泛普及科学防疫信息与措施;在语言救援阶段,满足多语种、多样化的信息接收需求,通过语言的力量,凝心聚力、共克时艰;此后,语言企业纷纷免费开放服务平台和内容资源,各语言行业都积极行动起来,责任担当提供语言产品与服务。此次疫情引发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①李艳、贺宏志:《语言产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光明日报》2020年4月11日。

^②李艳、高传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消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3期。

中语言产品供给问题的深层思考,这也是语言产业经济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建立应急语言产品供给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作用优化语言服务效果、提升全民语言文明意识与语言文化素养等。^①

五、结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会促使人们改变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改变,会相应改变与原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经济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参与到生产资本的运行中;而语言资源在生产资料中,既可以作为生产工具,也可以作生产对象(原料)。这里的“语言资源”既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等工具型资料,也包括生产加工后的各类语言产品(如语言出版物、语言翻译软件、语言培训服务、语言康复服务等)。我国的语言产业研究学者正是敏感地把握了语言的生产力特性,经过十年的学术积累,构建了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理论体系,为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语言产业导论》首次提出建立“语言产业经济学”^②。本文尝试对语言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进行系统的学科界定,在对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基本范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搭建语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语言产业经济学是对语言产业这个新兴产业进行研究的新学科,是“语言产业”与“产业经济学”两个概念的融合体,但又不仅仅是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研究框架、学科特性与使命、学科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等问题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

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语言产业经济学的构建,不仅是语言产业研究、语言经济学研究深化的需要,也是这一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基于新文科建设的语言产业经济交叉学科的建设,有待多学科领域、产学研界协同努力,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探索、逐步完善,以“语言产业学科创新”来推动中国特色语言产业发展范式的构建,在新技术变革、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进入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面向语言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家战略发展的新布局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共同肩负起推动语言产业发展、服务国家语言战略的历史使命。

(2010年9月28日,“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成立,2018年更名为“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这标志着我国语言产业研究进入专门、系统研究时期。十年来,我国语言产业各业态及语言产业研究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并且,语言产业研究学者敏感把握语言的生产力特性,经过十年的学术积累,构建了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理论体系,为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该研究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以及“齐鲁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在此特别鸣谢)

^①李艳:《语言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疫情防控中的语言产品与服务》,《光明日报》2020年2月22日。

^②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导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Li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defines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proposes that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uses industrial economics methods to study languag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Language industry is an industry with new technology as its important feature and high-end service economy as its main content. It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linkag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basic categories of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framework for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research since 2010 has been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dustry itself, national strategic layou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task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research.

Key words: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s; language indust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trends

责任编辑:孙昕光

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①}

李宇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 数据时代的标志是把数据看作生产要素,数据价值由科学领域进入社会经济制度领域。语言数据包括四类: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负载的信息;由语言延伸的各种符号与代码;生活、艺术与科学技术符号。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语言数据都是最为重要的数据,因而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语言数据产业在内的语言产业将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方支柱。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逐渐为人和机器两个“物种”所拥有;信息空间是人类正在建造的第三空间,随着信息空间、语言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语言将承担起“万物关联对话”的任务,在社会、信息、物理三元空间中发挥互动作用。新基建应是“智能新基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具有“双物种”属性、在三元空间运行的语言;要考虑用“新文科”的思路培养适应数据时代需求的语言人才。

关键词: 数据;语言数据;语言产业;数字经济;生产要素;新基建;新文科;三元空间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87-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8

数据(data)是观察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得到的各种原始素材,通过对素材的加工处理获取信息、建构知识、生发思想。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就有数据存在,并为人类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不断作出贡献。随着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数据的作用更加重要,科学地位更加凸显,社会也对其更加重视。在计算机科学中,所有能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都可称之为数据,包括数字、文字、符号、语音、图像、视频,等等。计算机所形成的网络,为社会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计算机在数据收集、处理上表现出强大功能,特别是通过大数据学习而不断挖掘知识、获取智能,促进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的社会应用,突出了数据的科学意义。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第七大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可以通过市场“按贡献取酬”。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对信息化社会的本质认识,也是社会进入“数据时代”的标志。本文讨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意义、语言数据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语言智能与人类正在建造的“第三空间”、数据时代的语言产业问题等。目的在于认识语言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意义,语言学要以新文科的思路为数据时代培养人才。

一、数据成为生产要素

数据的价值首先被科学家所认识,特别是被计算机专家和信息专家所认识。计算机与信息

* 收稿日期:2020-08-19

作者简介:李宇明(1955—),男,河南泌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学前儿童语料库建设及运作研究”(19AYY010)、教育“十四五”规划研究课题项目“‘十四五’时期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是当今的先锋学科,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当今政府常会关注这类学科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利用公权力支持这些学科的发展,以便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机遇。因此,政府也会从这些学科领域认识到数据的价值,数据的意义由此从科技领域转入社会领域。

政府对于数据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第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第一层认识的结果是加大科技投入,改进科技政策;第二层认识会在第一层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进而改进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经济分配政策。政府的这两个认识层面,也代表着数据认识的两个阶段。当政府有了第二个层面的认识,看到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质时,社会就进入了“数据时代”。

(一) 各国政府的“数据行动”

在移动网络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数据及其相关问题,积极采取一系列与数据相关的政府行动。有学者曾较为全面地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①:

2017年3月,英国发布《英国数字化战略》,提出要释放数据在英国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提高公众对数据使用的信心。2018年,英国又发布《数字宪章》《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国家计量战略实施计划》等。2018年,美国发布《数据科学战略计划》《美国国家网络战略》《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等;欧盟发布《欧盟人工智能战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促进人工智能在欧洲发展和应用的协调行动计划》等;法国发布《法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5G发展路线图》《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工业转型的方案》等;德国发布《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人工智能德国制造》《高技术战略2025》等。

2015年7月,印度提出“数字印度”倡议,计划以“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两驾马车驮载国家未来。2017年7月,俄罗斯发布《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韩国早就提出要建设“数字政府”,要求管理网络化、办公自动化、政务公开化、运行程序优化,从而使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政府治理民主化。2017年,韩国行政自治部和信息化振兴院共同发布《2017年电子政府10大技术趋势》,宣布将数字政府逐渐发展成为结合数据分析、机器人技术、提供更周到服务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政府”。2018年,日本发布《日本制造业白皮书》《综合创新战略》《集成创新战略》《第2期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SIP)》等,详细阐述了推动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这些行动方案,充满着“数据、数字、智能”等字眼。

(二) 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的认识历程

前述各国政府的“数据行动”,其认识基本上还都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层面,但也开始触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层面,但并未明确把数据列入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认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也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相关。一方面,数据具有生产要素的性质,只有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成为现实,才能被人认识;另一方面,只有对信息化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具有洞察力的社会集团,才能率先认识,及早布局。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

^①陆俭明:《顺应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语言研究必须逐步走上数字化之路》,《外国语》2020年第4期。

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①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第二,如何发展数字经济。这些论述已经超越了为推进科学技术发展而关注数据,而是将数据问题向经济制度方向引领。

2018年4月13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经济分论坛在福州召开。2018年5月26—29日,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举行。2018年9月25日,江苏互联网大会在南京举行。2019年12月10日,第六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都突出了“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这一话题。特别是2018江苏互联网大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到会致辞。王新哲在致辞中强调:“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至此,人们确认了两个基本认识:第一,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第二,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

2019年10月28—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对数据具有生产要素性质的首次明确表述,把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第七大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按贡献取酬。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对信息化社会的本质认识,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制度的与时俱进。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主要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配置提出了要求。^②在第六款“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中,《意见》提出了三条:“(二十)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二十一)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安防、城市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推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二十二)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性,丰富数据产品。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推动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第七款第二十五条规定,“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第八款第二十六条规定,“引导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依法依规开展数据交易”。

《意见》是在“数据是生产要素”的判断之下作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安排,不仅为数据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的市场配置的体制机制与环境,而且也加固、加深了“数据是生产要素”的认识。

二、语言与生产要素的关系

人类观察世界所形成的数据,可供计算机处理的数据,80%都是语言数据,故而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语言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也有密切关系。认识语言与生产要素的关系,有利于在数据时代自觉地、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红利,对于语言学研究

^①《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12/09/content_5245520.htm。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和语言学人才培养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

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亦是信息载体。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数据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多数数据都是语言数据。语言数据主要包括如下4类内容:1.语言的符号系统。包括: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文字系统;标点符号;注音符号等。2.语言负载的信息。语言包括口语、书面语、语言参与的音频、视频文件等,它们记录、负载各种信息。3.由语言延伸的各种符号与代码。如盲文、聋哑人的手语、旗语、灯语、电报代码等。4.生活、艺术与科学技术符号。如电话号码、身份证编码、银行卡号码、乐谱、数学符号、化学符号、公式、计算机编程语言等。其中,前两项是自然语言数据;后两项是人工语言数据。人工语言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与自然语言一同使用;它们或是自然语言的符号化,或是需要自然语言辅助理解,或是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阐释。

计算机所要处理的数据,除语言数据外还有人面、人体动作、声音、气味、颜色、物象等数据,但毫无疑问,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其一,语言数据的数据量大;其二,语言数据与人类的关系较为密切;其三,语言是人类最常用、最能反映人类心智的符号系统。语言数据的计算机处理,较难也是最重要的是自然语言数据处理。计算机对语言数据的处理,如汉字识别、词语检索、自动翻译、自动写作、客户的机器语言服务等,每前进一步,就会产生新的语言产业,推进社会前进一大步。

数据是生产要素,那么,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也应当属于生产要素范畴。2019年12月17日,“第二届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智能写作的社会影响及其伦理、法律问题”。闭幕式上,笔者就曾谈及“作为生产要素的语言数据”问题。^①2020年5月17日,那顺乌日图领衔成立“东北亚语言资源数字化平台”,笔者作为平台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主任寄语”中指出:“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如同土地之于农民,机器之于工人,计算机通过对语言数据的加工学习可以获得知识与智能,从而去创造人类的新生活。”《光明日报》2020年7月4日第12版,刊载李宇明《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一文,这是中国的重要媒体首次发表语言数据是生产要素的观点。^②

(二)语言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文化和信息的最为重要的负载者,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建构者和阐释者。所以,不仅语言数据是“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而且语言也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

语言与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经济学把语言看作人力资本,语言能力是重要的劳动力,特别是智力为主的劳动岗位,尤其是服务产业,语言能力是比体力更为重要的劳动力。^③语言能力薄弱或有语言障碍的人群,常常会形成社会贫困群体。

^①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推进智能写作健康发展宣言》,第二届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2019年12月17日。

^②李宇明:《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光明日报》2020年7月4日。

^③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王海兰:《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王海兰:《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2期;赵颖:《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经济动态》2016年第1期。

语言不仅是如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系统”,语言也是“知识”的载体。^① 知识学习需要通过语言,知识储备需要脑神经语言系统的运作,知识的运用与创造也主要是通过语言。就技术而言,语言技术本身就是技术的一部分,特别是以信息化为主的现代语言技术,在技术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越是智能化的技术,越是与语言的关系密切;各技术门类的名词术语、各个产业的技术规范,都是用语言制定、表现出来的,用语言进行传授的;语言对于技术的扩散与创新,也具有很大影响。语言与“管理”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因为语言能力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管理能力的体现;管理的具体实施,几乎离不开语言。

语言与“土地、资本”仿佛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张振兴在2018年9月“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所作的《汉语方言资源应用随想》报告,揭示了语言与资本流动的关系,说明语言也是一种投资环境^②:

1.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87年数据:香港地区投资内地,65%资金流向珠江三角洲地区,12%流向潮汕地区;台湾地区投资内地,78.9%资金流向福建,闽南地区占其48%。

2. 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7》报告,福建省实际利用外资,2015年为768,339万美元,2016年为819,465万美元,其中来自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外资2015年占68.9%,2016年占64.5%。反向投资情况也大致如此,福建省对外投资,2015年是128,640万美元,其中投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为72.43%。

3. 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中国向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流量为1302.7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6.4%;其中对香港的投资为1142.3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87.7%;对东盟10国的投资为102.8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7.9%。

张振兴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语言原因:中国香港地区与珠江三角洲言语相通;中国台湾地区与闽南地区同言同语;东南亚地区,尤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到处都有说闽南话的华人华侨,福建人在那里做生意很少有语言障碍。

语言与各生产要素都有密切关系,既是多个生产要素的构成部分,又是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重要助力,甚至是基础条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语言智能水平的不断提高,语言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会越来越清晰,语言对各生产要素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

三、语言智能与人类的三元空间

语言智能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让计算机拥有人类的语言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人类智能主要表现在思维能力上。语言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凭借,是思维成果贮存、传播的载体,故而语言能力决定着思维水平。人类自幼成长,通过获取语言促进思维发展,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较好获得自然语言者,如聋哑人,其思维水平便严重受限。人类的书面语学习和外语学习,大大提升了思维品质,掌握了书面语、外语的人比文盲和单语者更具思维优势。尽管学界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还有不少争论,但语言在思维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否认。语言智能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智能,让计算机获取人类的语言智能是人工智能的重要任务。

人工语言智能(以下称为“语言智能”)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20世纪50年代,人类进行机器翻译的尝试,由此开始了训练机器进行语言信息处理的进程。中文信息处理经过字处理、

^①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论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3期。

^②张振兴:《汉语方言资源应用随想》,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议报告,2018年9月19-20日。

词处理阶段的艰难行进,现已顺利步入句处理、篇章处理的话语处理阶段,努力让计算机具有语言智能。^① 这些语言信息技术,促进着信息检索、自动翻译、机器写作、作文自动批改、人机对话等的快速发展。语言智能发展的水平,可以智能写作为例窥其全貌。

(一)以智能写作为例

智能写作可细分为辅助写作和自动写作两类。辅助写作是从素材收集、文章撰写、文本检校三个方面辅助人类写作,提升写作效率,如提供领域热点事件、引文推荐、写作润色、文本纠错、自动摘要等。自动写作是机器自主完成文章写作。2018年6月30日,中国智能写作产业联盟在北京成立,首批理事单位有中国声谷、科大讯飞、金山软件等17家。^② 当时,几乎所有互联网和AI巨头都投入智能写作市场。据分析,智能写作需求最强的有4大市场:内容资讯、金融财经分析、数字营销、行政办公。^③ 下面,从6个方面来描述智能写作的应用情况:

1.新闻智能写作

新闻智能写作的软件,有新华社的“快笔小新”、第一财经的“DT稿王”、今日头条的“张小明”、腾讯的“Dreamwriter”、创作大脑、Giiso、SoccerBot等。新闻智能写作,不仅提供新闻写作的智能机器人,而且结合多种技术,在新闻生产的策划、采编、发稿的全流程中为新闻从业者提供辅助支撑。新闻从业者结合机器撰稿的优势,进行更有创造力的工作。

2.应用文智能写作

应用文智能写作的范围很广,如通知公告、总结汇报、招投标文件、专利文件、规范标准文件等。当前主要的应用文智能写作软件,有微软、金山、搜狗等企业的产品,还有妙笔、世通亨奇、Giiso等。

3.诗歌智能创作

诗歌(包括对联)的创作需具备三大要素:情感表达;字眼搜寻;文句表达。计算机与之对应的技术是:情感计算;语义计算;文本生成。当然还离不开一定规模的语料库。当前较为有名的写诗能手有:清华九歌、微软小冰、薇薇写诗、小封诗歌、春联机等。其中有写古体诗的,有写新诗的,有写春联的。诗歌智能创作仍处在模仿阶段,但所写诗歌常有出人意料之句。诗歌智能创作或将催生新的人工智能门类。

4.小说智能创作

小说智能创作的软件有:壹写作、星达、小蜜蜂、神码AI、捏勺AI、《XXX》写作神器、“狗屁不通”文章生成器等。2016年3月,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的松原仁团队,根据预设内容自动生成了小说《机器写小说的那一天》。这部小说参赛,竟然瞒过了当时的人类评委,成功入围第三届日经新闻社“星新一奖”比赛。“狗屁不通”文章生成器,2019年竟然火遍网络。

5.用户评论

用户评论也可归入应用文智能写作,但因其在今网络上使用广泛,故可以单独立目。这方面的软件有:蓝色光标、Persado、Phrasee、返利机器人、vatti(华帝)小V等。用户评论是应用情感计算,批量生成可定制的评论,通过评论来塑造商品、企业、组织等形象的应用。用户评论往往不

①刘云、肖辛格:《中文信息处理发展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②张俊:《中国智能写作产业联盟成立》,《中国新闻》2018年6月30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702204279770381&wfr=spider&for=pc>。

③北京恒州博智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QYResearch):《2020-2026中国人工智能写作辅助软件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https://www.qyresearch.com.cn/reports/AI_Writing_Assistant_Software-p167680.html。

是真正的用户发出的评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逐步形成灰色产业,对社会生活存在威胁。^①

6. 社交机器人

社交机器人是具有智能写作能力的社交网络账号,以“人”的身份在社交网络中活动,与人进行商务、聊天等社交活动。社交机器人是智能写作技术在语言应用上自主性最强的一种形式,目前集中于商业营销、客户服务、儿童教育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开始涉足政治宣传,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比如选举态度等。

智能写作受制于预设的算法和数据库,具有结构化、模式化、同质化的表现。其语言特点是:字句堆砌复叠,段落连接不畅;数据详尽冗杂,常爱引经据典,行文缺乏生活常识,缺乏情感色彩;长于场景描摹,拙于议论叙事,事实与观点常出现逻辑错位。智能写作尽管离人类写作、阅读习惯还有很大距离,但已经呈现把人类从“笔耕口传”、高创作成本、高传播壁垒中解放出来的曙光。当然,智能写作技术在工商业、公共管理和文化传承等领域不加限制地应用,也将造成现实损失,产生伦理焦虑,因而必须直面智能写作带来的语言不规范、语言暴力、语言偏见、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秩序等问题。^②

(二) 语言的双物种性

机器具有语言智能了吗?这是较难回答的哲学层面的问题。第一,何谓智能?第二,如何判定机器具有语言智能?依照图灵测试原理,会发现机器在许多语言行为上可以“蒙人过关”,达到图灵测试的某种要求,比如机器写的一些新闻、诗歌、小说、用户评论,机器翻译的一些作品等。因此可以说,目前机器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语言智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的语言智能会逐步提升,不断地接近人类。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符号系统,这是语言学家的经典认识。当然,他也有关于动物语言的研究,动物界的确存在信息交换系统,但与人类语言相比,可谓云泥之别。搁置动物语言不论,可以说,语言信息处理之前的语言学,皆把语言看作人类独有的。但是语言智能的发展,使语言已为或将为人类和机器这两个“物种”共同享有。

过去的语言生活,多数都是“人-人”交际,其间一般不使用交际工具。这种“裸装备”的直接的“人-人”交际,现在还在应用,但是重要的语言交际大都采用“人-机-人”交际。其实,“人-机-人”交际是概括的说法,其内涵包括A、B两大类4小类交际模式:

A.“人-机-机-人”交际;B1.“人-机”交际;B2.“机-机”交际;B3.“机-人”交际;A是B的混成,可以分解为“人-机”交际、“机-机”交际、“机-人”交际三个类型。这些交际都离不开具有语言智能的机器,如果这些机器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机器拥有语言智能这一现象,就会看得更为明显。故而,现代的语言学应当把语言看作人与机器两个“物种”所有,是“双物种”的语言学。这是语言学可以超越过往获得大发展的学理基础。

(三) 人类的三元空间

人类形成之前,世界就是自然界,只是一个物理空间。人类的形成与发展,在物理空间中生长出一个社会空间。语言与社会空间一起成长,大约距今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已有较成熟的口头语言,口语的载体是声波。大约距今5,000—5,500前,文字在两河流域产生,语言

^①饶高琦:《给智能写作的快马套上科技伦理笼头》,《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4日。

^②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推进智能写作健康发展宣言》,第二届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2019年12月17日。

有了新载体光波。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出现,有声媒体使语言有了第三大载体电波。20世纪末,互联网商业化,语言信息处理出人意料地快速进步,人类开始建构一个新空间——网络空间。^①

网络空间也常称为“虚拟空间”“信息空间”。称为虚拟空间,是强调其虚拟性质,网名可以再命,性别可以隐匿甚至更换,地点可以主观臆拟。早期,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确有较大不同,由实入虚,如同转世,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脱离现实空间再行塑造。但随着网络实名化措施的实施,随着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加大,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故而有人觉得虚拟空间并不虚,不主张再叫虚拟空间。称为信息空间,是强调这个空间的特性是信息化的产物,主要是进行信息的运行与传播,与信息化时代也很契合。也有专家认为,信息不是某一空间所独有,社会空间也依赖信息,甚至物理世界也需要信息交换,同类动物之间、不同动物之间都有信息交换,同类植物之间有信息,甚至天体之间也存在信息,所以也有专家认为信息空间的名称也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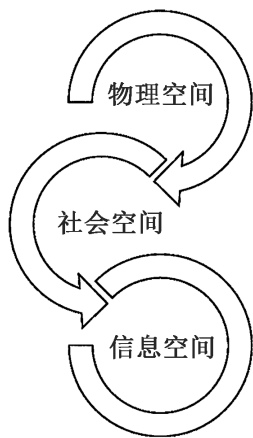


图1 “三元空间”生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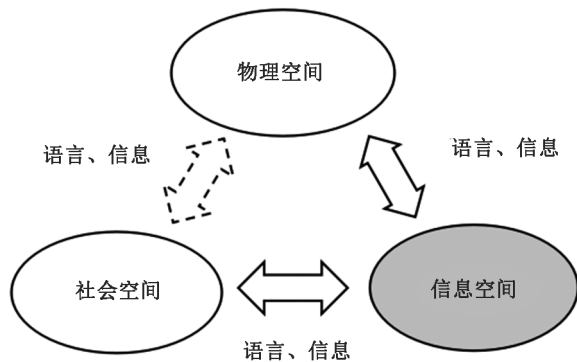


图2 三元空间的语言、信息关系图

名称之争往往伴随着对于“实”的认识分歧。一个新事物的问世常会伴有多个名称,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认识的深化,名称就会逐步约定俗成,固定下来。笔者也曾经使用过虚拟空间等多个名称,这里姑且从众,称之为信息空间。把信息空间独立出人类的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和人类社会并行而立,这便是人类正在生活的“三元空间”,如图1所示。

首先提出三元空间的,就我所掌握的资料看是潘云鹤。2019年11月3日,潘云鹤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人工智能2.0与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人类正由传统的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二元空间,逐步进入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2019年12月,刘挺在“第二届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上也阐述了信息空间的问题。2020年5月,笔者也向赵沁平请教三元空间的问题。对如何看待这个第三空间,赵沁平有他的看法。

总之,信息空间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空间,其结构和运行机理还在被逐步认识中,也还在被逐渐完善中。但有一点相对明确,那就是信息空间主要是被数字化、智能化了的语言空间;除却语言,信息空间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意义。语言过去是在社会空间中使用,如今是在社会空

^①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间、信息空间中使用。语言不仅具有双物种性,而且还具有双空间性。

就发展趋势看,语言并不满足于它的双空间性,它还将跨入物理空间。物联网和语言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只要在需要驱动的目的物上植入语言感应器,人就可以通过具有语言智能的机器与万物关联、与万物对话,使万物具有语言智能,如图2所示。无人驾驶的汽车、轮船、飞机,已经展示了人与物对话的雏形。

四、语言产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语言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语言产品为主的行业。语言产品的形态、语言产业的业态决定着语言产业的基本面貌,是语言产业研究的基础范畴”。当时,把语言产品的形态归纳为七种:语言、文字及相关符号;语言知识产品;语言文字艺术产品;语言技术产品;语言医疗康复产品;语言咨询培训服务;语言人才。当时也指出:“语言产品的形态,还可以有其他描述方式。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语言产品形态。比如,信息化时代,语言数据显得特别重要,机器翻译需要大量的双语数据,机器语言理解需要大数据的训练等。语言数据也可能成为一种语言产品形态。”^①现在看来,的确应有语言数据产品,应有生产这种产品的语言数据行业。

(一)语言数据产业

语言数据产业,是对语言数据进行收集库存、管理经营、加工应用的行业。语言数据产业涉及许多业态,如语言数据的收集、语言数据库的建设、语言数据的云存储、语言数据的计算机应用、语言数据产品的营销、语言数据及其各种规范标准、语言数据产业人才的培养等。这些业态代表着对这一新兴产业的当下认识,其中蕴含并催生着诸多语言数据的职业,通过这些产业和职业,可以生产出各种形态的语言信息产品。

语言数据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有语言意识。需从语言经济学、语言产业经济学等角度看待语言数据和语言产业,看到语言数据、语言数据产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需要市场驱动。自动翻译及前述智能写作的发展,便显示出市场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也有许多制度安排。市场运作需要对语言数据产品进行分类与规范,以便将其货币化。通过市场满足供求关系,实现语言数据作用的最大化和语言数据产业效益的最大化。

比如语料库,现在各有关研究单位几乎都有语料库,甚至每个语言研究课题都有语料库,但是这些语料库基本不能与同行分享,不能与社会共享。个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产权不好确定。语料库收集的都是他人的“语言成品”,或是作家著作,或是网络言论,或是发音合作人的话语,或是使用某种软件生成的语言数据等。语料库制作者即便是免费与同行或社会共享,也可能发生产权官司。

第二,没有统一的语料库标注规范。比如语料库应有哪些元数据、字形规范、词语切分规范、词性标注规范,等等。

一个像样的语料库,其建构成本巨大,但发挥作用有限,他人需要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语料库只是一例,语言数据产业此类问题甚多,亟需研究解决。要建立语言数据产品名录、语言数据产品规范、语言数据产业与市场的法规政策、语言数据职业规范及伦理道德等。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过去的很多规矩都是平面媒体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与失

^①李宇明:《语言产业研究的若干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误是一根藤上的瓜,有创新意识还需有容错意识,能够容错才敢于创新。

语言数据适应计算机应用是重要的学术问题。语言数据与计算机的接口是形式化,形式化是解决语言数据与计算机处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信息时代,网络已经是最为庞大的语言数据库,利用网络获取语言数据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网络数据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集聚,甚至还有机器生产的大量数据。要利用网络数据,就有一个“清洗”的问题,通过清洗去除数据的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偏见以及不良用语。现在,许多数据公司都在数据清洗方面花了不少功夫。

此外,需要明晰语言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语言数据涉及的各方权益。重视语言数据的隐私权,妥善处理语言数据可能出现的隐私泄露问题。

(二)其他语言产业

任何产业都有一定的业态。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导论》是我国最早研究语言产业的著作,该书把语言产业划分为九大业态:(1)语言培训业;(2)语言出版业;(3)语言翻译业;(4)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业;(5)语言艺术业;(6)语言康复业;(7)语言会展业;(8)语言创意业;(9)语文能力测评业。^①可以预见,在数据时代,这些语言产业也会有更浓厚的语言数据意识。

第一,更好地获得语言数据。语言产业的生产往往离不开语言数据,语言数据是许多语言产业的生产资料。比如,语言培训需要教材,教师需要参考资料;自动语言翻译需要双语数据库;语言会展业展出的都是语言产品,其中包括语言数据、语言数据服务等。语言产业的发展,需要利用网络、现代语言信息技术和语言数据市场去更及时、更便利地获取最适合的语言数据。

第二,利用好自己产出的语言数据。语言产业生产的语言产品,有许多就是语言数据。比如辞书,看起来是在编纂一条条词语,其实每个词条都是优质的语言数据,词条整合起来就是某一方面优质的知识系统。这些优质的语言数据,辞书编辑反复加工过,经过最为严格的“清洗”,是训练计算机提升智能的珍贵数据,也是计算机进行知识挖掘的珍贵数据。再如语言教学、语言测试等,都能生成有特殊作用的语言数据,比如经过批改的语言试卷,对于促进机器获取语言智能、促进自动评分技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语言数据并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甚至被丢入废纸堆中。

瑞士语言产业对该国GDP的贡献近10%;我国正值数据可以成为生产要素的时代,语言数据产业将有较大发展,其他语言产业亦可借数据之便,大幅提升经济能量。可以预测,语言产业、语言职业将能够创造更为显著的经济成果,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方重要支柱。

(三)智能“新基建”

2018年12月19—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建设,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此后,新基建的内容不断丰富,面貌也逐渐清晰。

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重视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的建设,能够让数据像交流电、自来水、天然气一样在千家万户奔流。但是,就三元空间的发展前景来看,新基建仅有“联通”是不够的,还需要智能;不仅做到“万物关联”,还要向“万物关联对话”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在新基建中,不仅重视“联通”,还要重视“智能”,重视“对话”,亦即让基建物具有“智能”,特别是应当具有语言智能,以便实现人与万物的关联对话,构建有智能的物联网。

^①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导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具有智能、特别是语言智能的基建,才是名副其实的新基建,为强调起见,或可称为“智能新基建”。如果说目前的“新基建”还主要是为数据、为智能铺设通道,那么,“智能新基建”更看重的是让基建物具有智能,促进“人-机-物”三者的互动,特别是通过语言进行互动。语言交际由“人-人”交际、“人-机-人”交际进一步发展为“人-机-物-人”的更为复杂的交际。在“智能新基建”的思维框架中,语言产业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四)新文科建设

语言已经不仅仅是人文现象,它是“具有声光电三大媒介、为人类与机器两个‘物种’共享、将应用在社会、信息、物理三元空间中”的事物。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也应当是横跨文理工的综合学科,由此可以说,“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①。

201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对其29个专业实行重组,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这反映了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大趋势。我国也在积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很多高校推进“学部制”改革,在体制上实现学科交叉。根据语言的性质,就应当依照“新文科”的思路发展语言学。综合、交叉、融入新技术的语言学,能够更好地适应“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时代命题和经济制度,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推进智能化“新基建”的发展。

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视频会议召开,部署新技术时代高端人才培养问题。会后出台文件,把交叉学科新增为第14个学科门类,说明了对人才进行大交叉、大融合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语言智能是诸多学科的交叉,需要交叉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作支撑,而语言学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应引起学界和学科规划者的重视。当然,新基建和知识经济的谋划者,也应当充分重视语言和语言学,获取语言学的科学红利和社会红利。

五、结语

由于数据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近些年世界各国都在开展“数据行动”。数据的重要性由科学家传递给政府,政府的数据意识由“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把数据看作可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的生产要素。认识到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质,人类就开始进入数据时代。

语言数据主要包括: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负载的信息;由语言延伸的各种符号与代码;生活、艺术与科学技术符号。这些类型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是最为重要的数据,故而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语言还与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具有密切关系。语言及语言数据将成为数据时代的重要生产力。

过去,语言为人类一个物种所独有。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机器逐渐在获取人类的语言智能,“人-人”交际发展为“人-机-人”的混成交际,语言逐渐为人与机器两个“物种”所有。在人类形成之前,世界就只有物理空间。人类的形成与发展,在物理空间中生长出社会空间。而今,人类正在建造出第三空间——信息空间。语言过去只在社会空间中使用,现在是在社会空间、信息空间双空间中使用。随着语言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语言还将跨入物理空间,在三元空间中发挥信息交互作用。数据时代,由于语言数据的数据性质,由于语言与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关系,语言产业会得到更大发展。首先发展的是对语言数据进行收集库存、管理经

^①李宇明:《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1期。

营、加工应用的语言数据产业,其他语言产业也会有更浓厚的语言数据意识,更好地获得语言数据,更好地利用自己产出的语言数据。当前的基本建设是“新基建”,为数据铺设通道,促进万物关联。但仅重视“联通”远远不够,还要让基建物具有“智能”,特别是应当具有语言智能,以便实现人与万物的关联对话,促进“人-机-物”三者的语言智能互动。这种新基建是智能新基建,是新基建的发展方向。

语言学常常被看作是人文科学,而且与“文学”组成一个一级学科。严格来讲,语言学人才是在硕士阶段才开始进行专业培养的。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语言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今天,在语言发展为人与机器“双物种”所有,将在社会、信息、物理三空间中运作的今天,为适应语言智能、语言产业和智能新基建的发展,语言学必须树立“新文科”意识,通过学科交叉培养数据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可以预测,语言产业、语言职业将能够创造更为显著的经济成果。语言学不仅要自觉适应新形势,新基建和知识经济的谋划者也应加强语言意识,像重视数据那样重视语言和语言学问题。

(本文写作得到王海兰、饶高琦的帮助,特此感谢)

Data Age and Language Industry

Li Yu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 data age is marked by viewing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the value of data goes from the realm of science into the real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Language data includes four types: A) symbolic system of language; B) linguistic information; C) various symbols and codes extended by language; D) symbols of life, ar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guage data is the most important from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oints of view, and, therefor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Language industry, including language data industry, will become one of the pillars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language is gradually owned by two “species”, human and machine. Information space is the third space being built by human being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pace,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language will take on the task of “interconnected dialogue of all things”, interacting in the social, informational and physical “triadic space”. The “new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intelligent new infrastructure”. The object of linguistic research should be languages with “bispecies” properties that operate in a “triadic space”. The idea of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foster language talents who will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data age.

Key words: data; language data; language industry; digital economy; production factors; new infrastructure; new liberal arts; triadic space

责任编辑:徐道春

我国非通用语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①}

董希骁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 按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分类,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属于“非通用语”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非通用语服务的需求从政治领域向经贸和人文领域延伸,其产业化趋势愈发明显。由于非通用语产业起步较晚且涉及语种众多,不同语种、不同业态的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供需衔接性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整体规划缺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由政府、学界或行业协会牵头开展供需关系调研;加强评估标准和语料库建设;根据国家战略为非通用语产业发展制定宏观和中观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大局。

关键词: 非通用语;语言产业;供需关系;基础设施;整体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099-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09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语言产业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②,产业形态日渐丰富,市场规模显著扩大,科技含量快速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持续增长。除了业态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之外,语言多样性作为垂直于产业面的第三根轴线,赋予了语言产业“三维发展”的潜力。“民族语言志”网站显示,世界上已知的“活语言”约有7117种。^③按我国学界的定义,除了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之外,其余所有外语均属于“非通用语”^④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语言服务的需求愈发多元,非通用语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对语言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一、我国非通用语产业发展现状

非通用语是人类语言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单个语种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范围有限。与以英语为代表的通用语种相比,非通用语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各业态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极不均衡,不同语种的发展水平也相差悬殊。

(一)产业结构:传统业态占比极高

* 收稿日期:2020-07-19

作者简介:董希骁(1978—),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研究”(AFA14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 陈鹏:《当代中国语言产业发展的三次浪潮》,《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③ 参见“民族语言志”网站:<https://www.ethnologue.com/>。

④ 亦称“非通用语种”,是我国外语教学界为加强教学组织和管理采用的一个概念。参见戴炜栋、胡文仲:《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较典型的语言产业业态包括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创意、语言康复、语言会展、语言能力测评等。^①其中,翻译、培训和出版这三个传统业态与非通用语关联最为紧密,在产业结构中占比极高。非通用语信息处理和语言能力测评近年来有所进展,本文将在第三部分简略提及。其余业态对非通用语的需求尚不明显,本文暂不讨论。

1.语言翻译。翻译是上述业态中最古老的一种,与非通用语相关的活动可追溯到东汉末年的(梵语—巴利语)佛经译介。明代专业翻译机构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的业务涵盖10余个亚洲语种,16世纪葡萄牙人则在澳门开启了葡萄牙语和拉丁语翻译活动。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因缅印战场战事需要加强了南亚和东南亚语种翻译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非通用语翻译需求主要来自政府层面,旨在与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官方往来。由于译员均为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极少从事有偿翻译服务,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产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语言翻译逐渐步入市场化轨道,一些翻译公司将非通用语纳入业务范围,政府部门也开始寻求有偿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我国对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带热了多元化的翻译需求,翻译市场化程度空前提升。

2.语言培训(或称语言教育)。非通用语教育的最初目的即培养翻译人才,元代的回回国子学、明代的四夷馆和清末的同文馆都兼具培训和翻译职能。民国时期,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创了我国南亚和东南亚语种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新中国的非通用语教育主要在本科层次开展,逐渐形成了亚非和欧洲两大语种群。尽管由政府提供的语言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但相关培训费用实际上转由公共财政承担,因此也应被纳入“大语言产业”^②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语种结构日趋完善。截至202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已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其中包括94种非通用语,实现了“开齐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③的战略目标。同年,全国高校共设有非通用语本科专业点578个,其中朝鲜语^④专业数量最多,泰语、葡萄牙语、越南语、意大利语、缅甸语和印尼语次之。47个语种目前仅在北外开设,多为近年新建的非洲和太平洋岛国语种,尚无人才产出。非学历语言培训通常针对两类需求:其一为留学语言培训,主要涉及朝鲜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其二为商务语言培训,主要涉及朝鲜语、葡萄牙语和东盟各国语种。^⑤慕课平台的兴起为更多社会学习者提供了培训机会,例如“北外网课(www.beiwai.com)”目前提供15种非通用语的入门课程,“中国高校慕课平台(moocs.unipus.cn)”的“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专栏则包含意大利语、白俄罗斯语、朝鲜语和泰语课程资源。

3.语言出版。语言类工具书和语言教育类图书是语言出版业的两大主要类别^⑥,此外还有一些图书互译出版项目也可归入此列。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文献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1949—2020年间中国大陆共出版非通用语辞书近400部,其中100余部与朝鲜语相关。同一时期出版

①陈鹏:《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

②李艳:《基于大语言产业观的语言培训业供给侧治理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③其中包括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享有相应地位的“隐性官方语言”。本文涉及的“当前本科专业数量”均以教育部2020年3月公布的数据为依据。

④亦称“韩国语”。本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一称“朝鲜语”。

⑤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简称,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⑥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引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非通用语教材 1350 余部(不含再版),涉及 50 个语种。其中,朝鲜语教材超过 500 部,意大利语教材 150 余部,泰语教材 100 余部,10 个语种仅有一部教材。另有 40 多个语种尚无国内正式出版的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机构是非通用语辞书和教材出版的主力。非通用语图书译介成果丰硕,特别是在 2010 年后,很多优秀作品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下被译为非通用语。近年来,我国通过外交和文化机构,先后与印度(2013)、塞尔维亚(2014)、阿尔巴尼亚(2015)、白俄罗斯(2015)、罗马尼亚(2019)等国签署了图书互译出版协议。出版企业通过多边合作,成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17)、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2018)和中国—东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北部湾国家数字出版基地)(2017),为非通用语出版产业搭建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二)发展水平:不同语种产业成熟度相差悬殊

各语种产业化水平的差异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1)地理位置。我国市场对邻国语种的需求较大,沿边省份在发展邻国语言产业方面享有明显的区位优势。(2)语言地位。非通用语在与国际通用语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例如,非洲共有 54 个国家,本土语种资源丰富,但众多国家将法语(26 国)、英语(25 国)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导致我国对非洲本土语言服务的需求低迷。(3)综合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数据显示,GDP 排名世界前 15 且以非通用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国家依次为意大利、巴西和韩国,我国市场对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朝鲜语的需求因而水涨船高。(4)政策导向。非通用语产业的政策敏感性极强,对象国是否处于“一带一路”沿线,是否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是否被纳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等因素都不容忽视。上述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各语种市场需求和产业成熟度的差异。下面举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1.朝鲜语。在非通用语产业体系中,和朝鲜语相关的产业成熟度最高。朝、韩两国与我国山水相依,双边政治和经贸关系紧密。2019 年,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00 年后,韩国文化产品的大量引进催生了更多类型的语言需求。目前我国朝鲜语本科专业点数量和德语持平,已超过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朝鲜语不仅在翻译、培训、出版等传统业态中一枝独秀,在语言信息处理等新兴业态中也走在所有非通用语前列。

2.东盟 10 国语言。东盟国家均处“一带一路”沿线,与我国接壤或隔海相望,往来频繁。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19 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语言产业建设方面,广西、云南两省的优势明显,不仅在东盟语种翻译、培训等领域形成一定规模,还初步制定了产业规划。例如,广西已将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重点确定为“谋定语言战略,出台语言政策;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优化翻译队伍,保证译文质量;增设汉语培训机构,挑战东盟国际语言秩序;语言产业结构多样化”^①。

3.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我国与这两门语言对象国的贸易潜力巨大。当前,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技术引进来源国,中国则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意大利还凭借免学费政策吸引了众多中国学生,带动了语言培训产业。我国对葡萄牙语的需求有赖于和巴西的经贸关系。当前,巴西是我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则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此外,还有 5 个非洲国家将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两个语种的人才储备相对丰

^①陈玉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广西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5 年第 19 期。

富,但随着双边合作的细化,对语言服务专业化的需求明显提升。

4.中东欧16国^①语言。我国的中东欧语种教育始于1954年,最初以培养外事干部为主要目标。直至本世纪初,中东欧语种服务需求仍主要来自政府层面,相关人才培养单位仅北外一家。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大量中国企业赴中东欧投资、并购,商品贸易日渐繁荣。2012—2020年间,我国高校的中东欧语种本科专业点从14个激增至81个,有望在数量上弥补人才缺口。由于相关语种产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供需对接精密度和服务规范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二、我国非通用语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非通用语产业特点的分析和归纳,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较具普遍性的问题。

(一)供需衔接性差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将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为“服务国家需要”。由于当时对外交往领域有限,“国家需要”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国家政治需要”,没有基于更为广泛的社会需求,从产业视角思考我国的非通用语能力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在西方化浪潮的侵袭下,非通用语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以英语为代表的通用语的严重挤压。除了广西、云南两省因边贸需要,加速发展部分东盟国家语种翻译和培训产业外,大多数非通用语的市场供需低迷。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语的多元化需求才真正显现,供需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

从需求侧看,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非通用语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从供给侧看,人才培养的政策依赖性较强,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迟缓。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非通用语教育规模近年来飞速增长,但人才培养仍集中在本科阶段,毕业生就业时暴露出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事实上,高、低两端的需求难以被通用语种替代,最能体现非通用语的价值:一方面,为体现对他国的尊重,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和综合实力,政府间高层次交往急需高端非通用语翻译人才;另一方面,在跨国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维和反恐、疫情防控等事务中,我方人员需要和外语能力欠佳的对象民众沟通,因此亟需接受基础性的非通用语培训。当前我国在本科层次开设的非通用语专业已近百种,但仅有朝鲜语、泰语、越南语、意大利语4个语种设有翻译硕士(MTI)专业,高端人才培养乏力。与此同时,在非学历教育层面,仅有朝鲜语培训和广西、云南两省的东盟语种培训发展势头较好。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培训具有一定发展潜力,但教学资源不够稳定。社会上对其他非通用语的学习需求大多难以满足,或只能通过私人渠道解决。

(二)基础建设滞后

与美、英、法、俄等国相比,我国的非通用语能力建设基础薄弱,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短板。通过近几年的努力,这块短板在数量上正被补齐,但在质量上依然脆弱,难以承受伴随国家发展而来的巨大压力,且对新兴业态的拓展形成了制约。这种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语言标准缺失。语言培训在所有业态中属于上游产业,通常在产业链中处于人才供给侧,其他业态则处于需求侧。当前,供给侧的准出标准和需求侧的准入标准同时缺失。在专业点数量较少的年代,人才培养质量主要由相关高校自行把关,以学校声誉为其背书。随着专业点数量

^①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2019年希腊正式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但通常不将希腊语视为中东欧语种。

的增加,培养质量问题日益突显。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能够体现国家需要的非通用语能力评估体系,严把人才出口关,已成为相关专业现代化、科学化、标准化建设不容回避的问题。下游语言产业同样需要根据行业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保从业人员资质。高传智、李宇明、张士东等都曾提议设置语言服务准入标准,但此项工作在非通用语产业中的开展极不理想。以翻译产业为例,至今尚无任何一种非通用语进行过全国性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认证。因第三方评价机制缺失,几乎所有翻译公司都只得将应聘者简历或业界的口碑作为鉴别译员水平的依据。由于服务购买方同样缺乏鉴定能力,翻译公司有意使用低水平廉价译员的情况亦不鲜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在我国举办非通用语能力等级考试,并颁发证书。此类现象可能存在两大隐患:其一,语言能力测评是语言产业中极具潜力的业态,国外机构率先抢占市场,可能对我国非通用语的业态拓展形成冲击;其二,国外测试的设计标准与我国的需要并不契合,一些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出入。国外测评标准在业界形成话语权后,可能影响我国的非通用语教育导向。

2. 语料数据匮乏。当前,基于语料库的语言信息处理技术迅猛发展,正在颠覆传统的语言培训和语言翻译产业格局。科大讯飞、中译语通、百度、搜狗、网易等公司推出了各种翻译设备和应用。以讯飞翻译机 3.0 版为例,能够支持中文与 50 余种非通用语实时互译。由于缺乏自主研发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大部分非通用语种在与汉语互译时,需要借助国外机构开发的商用或开源语料库,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不仅翻译效果欠佳,且存在遭遇别国技术封锁的风险,使我国语言信息安全面临威胁。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拥有极大发展空间,非通用语语料库作为该新兴业态的基础,存在诸多空白有待填补。

(三) 整体规划缺失

在本文提及的所有业态中,目前仅有教育部在 2015 年以内部文件的形式,针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属于语言培训产业范畴)制定过初步规划。相关工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高校语种结构的不断完善,国家外语能力大幅提升。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资源使用效率上: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开设非通用语专业、研编教材、资助留学,同时每年都有大批相关专业毕业生因就业渠道狭窄而被迫转行,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将非通用语教育规划纳入更宏观的视角,与语言教育规划的其他分支,以及其他业态规划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设计。我国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考虑到我国海外华侨操说语言的种类,自然外语资源也并不贫乏^①,其中包括大量非通用语资源。随着“汉语热”的兴起,非通用语对象国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数日渐增多。在某些情况下,外籍人士提供语言服务更为便利。因此,在考察非通用语人才供给状况时,需兼顾海外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产业的发展。当前片面强调非通用语教育的人才产出能力,忽略了此类人才具有可替代性,以及下游产业人才储备能力有限的事实。除少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有长期聘用非通用语人才的意愿和能力外,大多数产业部门对非通用语的需求属于短期或应急需求,只想用人不愿养人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说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始终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宗旨,那么非通用语产业规划则需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通过拓展新兴业态、开发潜在业务、盘活人才存量等方式来“丰富国家需要”。

^①文秋芳、苏静、监艳红:《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

三、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调研产业人才供需

造成供需脱节的主要原因在于研判不足,产业规划缺乏依据。有关非通用语人才供给的数据相对丰富,文秋芳领衔建设的“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主持编写的《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类专业建设和发展报告》,以及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中均包含相关信息,但对非学历教育关注不足。需求侧调研起步较晚,语种覆盖面也有待完善。相关成果有戴曼纯对外语人才需求的抽样调查(涉及20多个语种)^①,以及陈玉莲^②、陈颖^③等人对东盟语言产业需求的研究。

非通用语产业涉及语种和业态构成复杂,逐一调研耗时费力且过于琐碎,难以引起规划部门的重视。因此,建议按两种方式考察供需关系:其一是按业态进行跨语种调研,如外语教育界完成的上述数据库和调研报告均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对其他业态而言,开展此类调研的难点在于缺乏权威机构牵头。以翻译产业为例,中国翻译协会鲜有来自非通用语界的会员,与非通用语翻译相关的基础数据至今无从查询。因此,相关从业人员需尽快建立起业内交流机制,创造信息共享条件。其二是按语种或语种群开展跨业态调研,难点在于各行业互不统属,不易找到调研切入点和信息搜集渠道。陈颖^④、郭军^⑤等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采访来自国内外不同产业部门的代表,不失为可供借鉴的思路。

鉴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拥有丰富的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因此需在大语言产业视阈下考察资源配置情况,将提供公益语言服务的政府机构、语言事业单位也纳入语言产业调查与研究的范畴^⑥,并在产业规律的引导下厘清政府和市场、语言事业需求与个体语言需求、语言产业的公益性和营利性这三对关系。^⑦

(二)加快语言基础设施建设

在语言能力标准建设方面,需尽快将非通用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提上日程。借助量表来制订教学大纲、设置课程、编写教材、研发考试,是现代化外语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北美、澳洲和欧洲现已开发各类量表30余种,并在语言教学和测评中得到广泛的应用。^⑧参照2017年公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从条件成熟的语种或语种群入手,逐步研制符合我国价值取向和产业需求的非通用语能力等级量表,不仅是保障培训产业服务质量的迫切需要,还能推动语言翻译等行业准入标准的设立,并促进语言测试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据悉,我国计划于2020年下半年首次举办韩语(朝鲜语)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CATTI),这对于非通用语产业准入机制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①戴曼纯:《我国外语人才需求抽样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期。

②陈玉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广西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19期。

③陈颖:《语言资源理论视阈下广西面向东盟的语言产业发展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陈颖:《对当前我国东盟语言产业市场现状的调查与思考》,《语言产业研究》2018年第1期。

④陈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潜在语言市场研究——基于中国—东盟博览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3期。

⑤郭军、于泽凡:《中国—东盟博览会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问题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⑥李艳:《基于大语言产业观的语言培训业供给侧治理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⑦张日培:《语言政策视角下关于语言产业的若干思考》,《语言产业研究》2018年卷(创刊号)。

⑧董希晓:《研制中东欧非通用语种能力等级量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外语学刊》2019年第3期。

在语料库建设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①、山东大学等高校已经启动了汉外双语或多语平行语料库建设,涉及朝鲜语、越南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罗马尼亚语等非通用语,主要供科研和教学使用。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在中朝双语语料库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科大讯飞等企业目前拥有 20 多个语种的语料储备,正努力补齐语种短板,以期逐步减少对国外数据的依赖,在翻译机等产品上用自主开发的资源进行替代。此外,需从国家语言安全的高度充分重视此项工作,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扶持,同时推动产学研结合,让学界了解产业需求,促进学术成果转化。

(三)将非通用语产业规划纳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大局

按文秋芳拟定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框架,非通用语产业可被归入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的范畴。^②在宏观规划层面,应基于对人才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掌控,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的外语教育、汉语国际拓展、对外话语表述等维度与语言产业结构中的培训、翻译、出版等业态联系起来,提升相关产业部门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促进供需对位。

在中观规划层面,需秉持人才培养与储备、动员并重的理念,在继续加大政策性投入的同时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的调配作用。以高等院校为例,可着力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1)近年来我国高校依托语言优势成立了一系列智库机构。除了履行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职能外,这些智库应加强与产业部门的交流,主动发掘语言服务需求,成为面向全社会的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库。例如 2019—2020 年间,北外罗马尼亚研究中心、保加利亚研究中心针对美国打压华为 5G 技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等热点,多次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疫情防控外语通》在线查询系统于 2020 年 3 月正式上线,旨在为在华来华留学生和外籍人员提供疫情防控和治疗方面的语言服务,现涵盖 30 多个语种。(2)在兼顾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前提下,向校内外开放非通用语课程资源,激发人们学习相关语种的兴趣,挖掘潜在市场需求。例如,北京大学自 2016 年起在全校开设“一带一路”沿线语言课程,涉及 40 余种非通用语,只需 3 人报名即可开班。2020 年抗疫期间,“北外网课”平台向公众免费开放涉及 20 个语种的 300 门课程,非通用语在线学习者人数增长了 10 余倍,充分证明了市场潜力。今后,各高校还需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具体需求,大力加强在职人员非通用语培训。(3)做好语言服务平台的维护和升级工作。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依托北外建立的多语言服务中心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建议将此类机构建设为常态化的应急语言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人员配置,升级技术手段,并针对国际赛事、警务合作、卫生防疫、反恐处突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我国应对重大活动或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结语

世界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最直观体现,非通用语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我国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包容,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大幅提升外语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加强各语种资源的培养、储备和动员能力,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客观需要。国家已从供给侧入手,大力扶持非通用语教

^①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②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 70 年的建设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育产业的发展,其他业态也应积极参与,从实际需求出发为非通用语产业发展制定更为全面的规划。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目前依然是非通用语服务的主要需求方之一,且拥有大量人才资源,但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层次的丰富,“自给自足”的模式已难以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因此,应本着“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原则制定非通用语产业规划,提升决策部门对需求变化的敏感度和产业部门在资源配置中的灵活性。只有在全面调研人才供需关系的基础上完善产业规划,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供需两个层面分别确立准出和准入标准,才能确保非通用语产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Industry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Dong Xixiao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According to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mos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LCTLs)”.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the demand for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s is diversifying, the main use of LCTLs is extending from the political field to the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fields, and its industrialization tren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As LCTLs industry has a late start and involves too many languages, striking gaps have occurred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or different business formats, 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poor supply-demand connectivity”, “lagging infrastructure”, and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commonly exist.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counter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cluding: carrying out researches on supply-demand relation led by the government, academic circles or industry associ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ng standards and language corpora, formulating macro and meso-level plans for LCTLs industry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overall build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Key words: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language industry; supply-demand relation; infrastructure; overall planning

责任编辑:孙昕光

电子银行、金融便捷及家庭消费

——基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①}

臧旭恒^{1,2} 董婧璇²

(1.山东师范大学 国家与区域财富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358;2.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就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选取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银行均对家庭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家庭恩格尔系数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电子银行能够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影响家庭消费。基于异质性消费者角度研究表明,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风险偏好水平、金融知识水平、收入水平及城乡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含义是,提高居民电子银行使用率,特别是在低风险偏好、低收入、低金融知识群体及农村推广电子银行,对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电子银行;金融便捷;家庭消费;异质性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107-1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10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主要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和出口需求拉动模式转变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模式。自2013年至201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50.3%稳步提升至57.8%(如图1)。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十分重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任务要求”。可见,消费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13年至2019年,从消费总量角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32万元逐年上升至2.16万元;从消费结构角度,居民恩格尔系数由31.2%逐年下降至28.2%,传统的食品及衣着等基础类消费需求下降,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及医疗保健等服务性消费需求上升;从消费意愿角度,消费者更加追求消费对象的品质,比如对食品的消费更加注重膳食均衡,对耐用品的消费更加注重智能化和舒适度。这均显示中国居民消费不断优化升级。消费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水平、评估家庭生活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探究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微观家庭仍然受到一定的金融约束。根据2017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6.21%的家庭认为缺乏投资渠道,30.45%的负债家庭对于目前银行提供的

* 收稿日期:2020-08-13

作者简介: 臧旭恒(1953—),男,山东海阳人,山东师范大学国家与区域财富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董婧璇(1990—),女,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17ZDA038)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消费者的界定、行为度量及供需结构有效匹配研究”(71773063)的阶段性成果。

贷款服务并不满意。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包括:贷款期限及贷款方式并不合理、贷款额度无法满足其需求、银行贷款利率过高、贷款办理程序繁琐、贷款审批时间过长等。可以看出,传统金融服务方式仍存在非常大的弊端。随着金融和科技的不断创新,凭借成本低、效率高和覆盖广等特点,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电子银行发展迅速。电子银行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新型金融服务方式,一方面成为传统银行业务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带给金融消费者新的体验。2006年3月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并

对电子银行业务进行定义,其是指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电话银行业务”),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和网络,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自助银行业务”)。由于操作简单、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电子银行广受用户接受,发展十分迅速。如图1所示,中国银行离柜交易额2013年仅为1091.07万亿元,2019年已迅速增长至2057.71万亿元。此外,各大商业银行同时开始“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步伐,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强化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增加电子银行产品种类,实施“瘦身战略”,减少高低柜工作人员数量,撤并低产网点,打造新型银行服务模式。2013年至2019年,中国银行业平均离柜率由63.23%增长至89.77%。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自2013年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如图1)。那么,电子银行是否能够影响家庭消费呢?电子银行是否能够通过为居民带来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呢?传统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是否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呢?进一步来看,在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凸显,这是因为我国属于二元城乡结构,城乡居民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偏好存在着巨大差异。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信息资源和金融资源更为丰富,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更高,更能够有效利用各类金融工具合理规划自身消费。此外,由于消费者风险偏好、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存在差异,消费者对电子银行等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具有差异。因此,研究中国居民消费不能一概而论,应重点关注异质性消费者行为。本文基于异质性消费者角度,研究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机制,这对提高居民消费率,激发居民消费潜力,进而扩大国内内需市场,更好地发挥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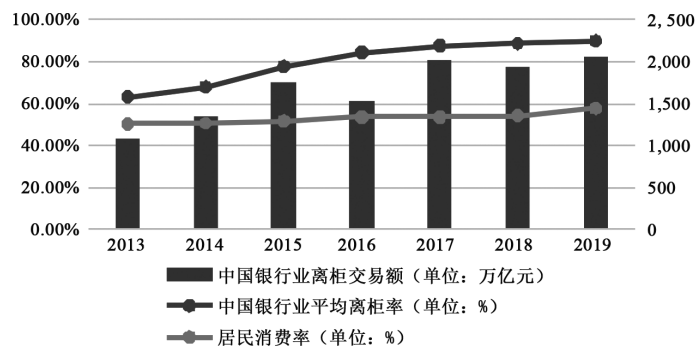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银行业离柜交易额、平均离柜率及居民消费率(2013—2019年)

注:①离柜交易额是指银行离开柜台办理业务交易额;②离柜率是指银行离开柜台办理业务交易额与总业务交易额之比。③数据来源:离柜交易额及离柜交易率均来源于中国银行业协会官网;居民消费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融资模式。^①目前,国内学者采用不同数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②,但将互联网金融与消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国外文献仍较为有限。Francesco (2020)研究发现金融科技 APP 提供的消费信贷功能能够增加家庭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促进家庭购买更多弹性消费品。^③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大多以 P2P 网络借贷平台、众筹类网络投资公司、理财宝类理财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国内有关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理论检验及实证研究较少。互联网金融公司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由于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原因造成的监管不严、金融违约成本低等问题。而电子银行依托于商业银行强大的资本金支持和信用优势,金融风险更低,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学者们从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交易成本、便利居民支付等不同视角出发,探究互联网金融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流动性约束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④,消费信贷业务不仅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⑤,还能够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传统金融市场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⑥,投资者也经常因为抵押品少、贷款额度小等原因被传统金融拒之门外^⑦。而互联网金融能够掌握贷款者全面的信用记录,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提高消费者信贷可及性,激发其信贷需求,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提升消费水平。^⑧从降低交易成本角度,Adams and Nehman (1979)提出传统贷款方式交易成本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需要支付交通费、手续费等各种费用。^⑨互联网金融服务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有多元化的交易平台和交易方式,不仅降低交易成本,还能够拓展消费交易的时间和空间,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⑩从便利居民支付角度,已有文献指出网上购物的广泛性、便捷性及低成本为居民消费提供了广阔的

①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

②王茜:《“互联网+”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的效应与机制》,《财经论丛》2016年第12期;崔海燕:《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1期;郭庆、刘彤彤:《P2P网贷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多重影响效应——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18年第2期;邢天才、张夕:《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倾向变动的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③Francesco D, “Perceived 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s: evidence from Fintech”, NBER working paper, 2020.

④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宋明月:《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与消费行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⑤Jappelli T and Pagano M,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9, No.5, 1989, pp.1088-1105; Williams G and Caporale G.M,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United Kingdom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23, No.2, 2002, pp.177-197;臧旭恒、李燕桥:《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2004-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动态》2012年第2期。

⑥Stiglitz J.E and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1, No.3, 1981, pp.393-410.

⑦Carter M.R, “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 of small farm agricul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28, No.1, 1988, pp.83-103;何明生、帅旭:《融资约束下的农户信贷需求及其缺口研究》,《金融研究》2008年第7期。

⑧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尹志超、张号栋:《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数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

⑨Adams D.W and Nehman G.I, “Borrowing costs and the demand for rural credi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15, No.1, 1979, pp.165-176.

⑩张李义、涂奔:《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化影响——从消费金融的功能性视角出发》,《财贸研究》2017年第8期。

发展空间^①,各类商品信息只需要一键查询,系统即可筛选出匹配消费者偏好的产品,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平台也为居民消费提供便捷通道,两者的结合营造了良好的网上消费环境,加速了居民的消费决策,刺激居民消费。

综上所述,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能够便利居民贷款、便利居民支付及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家庭消费。电子银行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有关电子银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电子银行是否会促进家庭消费呢?是否能够帮助家庭实现消费升级呢?电子银行影响家庭消费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呢?其对具有不同特征家庭的消费是否有异质性影响呢?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相比传统银行贷款,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推出“装修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医疗贷款”等多样化的贷款类别,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贷款需求。此外,电子银行也为贷款需求者提供了便捷的贷款申请方式,“快贷”等一键贷款方式为消费者带来良好的金融服务体验,降低了消费者贷款门槛及往返银行的费用,分期付款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当期购买力,有效缓解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释放家庭日常的消费需求。其次,各大银行推出的“云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能够满足居民随时随地的消费需求,也使居民不再担心现金丢失风险以及为防范风险而付出的成本,加速家庭的消费决策,有效刺激家庭的消费需求。最后,电子银行也为家庭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品种,以及便捷的资产购买方式,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降低家庭的不确定性预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本文也将从便利居民支付、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家庭资产配置多样性三个角度,探究电子银行是否能够通过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的理论机制。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参考凯恩斯的经典消费理论模型设置基准模型,基准模型如(1)式及(2)式:

$$Consumption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Z_i + u_i \quad (1)$$

$$Food_r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Z_i + u_i \quad (2)$$

模型(1)中, $Consumption_i$ 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家庭 i 的年消费支出的对数形式;模型(2)中, $Food_r_i$ 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家庭 i 的恩格尔系数;在(1)式及(2)式中, $E-bank_i$ 表示家庭 i 的电子银行参与程度,衡量指标包括 $join$ (是否开通任意一类电子银行)、 d (开通电子银行种类数目)、 $Internetbank$ (是否开通网上银行)、 $Mobilebank$ (是否开通手机银行)、 $Phonebank$ (是否开通电话银行)、 $Self_service\ bank$ (是否开通自助银行); Z_i 表示控制变量; u_i 表示误差项。

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本文采用加入交乘项的方法探究电子银行对具有不同特征消费者的异质性影响,分别设置模型如下:

$$Consumption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Risk_i + \beta_3 Risk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3)$$

$$Food_r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Risk_i + \beta_3 Risk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4)$$

$$Consumption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Fin_level_i + \beta_3 Fin_level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5)$$

$$Food_r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Fin_level_i + \beta_3 Fin_level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6)$$

^①秦芳、吴雨、魏昭:《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当代经济科学》2017年第6期。

$$Consumption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Rural_i + \beta_3 Rural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7)$$

$$Food_r_i = \beta_0 + \beta_1 E-bank_i + \beta_2 E-bank_i \times Rural_i + \beta_3 Rural_i + \beta_4 Z_i + u_i \quad (8)$$

模型(3)(4)(5)(6)(7)(8)分别研究了电子银行对具有不同风险态度消费者、不同金融知识水平消费者及城乡居民的异质性影响。 $Risk_i$ 代表消费者的风险态度,本文赋值“风险偏好者”为“1”,“风险规避者”为“0”。此外,本文选择“是否上过金融课程”作为金融知识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若户主“上过金融课程”, Fin_level_i 取值为“1”,若户主“没上过金融课程”, Fin_level_i 取值为“0”。最后,本文定义若户主为“农村居民”, $Rural_i$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1个县(区、县级市),1,396个村(居)委会,包括37,289户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等信息,为本文研究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剔除所有核心解释变量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即回答“不知道”或“拒绝回答”样本,经过清理得到25,758个样本量。又由于问卷中某些家庭的消费和收入数据存在异常值,故本文对其进行1%的双边截尾处理,最后得到24,791个样本。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类支出八大类别。CHFS关于家庭消费支出项目包括:食品支出、平均每月水/电/燃料支出、日用品支出(不包括食品、衣着)、家政服务支出、交通支出、通信支出、娱乐支出、衣着支出、住房/装修/维修/扩建支出、暖气费支出、购买家庭耐用品支出、购买奢侈品支出、教育培训支出、购买交通工具及零部件支出、旅游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本文将CHFS家庭消费支出项目按照统计局分类标准划分为八大类,居住类支出包括水/电/燃料支出、住房装修/维修/扩建支出、暖气费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包含日用品支出(不包括食品、衣着)、家政服务支出、家庭耐用品支出;交通和通信类支出包括交通支出、通信支出、购买交通工具及零部件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包括娱乐支出、教育培训支出、旅游支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三类可直接与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一一对应。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家庭电子银行的参与程度。CHFS调查问卷中有关电子银行的问题为:“您家主要使用过/开通了下面哪些形式的银行服务?1.银行网点柜台;2.网上银行;3.电话银行;4.‘村村通’惠农金融服务点;5.手机银行;6.自助银行;7.其他。”根据此问题,如果回答中包含“网上银行”选项,则令变量 $Internetbank$ 等于1,否则等于0;如果回答中包含“电话银行”选项,则令变量 $Phonebank$ 等于1,否则等于0;若回答中包含“手机银行”选项,令变量 $Mobilebank$ 等于1,否则等于0;若回答中包含“自助银行”选项,则令变量 $Self_service$ 等于1,否则等于0。此外,本文形成综合指标 d 和 $join$,分别代表家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数目和是否开通任意一类电子银行。若家庭开通或使用上述四类电子银行中的至少一种,则 $join$ 等于1,否则等于0。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严格地论证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控制不同家庭间的异质性问题,本文设置家庭层面和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户主层面涵盖的变量能够体现家庭户主的个体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金融知识水平、风险偏好、婚姻状况、是否为共产党员;

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所在地区、是否为农村家庭、是否有车、房产数量、户主在本村/城市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个数。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调查样本中,农村家庭占比24.3%,户主平均年龄52岁,仅有24.9%的家庭户主为风险偏好者,有关金融知识问题的答对个数平均为1.14个。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的开通率分别为24.5%、14.6%、5.1%、38.4%,可以看出,自助银行的居民使用率最高,其次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的居民使用率最低。

表1: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onsumption</i>	家庭全年消费总量的对数	24,791	10.706	0.757	8.653	12.866
<i>Food_r</i>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	24,790	0.423	0.238	0	1
<i>join</i>	是否参与任何一类电子银行,“1”表示“是”	24,791	0.479	0.500	0	1
<i>Internetbank</i>	是否参与网上银行,“1”表示“是”	24,791	0.245	0.430	0	1
<i>Mobilebank</i>	是否参与手机银行,“1”表示“是”	24,791	0.146	0.353	0	1
<i>Phonebank</i>	是否参与电话银行,“1”表示“是”	24,791	0.051	0.220	0	1
<i>Self_service</i>	是否参与自助银行,“1”表示“是”	24,791	0.384	0.486	0	1
<i>d</i>	参与电子银行种类数目	24,791	0.827	1.079	0	4
<i>rural</i>	是否为农村居民,“1”表示农村居民	24,791	0.243	0.429	0	1
<i>income</i>	家庭总收入的対数	24,397	10.731	1.288	0	13.461
<i>region</i>	家庭所在地区,“1”表示东部,“2”表示中部,“3”表示西部	24,791	1.724	0.830	1	3
<i>male</i>	户主的性别,“1”表示男性	24,791	0.749	0.433	0	1
<i>age</i>	户主的年龄	24,783	52.036	14.436	3	98
<i>edu</i>	户主的教育程度	24,751	10.009	3.988	0	22
<i>health</i>	户主的健康状况,“1”表示健康	24,675	0.615	0.487	0	1
<i>fw</i>	户主的金融知识水平,答对有关金融知识的问题个数	22,599	1.139	0.922	0	3
<i>risk</i>	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1”表示风险偏好者	23,292	0.249	0.433	0	1
<i>Nohtm</i>	是否为非htm型家庭,“1”表示“是”	24,791	0.505	0.500	0	1
<i>house</i>	家庭的房产数量	22,613	1.500	16.373	0	999
<i>car</i>	家庭是否有车,“1”表示“是”	24,770	0.268	0.443	0	1
<i>relatives</i>	户主在本村/城市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个数	24,739	4.114	2.596	0	7
<i>marriage</i>	户主的婚姻情况,“1”表示已婚	24,774	0.869	0.338	0	1
<i>communist</i>	户主是否为共产党员,“1”表示“是”	23,309	0.208	0.406	0	1

注:①CHFS问卷中涉及户主身体健康状况的问题有两个:“是否有慢性病”和“与同龄人相比,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本文认为第二个衡量标准较为主观,而问卷所指慢性病已涵盖大多数疾病,因此选择“是否有慢性病”作为衡量户主是否健康的标准,“无慢性病”代表身体健康,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②衡量户主风险偏好程度的问题为:“如果现在有两张彩票供您选择,若选第一张,您有100%的机会获得4,000元,若选第二张,您有50%的机会获得10,000元,50%的机会什么也没有,您愿意选哪张?”本文将选择“第二张”的户主视作风险偏好者,取值为1,选择“第一张”的户主视作风险规避者,取值为0。

③衡量户主金融知识水平的问题共有3个,分别考查“利率计算”“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本文以答对问题个数定义金融知识水平,分别赋值0、1、2和3,以表示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得分越高。

④衡量户主教育程度的问题为“被采访者的文化程度”,本文用受教育年限衡量文化程度,“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取值为0、6、9、12、15、16、19、22。

⑤关于户主的婚姻状况,“已婚”取值为1,“未婚”“同居”“分居”“离婚”“丧偶”均取值为0。

(四)内生性讨论

本文模型(1)中,可能会因为双向因果或遗漏变量的原因存在难以克服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家庭在消费的过程中,除了增加对资金量的需求还会增加对资金便利性的要求,家庭开通

电子银行的意愿提高。另一方面,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有很多,除本文的控制变量外,还可能受到家庭对未来预期等一系列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导致电子银行的系数估计有偏误。

为解决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参照 Bucher-Koenen & Luasardi(2011)的方法^①,本文选取家庭所在城市除该家庭以外的平均电子银行开通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如果家庭所在城市除该家庭以外的平均电子银行开通率较高,则该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较快,每户家庭开通电子银行概率也会提高。且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该家庭电子银行开通情况这一单一渠道来影响该家庭消费,满足排他性约束。实证检验部分将会给出相关详细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是否开通电子银行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

表2第(1)列报告是否开通任意一类电子银行对家庭总消费影响的 OLS 估计结果。是否开通任意一类电子银行系数为 0.189,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开通或使用任意类别电子银行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此外,从其他变量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金融知识水平、风险偏好者、已婚、家庭有车及在本村/城市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个数均对家庭总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西部家庭、户主性别男性、年龄及身体健康均对家庭总消费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房产数量和户主是否是共产党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也符合事实逻辑。

OLS 估计因为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所在城市的除该家庭以外的平均电子银行开通率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 Durbin-Wu-Hausman 检验(下称 DWH 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2第(2)列报告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DWH 检验结果显示 p 值为 0.004,拒绝外生变量原假设。此外,第一阶段 F 值为 395.686,超过经验值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IV-2SLS 估计结果表明,是否开通任意类别电子银行的系数为 0.622,在 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无论是 OLS 回归,还是 IV-2SLS 回归,参与任意一类电子银行对家庭总消费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2中(3)(4)列分别报告是否使用任何一类电子银行对家庭恩格尔系数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和 IV-2SLS 回归结果。参照以往文献,并结合第(4)列 DWH 检验结果,发现在此模型中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即 OLS 回归结果是无偏的。OLS 回归结果中,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边际效应为-0.013,说明使用任意一类电子银行能够显著降低恩格尔系数,改善居民消费结构。

(二)家庭电子银行使用广度、总消费及恩格尔系数

为研究电子银行使用广度对总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分别检验家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数目对总消费和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2)列为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著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数目的系数为 0.405,表明在 1%显著性水平下,开通电子银行种类数目越多,家庭总消费水平越高。第(3)列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的系数为-0.014,说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数目能够降低恩格尔系数,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①Bucher Koenen et a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etirement planning in Germany",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10, No.4, 2011, pp.565-584.

表 2:是否开通任意一类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总消费		被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	
	(1)	(2)	(3)	(4)
	OLS	2SLS	OLS	2SLS
<i>join</i>	0.189*** (0.013)	0.622*** (0.157)	-0.013** (0.005)	0.055 (0.046)
<i>rural</i>	-0.198*** (0.020)	-0.142*** (0.025)	-0.091*** (0.007)	-0.082*** (0.008)
<i>income</i>	0.136*** (0.006)	0.119*** (0.009)	-0.007** (0.003)	-0.009*** (0.003)
<i>region</i>	-0.046*** (0.017)	-0.042*** (0.015)	-0.019*** (0.005)	-0.018*** (0.005)
<i>male</i>	-0.043*** (0.015)	-0.037** (0.016)	-0.005 (0.005)	-0.004 (0.005)
<i>age</i>	-0.005*** (0.001)	-0.0003 (0.002)	0.002*** (0.000)	0.003*** (0.000)
<i>edu</i>	0.017*** (0.003)	0.012*** (0.002)	-0.000 (0.001)	-0.001 (0.001)
<i>health</i>	-0.043*** (0.011)	-0.053*** (0.012)	0.026*** (0.004)	0.024*** (0.005)
<i>fw</i>	0.040*** (0.005)	0.017*** (0.010)	-0.002 (0.002)	-0.006** (0.003)
<i>risk</i>	0.041*** (0.012)	0.031** (0.012)	-0.000 (0.004)	-0.002 (0.004)
<i>house</i>	-0.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car</i>	0.422*** (0.016)	0.365*** (0.022)	-0.081*** (0.004)	-0.090*** (0.008)
<i>relatives</i>	0.011*** (0.002)	0.010***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i>marriage</i>	0.135*** (0.018)	0.141*** (0.018)	0.008 (0.007)	0.009 (0.007)
<i>communist</i>	0.004 (0.014)	-0.006 (0.015)	-0.012*** (0.004)	-0.014 (0.005)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39	17,939
F 值/Wald chi2	438.66***	7975.95***	56.98***	872.33***
R2	0.365		0.072	
第一阶段 F 值		395.686***		396.106***
DWH Chi2(P 值)		8.465 (0.004)		2.393 (0.124)

注:表格中汇报的是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不同电子银行类别与总消费

接下来,分别研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对总消费的影响。为准确估计每一类电子银行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本文进行样本清理,剔除参与二类及以上电子银行的样本,得到样本量 6533 个。回归模型中构建三个 0-1 虚拟变量,若虚拟变量 dummy1、dummy2、dummy3 值为 0,表示家庭参与自助银行;若虚拟变量 dummy1 取值为 1,表示家庭参与网上银行,

虚拟变量 dummy2 取值为 1,表示家庭参与手机银行,虚拟变量 dummy3 取值为 1,表示家庭参与电话银行。dummy1-dummy3 的系数分别衡量了使用自助银行的家庭与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家庭的消费差距。从表 4 回归结果来看,相较于自助银行,参与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但电话银行与自助银行在影响家庭消费方面并无显著差距。

表 3:家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总消费及恩格尔系数

被解释变量	总消费		恩格尔系数	
	(1)	(2)	(3)	(4)
	OLS	2SLS	OLS	2SLS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0.105*** (0.006)	0.405*** (0.078)	-0.014*** (0.002)	0.034 (0.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39	17,939
F 值/Wald chi2	458.27***	5902.35***	58.38***	855.29***
R ²	0.369		0.074	
第一阶段 F 值		312.333***		312.267***
DWH Chi2(P 值)		15.355 (0.000)		3.096 (0.080)

注:“Yes”表示模型中已控制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金融知识水平、风险偏好、婚姻状况、是否为共产党员;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家庭所在地区、家庭年收入、是否为农村家庭、家庭房产数量、是否有车、户主在本村/城市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个数等变量,为节省篇幅,表中没有报告,下同。

表 4:电子银行类别及总消费

被解释变量	总消费	
	(1)	(2)
Dummy1	0.298*** (0.024)	0.085*** (0.027)
Dummy2	0.213*** (0.052)	0.107** (0.048)
Dummy3	0.201 (0.096)	0.109 (0.092)
控制变量	No	Yes
样本量	6,533	4,710
F 值/Wald chi2	60.76***	125.48***
R ²	0.0304	0.2511

(四)电子银行与各分项消费支出

为了进一步探究四类电子银行对八项消费支出比例的影响,本文分别将四类电子银行对八项消费支出比例进行回归分析。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开通或使用四类电子银行对居民衣着类支出、日用品类支出、文教娱乐类支出及其他类消费支出比例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于家庭居住类支出、交通通信类支出及医疗保健类支出分项,开通或使用电子银行对这三类消费支出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家庭居住类、交通通信类及医疗保健类等发展型消费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电子银行的使用更能够增加家庭文教娱乐等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有助于居民实现消费升级。进一步分析,在居民衣着、日用品及文教娱乐等支出分项上,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回归系数均大于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可能的解释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使用,更加便利居民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刺激居民增加这三类消费分项的支出。

表 5:电子银行与各分项消费支出

银行种类	Food	Cloth	Living	Daily	Tran/Com	Edu/Amu	Med	Other
网上银行	-0.035*** (0.005)	0.004*** (0.001)	-0.004 (0.003)	0.012*** (0.001)	-0.003 (0.003)	0.024*** (0.003)	-0.004 (0.004)	0.002*** (0.000)
手机银行	-0.039*** (0.005)	0.003*** (0.001)	-0.004 (0.003)	0.012*** (0.002)	0.003 (0.003)	0.018*** (0.003)	-0.002 (0.004)	0.005*** (0.001)
电话银行	-0.042*** (0.006)	0.002 (0.002)	0.001 (0.005)	0.009*** (0.003)	0.002 (0.006)	0.016*** (0.005)	0.003 (0.005)	0.006*** (0.001)
自助银行	-0.003*** (0.005)	0.003*** (0.001)	-0.005** (0.003)	0.002* (0.001)	0.004** (0.002)	0.011*** (0.003)	-0.014*** (0.004)	-0.000 (0.000)

注:探究电子银行对各项消费支出比例的影响问题,若使用 IV-2SLS 回归,DWH 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上述结果均为 OLS 回归结果。

四、机制分析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将从电子银行能够便利居民支付、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家庭资产配置多样性三个角度,探究电子银行通过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刺激家庭消费的理论机制。调查问卷中有关电子银行使用用途的问题分别为:“您家使用网上银行的主要用途是?”“您家使用手机银行的主要用途是?”统计结果表明,家庭使用网上银行的主要用途前三名依次是:网上购物电子支付、账户间转账、向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家庭使用手机银行的主要用途前三名依次是:账户间转账、缴纳各类生活用费、向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可以看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能够改变居民现金交易习惯,便利支付是居民选择使用电子银行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验证电子银行的便利居民支付机制,我们首先探讨电子银行是否能够刺激居民网络购物。前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更能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并且这两类电子银行业务类型覆盖面最广、居民使用频率最高。因此,下文将从电子银行使用广度(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三个角度分别进行考察。表 6 为实证结果,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均能够显著增加消费者网购支出,进而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家庭因为网络支付便利性和网上商品多样性选择网购,而支付便利是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形式实现的。因此得出结论,电子银行能够通过便利支付机制促进居民消费,这也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①

表 6: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影响机制一

被解释变量	网购支出(2SLS)		
	(1)	(2)	(3)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0.331*** (0.109)		
网上银行		1.526** (0.694)	
手机银行			1.039*** (0.4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4,994	4,994	4,994
Wald chi2	948.79***	577.21***	902.61***
一阶段 F 值	76.025***	16.239***	17.849***
DWH Chi2(P 值)	1.632 (0.203)	2.747 (0.099)	2.018 (0.157)

^①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数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

调查问卷中有关消费者享受金融服务成本的问题为:“您估计多少分钟可以到达最近的银行服务机构?”到达最近银行服务机构所需时间越长,则消费者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付出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越高。共有 5,884 个家庭回答此问题,消费者到达最近银行服务机构的平均路程时间为 23.81 分钟。本文按照消费者到达银行服务机构所需时间将样本平均分为 2 组,即高交易成本组与低交易成本组。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低交易成本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依次是 0.135、0.251 及 0.251,而对高交易成本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依次是 0.139、0.337 及 0.335,可以看出电子银行对承受高交易成本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于成本较高的传统金融服务方式,电子银行通过拓展居民消费交易的时间和空间,可降低居民往返银行的交通成本及时间成本,提高居民的金融可及性,进而促进居民消费。

表 7: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影响机制二

家庭收入分组	因变量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的系数	样本量	家庭是否开通网上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家庭是否开通手机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低交易成本群体	总消费	0.135*** (0.021)	2,288	0.251*** (0.048)	2,288	0.251*** (0.060)	2,288
高交易成本群体	总消费	0.139*** (0.030)	2,272	0.337*** (0.087)	2,272	0.335*** (0.102)	2,272

多样化的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因此持有多样化资产配置的家庭能够分散风险,降低其风险预期,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Rowland(1999)指出交易费用的提高会降低家庭投资组合的多样性,投资者持有较少种类资产的原因是由于高昂的信息成本。^①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资产购买渠道,并提供与居民盈利需求、安全需求、流动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提高家庭各类金融资产的可及性,为家庭带来更多能够选择的资产类型,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降低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家庭消费。为验证此作用机制,本文参照 Abreu(2010)的方法^②,通过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种类数目考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问卷中金融资产类型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基金、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非人民币金融资产及贵金属。表 8 给出了参与电子银行对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种类的影响。可以看出,电子银行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降低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家庭消费支出。

五、异质性分析

(一)消费者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电子银行对不同风险偏好消费者的异质性作用,本文赋值“风险偏好者”为“1”,“风险规避者”为“0”,并分别加入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与“风险偏好者”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1)(2)(3)列分别报告了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不同风险偏好消费者总消费的异质性影响,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304、-1.813、-2.319,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电子银行对风险规避者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可能的解释是,风险

^①Rowland P.F,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9, No.1, 1999, pp.145-170.

^②Abreu M and Mendes V,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Quantitative Finance*, Vol.10, No.5, 2010, pp.515-528.

规避者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关注较多,受到粘性效应、习惯效应及耐久效应的影响更大,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规避者消费支出较少。因此,相较于风险偏好者,开通或使用电子银行更能够缓解风险规避者的预算约束,提升其总消费水平。第(4)(5)(6)列分别报告了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不同风险偏好消费者恩格尔系数的异质性影响,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电子银行在促进消费者消费升级方面,风险偏好者与风险规避者并无显著性区别。

表 8: 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影响机制三

被解释变量	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种类		
	(1)	(2)	(3)
电子银行 开通种类	0.357*** (0.072)		
网上银行		1.608*** (0.429)	
手机银行			1.460*** (0.4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40
Wald chi2	1,412.36***	1,212.86***	1,115.65***
一阶段 F 值	312.333***	90.1741***	149.682***
DWH Chi2(P 值)	9.837 (0.002)	11.759 (0.001)	7.402 (0.007)

表 9: 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风险偏好的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总消费(2SLS)			恩格尔系数(OLS)		
	(1)	(2)	(3)	(4)	(5)	(6)
电子银行 开通种类	0.505*** (0.110)			-0.014*** (0.002)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风险偏好者	-0.304*** (0.084)			-0.001 (0.004)		
网上银行		2.526*** (0.592)			-0.036*** (0.006)	
网上银行× 风险偏好者		-1.813*** (0.461)			0.003 (0.009)	
手机银行			2.874*** (0.634)			-0.039*** (0.005)
手机银行× 风险偏好者			-2.319*** (0.549)			0.0002 (0.0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40	17,939	17,939	17,939
F 值/Wald chi2	6,881.05***	3,737.05***	3,746.56***	55.28***	54.24***	59.47***
R ²				0.074	0.074	0.074
一阶段 F 值	231.042***	84.900***	86.207***			
DWH Chi2(P 值)	15.351 (0.0001)	16.675 (0.0001)	26.427 (0.000)			

注:研究电子银行对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均无法通过 DWH 内生性检验,故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仅报告 OLS 回归结果;研究电子银行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DWH 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 p 值均为 0.000,故内生性问题严重,限于篇幅,仅报告 IV-2SLS 回归结果,下同。

(二) 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Cole et al.(2009) & Miller et al.(2009) 指出,金融知识水平会显著影响家庭对金融业务的使用。^① 因此,金融知识水平不同的消费者对电子银行业务的掌握情况也不尽相同。为验证电子银行对不同金融知识水平消费者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选择“是否上过金融课程”作为金融知识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4)(5)(6)列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上过金融课程的家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上过金融课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影响更大,也证实电子银行更能够帮助高金融知识水平群体实现消费升级的结论。可能的解释为,对于高金融知识水平群体,其对电子银行产品及内容的接受程度更高,使用电子银行频率更高、使用范围更广,进而刺激家庭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因此,电子银行更能够帮助高金融知识水平群体实现消费升级。

(1)(2)(3)列显示,对于没有上过金融课程的家庭,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其总消费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低金融知识水平群体对传统金融产品及业务了解不足,风险偏好较低,金融产品投资期限较长,面临更大的流动性约束和信贷约束,使用电子银行能够缓解其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消费。

表 10: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金融知识水平(是否上过金融课程)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总消费(2SLS)			恩格尔系数(OLS)		
	(1)	(2)	(3)	(4)	(5)	(6)
电子银行 开通种类	0.461 *** (0.089)			-0.012 *** (0.002)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上过金融课程	-0.291 *** (0.070)			-0.009 * (0.005)		
网上银行		2.126 *** (0.444)			-0.031 *** (0.005)	
网上银行× 上过金融课程		-1.551 *** (0.347)			-0.022 ** (0.010)	
手机银行			2.359 *** (0.473)			-0.033 *** (0.005)
手机银行× 上过金融课程			-1.948 *** (0.423)			-0.017 * (0.0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449	19,449	19,449	19,448	19,448	19,448
F 值/Waldchi2	6,552.28 ***	3,072.95 ***	4,200.06 ***	77.14 ***	64.85 ***	79.20 ***
一阶段 F 值	277.775 ***	95.459 ***	117.499 ***			
DWH Chi2(P 值)	17.813 (0.000)	19.729 (0.000)	29.239 (0.000)			

(三) 城乡异质性分析

我国属于二元城乡结构,“城市和农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是极为不同的”^②,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显著差异。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更加完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更高,对电子银行等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各类互联网金融工具规

^①Cole Shawn et al., “Price or knowledge? What drives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6, No.6, 2011, pp.1933–1967; Miller et al., “The case for financial lite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moting access to finance by empowering consumers”, World bank, DFID, OECD and CGAP Joint Note, Washington, DC.

^②张宗斌、汤子玉、辛大楞:《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

划自身消费。而农村地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可能会更加固化,因此,电子银行对城乡家庭消费具有异质性影响。如表 11 所示,对于家庭总消费,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分别与农村居民产生交乘项,系数依次为-0.203、-1.242 和-1.540,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对于家庭恩格尔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交乘项系数依次是 0.026、0.058 和 0.077。这说明电子银行更能够显著促进城镇家庭消费和帮助城镇家庭实现消费升级。

表 11: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城市农村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总消费(2SLS)			恩格尔系数(OLS)		
	(1)	(2)	(3)	(4)	(5)	(6)
电子银行 开通种类	0.426*** (0.084)			-0.017*** (0.002)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农村居民	-0.203*** (0.066)			0.026*** (0.005)		
网上银行		1.804*** (0.371)			-0.042*** (0.005)	
网上银行× 农村居民		-1.242*** (0.312)			0.058*** (0.014)	
手机银行			2.055*** (0.388)			-0.046*** (0.005)
手机银行× 农村居民			-1.540*** (0.349)			0.077*** (0.01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40	17,939	17,939	17,939
F 值/Wald chi2	5,337.54***	2,820.12***	2,771.91***	62.85***	60.88***	62.81***
一阶段 F 值	212.886***	88.910***	128.323***			
DWH Chi2(P 值)	15.337 (0.000)	16.933 (0.000)	26.356 (0.000)			

(四)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我们探讨,电子银行对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是否有异质性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样本家庭按照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分为低收入水平组与高收入水平组。表 12 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两组家庭样本,使用电子银行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进一步分析,T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高低收入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且低收入组的三项回归系数均高于高收入组,这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电子银行对总消费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高收入阶层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很大一部分家庭进入高收入阶层,但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中,中低收入家庭仍占据很大比例,收入分配十分不均衡。^① 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受到更大的流动性约束,电子银行不仅能够提供“快贷”等一键贷款业务,也提供装修贷款、汽车贷款、医疗贷款及教育贷款等多种贷款品种,满足家庭多样化的贷款需求,降低贷款人贷款门槛,简化其贷款办理手续,缓解低收入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①臧旭恒、陈斌开、尹志超、汪伟、易行健:《“新冠肺炎疫情与消费”专家笔谈》,《消费经济》2020年第3期。

表 12:电子银行与家庭消费:收入水平异质性

因变量	家庭收入分组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的系数	样本量	T 检验	家庭是否开通网上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T 检验	家庭是否开通手机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T 检验
总消费	低收入	0.119*** (0.009)	8,848	12.91 (0.0003)	0.232*** (0.022)	8,848	8.56 (0.003)	0.274*** (0.026)	8,848	14.79 (0.000)
	高收入	0.081*** (0.006)	9,092		0.158*** (0.015)	9,092		0.158*** (0.016)	9,092	

六、稳健性检验

(一)稳健性检验 1:以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衡量家庭消费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消费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及享受资料。有较多文献也以此为根据将消费行为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及享受型消费。上文仅使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家庭消费结构有一定的局限性。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使用发展型消费占总消费比例及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比例衡量家庭消费结构,进而探究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发展型消费是指消费者以自身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本文发展型消费包括交通支出、通信支出、购买交通工具及零部件支出和教育培训支出;享受型消费是指消费者以自身享乐为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本文享受型消费包括娱乐支出、购买奢侈品支出、旅游支出及医疗保健支出。实证结果如表 13 所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均能够增加家庭享受型消费占比,但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对家庭发展型消费占比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表 13:稳健性检验 1:以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衡量家庭消费消费结构

被解释变量	发展型消费占比			享受型消费占比		
	(1)	(2)	(3)	(4)	(5)	(6)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	0.003** (0.001)			0.005*** (0.002)		
网上银行		0.002 (0.004)			0.018*** (0.004)	
手机银行			0.004 (0.004)			0.019*** (0.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940	17,940	17,940	17,918	17,918	17,918
F 值/Wald chi2	175.06***	174.15***	174.05***	97.42***	94.79***	101.99***

(二)稳健性检验 2:更换风险偏好变量

本文更换风险偏好代理变量,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CHFS 调查问卷中另一关于风险偏好的问题是:“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我们将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视为风险偏好者;将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视为风险中性者;将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项目”“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视为风险规避者。表 14 是关于消费者风险偏好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消费者风险偏好越大,开通电子银行的意愿越大。如表 15 所示,电子银行开通种类、手机银行及网上银行的系数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风险规避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偏好者,这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电子银行对风险规避者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表 14:关于消费者风险偏好的描述性统计

	开通网上银行	开通手机银行	开通电话银行	开通自助银行
风险偏好消费者	49.266%	33.307%	13.78%	52.124%
风险中性消费者	43.925%	25.442%	8.700%	51.933%
风险规避消费者	16.738%	9.292%	3.231%	33.597%

表 15:稳健性检验 2:更换风险偏好变量

	总消费(2SLS)								
	风险偏好者			风险中性者			风险规避者		
	(1)	(2)	(3)	(1)	(2)	(3)	(1)	(2)	(3)
电子银行 开通种类	0.264*** (0.068)			0.422*** (0.146)			0.458*** (0.092)		
网上银行		0.710*** (0.269)			1.890*** (0.715)			2.467*** (0.573)	
手机银行			0.824*** (0.307)			1.807*** (0.614)			2.969*** (0.59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14	1,914	1,914	3,700	3,700	3,700	12,060	12,060	12,060
F 值/Wald chi2	810.04***	819.89***	680.78***	1,556.00***	866.20***	1,081.58***	3,169.23***	1,415.95***	1,579.05***
一阶段 F 值	101.235***	53.031***	63.436***	66.947***	22.153***	32.168***	207.703***	49.143***	71.363***
DWH Chi2(P 值)	5.840 (0.017)	3.040 (0.083)	4.373 (0.038)	7.779 (0.006)	8.930 (0.003)	16.657 (0.000)	15.427 (0.000)	18.487 (0.000)	28.670 (0.000)

(三)稳健性检验 3:以答对金融问题的个数衡量金融知识水平

衡量户主金融知识水平的问题共有 3 个,分别考查“利率计算”“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本文以答对问题个数定义金融知识水平,答对 0、1、2、3 道题分别代表低金融知识消费者、较低金融知识消费者、较高金融知识消费者和高金融知识消费者。表 16 描述了不同金融知识水平消费者开通电子银行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开通各类电子银行的消费者比例也逐渐上升。

表 16:金融知识的描述性统计

	开通网上银行	开通手机银行	开通电话银行	开通自助银行
低金融知识消费者	7.406%	4.453%	1.405%	22.675%
较低金融知识消费者	25.603%	15.043%	5.298%	42.151%
较高金融知识消费者	36.557%	21.750%	7.705%	46.776%
高金融知识消费者	53.597%	32.951%	11.679%	54.745%

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显著提高家庭开通电子银行的比例。进一步检验不同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看其开通或使用电子银行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果是否一样,其研究结果如表 17 所示。对于任何一组样本,电子银行均显著促进家庭总消费,并显著降低家庭恩格尔系数。随着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对恩格尔系数的边际影响逐渐增加,表明电子银行更有助于高金融知识水平群体实现消费升级。

表 17:稳健性检验 3:更换金融知识水平变量

金融知识水平分组	因变量	电子银行开通种类的系数	样本量	家庭是否开通网上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家庭是否开通手机银行的系数	样本量
低金融知识消费者	总消费	0.299 ^{**} (0.137)	4,817	1.536 [*] (0.794)	4,817	2.796 ^{**} (1.207)	4,817
	恩格尔系数	-0.005 (0.006)	4,817	-0.022 [*] (0.013)	4,817	-0.022 (0.017)	4,817
较低金融知识消费者	总消费	0.419 ^{***} (0.077)	6,968	1.694 ^{***} (0.409)	6,968	1.752 ^{***} (0.341)	6,968
	恩格尔系数	-0.014 ^{***} (0.003)	6,968	-0.028 ^{***} (0.007)	6,968	-0.035 ^{***} (0.008)	6,968
较高金融知识消费者	总消费	0.474 ^{***} (0.107)	4,593	2.201 ^{***} (0.538)	4,593	2.296 ^{***} (0.739)	4,593
	恩格尔系数	-0.015 ^{***} (0.003)	4,592	-0.038 ^{***} (0.009)	4,592	-0.043 ^{***} (0.006)	4,592
高金融知识消费者	总消费	0.443 ^{***} (0.083)	1,562	2.157 ^{***} (0.627)	1,562	1.767 ^{***} (0.373)	1,562
	恩格尔系数	-0.015 ^{***} (0.005)	1,562	-0.041 ^{***} (0.012)	1,562	-0.029 ^{***} (0.010)	1,562

(四) 稳健性检验 4:PSM 倾向匹配得分法

本文以是否使用任意一类电子银行作为分组标识变量,利用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匹配得分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核心是尽量用相似特征的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以减少估计偏误。本文以未参与电子银行的家庭作为控制组,参与电子银行的家庭作为实验组,选取基准回归中所有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平均处理效应(the Averag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ATT)则是参与任意一类电子银行家庭的消费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18 所示,可以看出,是否参与任意一类电子银行的系数均为正值,且在 5%水平下显著,说明电子银行能够促进家庭总消费。

表 18:稳健性检验 4:PSM 倾向匹配得分法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 值
最小邻近匹配(1:1)	11.005	10.832	0.174 ^{**}	0.022	7.93
最小邻近匹配(1:2)	11.005	10.830	0.175 ^{**}	0.020	8.94
最小邻近匹配(1:4)	11.005	10.830	0.176 ^{***}	0.019	9.44

七、结论

近年来,电子银行凭借效率高、操作简单、不受时空限制等独特优势迅速发展。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选择工具变量,就电子银行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电子银行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并降低家庭恩格尔系数。基于异质性消费者角度,电子银行对风险规避者、低金融知识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推广电子银行,特别是在低收入、低金融知识群体间推广电子银行,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和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相关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加大电子银行宣传力度,提升居民电子银行使用率。银监会、银行业协会、各大商业银行应加强向消费者宣传有关电子银行的基础知识,减少居民对电子银行业务的安全忧虑。第二,特别

需要关注低收入群体、低金融知识群体和风险规避群体,在开通其电子银行的同时,应教会其使用方法,以提高消费者对电子银行的使用频率。第三,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关注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体验,适当简化电子银行操作流程,完善金融服务,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E-banking, Financial Convenienc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Zang Xuheng^{1,2}, Dong Jingxuan²

(1. Institute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Wealth,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in 2015 to conduc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test on the impact of e-banking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it selects tool variables and uses two-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2SLS) for esti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opening of online banking, mobile banking, telephone banking and self-service bank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while having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amily Engel coefficien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e-banking can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urther affect household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e-banking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risk preference, financial knowledge, income level and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banking, especially in the low-risk preference, low-income, low-financial knowledge groups and rural areas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lifting the level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realizing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Key words: e-banking; financial convenie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责任编辑:王盛辉

卫道、救时与应时:晚清湖湘理学的 学术特色与价值研究*

张晨怡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 评价晚清湖湘理学,需要将其置于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的学术框架之内。晚清时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学术风气发生转变,汉学衰落,理学复兴。晚清湖湘理理学上承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兴起于嘉道,于咸同年间发展到鼎盛。晚清湖湘理学家们不仅重视修史辨学以卫道,更强调义理经世以救时,并注重因应时代,主张有限度地吸纳西学,成为“中体西用”说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而且积极促成了“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但由于在学理上鲜有创新,最终没有改变自身乃至儒学总体衰落的命运。

关键词: 学术史;晚清;湖湘理学;卫道;经世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12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11

清嘉道以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学术风气发生转变,汉学衰落,理学复兴。其中,湖湘地区是晚清时期理学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就时间而言,晚清湖湘理学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主要活动于嘉道年间;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主要活动于咸同年间。至光绪年间则已衰颓,不复成军。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而且积极促成了“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对于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湖湘理学,学界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如陈谷嘉和朱汉民的《湖湘学派源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立新的《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岳麓书社2003年)、朱汉民的《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上述著作为湖湘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均侧重于南宋时期,而鲜少涉及晚清时期湖湘理学的研究。作为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理学自然也被湘学研究者纳入研究范畴之中,如李肖聃的《湘学略》(湖南大学1946年)、朱汉民的《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黄圣旻的《湘学与晚清学术思潮之转变》(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陈书良的《湘学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等。但由于湘学并非凝固的时间概念,南宋时期的湘学虽然可以等同于湖湘理学,然而随着湘学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均发生变化,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所以罗志田说近代湘学“杂而不纯”^②。也正因为此,上述著作对晚清湖湘理学的关注程度与南宋时期的湖湘理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其研究成果也往往比较简

* 收稿日期:2020-07-05

作者简介:张晨怡(1976—),女,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化视野下晚清理学的流变与价值研究”(14YJC770039)的阶段性成果。

② 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略。此外,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昭军的《清代理学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对晚清湖南地区的理学也有论及,但限于体例,着墨不多。专门研究晚清湖湘理学的著作仅有张晨怡的《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集中对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限于研究时段,对嘉道年间的湖湘理学未予详细论述。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晚清湖湘理学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又有一系列专题论文相继发表,但往往侧重于具体人物^①,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现状与晚清湖湘理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亟待学者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有所突破。本文将晚清湖湘理学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对其学术渊源、学术特色、学术地位及价值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

一、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渊源

就文化的传承而言,“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们对某一文化或文学具有浓郁的兴趣,由此培养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反过来促成了某一文化或文学的赓续,使得这种传统继续找寻到传承人”^②。研究湖湘理学,也要首先追溯其地域文化渊源。湖湘理学发端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至湖湘学派出现而正式形成。周敦颐,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代表作为《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基于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并吸收了道教《太极图》的思想,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论哲学。《通书》以“诚”为核心,“诚”既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又是“圣人之本”的道德人格本体,从而将宇宙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终极存在的本体依据。^③周敦颐的著作言辞简约,内蕴丰富,以论纲式的表述为后代理学家留下了十分广阔的引申和发挥的空间。此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号称“理学之邦”,数百年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被尊为“道学宗主”,是湖湘地区后辈学人“自豪乡曲”“绍休前人”的主要对象。^④

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阵营中的一个学术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等。他们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形成、发展以及主要学术、教育活动皆在湖南一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湖湘学派。^⑤它是湖南地区形成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在湖湘理学的建构过程中居于十分重要、显著的地位。湖湘学派在研治学术的同时,还创办了多所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教育基地。胡安国、胡宏隐居衡山一带时,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院、道山书院;张栻在长沙传播理学时,主要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基地;张栻的弟子创建了湘乡的涟滨书院、湘潭的主一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等。在当时,这一庞大的书院群作为湖南的理学学术——教育中心放射着巨大的能量,使湖南成为理学极盛之地。湖湘学派于南宋末年消亡以后,这些书院延续湖湘理学学统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著名的岳麓书院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兴学不辍,其他如城南书院、涟滨书院、碧泉书院、文定书院等也都得以延续,特别是在清朝办学更盛。

① 相关论文主要研究晚清时期湖湘理学人物,如:乐爱国:《唐鉴与钱穆“朱子学案”的结构异同分析》,《求索》2013年第3期;罗检秋:《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张晨怡:《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范广欣:《刘蓉的“门户之见”与理学家的经世观念》,《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综论晚清湖湘理学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

② 李宗刚:《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综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 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④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⑤ 陈谷嘉、朱汉民:《湖湘学派源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湖湘学派推崇程朱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通过书院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学风,对湖南的后代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明中后期心学兴盛,还是清乾嘉时汉学风行,湖湘地区的大部分学人都始终尊奉理学学统,并注意把理学与经世之学、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少有空疏之弊。

清嘉道以后,理学呈现出复兴态势,湖湘地区更是涌现了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多位理学之士。他们均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罗典,不仅自身尊崇理学,而且努力传播理学,为湖湘理学继南宋之后再度活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唐鉴,湖南善化人,为学笃守程朱,力辟陆王,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国朝学案小识》《省身日课》等。唐鉴官至太常寺卿,人亦高寿,弟子众多,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均曾从其问学,影响巨大,堪称晚清复兴理学的宗主。陶澍,湖南安化人,尊崇理学,不废汉学。贺长龄,湖南善化人,“平生笃宗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①。陶澍官至两江总督,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二人位高权重,均不遗余力推广理学。贺熙龄,贺长龄之弟,执教城南书院多年,培育出左宗棠、罗泽南等众多理学之士。欧阳厚均,湖南安仁人,担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以“忠孝廉节,敦品励行”立教,提倡“义理经济之学”,门下著录弟子三千,著名者有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等。胡达源,湖南益阳人,崇奉理学,执教城南书院期间,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著有《弟子箴言》一书,唐鉴、陶澍等曾联名向道光帝推荐该书,以传播理学价值观念。

咸同年间,湖湘地区又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继起,并借助湘军网络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理学群体。他们多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或涟滨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的濡染。以年岁论,则多为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人的后辈,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均深受前者影响。这一时期湖湘理学的核心人物为湘乡曾国藩,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创建湘军,利用师生、同学、宗族、姻亲、同乡等关系,将一大批有着共同学术旨趣和政治观点的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镇压太平天国,投身洋务运动,使湖湘理学爆发出巨大能量。他们撰写、刊刻理学书籍,兴办义学、书院,设立忠义局,修建祠堂,并借助政治军事力量将理学的价值理念推向全国。

二、修史辨学:晚清湖湘理学卫道的两种方式

按照理学的正统观念编修史书,驳斥各种被理学视为异端的学说,是晚清理学复兴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理学自形成以来即有修史辨学以维护圣道的传统,朱熹模仿春秋笔法,编《通鉴纲目》,“辨名分,正纲常”,以宣扬理学正统观念;张载、二程批佛,朱熹更是于佛老之学、陈亮的功利之学、陆九渊的心学等一切所谓异端邪说严加拒斥,无所不辨。延续至明、清两代,理学中修史辨学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特别是晚清以来,社会政治发生严重危机,湖南理学家们更是热衷于秉承理学观念修史,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编修理学学术史,明宗续统,与各种被理学视为异端的学说作斗争,竭力树立理学的学术权威,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时期理学家编著的理学学术史中,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国朝学案小识》始作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全书收录清代前中期学者256人,共14卷,包括《传道学案》2卷、《翼道学案》3卷、《守道学案》4卷及《待访录》2卷、《经学学案》及《待访录》3卷,卷末另附《心宗学案》及《待访录》,列于正文之外,以示排拒。在体例上,《国朝学案小识》借鉴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是一

^①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70页。

部以学案提名的学术史著作。但它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该书以《提要》取代《凡例》,开篇即表明尊朱黜王、扬宋抑汉的著述宗旨,将传主按其对于道统传承的重要性分为五等,编制出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主干的清代学术发展史,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门户之见。

“《清学案小识》在道光中叶的问世,不是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面对汉学颓势的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皆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①因此,《国朝学案小识》成书之后,虽因门户之见深受一些学者的诟病,但还是得到了一大批致力于卫道的理学人士的称许和共鸣。湖南善化人黄倬称该书“正洙泗之坛坫”,“严洛闽之樊篱”,“为斯世扫榛莽,为后学正趋向,为希贤作圣者立一必至之正鹄”。^②受唐鉴影响,云南理学名家何桂珍特著《续理学正宗》,并根据唐鉴的意见,续补清初窦克勤编《理学正宗》遗漏的道学传人,构建出更为完整的理学道统史。

除了编修理学史、分疏学术源流、表彰程朱理学,晚清湖湘理学士人还致力于辨学,从学理上驳斥异端学说。在这些崇尚辨学的理学家的心目中,辨学卫道与经邦治国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辨学卫道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为深远。唐鉴、罗泽南、刘蓉等均“孜孜焉以崇正学、辟异端、正人心、明圣教为己任”。^③其中,罗泽南的《姚江学辨》最具代表性。

罗泽南,湖南湘乡人,除《姚江学辨》外,还著有《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等多部理学著作,是晚清时期理论体系最完整严密的理学家。秉承儒家的传统思维,罗泽南把政治的治乱、朝代的兴替归结为学术的正邪明晦所致,认为“世运之盛衰”系于“道之兴废”^④,如果学术不正,世运必然随之而坏,“生民之祸遂有不可胜诘者矣”。因此要使天下百姓免于丧乱之苦,就必须昌明“正学”、“黜”“俗学”、“熄”“异学”^⑤。对于各种异端邪说,罗泽南按照它们对圣道、对人心危害的轻重缓急,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对于王阳明心学的抨击是最为激烈的。

自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围绕“道问学”与“尊德性”、“即物穷理”与“发明本心”等问题展开争论以后,“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别之间的论辩诘难始终持续不断,特别是在王阳明心学兴起以后,更是如此。明朝程瞳的《闲辟录》、陈建的《学薮通辨》,清初张烈的《王学质疑》、童能灵的《朱子为学考》、陈法的《明辨录》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清中期以后,汉学兴盛,理学式微,程朱陆王之辨一度或息。然而,嘉道以后,沉寂多年的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为了防止陆王心学借势复兴,罗泽南不得不重提程朱陆王之辨。^⑥由于朱熹已经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进行了驳斥,所以罗泽南特著《姚江学辨》一书集中批判阳明心学。

《姚江学辨》著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分为上下两卷,约4万字,从学理上对朱王之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上卷主要依据程朱的“性”“理”至上论批判了王阳明以“心即理”说为核心的心性学说,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否定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在体例上,该书基本上仿照朱熹的《杂学辨》,将王氏著作的原文按照不同问题摘引出来罗列于前,自著按文于后,引文辨文相间而行。

①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81、282页。

②黄倬:《跋》,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③唐鉴:《罗山山西铭讲义序》,《唐鉴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7页。

④罗泽南:《重修濂溪先生墓记》,《罗山遗集》卷五,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19-20页。

⑤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24页。

⑥罗泽南:《与高旭堂书》,《罗山遗集》卷六,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3页。

罗泽南对王学的批判得到众多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湖南理学家唐鉴、关中理学家贺瑞麟等都对《姚江学辨》一书津津乐道。笃守理学的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也说:“陆(九渊)、王(阳明)、陈(献章)三先生行谊、气节、功烈、政绩、忠节大端固皆可为后世师表,至其学之偏弊,则朱子、胡敬斋(居仁)、罗整庵(钦顺)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建)《学郢通辨》、张武承(烈)《王学质疑》、顾亭林(炎武)《日知录》、陈定斋(法)《王学辨》、罗忠节公泽南《阳明学辨》(案:即《姚江学辨》)以及张杨园(履祥)、陆清献(隴其)、张清恪(伯行)、倭文端(仁)、吴竹如(廷栋)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极其明矣。学者分别师法之可也。”^①上述评论虽有一些溢美之词,但也可见《姚江学辨》在辨学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与唐鉴不同,罗泽南批王学并未停留在学术源流的分疏上,而是深入到王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进行学理上的辨析。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他对王阳明的心性学说、知行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驳斥,大有釜底抽薪的味道。可以说,罗泽南批王学,与唐鉴为理学家张目,互为补充,《国朝学案小识》长于历史源流的分疏,而《姚江学辨》长于学理的辨析,相辅相成,于扩大程朱理学的声势、推动其在晚清的复兴极为有益。但湖湘理学家修史辨学的目标不限于推动理学复兴,他们对“道统”建构的背后隐含着更重要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教秩序。晚清理学对“道统”的建构与对“政统”的维护是联系在一起的,晚清理学复兴因此成为集思想与政治为一体的运动。

三、义理经世:晚清湖湘理学救时的主要途径

湖湘理学的经世色彩相当浓厚。早在两宋之际,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即强调以义理说《春秋》,著有《春秋传》,打下湖湘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基调。其子胡宏虽然终生不仕,但始终关心社稷安危,曾写下《上光尧皇帝书》,希望宋高宗能够“正三纲”“行仁政”,其代表作《知言》不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理论体系,而且突显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胡安国养子胡寅不仅是一位理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其立身行事皆以“尊王攘夷”为宗旨。胡宏弟子张栻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其治学、授徒、整军、为政无不强调“经济之学”,最终奠定湖湘学派的经世特色。

有赖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书院群的传承,明清时期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虽一度隐而不彰,但始终不绝如缕。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际,湖湘地区更诞生了一代大儒王夫之。王夫之曾就读于岳麓书院,青年时即关心时政,与同窗好友结成“行社”。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以读经著史表达经世之志,著有《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等约百种,进一步将湖湘理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晚清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清嘉道年间,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社会危机进一步凸显,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②,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他们皆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为山长罗典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罗典,湖南湘潭人,担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期间着意恢复和重建湖湘理学经世学统,为“湘系经世派”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湘系经世派”的核心人物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③,将一大批经世人才聚拢在身边,日“以文章经济相莫逆”^④,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忠实的践行者和有力的推动者。邓显鹤编辑刊刻《船山遗

①方宗诚:《志学录》卷八,清光绪三年(1877)刊本,第31页。括号之内字为作者所加。

②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8页。

③陶澍:《陶澍集》(下),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99页。

④魏源:《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48页。

书》、贺长龄、魏源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都离不开陶澍有力的支持。对此，清流党人张佩伦评论说：“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钰)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①

在嘉道年间“湘经世派”的直接影响下，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湖湘理学士人崛起于咸同年间，使湖湘理学的义理经世特色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出山之前，他们致力于以“礼”化“俗”，通过在家乡讲学施教，力图使地方上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道”的熏陶。在出办湘军之后，他们借助日益强盛的兵威，更将影响扩大到全国。利用宗族制度，恢复社会秩序；改良吏治，维护社会秩序；转变风尚，重塑理学价值观念。^②正如民国哲学家贺麟所评：“在前清咸同年间，清朝中兴名臣如曾涤生、胡润芝、罗罗山三人，均能本程、朱之学，发为事功。”^③

概而言之，晚清湖湘理学顺应了嘉道以来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学术转向，进一步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并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特色。晚清复兴湖湘理学的宗主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中提出要“守道救时”，他说：“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④将“守道”与“救时”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这也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群体立场。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将“经济”从“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中的“义理”独立出来，进一步提出“孔门四科”，强调“义理经济”合一。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⑤对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曾国藩也曾作如下剖析：“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⑥将“内圣”与“外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同等重要。事实上，“内圣外王”虽出于《庄子·天下》，但自儒学诞生以来，就成为儒家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为了应对唐五代以来的精神危机和政治乱象，理学在宋代应运而生，本身就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实践。然而理学发展到后期，很多理学流派往往过于强调心性，将“内圣外王”割裂开来，日益脱离社会政治现实。在晚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刺激下，湖湘理学士人重拾经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征形成了新的学术特色，扩大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依照是否追求“经世”，史革新将晚清理学家划分为以倭仁为首的理学主敬派和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事实上，主敬派与经世派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经世”，而是如何“经世”。理学经世派致力于求强求富，主敬派亦有图强言论，二者也均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并在“同治中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区别在于，主敬派的施政纲领主要为道德论在政治上的延伸，而以湖湘理学士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世派则强化了理学资源中那些长期不被程朱后学重视的内容并有所发展，强调“外王”不能由“内圣”自然生发，而必须脚踏实地地为秩序重建进行知识储备与政治实践。他们以义理经世为救时的主要途径，不仅纠正了理学末流“重内轻外”的弊端，

①张佩伦：《润于日记》已卯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括号内字为作者所加。

②张晨怡：《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贺麟：《五十年来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

④唐鉴：《提要》，《清学案小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⑤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42页。

⑥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

推动了晚清士林讲求经世之学风气的形成,而且身体力行,在军事、政治、文教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晚清湖湘理学家的心目中,经世不仅是政治追求的过程,也是理想的境界,因此他们始终强调对“学统”“道统”“政统”三位一体格局的维护。可以说,经世致用虽非晚清湖湘理学所独有,但其义理经世特色却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既有主张,又有实践,从而与同时期趋向于经世的今文经学、汉学等儒学其他流派显著区分开来。

四、中体西用:晚清湖湘理学对西学的吸纳

理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中国步入近代才开始出现的新命题。关心时务的晚清湖湘士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符合时代需要的回答。与晚清时期一般理学家坚持“夷夏之辨”、完全抗拒西学的传入不同,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湖湘理学士人主张有限度地接受西学,赞同“中体西用”理念。

对于西学这一强势外来文化,倭仁、贺瑞麟、于荫霖等理学主敬派主张一概排斥。“持这种观点的人仍然用传统的‘夷夏之辨’观点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中外形势”,“拒不承认中国有落后于人的地方,不承认西方国家有先进发达之处,甚至连已经成为事实的西方经济科技的先进性也不承认”。^①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同治六年(1867)倭仁反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事件。在奏折中,倭仁写道:“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在同文馆之争期间,倭仁所上奏折虽以倭仁个人的名义呈递,但实际上却是众多理学人士商讨的结果。在论辩期间,倭仁、徐桐、李鸿藻、翁同龢等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对策,“商略文字”。^③可见,倭仁严守“夷夏大防”,代表了理学主敬派的群体立场。理学主敬派的主张,貌似纯正,实际上背离了儒学兼收并蓄的本来宗旨。儒学之所以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始终具有生命的活力,正在于对各家各派思想的不断会通融合。因此,理学主敬派于西学严加拒斥,无异于加速了理学乃至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西学东渐虽然在近代才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但从理学发生过程中追根寻源,理学家应对异质文化,也是有一定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历史上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入主要有两次:一次应对的是佛教,一次应对的是西学。理学之产生,正是为了应对佛教传入并广泛流传以及道教盛行对儒学根基的动摇的挑战。经过一番“出入佛老”的努力,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老思想以弥补儒学思辨性不足的弱点,构建了一个十分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理学家虽无不以佛老为异端,但是理学的哲学体系中却渗透着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晚清湖湘理学之所以在咸同年间大放异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学的吸纳。相对于汉学家,湖湘理学家率先趋于经世,并以经世之学为接引西学的媒介,在知识转型的基础上进行思想转型。可以说,“清末理学家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正是理学的兼容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④。

晚清湖湘理学对西学的吸收融合,最初主要在于对“西技”的学习。曾国藩说:“无论目前资

①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4、165页。

②《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③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557页。

④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0页。

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左宗棠也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②二人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赶超西方。正是基于此种理念,他们纷纷投身到洋务运动的洪流中去,“采西学,制洋器”。而随着与西方接触程度的加深,他们逐渐认识到西学中还有更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③,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取法西方现代政治制度。

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上述言论在当时遭致包括理学主敬派在内的保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抨击。但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坚信,他们对西学的吸纳正植根于理学的内在精神。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中最重要的理论家罗泽南说:“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禹、汤、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尽行者。道无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经济矣。”^④他强调“道无古今,用有古今”,道不可变,用则可因时而变,这正是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理论基础。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学习“西学”,目的是发展“中学”。因此,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他们格外强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即使是汲取西学程度最为深广的郭嵩焘,他的洋务思想也是建立在“理”“势”“情”“几”等理学基本观念基础之上的。在中西思想的激荡中,夷、夏、体、用、学、术、理、势等传统理学概念获得了新的阐释。西学对湖湘理学发生作用,并不一定指那些为湖湘理学所吸纳的部分,形成争论也证明影响已经产生,湖湘理学的思想转型就在此过程中进行。

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对“中体西用”的提倡和实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甲午战争后,“中体西用”还逐渐取代“崇儒重道”,并演化为清政府的文化政策。随着中国学习西方便度的加深,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西化”日渐等同于“国际化”,“中体西用”说由被顽固派斥之为离经叛道,到被革命派斥之为狭隘保守。对此,钱穆的观点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说:“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⑤钱穆对“中体西用”说基本文化内核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正面的评价。

五、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地位与价值

评价晚清湖湘理学,需要将其置于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的框架之内。“清代理学上承宋、元、明,历经近三百年”,“前期兴盛,中期式微,晚期有所复兴又走向衰落”^⑥。晚清湖湘理学初兴之嘉庆年间,理学虽然仍被清政府尊为官方哲学,但是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正如日中天的乾嘉汉学无法相比。道光朝以后,“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得到强化,汉学由盛转衰,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

①曾国藩:《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272页。

②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27页。

③郭嵩焘:《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45页。

④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11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00页。

⑥龚书铎:《绪论》,《清代理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

有力的契机。晚清理学复兴,主要发生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等宋代理学家当年讲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其中,湖南地区宗奉理学的人数尤多,并形成了以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为代表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

在晚清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湖湘理学群体与其他地区的理学人士相比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理学家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以唐鉴为核心,当时在京为官,来自全国各地的理学家如曾国藩(湖南)、倭仁(河南)、吴廷栋(安徽)、吕贤基(安徽)、何桂珍(云南)等都从其问学,一改乾嘉年间京内理学沉寂的局面,京师理学群体正式形成。唐鉴对京师、湖南乃至全国的很多理学士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除了自己致力于编修《国朝学案小识》外,还积极推动其他理学士人进行理学著作的编撰。何桂珍著《续理学正宗》、罗泽南著《西铭讲义》,都与唐鉴有过密切的学术交流。一时间,在道光朝形成了一个修史辨学、传继道统的高潮,这也是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表征。由于对唐鉴“守道救时”说的领悟各不相同,从唐鉴问学的理学士人或强调“守道”,或强调“救时”,最终形成了两种理学治学路向。可以说,晚清理学主敬派、理学经世派均发端于此。主敬派的施政重点在于“正君心”,而以湖湘理学士人核心成员的经世派的施政纲领基于更充分的知识储备更切中时弊,这也体现了晚清湖湘理学重“实政”对清初理学重“实学”的超越。

咸同时期,特别是同治年间,晚清理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以倭仁为核心的理学主敬派在京师多居于高位,以曾国藩为核心的理学经世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也急速扩张,呈现出理学盛极一时的局面。“尽管宗理学者不同于程朱理学本身”,但“宗理学者政治地位的高下一定程度上确又能转移学术风气,体现学术盛衰”^①。理学这一兴盛局面的形成,与湘军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湘军集团不但是一个军政集团,还是一个文化集团,其核心首脑基本由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组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主体,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开掘出理学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并积极将自己的义理经世主张付诸实践。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和“同治中兴”关系密切,互相推动,而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清湖湘理学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在近代大变局中,晚清湖湘理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对此,清末湖南士人曾廉评价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鑫、李续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不谓非正学之效也。”^②

史革新在研究晚清理学时曾指出:“近代社会的发展给传统理学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也迫使这个古老的学派不得不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成功的一面,又有失败的一面”。^③理学虽然在晚清一度复兴,但终如昙花一现。光绪朝以后,在西学的冲击下,理学后继乏人,迅速衰落,湖湘理学也是如此。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核心人物曾国藩病逝于同治十二年(1873),重要成员郭嵩焘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至此,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已经凋零殆尽,影响渐失。此后,湖南地区虽有谭嗣同、杨度等继起光大湘学,但其学术已逸出理学范围,无法用理学涵盖,晚

①张昭军:《清代学术史》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②曾廉:《应诏上封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3页。

③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页。

清湖湘理学中再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究其原因,湖湘理学虽注重因应时代,但由于在学理上鲜有创新,最终没有达到呼唤新生的目的。对于西学,湖湘理学基于经世理念,虽有所吸纳,但时变势易,与宋代理学初兴之时对佛教的包孕再生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反而动摇了理学的根本,加重了民众的思想文化危机。

中国历史上佛教东来并不伴随着武力入侵,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却与船坚炮利相伴而来,可见,晚清中国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佛教于西汉末由印度传入中国,流传日广,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宋代以来佛教则被彻底中国化、儒学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应对佛教的过程中,儒学经过长时间的低迷,本身也如凤凰涅槃般,孕育出理学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晚清中国,国家衰败,社会停滞,西学强势,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困难重重。近代以来,儒学各派面对危机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学术更新,其中以晚清湖湘理学最具代表性,但最终都没有改变自身乃至儒学总体衰落的命运。事实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曲折而漫长,如不过分苛求前人,晚清湖湘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们今天在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充分发挥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Defending the Dao, Saving the Nation and Dealing the Time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Huxiang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Che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o evaluate Huxiang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place it in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the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cial crisis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cademic atmosphere changed;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declined; Neo-Confucianism reviv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xiang Neo-Confucianism was inherited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ounded in Jiaqing and Daoguang dynasties and developed into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in Xianfeng and Tongzh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xiang philosophers not on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to defend the Tao, but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dministering the state affairs to save the nation, and also paid attention to dealing with the times. They advocated a limited absorp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became powerful initia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theory of “making Western things serve China”. They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actively helped bring about the emergence of “Tongzhi Resurgenc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ory, they did not in the end change the fate of themselves, not to say the overall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academic history;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xiang Neo-Confucianism; defend the Tao; administer state affairs

责任编辑:张登德

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逻辑向度^{*①}

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学校制度文化具有显著的育人功能。其育人功能的彰显并非自然而然,也非机械套用,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理路,印证和表征着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在价值论向度、认识论向度、方法论向度和实践论向度上的逻辑关联。这四个向度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互补共进,共同诠释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生成逻辑。洞察、明晰与把握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四维逻辑向度,应确立完善人性的制度文化观,培育制度文化认同心理,实施“引领+参与”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制度文化育人的执行力。

关键词: 学校制度文化;文化育人;逻辑向度

中图分类号: G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13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12

学校是文化的存在,也是制度的存在。学校是制度化的产物。“学校的长处全在于制度,它包括了学校发生的一切事。因为制度才是一切的灵魂。通过它,一切产生、生长和发展,并达到完善的程度。哪里制度稳,那里便一切稳定;哪里制度动摇,那里便一切动摇;哪里制度松垮,那里便一切松垮和陷入混乱;而制度恢复之时,一切也就恢复。”^②作为学校制度的有机组成和具体化,学校制度文化是指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并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办学思想、文化习俗、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等有机组成的规则系统。学校制度文化印证着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品位,彰显着学校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一所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优劣程度,直接关系到学校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力度,进而影响到学校育人的整体效果。学校制度文化“为学校道德教育提供明确、稳定的价值指南,推进道德自由的实现,促进制度规约与道德认同的良性循环,与时俱进地推进育人工作的创新与实践”^③,具有显著的育人功效。这是学校制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之源。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具有深刻的价值逻辑向度、认识逻辑向度、方法逻辑向度和实践逻辑向度。价值论向度指明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方向指南,认识论向度表征着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理论自觉,方法论向度凸显着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实施方式,实践论向度展现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行动轨迹。这四个向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勾勒出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深刻理解和有效把握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多维逻辑向度,进而采取切实行动,预防或消除育人过程中的障碍,涵养制度文化育人的道德旨趣,可以更好地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活动纳入

* 收稿日期:2020-08-18

作者简介:冯永刚(1977—),男,内蒙古察右中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自组织理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研究”(BIA150099)的阶段性成果。

②[捷克]夸美纽斯:《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③冯永刚:《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一、价值论向度:提升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确立完善人性的制度文化观

制度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教育工作者在道德教育中创设制度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需求,服务自身发展,并非为自己的手脚戴上沉重的枷锁或设置樊笼。我们反复强调,制度文化育人的实质是“人化”,学生是道德发展的主体,无限夸大或刻意拔高制度文化的管制功能,在学校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得不到人们的敬重与推崇,反而会给师生们带来痛苦或非难的感受。康德“人是目的”的经典论断,为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离开了人这个道德主体,也就失去了谈论道德或不道德的资格。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制度文本是静态的,如何使其活化,产生应有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考虑和斟酌的。学校制度文化育人作用的彰显并非单纯的外部规范的过程,而是青少年学生积极认同并主动实践的建构过程。“学校制度文化的功能发挥需要经过一个内化过程。”^①偏失这一过程,仅靠外部的强制力量,仅能在一段时间或小范围内起作用,行之不远。因此,无论是制度文化的制定,还是制度文化的实施,均需要调动青少年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深化他们对制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打造合乎其道德需求的制度文化,这样的制度文化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可和自觉遵守。反之,目中无人的或反人类的制度文化,将学生置于被制度文化控制之下的外在存在物,急于求成,以高压或强制的方式要求学生无条件地遵守制度规则,将服从制度规则本身作为目的,其弊端在于将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于人的发展而言,制度规则本身是一种手段,之所以在学校立德树人活动中强化制度规则或纪律教育,其用意在于让制度规则或纪律服务于学生道德的成长而非相反。只有制度规则或纪律合乎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和道德性,方能产生正向意义,推进青少年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倘若制度规则或纪律僭越了人性光辉和伦理道德,制度规则或纪律就成为人的发展的对立物或异化物。“任何一条规范,就其本身而言,都只是在特定的某种约定的条件下必须遵守的……如果规范与做人的要求相背,则本来就不值得尊重;如果它与做人的要求相符,那么,实际上我们所尊重的是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规范。可以说,规范的伦理价值永远是相对的,而人性的道德价值才是绝对的。”^②在制度文化育人的过程中过分注重规训,用高压的、严苛的、僵硬的、死板的规章制度塑造学生,必然扼杀学生的道德探究欲望和创造兴趣,窒息学校制度文化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底蕴。因此,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活动要走出工具化、功利化的泥潭,要强化人文关怀的服务意识,将制度规约与道德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充盈人性,丰富人性,发展人性,实现学校制度文化“为了人”“发展人”“完善人”的目的价值,实现功利教育到人性完满的回归与转变,将学校营建成学生健康成长、自主发展、幸福温馨的乐园,扎实推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理念

学校制度文化并非商品包装上的既定规格与执行标准,我们不能将学校制度文化建设视为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也不能将学生看作流水线上加工出来的产品。“道德的人本意蕴就使之与传统的种种‘非人’的道德观区别开来,为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批判道德和道德教育中的‘无人’状

①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

②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况、确立人本化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①如果只注重外在功利和非人的钳制而不重视人格的培养,当制度文化和学生真实道德生活发生冲突时,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一味地对学生提出强制的道德要求,这种不当范式可能使学生厌恶制度文化,会使他们产生被制度文化和道德欺骗的感觉,进而产生反感甚或抛弃道德的念头,这将会给学校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破坏性的效应,导致制度文化育人活动走向异化,将会遗患无穷。因此,在制度文化创建与执行过程中,应从功利取向转向人文关怀,这在休谟那里也得到了明证。在休谟看来,人并不总是高尚的,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耍滑头、尖酸刻薄、游手好闲等行为,由此提出了“无赖原则”。聚焦于制度文化领域,也要具有“人人可能是无赖的”预设。对制度创设者而言,出自功利的考虑,他们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不合理的但对自身有益的制度,或创设有益于自己的制度。为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从完善人性的高度出发,排除人为的、功利因素的干扰,让制度供给充满并洋溢浓浓的人性关爱,让道德的种子在人们心目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实现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对于功利的、反人的、背离人性诉求的学校制度文化建设,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与理由任其自然发展,对其采取的做法绝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抛弃,坚决予以废止,否则,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必然是隔靴搔痒,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强化公正的或道德的制度文化价值取向

“制度文化在根本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和对待制度的方式。”^②了解了制度设计者所秉持的制度文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把握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精神意蕴,这是推进高标准育人的必然诉求。“人类生存的公正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人本要求问题。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公正,其首要的条件是制度公正。”^③只有公正的或道德的制度才能生成有效的学校制度文化,才能凸显制度的伦理特质与人文管理色彩,焕发学校制度文化在育人过程中的魅力与活力。反之,如果制度本身偏离了公正的或道德的航向,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文化不仅无法促进反而可能成为学生道德发展的羁绊。因此,学校应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与人道关怀的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建设正义的、道德的制度文化,不断地缩小现实制度文化和理想制度文化之间的距离,将其外化为自愿自觉的行为,激励他们不断积极进取,将制度文化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纪律自觉,实现制度他律到道德自律的提升,从而不断推进人性的完善和超越。

二、认识论向度:与时俱进推动制度创新,培育制度文化认同心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要求研究者要不断增强认识的理论自觉,推动认识不断地深入发展。这意味着,任何一项学校制度文化的设计与出台,均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会一劳永逸。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科学技术蒸蒸日上,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青少年的道德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必然要求学校教育对此作出回应。由于新元素的加入,学校制度文化中的一些规章与按部就班的行为已经不能适应青少年学生道德发展的需求,不得不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进而作出应有的调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勃伦指出:“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

① 戚万学、唐汉卫:《现代道德教育专题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② 季革主编:《学校文化自我诊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③ 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保守因素。”^①为此,学校教育工作者要怀有忧患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时代脉搏和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实际,及时掌握知识或信息的主动权,对学校制度文化中陈腐的育人观念和实施机制进行反思性调整,在改造、批判与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新旧更替,不断进行制度建设的自我否定与超越。“作为个人、社会团体制度化的过程,一般是指从不稳定、不严谨、非结构的形式发展为稳定的、有序的、有结构的形式过程,也就是从不明确的结构到明确的结构,从非正式的控制到正式的控制的过程。”^②通过制度文化创新,才能激发造血功能,不断地进行调试、自我修复与充实完善,建立积极向上、科学合理、充满人文气息的学校制度文化,吹响学校制度文化育人与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的时代号角。

在学校育人过程中生成优质的制度文化,要有“碰钉子”的精神和勇气。“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异;并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而思想的顺序则是从他自己以及从他的创造者和他的归宿而开始。”^③为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完全缺失”的制度文化供给。完全缺失的制度文化是一种显性缺失,这是学校在育人活动中完全缺乏某方面的制度供给,致使相关工作无以开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在深入调研和广泛论证的基础上查漏补缺。要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以文化育人和制度育人为航向,以强化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世界为抓手,尽早建立当前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工作中缺失的《学校教育法》《教育投入法》《教育保障法》等相关的制度。二是加强“不完全缺失”的制度文化供给。不完全缺失的制度文化是一种隐性缺失,这是指学校尽管创设了相应的制度,但不全面、不完整、不健全,在实施过程中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在这些方面确实有一些标准,一旦违反它们,就会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这些标准是浮动的、相对的,但是大多数标准都有一些禁区,一旦被侵入,就会给警觉的教育者发出危险的信号。”^④为此,必须加大制度文化的规范和解释力度,使制度文化更具普遍性和实用性,便于理解,易于执行,充分调动师生员工执行制度的自觉意识,用实际行动加以诠释,持续完善与提升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水准,使制度文化育人不再仅仅成为一种口号。

(一) 培育制度文化认同心理

任何一种学校制度文化的构建与运行,都离不开相应的思维基础和心理结构,均存在着一整套认同范式,这就是制度文化的认同心理。因此,欲增强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效果,就必须把加强制度文化的认同作为重中之重。“没有内心认同的制度文化,就不会有有形于外的规范行为的各类有效的制度。”^⑤制度文化认同是对制度的认可、理解和接纳,是制度文化发挥育人作用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学校道德教育活动中,制度文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对制度文化的认同心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合理的制度文化是影响学生道德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而制度文化的认同心理是保证制度文化能够有效贯彻的内在因素。在促进青少年学生道德成长过程中,制度认同尤为重要。“虽然我们可以把马引到水边,却不能迫使它饮水。”^⑥如同面对一个备受饥饿折磨、奄奄一息的人来说,试图引导他树立远大的道德理想是不切

①[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0页。

②陈桂生:《教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③[法]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④[美]约翰·I·古得莱德:《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苏智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⑤车洪波、郑俊田:《中国当代制度文化建设》,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⑥[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实际的一样,如果学生本身对制度文化不感兴趣或是怀有抵触情绪,制度文化的育人功能必然大打折扣。衡量学校制度文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学生是否产生了相应的制度认同心理。制度文化根植于人的内心,决定着人的价值取舍和认知风格,影响着人们对制度的态度以及执行制度的坚定性以及持久性。“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都最终取决于人的生存方式。”^①缺乏深植于内心的制度认可与自觉执行,仅靠外在的规范和强制,制度是不能持久发挥应用功能的。

要实现制度认同的前提是要设计公正的或道德的制度。麦金太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于它们。”^②这在前文已经有所论及,不再赘述。此外,学校制度文化的语言文字表述应简洁明了,周密严谨,经得起反复推敲,力戒运用模棱两可、结构紊乱、有分歧的用语,使师生员工能够清晰地理解制度文本所承载的知识信息,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从而使自己的言行合乎规范。采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表述,这是一个掩盖或堵塞问题的做法,而不是一个真正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教育手段,它必然降低人们的制度认同与接纳心理,易使人心浮动,难以在育人过程中步调一致。

(二)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制度敬畏心理

师生员工的认同是学校制度文化发挥应有育人作用的基本前提。要通过学校网站、广播电台、校报或橱窗等多种传播形式,以及举办报告、主题沙龙或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教育,普及制度文化常识和基本精神,将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道德精神及伦理指向等要素传达给每一位师生,让师生充分意识到制度文化的重要性,在耳濡目染中使制度文化根植于师生的心中。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师生员工知晓,学校制度文化的规约仅是育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基础,而对学校制度文化的共识和自动执行才是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理想目标。学校制度文化的有效运作,能使制度文化焕发应有活力,其最终的结果是形成带有某种倾向性的制度共识,将学校打造成一个规则共守、彼此尊重、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大家庭,这将大大激发师生员工对制度文化的敬畏心理,让他们具有共同的道德理想,增强他们对制度文化的信任度和亲和力。

(三)激发青少年学生自我认同的道德意识

自我认同意味着自尊、自信和自理,能够践行实现自我价值,即拥有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情怀。一个自我人格分裂的人是无法认同学校制度文化的。人是道德的存在,个体的自我认同意味着道德身份的认同^③,抽掉了自我认同这个基本前提,学校制度文化认同必然难以落地。一个人如果缺乏应有的道德修养,即便是道德的制度或正义的制度也难以产生应有的道德约束力,对他也于事无补。在《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一书中,麦金太尔以睿智的语言指出:“只有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如何运用法律。”^④师生员工只有拥有了认同和自信,才会焕发时不待我、学习先进、创优争先的道德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才能排除各种内外困难,不会因为障碍望而却步。对此,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一书中作了形象的比喻:“当严冬的暴风雪在户外咆哮肆虐时,只有信条才能使人感受室内倚炉而坐的安谧舒心。”^⑤由于制度认同贯穿于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各个环节,伴随于制度文化废改立的整个动态发展过

①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②[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2页。

③唐爱民:《吉登斯结构化社会学理论的道德教育意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⑤[英]伯特兰·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程,因此,要将认同与遵守制度文化视为一种习惯养成,深入到青少年学生的头脑,用自我认同的精神激励士气,凝聚力量,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制度文化认同心理,凝聚制度目标共识,形成步调一致的目标愿景、思想境界和道德追求,增强文化自觉与道德自律。

三、方法论向度:民主治校,实施“引领+参与”的治理方式

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活动中,学校采取的方式方法直接制约着师生员工参与制度文化建设的热情。要实行民主管理,要民主治校,形成民主的作风,打破传统固化的、僵硬的管理体制的束缚,为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工作的有序开展排除障碍。以制度文化建设促进学校道德教育工作的长足发展,不是进行强行的压制与操纵,也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要进行批判性理解,用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来讲,就是要通过交往理性来认识事物。学校中层领导集体在制度文化建设中要宏观引领,缜密计划,精心组织,认真运筹,党政群齐抓共管,实施“引领+参与”的治理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职员工参与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加深他们对制度文化的深刻认识、领会和理解,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每一点一滴进步与学校道德教育工作休戚相关,将自己的参与和发展都与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学生、教师、教学团队乃至整个学校不断超越的发展观念,引领学校的道德风气,促进制度规范与道德自主良性互动,优势互补,从而使师生拥有积极的情绪、健康的心态、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断提升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效果。

(一)加强学校的道德领导,打造优秀的领导文化

校长是学校制度文化改革和发展的排头兵,直接关系到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品位和风格。“一般来说,校长的知识、学识、胆识和办学理念往往决定着学校文化品位的高低;校长的精神状态、人格魅力和工作作风往往又决定着学校文化根基的深浅。”^①在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中,校领导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自觉规范自身的言行,从官本位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引领和协调发展的道路,抓内涵发展,坚持人本的、动态的发展观,树立服务的意识和理念,打造优秀的领导文化,用无形的精神力量确保优质的学校制度的生成及有效运作,这也是创办品牌学校所必需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校领导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激活学校的管理活力,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种领导文化会逐步渗透到每一个教职员工的内心之中,会对学校制度文化的贯彻执行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推动他们自觉自愿地落实制度。此外,校长要深入到学生群体之中,就制度建设与道德问题,与学生面对面交谈与沟通,在疏通思想、消解隔阂和形成共识的过程中让他们体验到学校领导的关心或关爱,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不断矫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表现出良好的行为风范。“人不仅要思考,也要行动和关心,教育过程必须超出智力的训练,帮助青年学习如何有效地和负责任地行动。”^②倘若校领导能够持续地、一贯地做出表率,就会督促教师带头执行制度,为学生做出良好的榜样,自然会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成效,受其鼓励与引导,学生就会“上行下效”,逐渐认可与接受制度,逐步养成自觉遵章守纪的文明行为。此种良性循环,有助于促进制度文化育人质量的稳步提升。

(二)创设条件,调动青少年学生参与制度文化建设的自觉性

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使制度文化成为青少年学生内心接纳并积极外化的切实行为。

①赵中建主编:《学校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

②[澳]W.F.康纳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孟湘砥、胡若愚主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学生的参与意识是否得到充分的尊重或保障,是影响学生参与制度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学生之所以缺乏参与制度文化建设的热情,就在于制度文化没有深入他们的内心,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同。因此,制度文化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这是制度文化发挥育人作用的根本条件,也是优质制度文化形成的基本保障。“一个参与性民主制度有利于扩展其参与者对他们从事的事业的理解,并鼓励他们在决策中发挥道德上的自觉性,从而达到对参与者进行教育的目的。”^①因此,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过程中,要赋予青少年学生在校制度文化制定过程中应有的参与权与表达权。青少年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必须落实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能体会到创造的意义和做人的意义,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②。《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也指出,要通过具体的事例进行道德教育,尤其是组织学生讨论一些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和法律的难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与看法,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判断与推理能力,提供给他们一把了解学校与社会的钥匙。学校制度文化应适应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文化的育人效能,回归青少年学生朴实的道德生活,从不乱扔纸屑、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遵守交通规则,举止文明等入手,将制度文化育人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润物无声,引导学生学会沟通、学会协助、学会共同生活。对于班级文化制度建设,要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青少年学生的育人原则,贯彻“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基本理念,让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到制度制定中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执行过程中,要赋予青少年学生应有的监督权。拥有了监督权,青少年学生对制度的执行就会变被动为主动,更能激发他们“我是学校的主人”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唯有如此,他们才会真正领会到制度文化的道德蕴涵,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品德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将制度文化设计的权利交还给教师

在工作实际中,学校制度文化无法贯彻落实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领导者在设计制度文化时剥夺了教师的参与权与知情权。这样做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学校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认为学校制度文化或是构成了对他们自由的约束,或是给他们增加了道德负担,因而,不少教师或班主任倍感无助,或疲于应付,或敷衍了事,甚至联合学生对抗学校,如此学校制度文化无法引起他们的积极的心理反应。在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工作中,教师的参与未必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如果忽视教师建设制度文化的参与权或主动权,极易引发育人效果低下的不良状态。因此,在制度文化设计中,要大胆放权,给教师或班主任应有的选择、判断或取舍的权利。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校要对班主任充满信心。我们相信,没有一个班主任愿意把自己的班级管理得越来越差。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引导者、学生的示范者和教育者。学校要为班主任提供更多的参与权利和支持条件,而不是一味地控制他们。班级管理是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有效手段。学生的道德思维、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能力是在班级的各种制度文化的引导下逐步得到发展的。学校要实施民主的方式,结合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民意调查,调动所有教职员参与制度文化育人的积极性,探寻让他们主动融入制度文化的策略,合理配置人、财、物,寓教于乐,打造充溢智慧与活力的共同体,这是发挥制度文化育人功能的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感到幸福工作的成就感,向往道德生活,把制度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有益做法转化为育人的精神食粮,成为学校育人工作发展的动力系统,不断推动学校育

①[英]约翰·怀特:《再论教育目的》,李永宏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②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1页。

人活动向新的台阶迈进。

四、实践论向度:健全运行机制,切实提升制度文化育人的执行力

立德树人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这就决定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不应成为静态的、为了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学术”,一言以蔽之,不能悬而不决,必须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就其呈现形式而言,制度文化本身是静态的,对人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唯有对个体的言行进行规约与引领时,方可彰显其动态属性。“履,德之基也。”(《周易·系辞下》)要切实提升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效果,有效避免学校制度文化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个强有力措施,就是加大学校制度文化的执行力度。执行力不仅是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体现,而且也是活力和效力的表征。衡量一所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程度的标准,并不完全在于学校制度文化本身的健全与否,还必须考虑制度文化是否落到了实处。否则,再先进的制度文化,如果束之高阁,贯彻不力,运作不当,也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制度文化是否得到有效的落实,应以个体是否经常地、稳定地、持续地自觉执行制度为基本准绳,当个体能够始终如一地自觉执行制度时,标志着制度文化的育人功能真正得以贯彻。因此,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就被提上日程。

(一)脚踏实地,从贯彻落实制度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做起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刘备诫其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小事中孕育着伟大,孕育着深刻的哲理与做人的道理?“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所蕴涵的道德合理性在小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福柯深刻地诠释了细节在培养有道德的人的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他认为:“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套技术,一整套办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①因此,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活动中,任何细节都不能掉以轻心,都不能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关注细节,应从小到每一次谈话、每一次备课、每一次活动等做起。一个对细节满不在乎的人是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成果的。因为小事反映着大事,小节体现着大节。在帕斯卡尔看来,一些小事,尽管小得不能再小,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无伤大雅的,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既可以安抚我们受伤的心灵,也可以像一把尖刀,深深地刺痛我们的内心。因此,如果不关注小事和细节,就有可能发展为大事或大节。如果青少年学生不拘小节,认为违规违纪是人之常情,将迟到早退、乱扔纸屑、投机取巧视为不足挂齿的小节,那么,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都会变得无所谓。很难想象,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实践活动中,一个经常迟到早退的人,如何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与爱岗意识?一个乱扔纸屑的人,如何能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又怎样能培养出行言如一、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要将育人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活动中,要依托节假日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育人活动,通过制度化安排,防止形式化、表面化、浅显化,不仅一以贯之,而且要注重实施成效,使之真正发挥应有的育人功能。约定俗成的规范“只有经过大量道德上的训练,儿童才能成为那种制度所计划培养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0页。

的完人”^①。如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组织开展“让雷锋精神落地生根”“学雷锋、献爱心”“寻找身边的雷锋”或“我与雷锋精神同行”等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以雷锋精神为动力,充分发挥雷锋同志勤俭节约、友爱互助、勇于奉献等正能量,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的担当意识和自愿服务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一贯化、规范化,让雷锋精神在校园中蔚然成风;在3月12日的植树节开展以“我为学校添抹绿”“感恩自然,奉献绿色”“共创一片蓝天”“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绿化校园、关爱环境、保护环境与美化生活的生态道德意识,强化对低碳生活的认知,切实感受植树活动和劳动过程带来的愉悦;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展“我劳动、我快乐”“劳动光荣,奉献最美”“我是劳动小能手”“劳动是创造幸福”等主题活动,让学生了解劳动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的意义,树立热爱劳动的观念,尊重劳动人民,爱惜劳动成果,力所能及的事,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奏响“劳动创造幸福”的主旋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开展“国旗下的讲话”“红领巾向党”“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等活动,激发学生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爱国热情,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丰富多彩、趣味横生的课外活动中促进学生道德不断成长。只有为广大学生树立“行动的楷模”“可见的榜样”“十佳学生社团”等激励性的学校制度文化,才能充分发挥同学之间、同伴之间的示范作用,保证示范激励的正确方向,行善的动机和信心的倍增,新的、更高的道德需求随之产生。在这种需求的指引下,青少年学生的道德行为得到了强化,从而激励他们朝着先进的方向奋进,提高了育人效率。

正是在这种长期的、一贯的活动中,弘扬美德,使青少年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对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实干家”,进而焕发道德良知。他们已经不再将遵守制度规范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准则,但我们在判断我们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原则为依据,所以我把这个原则称为良心”^②。

(三)建立健全惩戒制度,尤其是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人们之所以违反道德或行为规则,是为了获得某些收益或好处。在这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分析很有见地。他尖锐地指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③如果将违规的意识与弊大于利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能从思想源头上消除人们违规的动机,预防、减少或消除人们的不道德行为。对于一些极为恶劣的行为,要在曝光的基础上,进行深层的检视,使之产生羞愧或悔恨之意,引导其改过迁善,矫正育人过程中制度文化实施的偏颇,这在福柯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因为惩罚必须以极其严峻的方式将罪行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惩罚也必须对这种‘残暴’承担责任:它必须通过忏悔、声明和铭文揭示残暴。”^④因此,要在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坚定决心,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打感情牌,要捍卫制度的权威,信守道德规则,而不是屈服或顺从某个具体的人,让学生心悦诚服地遵奉制度,不折不扣地将制度文化中的育人要求落实到日常学习和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学以致用。此外,在学校制度文化的贯彻与落实过程中,要强化问责制,对于执行力弱或执行不到位的部门和

①[英]伯特兰·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②[法]卢梭:《爱弥儿》(下卷),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56页。

③[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3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1页。

人员进行问责。要规范办事程序,彻底舍弃“人治”的流弊,执行制度时应不顾情面,照章办事,一视同仁,不能以任何借口特殊对待,以此调动师生员工遵守道德规则的主动性,使之自觉自愿地恪守各种规章制度,将践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自觉行为,将育人行为落到实处,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充分发挥学校特定人群的示范或表率作用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在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落实过程中,要发挥学校领导、行政人员或党员干部的“领路人”作用,严格按照学校制度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行,求真务实,不找借口,不寻托辞,带头执行学校的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为其他师生员工遵章办事及内化制度文化增添正能量,最终形成学校校长、行政人员或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上行下效的良好教育格局。此外,班主任也要带头示范,为树立良好的榜样,在常态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追寻不平凡的精彩。作为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教育者和合作者,班主任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班主任带头践行制度文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这种无声的教育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鞭策青少年学生,激发学生天性中至善至美的意识,强化他们的效仿行为,尤其是使之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及时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加强自主管理,久而久之,必将达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美好氛围,将制度文化的育人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Logical Dimension of System Culture Education of Schools

Feng Yongg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System culture of schools has a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functio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chool system culture, which is neither natural nor mechanical, but has its own internal logical idea, confirms and represent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chool system culture in the dimensions of value,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The above four dimensions connecting and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together explain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chool system culture educ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larify and grasp the four-dimensional logic dimension of school system culture educ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system culture view that can perfect personalities, cultivate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cultural identity, implement the “leading & participating” governance approach, and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culture education effectively.

Key words: system culture of schools; educ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logical dimension

责任编辑:张登德

国防电影:困境中的艰难突围

——以电影《壮志凌云》为例*^①

张新英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1936年底,由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壮志凌云》在经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禁映和重审风波后终于化险为夷,获准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部被新华影业公司寄予厚望的“有声革命巨片”不负众望,以其宏大的艺术野心和过硬的制作质量,成为非常时期中国影坛“国防电影”的标志性作品。面对外敌入侵、国将不国的残酷现实,编导吴永刚难忍心中郁积的愤怒与苦闷,他借助一个大众皆能心领神会的“农民保家守土”的血泪故事,向人们发出了“拒盗抗敌”的强烈呼吁,但影片被迫采取的隐晦艺术表达及其上映前后遭遇的禁映风波,则成为彼时国防电影处境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国防电影;《壮志凌云》;禁映;家国隐喻;吴永刚;左翼电影

中图分类号: J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5-0145-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5.013

一、《壮志凌云》的禁映风波

1936年,导演吴永刚由联华影业公司转入新华影业公司,开启了其电影生涯的新阶段。在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的支持下,吴永刚编导了影片《壮志凌云》。影片耗资不菲,演员阵容庞大,集结了金焰、王人美、田方、韩兰根、王次龙、金仑、陈娟娟、周凤文、宗由、章志直、施超、黎明健等十二大明星,并远赴郑州、北平等地拍摄外景,片中涉及的“大厮杀”“大轰炸”等宏大战争场面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上海《申报》刊登的首映广告宣称影片“参加演员二千余人,计耗火药三千余磅,战争场面的伟大,战争炮火的激烈,在国产影坛上树一新纪录”^②。广告宣传虽难免夸张,但《壮志凌云》确乎称得上是一部“耗大量资本!费无数心血!倾全力摄制”^③的巨片。当时舆论盛赞:“国产电影中,能这样切实摄制的,《壮志凌云》确是第一张。不仅它在题材上,出类拔萃,展开了一部时代的电影,而对于一部时代电影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上,如采用伟大的背景,真实的道具,大批的演员,也都能完备。”^④新华影业公司也对这部影片寄予厚望,“以为这样一部片子以金(焰)王(人美)夫妇婚后,初度合作为号召,一定可以有满意收获”^⑤。影片拍摄期间,新华影业公司持续在各大报刊予以宣传推介,为其正式上映作准备。

* 收稿日期:2020-07-15

作者简介:张新英(1979—),女,山东高密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中国电影史再研究”(15FYS008)的阶段性成果。

② 《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1日。

③ 《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2月14日。

④ 《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1日。原文中句号为“句逗”,引用时改为现代汉语的逗号。

⑤ 《认为内容含有宣传抗敌色彩 租界当局禁映壮志凌云》,《电声》1937年第1期。

《壮志凌云》完成后,“试映结果,成绩优异;新华当局对此极度重视,故于本埠金城大戏院,排定大除夕启映,逆料必可轰动一时。而且南京电影检委会也已经检查通过”^①。就在新华影业公司雄心勃勃,欲在电影市场大展身手之际,却接到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纸禁令:“租界当局,前曾集议,凡在租界内,不准任何国家,有侮辱另一国影片开映,换言之,此后所出国片,未便显然含有抗外意义。”^②因此,工部局以影片内容是“针对某国宣传抗敌,煽动民族战争”^③为由,断然予以禁映。若禁令生效,则意味着影片无法在上海租界映区开映,只能转移至内地第二轮影院放映,这对投入摄制费用达“六万元之巨”的新华影业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打击:“上海的收入,本来占全国十分之四的,现在租界一禁映,他们所受的损失因为还有一个元旦在里面,所以至少要少收二三万元。”^④

新华影业公司自然不甘束手就擒,竭尽全力展开斡旋,“向工部局方面据理力争,提出交涉”^⑤,整个中国电影界对禁映一事也极为关注,“认为此风一开,影响非小”^⑥。在新华当局的强烈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答应对影片进行复审,“但工部局小心翼翼,恐怕自己的眼光不够,将邀请日领事馆方面派人到场同观”^⑦。1936年12月28日下午4时,《壮志凌云》死里逃生,获得租界工部局颁发的放映执照,得以如期公映。

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及电影杂志如《社会日报》《东方日报》《铁报》《立报》《电声》《电影周报》《影与戏》等,均对《壮志凌云》被禁的前因后果进行过详细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媒介对租界工部局给出的禁映理由均表达了强烈不满,但字里行间的措辞和表述却颇耐人寻味。兹举几例:

《电影周报》认为影片被禁缘于工部局的“曲解剧意”:

工部局方面所认为抗敌的表演,实在只是一群强盗打家劫舍的强暴行动;这样画面,原是很寻常的,并没有牵涉及于国际的问题;但在过度小心的工部局方面观点之下,他们竟认为是相当严重,不准通过。处于次殖民地的环境中,除了极度愤慨以外,更有何话可说!^⑧针对工部局邀请日本领事馆人员到场审看的行为,《电影周报》讽刺其是为了“推诿责任”:

事情既已被工部局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觉得反正《壮志凌云》里所写的是强盗,也乐得让日人亲自来看看,这里面的强盗,究竟是不是他们?

也许日人看了之后,会哑然失笑吧!像这样与他们不相干的电影,为什么也要劳他一次的驾?

事实最雄辩,它决不会给工部局的曲解而葬送吧!^⑨

《影与戏》杂志亦对工部局将影片“误认为是抗敌的片子”表示了“惊诧”,以几乎同样的措辞对“工部局方面所认为的抗敌的表演”进行了辩解,继而抨击道:

其实工部局方面顾虑及于某国人的关系,未免小心太过,而在情形上也是那么相当滑稽

①渥丹:《〈壮志凌云〉检查的波折》,《电影周报》1937年第1期。

②《新华巨片〈壮志凌云〉:洋大人嘴边一个“不”字……新华损失六万》,《影与戏》1936年第4期。

③《认为内容含有宣传抗敌色彩 租界当局禁映壮志凌云》,《电声》1937年第1期。

④《新华巨片〈壮志凌云〉:洋大人嘴边一个“不”字……新华损失六万》,《影与戏》1936年第4期。

⑤渥丹:《〈壮志凌云〉检查的波折》,《电影周报》1937年第1期。

⑥《新华巨片〈壮志凌云〉:洋大人嘴边一个“不”字……新华损失六万》,《影与戏》1936年第4期。

⑦渥丹:《〈壮志凌云〉检查的波折》,《电影周报》1937年第1期。

⑧渥丹:《〈壮志凌云〉检查的波折》,《电影周报》1937年第1期。

⑨渥丹:《〈壮志凌云〉检查的波折》,《电影周报》1937年第1期。

的,原来,这片子的内容,只是表演一群农人们在守卫自己村庄,抗拒匪众的劫掠;对于某国人方面,绝对找不出有一些儿关系的影子,所以工部局禁映的理由,也只说是“影射”而已,如果照这样疑心见鬼的所谓“影射”的情形,便在租界境内,不准放映;以后真越法(发)不堪设想,而可以牵涉误会的片子,未免太多了。^①

再如,《电声》认为影片“内容是描写一群强盗打家劫舍和地方人士奋力抵抗的故事”,因而“绝无某国人干涉的正当理由”^②;《东方日报》1936年12月24日分别以“《壮志凌云》沪租界检查起波折 打家劫舍的强盗误认为是某国人的侵略”和“谈工部局禁映《壮志凌云》”为题对禁映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言外之意,都在申明影片内容与“抗日”并无联系,暗示影片被禁实乃缘于工部局无中生有的敏感和多疑。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解读《壮志凌云》的文本不难发现,在“一群农人守卫村庄抗击强盗”的故事背后,影片影射日军野蛮入侵、宣传全民抗日的主旨不言自明,因而工部局的指控和禁映,并非缘于“疑心见鬼”的“误会”和“曲解”。正因为蕴含了全民抗日的主张,影片才成为“国防电影”的代表作,而其隐晦的表达策略和遭遇的审查风波,则使其成为“国防电影”彼时处境的典型缩影。

二、国片巨制外衣下的家国隐喻

据编导吴永刚自述:《壮志凌云》常因片名而“被人误解为一部航空剧本”^③,而影片实际讲述的,是“一群被某一种恶势力侵入而作抗战的农民的血泪史,也是一群在青纱帐里或在冰天雪地里作血战的民族英雄”^④。故事开始于1915—1916年间,各种天灾人祸肆虐中国大地,黄河流域的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战火摧毁了农夫老王的家,他的妻子也葬身硝烟之中,老王只得带着年幼的女儿黑妞踏上流亡之路。漫漫旅途中,父女俩目睹一个奄奄一息的妇人病饿而死,留下一个孤苦无依的男孩顺儿。善良的老王把这个比黑妞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带在自己身边,继续流亡。难民们本想去富庶的城市谋生,他们辗转来到北京城,却发现并无容身之处,只能长途跋涉前往冰天雪地的边省求取活路。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农民们把昔日的苦寒之地建成了美丽的家园,他们在村口筑起高台,插上旗杆,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创业成果。但好景不长,省城里强盗横行,农民的土地和家园危在旦夕。顺儿力主抗敌,组织村民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爱慕黑妞的青年农民田德厚与顺儿不睦,不肯听从指挥。打着卖药幌子到村里打探底细的老头趁机挑拨田德厚除掉顺儿,却被田德厚和顺儿识破奸细身份,两人冰释前嫌,并肩作战。在同敌人的对决中,村民伤亡惨重,章胖、韩猴和黑妞相继牺牲。村庄即将失守,田德厚冒死突出重围,跑到邻村请来救兵,自己却伤重而亡。村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用血肉之躯守护着土地和家园。影片结尾,敌人又一次发动进攻,幸存的农民们拿起武器,在激越的号角声中,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的炮火。

从情节来看,《壮志凌云》无疑是一个极为通俗的抗敌故事。与1936年11月上映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费穆导演)“以狼喻敌”的极为隐晦的暗示手法相比,《壮志凌云》剑指日寇、“拒盗抗敌”的吁求可谓相当直白,其隐喻意义不言自明。片中意欲侵占农民土地的“强盗”还未正式亮相,其真实身份却已呼之欲出:打着卖药幌子的奸细以“唱洋戏”的留声机吸引村民,村民

①《新华巨片〈壮志凌云〉:洋大人嘴边一个“不”字……新华损失六万》,《影与戏》1936年第4期。

②《认为内容含有宣传抗敌色彩 租界当局禁映壮志凌云》,《电声》1937年第1期。

③吴永刚:《〈壮志凌云〉导演者言》,《新华画报》1936年第1期。

④吴永刚:《写〈壮志凌云〉的动机及其他》,《新华画报》1936年第4期。

看到留声机上画的狗,认为“洋鬼子顶坏的,这机上不画人听,画个狗听,那么我们听的人都成了狗了”。借村民之口,影片有意引导观众把“顶坏的洋鬼子”和正在省城里“杀人放火强奸无所不为”的强盗联系在一起;强盗们“要的是土地”,而且“这一次的大乱听说早打定了主意”,他们指派奸细暗中打探消息,在隐秘处掩埋了大量武器,喻指敌人的入侵蓄谋已久;华老先生惧怕强盗,说“人家有飞机、枪、大炮”,也意在说明对方并非普通强盗,而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事集团。华老先生建议村民“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要什么就给人什么,暂时得忍耐一下,要不然给你个鸡犬不留,杀身大祸,到那时候也就完了”,反映的正是当时部分国人面对强大敌人的畏惧乃至投降心态;顺儿则反驳道:“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一个中国人!我问你,人家要你的命你给不给?说一句得罪你的话,人家要你的老婆要你的闺女你给不给?再说这块土地吧,哪一块哪一寸,不是几位老人家们一滴汗一滴血开辟出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是我们的地。”顺儿的回应一方面揭穿了侵略者贪婪暴虐的本性,一方面又批判了“唯武器”论者的懦弱和屈从,传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寸土必争的抗战主张。其后,华老先生牲口被抢、身中数刀,意识到一味退让绝没有出路,转而告诫村民们要做好应战准备,临死前还喊着抵抗;老王临终前也叮嘱孩子们“死也要守着这片土地,不要退”,更进一步表明了“抗战到底”的主张。太平庄难以抵御敌人的进攻,田德厚去邻村借救兵,两村曾因地界纷争结下过仇怨,但大敌当前,村民们都意识到“现在不是记恨私仇的时候”,最终加入抗敌队伍。这样的情节设置,无疑是在呼吁所有的抗日力量搁置纷争和恩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除利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富有内涵的台词进行暗示之外,《壮志凌云》也巧妙借用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和物象来隐晦地传达抗日主张。片中的“边省”是一个隐喻空间,对应的无疑是中国东北地区。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序幕,而东三省的相继沦陷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已经沦陷的东北地区便成为正在沦陷的苦难中国的象征。太平村村民欲求平安度日而不得,村口石墩上竖起的旗杆和挂起的国旗,也便成为家与国的象征。当国旗被敌人的子弹打落,平素最胆小怕事的韩猴自告奋勇爬上旗杆,重新挂好国旗,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黑妞中弹牺牲后,她的遗体被顺儿放置于国旗之下的高台上,宛若祭坛一般的高台亦颇具隐喻意义;以韩猴和黑妞为代表的中国人,在国破家亡之际,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祭于抗敌御侮的崇高事业。这样的象征场面,无疑能激发现实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共赴国难的勇气和激情。

为了集中凸显“抗敌御侮”的主题,《壮志凌云》甚至放弃了原本可以被着重描绘的爱情故事:顺儿是太平村最英俊能干的小伙,黑妞是太平村最俊俏迷人的姑娘,两人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却不知彼此并无血缘关系。老王有心揭开顺儿的身世,撮合二人的姻缘,却屡屡被意外事件打断。与此同时,同村青年田德厚喜欢上黑妞,他的妹妹小娇则爱慕着顺儿。按常规影片的故事走向,这样的人物情感关系完全可以演绎出一幕幕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但导演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让老王至死都未能对兄妹二人说出真相,黑妞和田德厚的牺牲更是彻底断绝了爱情故事继续发展的可能。于是,儿女情长最终让位于家国大义,顺儿和黑妞不再是浪漫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而成为家园故国风雨飘摇之际率先觉醒、奋起保家卫国的无数中华儿女的化身。

由此,《壮志凌云》成为一个披着国片巨制外衣的宏大家国隐喻,影片讲述的“村民拒盗抗敌”的表层故事,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深层历史和现实达成了一种绝妙的呼应。影片结尾处,面对已经成为废墟的村庄,有人建议投降,有人提议逃命,顺儿则站在象征着父辈艰辛创

业荣耀的高台之上,大声疾呼:“我们要抵抗下去!敌人还要来的!”而就在《壮志凌云》公映后的半年左右,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顺儿在《壮志凌云》中的这句呐喊,由此成为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宣言。

《壮志凌云》公映后的舆论反响,也足以说明观众明确领会到了影片宣扬抗敌御侮的宗旨和意图。评论界一致认为:影片“以农村为题材,但却处处的表演民生的疾苦,整个民族的被压迫”^①,传达了“要生存唯有战”的主题。试举几例:

例一:《壮志凌云》直接描写抗敌的悲壮场面,比之寓言的《狼山喋血记》更易使观众明瞭。(这并不是说寓言不好,样式是应该多种多样的,好的寓言能够感动观众,正如直接的描写一样,从这二件作品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在恶劣的环境下,即使直接描写抗敌的《壮志凌云》,也不能不以“强盗”,“红枪会”等代替外寇。

……在急迫的敌人的进攻下,只有那些唯武器论者才来反对立刻爆发一个伟大的抗战。个人的利害,这一集团与那一集团的仇隙,都在抵抗共同的敌人的目标下自然而然的融解了。^②

例二:《壮志凌云》所取的题材,据说:虽只是一幕塞外民众抵抗“土匪”的侵略,而且对“土匪”的暴行的描写,也因客观环境的限止(制),采用了较侧面的方法,但不论其究属是否“土匪”,其中显然包含着一个极大的真理,处在“土匪”的铁蹄下,只有一致奋起抗战,才能打开自己的生路,这指示是千万分正确可靠的。中国民族要是想使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除此,还有那(哪)一条路可走呢?^③

例三:它没有伟大的战争场面,布景的装置也时常露出痕迹,但是它有一种说不出的质素,令人感到无限兴奋,那是因为这部片子适合这个国难时期,当它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引起我们许多联想,那村人奋勇拒匪的情形,岂不是东北义勇军浴血抗敌的缩影?……

片中的“匪”,据说是“红枪会匪”,但是银幕上既不见会匪出现,而他们所射发,也几乎全是重磅的炮弹,真正的土匪似乎不该是那么样子,观众也许疑心这是编导者的疏忽,可是进一步的思索你便可以晓得这正是编导者的苦心所在而应该予以原谅的。^④

例四:这里作者是把敌人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来了的,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认出谁是我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这部影片的意义已经很大了,何况它在后面还指示了我们如何去对付敌人。

虽然,在片中,敌人是被指为红枪会的,但是这中间却有一个说不出的隐情,那就是怕片子在租界当局通过的时候,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临时插进去的。知道了这,我们不惟不敢说影片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有佩服他们能够在种种困难之下去想法克服,使影片能公之观众。^⑤

由上述评论可以看出,人们能够明确“意会”到《壮志凌云》对现实的“影射”。因此,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影片的禁映,确非一桩“冤案”。而众多媒体对影片的真实意旨自然心知肚明,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为影片辩护,异口同声地否认影片存在“影射”意图。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姿

①二马:《影评:壮志凌云》,《天文台》1937年第39期。

②《大公报新乐先生评〈壮志凌云〉》,《新华画报》1937年第2期。

③《大晚报叶蒂先生评〈壮志凌云〉》,《新华画报》1937年第2期。

④《〈壮志凌云〉(B下)》,《电声》1937年第2期。

⑤陈毅:《〈壮志凌云〉》,《时代观》1937年第2期。

态和立场,一方面缘于媒体自发维护国产影片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表明《壮志凌云》作为一部反映国难当头之际民族情绪和大众心声的电影,满足了人们对国防电影的热切期盼,契合了人们对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的吁求和呼唤。而它从创作伊始到被禁再到解禁之后的种种遭际,正是国防电影彼时复杂处境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三、国防电影的艰难处境

事实上,早在《壮志凌云》之前,具有抗日内容的国产影片遭遇各种审查和禁映的情况已非常普遍。“早在1932年,对于抗日影片,国民党反动派就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态度相反,采取了百般压制的政策。……反动派对已经摄制、正在摄制或准备摄制的抗日题材影片和电影剧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施行了强迫禁止的手段。早已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地区各电影院放映的《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也被国民党禁止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影院上映了;故事片《东北二女子》公映不久也被禁映,直至经国民党电影检查当局多次检查,大加剪删后,才准予再次上映(租界内仍禁映)。”^①一些反映抗日的电影剧本被禁止拍摄。为了躲避审查和禁映,许多影片“从内容到片名,都被改动”^②。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内却公然上映鼓吹日本侵华的法西斯影片。

1933年大批左翼电影出现后,国民党和上海租界工部局针对国产电影的审查和迫害更是变本加厉。1933年9月成立的“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接连公布了十数种“电影法规”,对电影从剧本到成片放映的各个环节都进行全面掌控和检查。根据“剧本审查委员会”的统计:“从1934年11月起至1935年3月止仅仅五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禁止了八十三个之多的电影剧本的拍摄。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这时也跟着强化了电影检查,公然禁止‘九一八’、‘一二八’的字样在银幕上出现。”^③有人因此感慨:“在中国,大概‘言路’要算是很窄了吧?但更狭的是电影的路。影剧本要审查两次,摄成电影以后还要经过一度严格的审查。但这还不要紧,倘使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形,一部影片从剧本到胶片,全都经过了合法的手续,顺利通过,而不能自由在各地上映,那就要使制片家和制作人受到了致命的重伤。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一点也不希(稀)罕。”^④在自己的国土上制作影片却要受到种种压制,这令很多电影人出离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审查之外,反动势力还辅以各种暴力手段。1933年11月,大批蓝衣社暴徒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向上海各影院发出“警告信”,威胁将以暴力手段对付影院放映进步电影的行为;1934年1月—1935年4月,反动势力在政治、经济、舆论等各个领域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电影公司和电影院施加持续高压,左翼电影运动被迫进入低潮期,“正面宣传反帝抗日、直接描写阶级斗争、深刻暴露社会黑暗的影片,也都失去了摄制的可能”^⑤。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华北事变在进一步加重民族危机的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月,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中国革命电影运动进入国防电影运动的新阶段。

国防电影依然不可避免地遭遇种种审查和迫害,曾用来对付左翼电影的种种卑劣手法,被变

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292-293页。

②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293页。

③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304页。

④郁文:《国防电影的题材问题》,《明星》1936年第2期。

⑤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305页。

本加厉地施加到国防电影身上。“在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就一再加以阻挠,而在它成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更接二连三地对它进行扼杀。”^①但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和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迫使国民党于1936年5月前改变对国防电影的策略,“由公开的反对与扼杀,转而为表面支持,背地里阻挠与迫害”^②。整体而言,国防电影运动的开展,大大受制于彼时国民党当局无孔不入的政治压迫和种种严苛的规章制度。身处如此境遇之下,进步的电影人试图拍摄有革命和抗战内容的影片,自然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让电影公司和电影人心有余悸,明星公司已经摄成的《热血忠魂》(1935)和预备投拍的《最后一滴血》(1936)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热血忠魂》历经数次审查修剪终于领到执照,但在汉口、重庆、广州等地却遭遇禁映厄运,“在公映之前,当地友邦的领事就向地方官交涉,要求禁映。为敦睦友邦起见,于是这本影片只得束诸高阁了”^③;而洪深的剧本《最后一滴血》,“检查的结果竟有六分之五‘要不得’”^④,自然也就没有了拍摄的可能。

除了要应对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各种审查,制片公司和电影人还要考虑最实际的商业投入和市场回报问题。毕竟,摄制一部电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若拍摄完成之后无法公映,制片公司必然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拍摄一部前途未卜的“国防电影”,意味着制片公司要面对诸多风险,这对基础薄弱先天不足的民族电影业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论者曾言:“电影公司老板的出资干电影事业,无非是为了赚钱,利用新兴的事业,藉以获得盈余,他们虽然也会注意于补助社会教育和捐着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的美名,但在他们的脑子里,还赶不上搭布景的一根泥木条子来得有用,虽然这话并不是电影公司老板都如此。”^⑤这一言论虽有尖刻之嫌,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制片公司投拍电影时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

《壮志凌云》的摄制,便发生于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壮志凌云》之前,吴永刚已在联华影业公司执导了《神女》(1934)、《小天使》(1935)和《浪淘沙》(1936)三部作品。《神女》使身为影坛新人的吴永刚一举成名,《浪淘沙》却因过度关注人性问题无视民族危机而遭遇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失利。当时有舆论批评道:“吴永刚先生以现在和神女时代比较起来,我觉得他是懦弱得多了,然而血腥和火药的气息,现在却是在日益浓厚呀,一个站在时代的前线的艺术家,为了懦弱的缘故,他是会退后下去的,然而敌人却在向我们进逼过来。”^⑥吴永刚在进行自我剖析时也坦承:“我承认我太懦弱了,尤其是站在这充满了火药和血腥气的非常时期,我们应该自省,我们应该贡献点什么给观众。”^⑦正是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转入新华影业公司的吴永刚在之前所写剧本《火山的溶岩》和《长白山下》的基础上,“提出了《壮志凌云》的故事”^⑧。

尽管在主观上具备了创作国防电影的强烈意图,但鉴于国防电影的艰难处境,如何既能规避政治审查又能有效传达抗日意图并争取良好的营业成绩,便成为吴永刚面临的重大难题。他在创作阐述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纠结与痛苦:“当我开始写壮志凌云的分幕和对白的时候,我是

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421页。

②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422页。

③姚克:《我对于“国防电影”的意见》,《中流》1936年第1期。

④姚克:《我对于“国防电影”的意见》,《中流》1936年第1期。

⑤刘壹:《关于制作国防电影》,《时代电影》1937年第6期。

⑥吴永刚:《〈壮志凌云〉导演者言》,《新华画报》1936年第1期。

⑦吴永刚:《写〈壮志凌云〉的动机及其他》,《新华画报》1936年第4期。

⑧吴永刚:《〈壮志凌云〉导演者言》,《新华画报》1936年第1期。

忍受着非常的痛苦,落笔的时候,煞费斟酌,种种地方,如何的避重就轻,委曲求全,我知道在前面的路是不会平坦的,我将要背起这十字架来。”^①“因为要使这戏能够促其实现,为着要避免外力的干预,在写作的时候常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只好委曲求全,写得隐晦一点,在这里我要深深的叹口气,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叹气,我们要低着头,咬着牙,干下去——干下去,为着我们这颓废的民族作一次呼声!”^②由此可见,采用较为隐晦的隐喻和影射方式,实在是导演迫不得已的选择。若非如此,《壮志凌云》根本没有跟观众见面的可能性。而如前所述,即便已经采取了隐晦的表达手段,影片依然难逃被审查和禁映的命运。若不是以张善琨为首的新华当局长袖善舞,《壮志凌云》在上海的禁映必成定局。

在上海映区以外,《壮志凌云》也难逃被删改的命运。据《电声》杂志报道:“为了情形特殊,凡是到东北去的电影,被修剪得很多。……《壮志凌云》也有人购去开映,据说片名换了一个,内容也会加以删改。”作者继而慨叹:“这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免的事实,因为我们在未失的领土之上,已同样感到此种痛苦,在东北那一定是‘当然’的了。国片市场对外受失地影响,对内为粤语片所乱,弄得越来越坏,如今在失地中尚保持这一点营业纪录,是应该可说满意的了。”^③影片名字被改、内容被删,却因能够侥幸上映而令人倍感庆幸和“满意”,《电声》杂志的百感交集,表达的无疑是对国防电影艰难境遇的不满和反讽。

四、价值与意义:为国防电影树立典范

《壮志凌云》在上海金城大戏院连映15天,观众观影踊跃。开映第六天,《申报》广告宣称:“拥挤情形打破任何纪录!三万余忠实观众即是有有力保证!”“开场以至终场掌声不绝!足见人心振奋民气激昂!”^④开映一周后,“观众四万,众口同声赞美!”^⑤“已映十二天,卖座始终不减”^⑥。作为继《狼山喋血记》之后最重要、最醒目的国防电影,《壮志凌云》引发的舆论反响亦十分热烈,它在表现国难、宣扬抗战方面的主张和成效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可以说,《壮志凌云》的出现和成功,回应了国防电影时期中国电影界的诸多困惑和争议,也大大激励了电影公司和电影人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电影界的风气,提振了在铁蹄下苦苦挣扎的进步影人乃至中国国民的士气,堪称“非常时期中,中国人的一服兴奋剂”^⑦。

自1936年5月“国防电影”口号被提出后,舆论界的主流声音均认同电影在国难当头之际应当发挥自己的文艺价值和使命:“国防电影,跟其他国防文字(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一样,是汉奸以外的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抗敌救(救)国的一种锐利的武器,它要给一切人民以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的思想,道德和情绪上种种煽动,它要反映外敌蹂躏之下的这无限多角形的现实的过去和现在,使人民更清醒的明瞭他们祖国的地位,使他们自身的生活出发,更锐利,更快速,更敏感,更理想也更实际的感觉到生之挣扎的迫切,因而觉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的重要。”^⑧但对于“什么样的电影是国防电影”和“当前情势下能不能拍成国防电影”等核心问题,人们却一直

①吴永刚:《〈壮志凌云〉导演者言》,《新华画报》1936年第1期。

②吴永刚:《写〈壮志凌云〉的动机及其他》,《新华画报》1936年第4期。

③《〈联华交响曲〉在东北开映〈小五义〉一段完全剪去〈壮志凌云〉亦被更换片名删改内容》,《电声》1937年第21期。

④《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5日。

⑤《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7日。

⑥《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12日。

⑦《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37年1月5日。

⑧克铭:《国防电影》,《沪光》1936年第2期。

争论不休。

关于“什么是国防电影”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声音。

一种声音认为电影界应从广义来理解“国防电影”的范围。比如,应云卫认为“凡是于中国民族有利的电影,就应该是国防电影”^①;柯灵认为:“‘国防电影’的题材是广泛的,不一定要描写义勇军抗敌……。环顾寰中,国事螭蟾,民生凋敝,四海汹汹,莫不与当前紧迫的现实有关,只要有艺术家的敏锐,也确乎可以信手拈来,都成妙谛。”^②言中之意,凡与当下现实相关的皆可成为国防电影的题材;郑伯奇则认为国防电影应该跟生活联系起来,但“国防电影并不限制历史上的取材。事实上,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历史作品有盛行之可能”,并提醒“取材历史,要不忘记从新估价,完全现在新的立场上的重新估价”^③;剑尘则提出应从两个方面取材:“一,以往历史上民族革命的故事”,“二最近国内军事建设及与国防有关之事实”^④。他还详细列举了诸多历史和现实的题材,如历史上汉武帝征讨匈奴开拓疆土之武功、唐太宗定突厥讨南越之伟政、薛仁贵平远东的奇迹、戚继光剿灭倭寇的光荣故事;近年来本国陆海空军大操写真、揭露无防海口的危状、边防要塞的介绍、国民服兵役的鼓励,等等,范围可谓广泛。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只有抗日电影才是真正的国防电影。比如,姚克就认为“国防”二字其实并不新鲜,若把国防电影视为“对付国难的电影”,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国难并非现在才有,而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前的民族危机正是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结果,但因为当别的帝国主义者自顾不暇,暂时没有余力作进一步的侵略,只有日本乘机加紧侵略步伐,因此现阶段的国难主要来自日本帝国主义。“根据以上的论断,目前提出的国防电影应该就是抗×(日)电影。否则,这个口号简直就不必提出。因为我们早已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先,假使国防电影的‘国防’二字并非抗×(日)的代辞,那么不过是标新立异的一个时髦口号罢了。”在此逻辑基础上,姚克反驳那种认为“国防电影的对象不仅是抗×(日),而是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说法,认为那样一来,国防电影的范围未免过于广泛:“若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影片都可以归入国防电影里去,那么大部分的国片岂不是都应该名之曰国防电影?我们岂不是已经有了许多国防电影了吗?这当然是太笼统了,而笼统的口号是最容易变成滥调的。国防电影的范围既如此广泛,那么甲公司摄一本子女反抗父母定的婚姻的片子可以挂国防电影的招牌,乙公司制一本某外商烟厂工人罢工的片子也可以挂国防电影的招牌。其流弊必至于每张国产电影都变成‘国防电影’,而国防的原意反被混淆了。”^⑤姚克认为,这样势必会对国防电影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人在综合国防电影广义和狭义两种范畴的基础上,对其范畴提出补充和限定。比如,凌鹤认为广义的“凡是最真实的描写现实,便是国防电影”的说法,“一定是联系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有了这本质的因,才有诸种现象的果。譬如表现华北问题,必得说明日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对华侵略,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与帝国主义者打劫的行为,解决华北问题,必得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但是假如作家并不指明这主因,只抓着经济恐慌或剥削关系等等,那就不是国防电影”;而狭义的“以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以全国抗敌的民众运动等等作为题材方是国防电影”的说法又过于狭隘,因为当前中国的敌人不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反汉奸、表现民族工业的崩溃

①应云卫:《国防电影我见》,《咖啡味》1936年第2期。

②柯灵:《国防电影漫谈》,柯灵:《柯灵电影文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③郑伯奇:《谈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33期。

④剑尘:《论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28期。

⑤姚克:《我对于“国防电影”的意见》,《中流》1936年第1期。

等问题显然是义勇军或民众抗敌之类的正面抗战不能涵盖的,“因此现在讨论国防电影,固然得集中火力在反帝抗敌的意义上,同时也不放松反封建势力的战斗,而技术上策略上却也不能不清算一番,注重统一战线”^①。

对于“当前情势下能不能拍成国防电影”的问题,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悲观主义者认为:“喊‘国防’的口号是一件事,做实际的国防工作是另一件事。‘国防电影’的名目并不是不动听,可是在这动听的口号之下,中国电影界是否能达到国防的实际呢?”^②这一悲观论调源于国防电影面对的诸多现实困境。如前所述,在敌对势力的干预和压迫下,明星公司的《热血忠魂》(1935)在外埠被禁映,洪深的《最后一滴血》(1936)剧本被砍;再往前追溯,被粗暴禁映或被迫删剪的影片更是不计其数。国防电影所面临的严酷现实,让悲观主义者不禁悲叹:“理论是理论,事实还是事实,假使在现环境下,真要拍摄‘国防电影’起来,事实问题,不能不顾,而果然能得免受阻碍吗?……在这一情形之下,即赶拍了‘国防电影’,又去映给谁看?”^③

对国防电影创作持乐观态度者则与悲观主义论调针锋相对。比如,针对姚克的观点,钟辛茹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要是像姚克先生那样所说的,不能摄制就不摄制,那么还是活活的待毙好了。”钟辛茹主张:“我们总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去,虽则环境不允许,但我们能在一部影片中些微表现一点‘国防电影’的意义也就有了。”^④应云卫则指出:“对国防电影作悲哀论调的,以为这些题材即使摄成电影,也会像过去一两张影片一样,不能公映的,但是客观环境是得用辩证法来分求的,只要我们制作者真的下决心,用尽一切的力量,用尽一切的手段去设法摄制,我们的电影观众真的热烈地要求并拥护着国防的作品,真正的国防电影是不会不能摄成的。”^⑤有论者更提出具体化的设想和建议,比如钟辛茹进一步提出了国防电影的三个原则:一是一切电影从业员、影评人及爱好中国电影的观众,无条件联合起来,反抗一切阻碍国防电影摄制的恶势力;二是要求每个作者都有自由创作,不受任何环境、任何主义的束缚,为民族解放而创作;三是要求所有影评人和电影刊物努力提倡和宣传“国防电影”的口号,鼓励大家摄制富有“国防电影”意义的影片,扩大电影界的爱国行动。^⑥《明星》杂志的编者在回答读者关于“国防电影”的问题时也提出:“倘使我们政府能够真正开放摄制影片的自由,对国防电影在营业上所受的意外打击(如租界不能上演等等)能稍稍加以保障,这问题就要好办得多了。”^⑦

从上述两种论调的交锋中,我们不难窥见国防电影所处的舆论困境:悲观主义论调过度夸大了国防电影面临的困难,否认国防电影有创作的可能,这无疑会让创作者为悲观消沉的情绪所左右,无益于国防电影的创作;但若无视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一味强调猛打猛冲,甚至幻想政府当局给予完全的创作自由和营业补贴,显然又耽于幻想,同样不利于国防电影的创作。

从1936年国防电影的创作实效来看,成绩也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是数量上严重短缺:“‘国防电影’喊了好久,但成绩呢?少的可怜,除了费穆先生的《狼山喋血记》之外,我们却再也想不出其它来。”^⑧与国防电影的萧瑟局面相对的,却是那些以追逐商业利润和麻醉大众为目的、“专

①凌鹤:《国防电影小论》,《国防周刊》1936年第1期。

②姚克:《我对于“国防电影”的意见》,《中流》1936年第1期。

③《煞风景的话》,《星华》1936年第31期。

④钟辛茹:《最近中国电影界动态——“国防电影”提出后》,《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期。

⑤应云卫:《国防电影我见》,《咖啡味》1936年第2期。

⑥钟辛茹:《最近中国电影界动态——“国防电影”提出后》,《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期。

⑦“国防电影”及其他》,《明星》1936年第4期。

⑧《时事新报李一先生评〈壮志凌云〉》,《新华画报》1937年第2期。

以取悦于有闲阶级”^①的“软性电影”大行其道。许多有识之士对国产电影的这种不平衡局面深感不满,又囿于当时国防电影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受到的重重压制而无可奈何。而被视为1936年“国防电影”代表作的《狼山喋血记》,却又因其过于强烈的寓意性而不被大众接受,在营业方面亦被视为一部失败之作,更给国防电影的反对者提供了“口实”,“于是某些人便讥笑‘国防电影’的不能成立”^②。国防电影颓弱不堪的创作现实,的确令人心生沮丧。

《壮志凌云》的公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由桃色而走进民族的阵线”^③。影片既以深刻的主旨生动地诠释了“国防电影”抗敌御侮的理念,又以通俗的故事和完美的表达技巧解决了一直困扰“国防电影”的观众接受问题,不仅大大提升了“国防电影”的声誉,也为其后“国防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大公报》靳栾高度评价《壮志凌云》,认为其在各方面都不下于《狼山喋血记》,“而作品的煽动性还要胜过《狼山喋血记》……比之寓言的《狼山喋血记》更易使观众明瞭”^④。如果说《狼山喋血记》为国防电影提供了内容和营业上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壮志凌云》便“显示了巨量的感动力,抗御战争暴露出我们北地同胞正当底自卫精神,观众被这壮烈的牺牲与严肃的昭示惊醒了。于是,吴永刚先生跟踪在费穆先生后面,奠定了‘国防电影’底初步基础”,《壮志凌云》因此被视为继《狼山喋血记》之后又一“壮烈的尝试”和“伟大的成功”。^⑤更重要的是,影片的摄制是电影公司和电影制作者在国难日重的情势下,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艺术使命感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当时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电影环境中,新华公司和吴永刚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7年6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的第四届“国产影片评选”活动中,新华公司的《壮志凌云》与明星公司的《小玲子》《女权》、联华公司的《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艺华公司的《广陵潮》《新婚大血案》、天一公司的《女同学》《杨柳村》等共计16部影片同台竞争,最终和《小玲子》入围前二甲。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郑重起见,决请邵力子部长,将此两片亲自过目,作最后的裁决,据一般人的推想,以为《小玲子》在技巧上相当不错,《壮志凌云》则更富于‘国防’意识;在那邵部长所说‘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主张之下,这次‘冠军’一席,无疑是该属诸《壮志凌云》;不意经他椽笔点元下来,‘大魁天下’的竟是《小玲子》,而《壮志凌云》却经列名第二了。”^⑥作为奖励,影片获得重新公映的荣誉。《壮志凌云》虽未能夺冠,但与公映前差点被禁映的命运相比,它的获奖意味着国防电影在获得大众推崇之外,也获得了政府当局的鼓励与认可,这与1937年中国的情势密切相关。时隔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后的八年间,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用血肉之躯和钢铁信念铸就了胜利的丰碑,也暗合了《壮志凌云》里团结合作抗敌御侮的家国隐喻。从这个角度而言,首映于1936年12月31日的《壮志凌云》是一个关于彼时家国的寓言,也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的预言。

①刘壹:《关于制作国防电影》,《时代电影》1937年第6期。

②《时事新报李一先生评〈壮志凌云〉》,《新华画报》1937年第2期。

③二马:《壮志凌云》,《天文台》1937年第39期。

④《大公报靳栾先生评〈壮志凌云〉》,《新华画报》1937年第2期。

⑤何可人:《国防电影》,《新华画报》1937年第6期。

⑥《中宣部国片评选功德圆满 小玲子大魁天下·壮志凌云列第二·女权第三 联华片子完全落选怪难为情的》,《影与戏》1937年第29期。

Difficult Breakthrough of Defense Films in the Dilemma

——A Discussion about the Banned Film *Soaring Aspiration*

Zhang Xiny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36, *Soaring Aspiration*, a film produced by Xinhua Pictures, was allowed to premiere at Shanghai's Jincheng Grand Theater after being banned and retried by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Industry Bureau. The "sound revolution blockbuster", which Xinhua Pictures had placed high hopes on, lived up to the expectations. With the director's great artistic ambition and its excellent production quality, the film became the landmark work of "national defense films" in Chinese film industry in a period of emergence. Facing the harsh reality of foreign invasion and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country at stake, Director Wu Yonggang could not bear his smoldered anger and anguish. Therefore, he made a strong appeal to the people to "resist theft and resist the enemy" through a heroic story which the public could fully understand. However, the obscure artistic expressions which the film was forced to adopt and the disturbance of its being banned before its release became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of defense film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defense films; *Soaring Aspiration*; banned films; national metaphor; Wu rong gang; Left-wing films

责任编辑:李宗刚



不停歌的生产线 李萍 画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5卷 第5期(总第292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 办 山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 65 No. 5 (Serial No. 292)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 Jinan 250014,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u.edu.cn

刊号: ISSN 1001-5973
CN 37-1066/C

定价: 15.00元